

侵華急先鋒，盡現諜影刀光，

四十年橫行，積重纍纍血債。

徐付群等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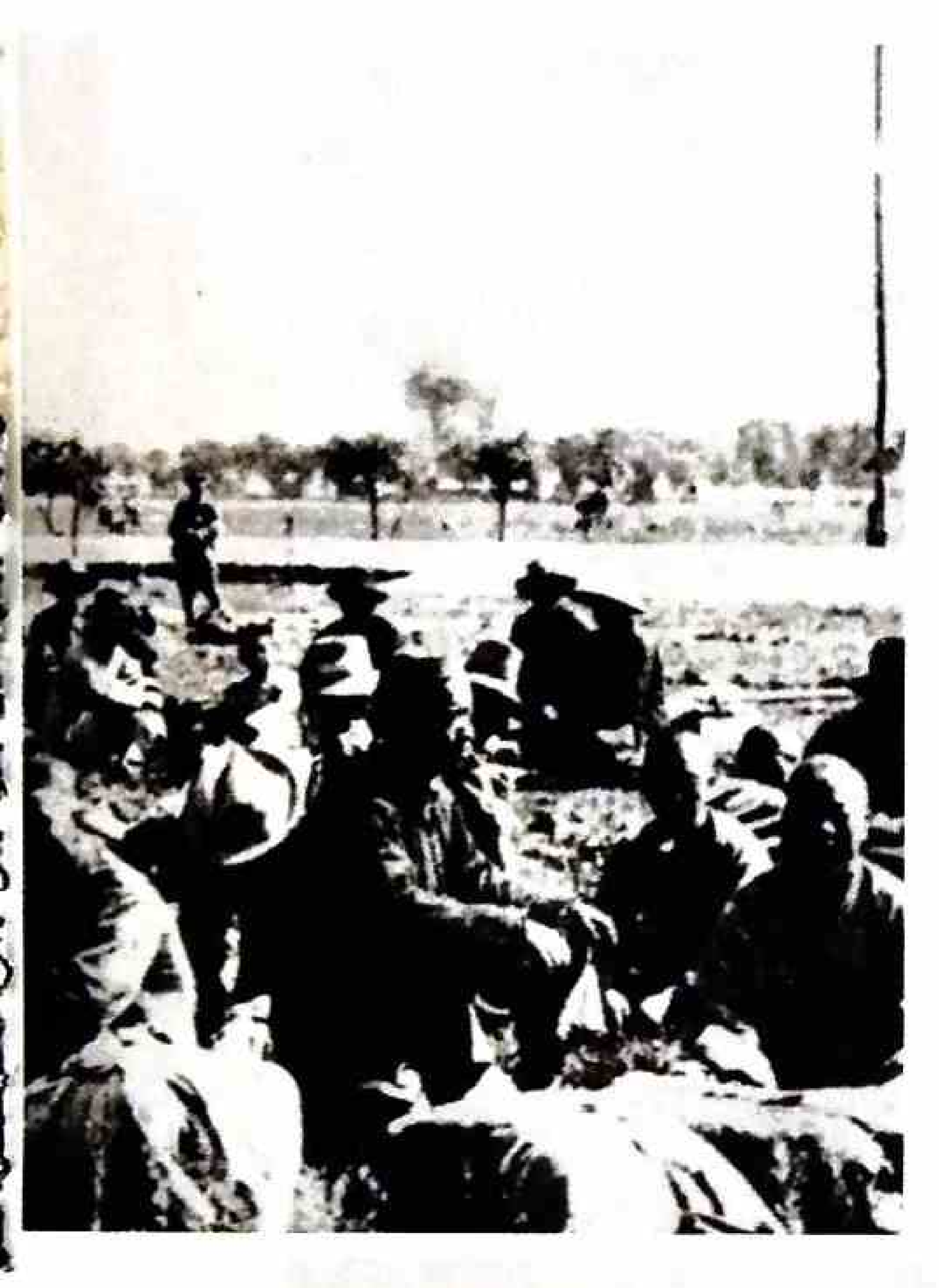
日本關東軍獸行內幕

利文出版

在皇姑屯事件中，奉系軍閥張作霖被日本關東軍用炸葯謀殺，引發了戰爭事端。圖為肇事現場被炸毀的列車。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晚，日本關東軍在沈陽城北的柳條溝自行炸毀南滿鐵路，引發九·一八事件，並猛轟東北軍的駐地北大營。



（左圖）九·一八事件後，北大營被日軍侵佔。圖為部分被俘中國兵。

（下圖）武漢會戰期間，為阻止日軍西進，中國空軍轟炸日艦及沿長江的機場，圖為被擊落的日軍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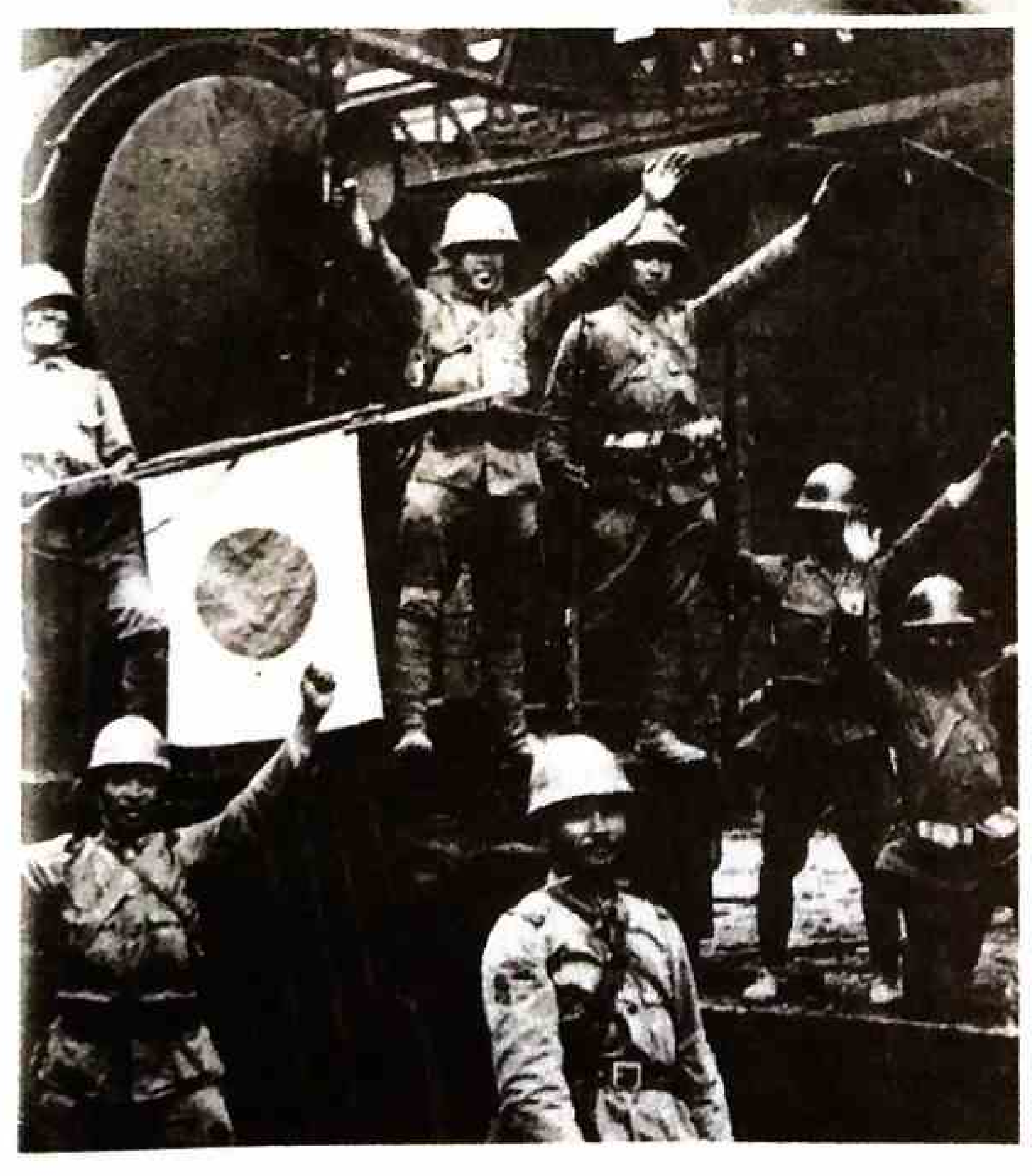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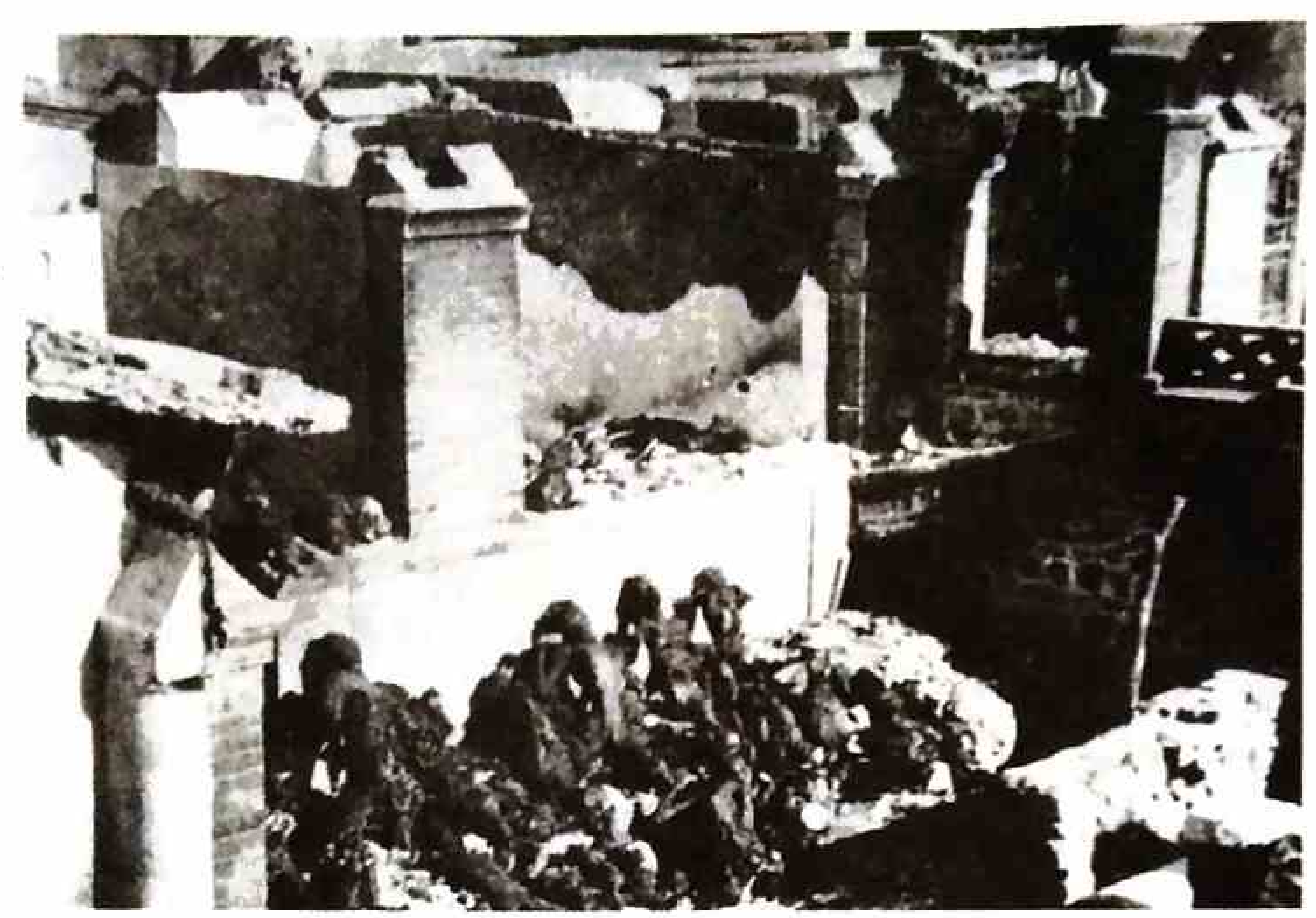


九·一八事變後國聯組成了以英國人李頓為團長的調查團到中國。上圖為李頓會見中國政府的代表顧維均。下圖為調查團訪日本關東軍司令部。



華中重鎮武漢市，是日軍侵華的力爭之地，中國軍隊在重軍攻擊的無奈之下，盡毀市內軍事設施，放火燒城後撤退。圖為日軍攻入空城漢口。





一九四一年一月二十五日，日軍炮製的河北丰潤“潘家峪慘案”，日軍集中村民，以機槍掃射，共死傷民眾近二千人。圖為劫後慘況。



一九四三年八月，日軍在河北省進行“掃蕩”，陽平村一帶一千一百五十二村民慘遭殘殺。



日本關東軍繳械投降



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上的日本一級戰犯，前排為辯護律師。

目録



第一章

急先鋒粉墨登場

關東軍是支很特別的軍隊。這支軍隊盤踞中國東北達四十年之久，没打過幾次像樣的戰爭，卻在日本享有『皇軍之花』的美譽。

這是一支『威名』遠揚的軍隊，一支獨斷專行的軍隊，也是一支罪惡累累雙手沾滿中國人鮮血的軍隊。

這支軍隊是日本軍國主義對外武力擴張的產物，它毫不猶豫地充當了日本對華殖民軍的急先鋒。

現在，讓我們揭開那一層層厚重的歷史帷幕，來看一看關東軍的真面目：

倭人垂涎東北虎視眈眈

東北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領土。

遠在舊石器時代，我們的祖先就勞動、生息、繁衍在這片美麗富饒的土地上。

從夏至春秋的奴隸制時代，東北就被納入中國的版圖，成爲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從戰國至鴉片戰爭前的封建時代，歷代王朝都在這裏設官鎮守，對東北各民族實行有效的管

轄。

然而，豺狼入室，平地起災禍。近代以來的中國史册記載了東北美麗的河山和勤勞善良的人民所遭受的太多屈辱與苦難：

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數千名英軍强佔大連灣作爲進擊京津的基地。他們肆意拆毁民房，掠奪糧食，搶劫牲畜，迫使沿岸居民扶老攜幼，背井離鄉。美麗的大連灣被糟蹋得一片荒凉。

正當英法聯軍于一八五八年春兵逼京津、滿清朝野震驚之時，沙皇俄國趁火打劫，迫使清政府與之簽訂《瑷琿條約》。從此，黑龍江以北，外興安嶺以南的六十多萬平方公里的中國領土盡歸沙俄所有。

沙俄貪慾無止境。它又强迫清廷簽訂中俄《天津條約》、《北京條約》等不平等條約，大肆攫取在華權益。同時其武裝侵略的魔爪則繼續伸向烏蘇里江以東地區的中國領土……

前院有狼，後院有虎。英、法、俄對東北的侵略還在繼續，東方島國日本謀劃的『大陸政策』又把東北地區納入其戰略視野，作爲擴張爭霸的重點目標。

『大陸政策』是一個野心勃勃的征服全世界的侵略政策，它發端于十九世紀六十年代末的『征韓論』。

一八六八年日本明治維新成功，規定了『拓萬里之波濤，揚國威于四方』的對外方針，初步顯露其勃勃野心。次年一月，明治政府派使臣去朝鮮遞交文件說：『我皇即位，重整綱紀，親理萬機，極願睦鄰』。孰料朝鮮方面不買這個賬，以違背舊例爲由拒絕接受，讓日本人碰了一鼻子

灰。木户孝允由此借機首倡『征韓論』。他說：『要以朝廷之兵力，開拓朝鮮之釜山浦港。此舉……于確定皇國之大方向，可使億萬人對內外之目光一變』。『朝國之事，可借以確立皇國之國體，……在東洋大發光輝……，當以此爲始。』

但由于國內變亂，『征韓論』暫時擱淺。

一八六九年八月，明治政府改組時設立外務省專事外交。該省向太政官建議，從對清外交入手來解決朝鮮問題。它提出的方案是：先與清國締結友好條約，取得與清國平等的地位，然後利用清國與朝鮮的宗屬關係，使日本位于朝鮮之上，易使其接受建交的要求。

于是，一八七〇年九月，日本政府派外務權大丞柳原前光等來華，要求簽訂修好條約。當時柳原花言巧語地對李鴻章說：『英法美諸國强逼我國通商，我心不甘而力難獨抗』，『唯念我國與中國最爲鄰近，宜先通好，以冀同心合力』。

這番游說正中李鴻章下懷。清廷也正巴不得有個同盟者與之攜手抗拒西洋人的侵犯，便應允了日本的請求。

雙方經過談判，于一八七一年九月十三日簽訂了《中日修好條規》。這是中日兩國在近代史上簽訂的第一個條約。其中明文規定：

『嗣後大清國、大日本國倍敦和誼，與天壤無窮。即兩國所屬邦土，亦各以禮相待，不可稍有侵越，俾獲永久安全。……』

『兩國既經通好，自必互相關切。若他國偶有不公及輕藐之事，一經知照，必須彼此相

助，或從中善爲調處，以敦友誼。」

但是，剛剛踏上資本主義路途的日本一心謀求國際市場，擴大生存空間，這些條文對它根本没有任何約束力。一八七二年十月，《中日修好條規》批准生效還不到半年，日本便違背條規，單方面把清國『屬邦』琉球列爲藩屬，改稱琉球藩。七年後加以吞併，改稱冲繩縣。

一八七三年九月起，日本政府再次掀起『征韓論』，鼓動侵略清國的另一『屬邦』朝鮮。兩年後的九月，日本政府派兵艦侵入朝鮮江華島沿岸，開炮擊毀朝鮮守軍炮台，並登陸燒殺，製造了江華島事件。次年春，迫使朝鮮簽訂『修好條約』，使日本攫取了自由貿易權、租借權、免納關税權、領事裁判權、測量海岸權等。從此，日本將朝鮮置于不平等的、附屬國的地位。外務省于一八六九年提出的『征韓』方案獲得顯著成效。

在强迫朝鮮修約之前，日本還于一八七四年春精心策劃了侵略清國『屬土』台灣的事件，向中國發動了第一次侵略戰爭。

一八七八年，日本『大陸政策』又向前跨了一大步。該年年底，日本政府制定的《擴張參謀本部條例》，將參謀本部從陸軍省下獨立出來，使之成爲直屬于天皇的專掌軍令事項的機關。其用意就在于爲對鄰近大陸的俄國、清國、朝鮮進行擴張作好準備。

爲了推行此項大陸政策，參謀本部成立伊始就承擔了一項特殊的使命——對『支那、朝鮮、樺太、滿洲，堪察加、西伯利亞沿岸』，『詳考其地理、政誌，』『爲有事之日，作好其參劃之圖略』。

一八七九年至一八八〇年，十二名軍官被參謀本部派駐中國各地調查軍備和地誌。擔任從朝鮮到中國沿海地誌和政情管理局局長的桂太郎，與該局的小川又次少佐到中國作了視察。歸國後，桂太郎提出一份題爲《與清朝鬥爭方策》的調查報告，設想派三個師團佔領大連灣並襲擊福州，然後一舉攻下北京，迫使訂城下之盟。

時任參謀本部長的山縣有朋肯定了桂太郎的作戰計劃，並胸有成竹地吹噓：『本邦在海陸攻戰方略上業經初步規劃。』

一八八七年，參謀本部制訂了題爲《討伐清國之戰略》的侵華計劃。這個計劃把對清國開戰的時間，規定在清國實現兵制改革以及歐美各國擁有遠征東洋實力以前。爲此，日本應在一八九二年以前完成對清國作戰的準備，在有機可乘時發起攻擊。其中還特別規定：由于旅順半島是控制清國北部、壓制朝鮮的要害地區，因此應趁俄國忙于經營中央亞細亞時加以佔領。

一八九〇年三月，剛坐上內閣首相這把交椅的山縣有朋，拋出他起草的《軍事意見書》和《外交政略論》在閣僚中傳閱。山縣在這兩個文件中爲侵略大陸政策製造了一個新論點，他鼓吹說：『國家獨立自衛之道，其途有二：第一是守衛主權綫，第二是保護利益綫。何謂「主權綫」？國家之疆域是也。何謂「利益綫」？即同我「主權綫」的安全緊密相關之區域是也。』

山縣所說的『區域』就是指中國和朝鮮。

同年十二月，山縣有朋在日本第一屆帝國議會上發表首次施政演說，公開宣佈了他的『保衛利益綫』的觀點，並以此要求大幅度增加海陸軍預算，大肆鼓吹擴軍備戰。

這標誌着大陸政策的公開出台。

所謂大陸政策，概括起來説，就是以『征韓論』爲開端，並以『征服滿洲』和『經營滿洲』爲重點，實現『征服中國』，最後『征服世界』的侵略政策。後來設立關東軍，是日本爲推行大陸政策而走出的具有戰略價值的一步棋。

野心勃勃的日本垂涎華夏，虎視關東。它像準備撲向獵物的狡猾的野獸，在尋找着突然進擊的時機。

關東軍司令部的誕生

日本人的機會接踵而至。

一八九四年，日本人發動中日甲午戰爭，在陸路兵分兩路侵入中國東北。戰後强迫清政府簽訂不平等的《馬關條約》，將遼東半島吞入口中。它所推行的大陸政策取得重要進展。這使日本侵略者欣喜若狂，忘乎所以。

但是，日本獨家割取遼東半島引起了幾個列强的不滿。《馬關條約》剛一簽訂，俄國政府就開始邀請德、法兩國對日採取共同行動，『勸告』日本政府放棄對遼東半島的獨佔。三國名義上是爲了中國首都的安全和朝鮮的獨立才干涉還遼，實際上心懷『分杯羹』的鬼胎。

日本自忖敵不過三國，幾經躊躇，決定全部接受三國『勸告』，放棄條約中『永久佔領遼東半島之壤地』的條款，並强迫清政府花五千萬兩巨款贖回遼東半島。

沙俄出面迫使日本歸還遼東半島，是爲了自己佔領這塊土地，企圖把六十年代末吞併的黑龍江以北和烏蘇里江以東的大片領土，再擴大到黑龍江以南和烏蘇里江以西，並向南一直延伸到中國東北最南端，建立東方的『黃色俄羅斯』。沙俄的胃口一點也不比日本小。

一八九六年，俄國邀請李鴻章參加沙皇尼古拉二世加冕典，誘使李鴻章簽訂了《中俄密約》，在『共同防日』的幌子下，把東三省的北半部變成俄國的勢力範圍。隨後又派兵强佔旅大，迫使清政府簽訂《中俄旅大租地條約》和《續訂旅大租地條約》。遼東半島落入俄國人手裏，東北全境成爲俄國的勢力範圍。

日本人又眼紅又惱火，怎奈力不如人，只好暫時咽下這口氣。

經過甲午戰後幾年的『卧薪嘗膽』，日本政府認爲條件已經成熟，利用對俄作戰之機來奪取中國東北地區的美夢可以實現。

一九〇四年二月八日夜，駛往旅順的日本艦隊先發製人，偷襲旅順口外的俄國太平洋艦隊。日俄戰爭正式打響。十日，日本天皇下詔宣戰，公然宣稱：

『韓國之存亡，實爲帝國安危之所繫……若滿洲歸俄國所有，則韓國之保全無由維持。』

詔書竟把日本的安危歸結爲韓國的存亡，把朝鮮能否保全歸結爲滿洲歸誰所有。這樣，爲了保證日本的安全，它就必須『佔據滿洲』。

這就是帝國主義的强盜邏輯。

戰爭開始後，清政府無可奈何地宣佈中立。日俄交兵，戰火卻在中國領土上慘烈地燃燒。

經過一年多的廝殺，日本獲勝。

一九〇五年九月，日俄在美國波士頓以北的海軍基地樸茨茅斯簽署和約，達成了私分中國東北的骯髒交易。和約規定：（一）沙俄政府將旅順、大連及其附近的領土和領海的租借權讓與日本。（二）沙俄政府將長春（寬城子）旅順間的鐵路及其一切支綫，以及一切附屬的一切權利、特權（包括採礦權）及財產無償地轉讓給日本。

不久，日本外務大臣小村壽太郎率領在樸茨茅斯談判的人馬，趾高氣揚地開進北京，同清政府『商議善後』，簽訂了《中日會議東三省事宜條約》（亦稱『北京條約』）。日本侵略者由此順利地取得了《樸茨茅斯和約》中俄國轉讓給它的全部權益，並乘機攫取了一些新的權益。

這樣，明治天皇『要奪回遼東』的積年夙願得以實現。東北南部成了日本的勢力範圍。此後，日本利用《北京條約》這一『合法』的依據，在維護『滿洲利益』的口號下，開始了新的肆無忌憚的侵略行動。

關東軍就是爲適應對東北的侵略擴張的需要而誕生的。它的前身是『滿鐵』守備隊和常駐南滿的一個師團。

所謂『滿鐵』，全稱是『南滿鐵路公司』，成立于一九〇六年底，經營由長春（寬城子）到旅順間的東清鐵路及其所有支綫。它既是代替日本政府經營南滿洲的『國家機關』，即殖民侵略機構，又是以經濟掠奪爲目的之一的國家壟斷資本主義企業，在日本對中國東北的經濟侵略活動中，『滿鐵』一直充當先鋒和主力的角色。

根據日中媾和條約的追加條款，日本有在南滿鐵路沿綫駐軍的權利，可以每公里駐紮十五名士兵擔任守備。一九〇七年，日本正式設立『守備隊』，名義上專事守備滿鐵及其附屬地，實際則是殖民擴張的打手。兩年後，『守備隊』編成六個大隊，總數接近四千人，分駐公主嶺、開原、奉天、大石橋、瓦房店等地。『守備隊』由直屬天皇的關東總督指揮。此外還有常駐南滿的一個師團也歸關東總督指揮，其司令部設于戰略要地遼陽。兩部兵力計約萬餘人，被命名為『關東軍』。與後來相比，此時的關東軍由于歸關東總督指揮，缺少獨立行動的能力。

一九一九年，鑒于關東都督府權力過分集中，並干預外交和施政方針的執行，駐滿軍事機構進行了空前的大改革，宣佈撤銷關東都督府，建立關東廳。

此次改革旨在縮小都督府的機構，限制都督直接或間接對外交的干涉。改革後的關東州統治機構變成了伊藤博文等人倡導的民政方式。關東廳長官原則上由天皇親自任命的文官擔任，其權限僅限于對關東州的管轄和專司南滿鐵路警務，在涉外工作中受外相的監督。

機構改革的一項重要内容是把關東都督府陸軍部改為關東軍司令部，並從總督府中獨立出來。首任代理司令官是立花小一郎大將。

關東軍司令部擁有原關東都督所掌握的一個師團、六個獨立守備隊，其任務是防衛關東州，保護南滿鐵路。直至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前夕，關東軍的基礎建制大體如下：

獨立守備隊六個，每個步兵獨立守備隊有成員九百人，共計五四百人；常駐一個師團，兵員五千人；總兵力為一萬零四百人。

關東軍總司令部設在旅順（駐一個步兵聯隊和重炮兵大隊）。

駐屯師團司令部設在遼陽，其中：步兵旅團司令部設在遼陽（一個步兵聯隊）；步兵旅團司令部設在長春（一個步兵聯隊）；步兵聯隊本部設在奉天（獨立大隊）；步兵聯隊本部設在旅順（一個步兵聯隊和重炮兵大隊）；騎兵聯隊本部設在公主嶺（一個騎兵聯隊和獨立大隊）；野炮兵聯隊本部設在海城；工兵大隊本部設在鐵嶺。

獨立守備隊司令部設在公主嶺，其中：獨立步兵第一大隊駐紮公主嶺；獨立步兵第二大隊駐紮開原；獨立步兵第三大隊駐紮奉天；獨立步兵第四大隊駐紮連山關；獨立步兵第五大隊駐紮大石橋；獨立步兵第六大隊駐紮瓦房店。

就這樣，關東軍司令部作爲一個『軍』而獨立了。關東軍就是在這個基礎上逐漸發展成爲一支龐大的野戰部隊，號稱日本陸軍的精銳，有『皇軍之花』的美稱。

駐滿軍事機構大改革，使軍方自日俄戰爭以來一直期望的軍隊對南滿的完全控制終于破產。新成立的關東軍，起碼在形式上也只是關東州和南滿鐵路的衛士。

但從另一方面來説，這支駐滿日軍『獨立』之後，擺脱了來自各方面的羈絆，反而輕鬆自由多了。它在作戰和動員計劃上接受參謀總長的指揮。這樣，由陸軍大將或中將擔任的關東軍司令官，自此以後可以以統師權獨立的名義，擺脱任何牽累，在滿蒙大地上自由馳騁。

『對付北方敵人』的軍隊頻頻插手中國軍政

日本前武藏大學教授島田俊彦在《關東軍》中寫道：

『遼東守備軍約有六個以上的大隊兵力。它是獨立于第一綫以外的作戰部隊，在這一點，與其後的關東軍有些相似，但還不能說它就是關東軍的前身。因爲遼東守備軍，不具備關東軍那種以俄軍爲假設敵、旨在對付北方敵人的基礎特征。……』

島田俊彦這段話中有關關東軍系譜方面的論述頗有可商榷之處，只能算是一家之言。我們認爲所謂遼東守備軍即是後來的關東軍的雛形。

但島田俊彦這段話卻揭示了關東軍的一個方面的性格，即它是以位于北方的俄軍爲假想對手的。這反映了日本的『國防方針』。

爲了給陸海軍作戰計劃提供一個可遵循的準則，同時也爲各項軍事工作奠定根本指導思想，日俄戰爭以後，日本制定了國防方針，並于一九〇七年四月被批准。

根據這個『帝國國防方針』，俄國首當其衝，被看成是第一個『想定敵國』，其次是美、德、法諸國。當時，日俄戰剛剛熄滅，硝煙尚未散盡。戰敗的俄國被迫將其在南滿的一切權益幾乎很不情願又毫不保留地轉讓給了日本。日本判斷，沙皇俄國必定不會善罷甘休，待其國力恢復之後，肯定要捲土重來，圖謀報復。

于是乎，盤踞在中國領土上的日本殖民者儘管沒把衰弱的中國政府放在眼時，卻時時籠罩在

另一個殖民帝國的威脅之中。

以俄國爲假想敵的方針始終得到日本軍方的貫徹。

一九一〇年，陸軍炮製的『對清策案』一方面鼓吹『爲對抗中國收回特權運動需要日俄合作』;另一方面卻在結論中泄露了天機：『自不待言，我軍建軍的要義，至少應以可對俄軍發起進攻爲標準。』

次年，陸軍大臣上原勇作在其一份意見書中以『將來與我國發生衝突的最危險仍是俄國』爲由，主張『組建兩個師團，乃當務之急』——要知道，上原勇作講這番話的時候，也正是日、俄兩國加强合作，關係有所改善的時候。

不過應該看到，『對付北方敵人』的方針是服務于『征服滿洲』、『征服中國』這一戰略目標的。日本人把軍隊派駐東北，斷然不是爲了去更有力地對付沙俄;相反，日本以沙俄爲第一敵人，是因爲俄國是與之爭奪東北的最有力對手。因此，日本人並不拘泥于對俄備戰，『對付北方敵人』的軍隊一有機會便頻頻插手中國軍政。

且看粉墨登場的關東軍初期的幾次表演。

一九一二年初，在關東都督府統治下的南滿，發生了關東軍武裝干涉中國革命的事件。

這一年，革命黨的勢力準備滲入清廷的政治心臟北京。與此同時，革命軍經由海路出現在山東半島一帶，並由遼東半島登陸，力圖由滿洲方面顛覆清政府，于是組成北伐軍第一軍，先期北上到達芝罘海域。

革命軍的動向引起日本方面的警惕。日本第二艦隊司令官吉松茂太郎中將，交給北伐軍一封嚴重警告信，嚴禁他們對遼東半島採取任何軍事行動。

但革命軍北伐部隊約六百人，不受日本海軍警告信的束縛，于二月二日在遼東半島的尖口山登陸，把司令部設在李家卧龍，並開始招兵。很快擴充爲一支一千七百人的隊伍，擁有兩門火炮。

清軍沿南滿鐵路大舉南下，準備迎擊革命軍。

尖口山一帶位于日本租借地關東州北側。條約規定，這裏屬于中立區，沒有日本官憲方面的同意，中國陸軍不准進入這裏。于是，日本政府接連兩次譴責革命軍違反條約，並于二月十三日向清軍與革命軍雙方發出最後通牒，要求他們撤出中立區。

很快，關東都督指揮下的駐紮師團之一部，受命進駐中立區內的金廠屯、萬家屯和蓋平，以示威脅。清軍與革命軍，本來要廝殺一場，怎奈經不住日本關東軍的武力恫嚇，分別于二十日至二十三日無可奈何地撤退到中立區以外和海上。革命軍由北方威脅北京的計劃，在日軍干涉下就此宣告破産。

這是關東軍第一次武裝干涉中國內政。

一九一六年春，在大隈内閣倒袁（世凱）方針慫恿下，幾名日本軍官勾結盤踞在内蒙的蒙古馬隊首領巴布扎布，密謀策劃第二次『滿蒙獨立運動』。

六月，袁世凱暴死，黎元洪出任總統，段祺瑞任國務總理。日本政府因而停止反袁活動，轉

爲採取援助段祺瑞的方針，以便控制中國。『滿蒙獨立』隨之破產。

接着發生了鄭家屯事件，關東軍積極出動，擴大事端。

第二次『滿蒙獨立運動』流產後，巴布扎布率領的三千騎兵在日軍庇護下頻頻與中國政府軍發生衝突。當時奉軍第二十八師馮麟閣部隊進剿巴布扎布軍，該師第二十八團駐紮于鄭家屯。

八月十三日，日本商人吉本與一名中國士兵發生口角，吉本即憤憤不平地到日本警署告狀。按說這只是民間糾紛，鷄毛蒜皮而已，沒啥了不得的。但驕橫的日本巡警川瀨卻小題大作，先是到二十八團團部尋釁，繼而去日本兵營糾集二十餘名士兵，殺氣騰騰直奔二十八團團部而來，結果言語不合，導致武力衝突。一場混戰之後，中國士兵死亡四名，傷數名；日本兵當場死七名，後因重傷又死五名。

這就是所謂『鄭家屯事件』。

事件發生後，日軍一方面電請附近各部來援，一方面要求中國軍隊撤出城外。八面城一個大隊奉命來援。日軍獨立守備司令官藤井少將命駐公主嶺騎兵第三十一聯隊兩個中隊和鐵嶺獨立守備步兵一個大隊、機關槍一個小隊向鄭家屯出動。

儘管中國軍隊根據日方要求，立即退出城外三十里，日軍各部到達鄭家屯後，仍將遼源鎮守使署及中國各營房悉數佔據，並張貼佈告，宣稱由鄭家屯至四平街三十里內，不准中國人入內，以示全行佔領。

鄭家屯事件由日本人挑釁而引起，但日方卻以此爲借口，不斷擴大事態，其目的是援助蒙古

巴布扎布和宗社黨勤王軍，借以對中國相要挾。日本政府借口鄭家屯事件向北京政府外交部提出的『懲罰第二十八師師長』、『對于被害者予以相當之慰藉金』等無理要求，張作霖均予以接受。人們不難看出在這一事件的前前後後關東軍所起的重要作用。

一九一七年，俄國爆發十月革命，結束沙皇的統治。日俄兩國共同侵略中國東北的聯合陣綫就此宣告壽終正寢，日本則加入帝國主義武裝干涉俄國革命的行列。參謀本部不失時機地積極擬定以保護日本僑民爲名的出兵西伯利亞計劃。

在出兵西伯利亞問題上，日本統治階級内部的具體意見並不一致，但幾乎所有的人都認爲在此時向西伯利亞出兵是千載難逢的良機。可以乘機奪取貝加爾湖以東的西伯利亞爲日本領土，或在這裏建立日本的傀儡國家；使西伯利亞和『南滿洲』之間的『北滿』和内外蒙古自然地落入日本手中，加强對中國的控制。

日本爲了出兵西伯利亞進攻十月革命後的俄國，更爲了加强對中國的侵略，于一九一八年三月至五月間强迫中國簽訂了『中日共同防敵軍事協定』。通過這個協定，日本開始實現中國軍隊的隸屬化，日軍可以『合法』實現軍事侵入中國東北，佔據並管制東清鐵路，佔據中國東北北部和俄國西伯利亞，以實現其侵吞東亞大陸的野心。

八月二日，日本政府發表『出兵西伯利亞宣言』，兵分陸、海兩路，大舉進犯俄國；同時又以『保護僑民』、『自衛』、『防敵』等名義，軍事侵入中國東北北部。爲此，關東軍再次出動，充當擴大侵略東北的打手。

八月中旬，關東都督中村雄次郎中將奉日本陸軍中央部的命令，將其駐『南滿』的第七師團長藤井幸槌指揮的一個混成旅（藤井支隊），以保護僑民爲名，沿中東鐵路侵入滿洲里一帶；並以一個步兵聯隊侵入哈爾濱與海拉爾之間，將第七師團主力駐紮于『北滿』。

九月，日本軍部又命令關東都督派遣一個支隊，經由東北北部，侵入俄國沿海州，同時命令關東都督，將其『守備區』由旅大租借地和滿鐵沿綫擴大到全東北和俄國外貝加爾州，要他維護守備區的治安並建立秩序。實際是企圖把這一廣大地區變成軍事佔領區。

凡爾賽和會之後，英、美、法、意等名國部隊先後由西伯利亞撤退。唯獨日本不但不撤兵，反而決定緊急增派第十三師團，以圖賴在俄國和中國東北北部。

一九二一年初，在國內外輿論的壓力下，日本與中國交換公文、宣佈廢除日華軍事協定。但日本政府仍不撤兵，反而于該年五月十三日通過了一個『關于滿蒙政策』的決定，大放厥詞曰：

『……滿蒙與我國領土相接，並與我國國防及國民生存上關係極爲密切。以上述兩大利益爲着眼點，在滿扶植我國之勢力，此乃我國對滿蒙政策之根本也。』

此時日本已不只强調其在『南滿』『東蒙』的優越地位』，而是强調『滿蒙』即全東北和『東蒙』了。

日本人的胃口越來越大。

一九二二年九、十月間，日本開始陸續從『北滿』和西伯利亞撤兵，伸得長長的黑手開始往回縮。這並不意味着日本人泯滅了吞併全東北的野心，而是暫時改變了策略，轉而採取扶植和勾

結東北地方實力派的方針。

日本人早就看好了奉系軍閥張作霖。利用張來加緊侵略全東北，這就是『滿蒙政策』的實質所在。

在這種背景下，關東軍又會有怎樣的表演呢？

獨斷專行地干預郭松齡事件

郭松齡事件發生在一九二五年第二次直奉戰爭之後。

一九一九年夏季，張作霖在日本的支持下實現了『統一東北』的野心。此後，又依仗日本的支持，接連窮兵黷武，向關內擴張勢力。奉張先是聯合直系推翻皖系段祺瑞把持的北京政權，繼而排擠直系勢力，組織親日的梁士詒內閣，引起直系不滿，直奉兩家終于兵戎相見。一九二二年四月二十九日至五月四日，直奉兩軍在長辛店、固安、馬廠等地先後發生戰爭，結果奉軍大敗。這就是第一次直奉戰爭。

兩年後的九月三日，江浙戰爭爆發。次日，張作霖即決定出兵討直，以報一箭之仇。自九月十七日起，直奉雙方在山海關附近連續發生激烈戰鬥。十月中旬，直軍招架不住，漸顯敗勢。吳佩孚正擬派兵增援，不料第三軍司令馮玉祥突然發動『北京政變』，對直系反戈一擊，導致直系的總崩潰。十一月初，吳佩孚率殘部乘軍艦倉惶南逃。第二次直奉交兵就此罷戰。

據傳說，第二次直奉戰爭期間，在馮玉祥政變的背後，有日本陸軍的派出機構在活動。由于

參謀本部的土肥原賢二大佐和黃郛一起對馮玉祥進行了有效的説服工作，才使馮玉祥斷然嘩變。關于這一工作與關東軍有什麼關係，尚不得而知。不過，陸軍大佐宇垣一成和上原勇作元帥，不但知道這些事，而且有迹象表明，他們曾唆使海外派出機構這樣做。因此，不能認爲關東軍沒有插手這件事。然而，這還只是幕後動手腳，在此後不久發生的郭松齡事件中，關東軍走上前台，開始獨斷專行起來。

郭松齡是東北軍中的將星。他畢業于北京陸軍大學，在東三省講武學堂任教官時結識了張學良，其作風爲人和軍事才能很爲張學良所欽佩。張學良從講武學堂畢業後接任衛隊旅旅長，同時向父親張作霖保薦郭出任該旅的參謀長。郭在一九二〇年的剿匪軍事行動及兩次直奉戰爭中屢建功勛，進一步得到張氏父子的器重。郭曾任奉軍步兵第八旅旅長，與張學良的第三旅合署辦公，郭負實際責任，時稱『三、八旅』。一九九二年第一次直奉戰爭以後，張作霖整編奉、吉、黑三省軍隊，統一以『東北軍』番號，張學良第三旅改爲第二旅，郭松齡第八旅改爲第六旅，這就是當時著名的東北軍精銳『二、六旅』。第二次直奉戰爭時，奉軍（東北軍）編爲六個軍。張學良、郭松齡任第三軍正副軍長，與第一軍組成聯合司令部，這就是東北軍主力部隊『一、三聯軍』。郭松齡不僅統率第三軍，還同時統連第一軍。第二次直奉戰爭後，張作霖有意提高『少帥』的權位，郭松齡便在張學良的倚畀之下，統帥了奉軍的全部精銳。郭氏治軍有方，在軍事改革方面有頗多建樹，他所帶的部隊風氣煥然，旗甲鮮明，堪稱精銳之師。因此，張學良對郭格外信重，言聽計從，他曾説『郭茂宸（郭松齡的字）就是我，我就是郭松齡』。張作霖也非常器重郭，特地

安排他輔佐『少帥』。

郭松齡就是這樣一個深得張氏父子信任的將領。

正是這樣一個深得張氏父子信任的將領，突然間大張旗鼓地反奉，將兵鋒指向『老將』張作霖。

其實郭松齡早就對張作霖與日本人勾勾搭搭心懷不滿，同時也不滿于張爲爭奪地盤而窮兵黷武，征戰不休，因此早有改革奉天之志。

二次直奉戰爭後，奉軍乘勢南下，一路奪取天津、河北、山東、江蘇和安徽。奪得蘇、皖兩省地盤後，張作霖竟派了郭的死對頭楊宇霆、姜登選兩人爲兩省軍務督辦，郭松齡認爲『老將』賞罰不公，更增忿恨之心。

一九二五年十月，孫傳芳拼湊了浙蘇皖閩贛五省聯軍，自任總司令，向佔據滬寧的奉軍發起進攻，奉浙戰爭爆發。奉軍連吃敗仗，剛得的地盤不得不撒手放棄，狼狽北撤。此時，奉軍既要制止孫傳芳的進攻，又要防備馮玉祥率領的國民軍的側擊。張作霖命令張宗昌、李景林部在津浦綫對付孫傳芳，令張學良和郭松齡率新組的第三方面軍六個整編師七萬人的精銳，在津榆一帶對付馮玉祥。

郭松齡卻暗中與馮玉祥聯手，積極佈署反奉。

十一月中旬，奉軍對馮方作一些讓步，決定將保大地區讓給馮玉祥。但是當國民軍第三軍去保大接防時，與奉軍發生武裝衝突。張作霖聞訊大怒，責罵馮玉祥出爾反爾，不守信用，要下令

動兵，與馮決一雌雄。

郭松齡不同意與馮軍開戰，他在天津對張學良說：『東北一片沃野，寶藏很多，可以開發經營，不應再在關內爭奪地盤，惹起戰爭。這是我和李景林的共同意見，希望轉達上將軍（指張作霖）多加考慮』。

張學良是否把郭的意見透露給張作霖了，不得而知。不過『老將』很快就電召郭松齡回瀋陽一趟，張學良也勸郭回去見張作霖當面陳述自己的意見。郭松齡意識到自己的活動已被張氏父子識破，去瀋陽凶多吉少，延誤下去夜長夢多，于是下了『提前行動』的決心。

當天郭松齡向張學良說：『上將軍腦筋太舊，受羣小包圍，恐已無可挽救。』他極力主張父讓子繼，由張學良接任東北最高首腦，改革東北三省局面，他本人願竭誠擁護。張學良聽到這番話不禁駭然，但他未動聲色，潛行搭乘北寧路火車東返。

郭松齡見自己的意圖已完全暴露，便立即派人赴包頭與馮玉祥商洽合作，簽署了聯合反張密約。密約主要內容爲：開發邊疆，保存國土；各理庶政，不事內政；改組合法政府，不與外人訂立賣國條約云云。

十一月二十日，郭以張學良的名義下令部隊東撤。

兩天後，總司令部列車抵達灤州，在這裏召開了團長以上軍官會議。郭松齡發表即席講話，列數張作霖勾結日本、窮兵黷武的罪行，宣佈班師反奉。他向軍官們公佈了自己的主張：移兵開墾，不參加內戰；要求張作霖下野，懲辦楊宇霆；擁護張學良爲司令，改革省政。

郭松齡還在反奉宣言、通電中闡述了其內政、外交方針、所部將領不管願意與否，相繼在反奉宣言上簽名。

當夜，郭將所部東北軍改稱『東北國民軍』，自稱總司令。七萬人的軍隊分編爲五個軍，官兵臂部一律佩帶書寫『不擾民、真愛民、誓死救國』的綠布徽章。

幾天之後，郭松齡下令主力部隊全綫出動，七萬人的精銳之師浩浩蕩蕩殺向關外，兵鋒所向，直指奉天。

郭松齡起兵時，奉軍大部已調到關裏，奉天只有少數衛隊。驚慌失措的張作霖，急急忙忙向關東軍求援。他没有同任何人商量，就親自帶着日本顧問，到瀋陽日本站滿鐵地方事務所的樓上，和由旅順關東軍司令官白川義則派來的日本軍官達成了一項口頭密約。密約的內容，主要是承認日本人有滿洲享有土地商租權和雜居權；在東邊道、洮昌道等重要城鎮，設置日本領事館。交換條件是關東軍答應對郭松齡發出警告，警告郭軍不得在滿鐵沿綫二十里內落下一枚炮彈（實際上就是阻止郭松齡軍隊開進奉天省城）；並在必要時，日本關東軍可以出兵保護張作霖和擔當維持奉天省城的治安。此外，關東軍還同意滿鐵火車不載運郭軍，並在滿鐵附屬地內（指瀋陽日本車站而言）或日本租借地內（指旅順、大連而言）提供給張作霖等要人作爲避難場所。

得到了關東軍的承諾，惶惶不可終日的張作霖一邊往日本人那裏轉移財產準備逃亡，一邊手忙腳亂地調兵遣將，部署軍隊迎擊郭松齡造反部隊。

現在輪到關東軍出場表演重要角色了。

其實，郭松齡起兵之初，關東軍便開始插手了。十一月二十六日，張學良搭乘軍艦抵達秦皇島，邀郭面談，企圖説服他幡然醒悟，郭拒不相見。與張學良一同到達秦皇島的關東軍參謀浦登江，帶來了白川司令官對郭的警告，要求郭立即停止軍事行動，並施以各種威脅、恫嚇之詞。郭不爲所動，要求日本嚴守中立，不要支持任何一方。

關東軍的意圖很明了，它要援助張作霖，排擠郭松齡。然而，這種直接插手的行動是與參謀本部的主張相左的。

郭松齡事件發生後，張作霖的顧問松井少將自不必説，連關東廳和總事館也一起主張援助張作霖。而幣原喜重郎外相和宇垣陸軍大臣則表示反對。他們認爲只要日本在滿洲的地位不受損害，就没有必要火中取栗。幣原外相還認爲，日本不要只拘泥于滿洲的形勢，而應該設法與目前尚能左右中央政局的馮玉祥和國民黨接觸。關東軍向陸軍總部報告了準備在遼河一綫阻擊郭軍東進，而參謀本部卻禁止他們違背不干涉内政、維護已有特權的既定方針。因此，關東軍只得採取預防措施，立即派駐滿第十師團之一部集結于奉天，以防可能出現的混亂。

關東軍與參謀本部之間在侵華問題上並没有原則性的分歧，只是在具體採取什麽樣的方針上與本部有相左之處。這就是被日本學者突出强調的所謂關東軍的『獨斷專行』的性格。

十二月初，郭松齡的『東北國民軍』與奉軍在連山激戰兩日，擊潰了奉軍防綫，下一個目標就是瀋陽。

形勢對奉張來説已相當危險。張作霖又氣又急，亂蹦亂跳，甚至有傳言説他準備下野。

即使在這種情況下，陸軍總部也沒有全力援張的打算，而只是指示關東軍司令官白川義則同時警告張、郭二軍，要他們保護日本的權益。十二月八日，白川司令官遵命向兩軍轉達了這一警告。

十三日，郭松齡部約二千人準備渡過遼河進兵營口，白川司令官沉不住氣了，他不顧陸軍部的方針，急命日本守備隊長阻止郭軍渡河。

關東軍還通過日本駐營口領事向郭軍送達關東軍的通牒，並威嚇說：『你們不要以爲營口只有奉軍鮑英才一個營的力量。我們日軍在南滿有兩個師團，在朝鮮有兩個師團，隨時都能開到……』

十四日，白川又以維持治安爲名，繼續强硬地阻止郭松齡部進入營口。對此，郭軍提出嚴重抗議，營口的英國領事也對關東軍表示不滿。這一措施完全出自白川司令官的個人獨斷。

當時，郭、奉兩軍均在巨流河附近排兵佈陣，準備決一死戰。關東軍禁止郭軍在營口渡河，替奉軍保有營口，阻遏並限制了郭軍右翼別動隊的活動。郭軍不得已退往田莊台，陷于進退維谷境地。

關東軍還曾以兩軍戰綫已接近滿鐵附屬地爲由，制定了一個把附屬地週圍三十公里以內的範圍劃爲禁止戰鬥區域的方案，呈報給中央，同時通知給郭松齡部。

宇垣陸軍大臣把白川的方案修改爲：『日本軍隊禁止兩軍在距南滿鐵路附屬地兩側以及該鐵路終點約二十華里以內的直接軍事行動。』

宇垣令白川將上述警告通知給張、郭兩軍。

幣原外相還打電報給駐奉天總領事吉田說：『只要他們的行動不超出第二次警告規定範圍，即使在禁止戰鬥區內，對兩軍的存在和通過，也可以採取默許的態度。因此，禁止郭軍進入營口的指令，自然解除。』

白川把修改後的警告于十五日對郭軍發出，並附加了一條說：『如果不聽勸阻，立即解除你們的武裝。』以此表示關東軍的決心。

白川司令官顯然不滿足于這有『放縱』郭軍傾向的警告。就在發出第二次警告的同一天，由駐遼陽的步兵第十聯隊，抽調了一個中隊（官兵五十人）去營口，以加强那裏的警備。這表明白川仍然不同意郭軍渡河和進駐營口。

郭松齡曾于十五日向日本駐華公使芳澤提出抗議。日本方面訓令關東軍嚴守中立，不得偏袒任何一方。

但關東軍依然我行我素。關東軍控制下的南滿鐵路，只給張作霖從吉、黑兩省調運軍隊，卻不准郭軍靠近。瀋陽『南滿站』及鐵路要隘，則有日軍挖掘塹壕備戰，並對郭軍的行動加以限制。因此，奉軍得以迅速地集中力量在巨流河一綫，郭軍的全部行動卻受到嚴重牽制。

根據關東軍多次要求增兵的請求，十六、十七兩日，由駐朝軍隊派出兩個步兵大隊和兩個野炮中隊。十九日以後，又由內地抽調混成第一旅團到達奉天。

二十二日夜，巨流河決戰開始。白川司令官派出幾十名關東軍炮手幫助奉軍操縱一五〇毫米

重炮，每彈必中。而郭軍的火炮因有人破壞了炮彈，不能發揮應有的威力，因而傷亡慘重，挫傷了銳氣。

次日，奉軍全綫出擊。郭軍兵敗如山倒，竟致一敗塗地，不堪收拾。兩軍勝敗之決戰，至此已成定局。

再次日凌晨，郭松齡在一片混亂中偕夫人韓淑秀及少數機要人員和部分衛隊潛逃。後來郭氏夫婦被奉軍捕獲，就地處決，屍首運回瀋陽在小河沿曝屍三日。郭軍餘部被解除武裝。

轟轟烈烈持續一個月的反奉戰爭就這樣功虧一簣。

郭松齡反奉失敗，關東軍的橫加干涉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關東軍並沒有直接參加對郭軍作戰，但它强有力的側面工作，一來牽制了郭軍的進擊行動，二業爲奉軍贏得了寶貴的機會。

至于關東軍爲什麼熱衷于干預郭松齡事件，答案似乎並不複雜。它本身是一支殖民侵略的先鋒部隊，負有維護大日本帝國在華既得權益並創造機會擴大侵略的使命，干預郭松齡事件很自然地成爲其使命的重要一環。

另外，島田俊彦在《關東軍》一書中有段文字是耐人尋味的。他寫道：

在這次郭松齡事件中，白川司令官爲什麼對支持張作霖表示出這般熱情？關于這一點，不難想象，白川與張有着不尋常的關係。可是，除此之外，陸軍内部的對抗也驅使白川援助張作霖。當時的陸軍省向每一個重要軍閥將領都派去了一個「中國通」軍人。給張作霖派去的是松井七夫，給馮玉祥派去的是松室孝良，給郭松齡派去的是佐佐木。因此，張作霖對郭松齡的

決戰，在另一個側面，可以說是白川對佐佐的較量，張作霖的勝利可以說是一位大將對一位少佐的勝利。』

這就是日本人眼中關東軍干預郭松齡事件的原因。

然而不管怎麼說，關東軍無視中央的行動，開創了關東軍獨斷專行的先例。如果說一九一九年關東軍的獨立使之有了任意馳騁的可能，那麼干預郭松齡事件只不過是獨斷專行的開端，小試牛刀而已。愈來愈濃的大日本帝國尖兵的過剩意識，會驅使它作出更加膽大妄爲的行動。

第二章

張作霖慘遭謀害

日本人扶持張作霖登上『東北王』寶座

帝國列强在對華侵略中慣于『以華制華』。培養一個黃皮膚的代理人，給中國人造成一種『自主』的假象，而他們則可以更爲隨心所欲地從中國土地上攫取所需要的一切。貪婪的日本軍國主義者對中國東北虎視眈眈，垂涎三尺。爲了加强對這片領土的侵略和掠奪，他們物色的合適的代理人就是叱咤一時、大名鼎鼎的張作霖。

張作霖，生于一八七五年，字雨亭，奉天（今遼寧）海城人。其父開小商舖，兼設賭局。張作霖讀過幾天私塾，十四歲喪父，做過小買賣，當過貨郎、獸醫，學過木匠，還在大車店做過傭人，在營口街上當過流浪漢，在清軍中當過兵，也坐過清朝的班房，又當過『胡子』（土匪）。從小不務正業，與賭棍流氓爲伍，爲非作歹。後來，在他岳父的支持下，糾集散兵游勇三十多人，成立『保險隊』，爲地主豪紳當『保鏢』，專事打家劫舍。不久，又由步兵轉爲騎兵，聲勢日大。一九〇二年，張作霖當上了八角台團練長，有部卒二三百人。

一九〇三年，張作霖的『保險隊』被清朝新民知府收編爲地方官軍，張本人被任命爲新民府

游擊馬隊管帶（即騎兵營長）。後又升任巡防營統和奉天巡防隊前路統領，所部已擴充爲五個營。

辛亥革命爆發後，張作霖奉東三省總督趙爾巽之命，率部移駐瀋陽，並任奉天國民保安會軍事部副部長，捕殺了一百多名革命黨人。他還和三十三名舊軍將領聯名發表效忠清廷的通電。

袁世凱當上了臨時大總統，任命趙爾巽爲奉天都督，張作霖爲奉天巡防隊第二十七師中將師長。一九一五年，張作霖又贊同袁民凱稱帝，被封爲一等子爵。

張作霖是個見風使舵的人，也是個野心勃勃不甘人下的人。但是，無論當年嘯聚山林混迹江湖，還是後來效命清廷及投靠袁世凱，這位土匪頭子出身的『好漢』大概很難夢到東北的千里沃野盡歸己有的美事。

而歷史偏偏安排他過了十年『東北王』的癮。

自然，張作霖的上台，是由于得到日本帝國主義的在力支持。如果没有日本的支持，張作霖是不可能取得統治東北的大權的。張作霖積極投靠日本，以便發展自己的勢力；而日本政府也想支持張作霖，使其充當日本侵略東北的代理人。

不過，談及張作霖與日本的關係，還要倒回去從日俄戰爭那陣説起。

當時，日本人爲了在俄軍後方製造混亂，曾派大批間諜潛入中國東北地區。俄國人也針鋒相對，以毒攻毒。日俄奉天戰役之後，日軍派井户川少佐爲新民屯軍政署長。當地日本憲兵隊懷疑張作霖是俄軍收買的間諜，予以逮捕，並呈請井户川判除死刑。井户川則認爲張作霖部下頗多精鋭的騎兵，可供利用，因而一再向兒玉參謀長請示，終使張作霖獲釋。井户川命張在表示願爲日

軍效命的誓約上簽字，張作霖順從地摁了手印。

這是張作霖投靠日本人的開端。

一九一一年，武昌起義成功，東北革命黨人也密謀策應。張作霖率所部巡防營迅速鎮壓了革命運動，此舉既效忠了清廷，又得到日本人的賞識。

野心勃勃的張作霖瞅準時機，日益加緊與日本勾結。

一九一二年一月的某一天，張作霖親自拜訪日本駐奉天總領事洛合謙太郎，投其所好地對洛合說：

『我深知日本在滿洲有許多特權，而且和滿洲有特殊關係。……日本對我如果有何吩咐，我一定盡力而爲。』

同年十二月，日本關東都督福島中將路過奉天，張作霖又專程前往拜訪，表示願意按日本人的指示行動。

當時洛合等人立即將張作霖的情況向日本外務省和參謀本部作了詳細彙報，並建議日本政府在對滿政策上，充分研究利用張作霖的方針是必要的。

一九一五年十月，張作霖參加日本在朝鮮召開的所謂『始政紀念博覽會』，借機前往漢城，拜見了朝鮮總督寺內正毅，向寺內說明『中日親善大義』，論述滿洲和日本的關係，表示自己的親日意見，自稱要『與寺內肝膽相照』。在這次活動中，張作霖給寺內留下了極好的印象，引起了日本統治集團的重視。

張作霖總算沒有白費一片良苦用心，幾次三番的諂媚、討好終于奏效。一九一六年，對張作霖印象頗佳的寺内正毅上台組閣，決定利用張作霖實現其侵略東北的政策。

當時，張作霖剛戴上一頂奉天督軍的烏紗，同時又兼任奉天省長，官運亨通，欲當『東北王』的野心也迅速膨脹。為此，他也主動向寺内内閣靠攏。

這年十月，張作霖對他的日本顧問菊池中佐說：

『我對日本在滿蒙的地位十分了解，對日本開發滿蒙一事持歡迎態度。現在中國南北衝突勢所難免，我力避投入政爭漩渦，一意和日本提攜，維持東三省及東蒙的安定秩序，以專心致力于開發。』

張作霖特地請菊池將他說的意思轉達給寺内總理大臣。張作霖用盡心機討得日本人的歡心，殊不知寺内内閣對他的表現已經相當滿意了。

寺内内閣中最有權勢的内務大臣、前滿鐵總裁後藤新平，在主張利用張作霖問題上也是最堅決的一個。他說：

『張作霖並無宦途履歷，與中央政府亦無密切因緣，而在滿洲則有特殊之勢力與地位。張離滿洲則無地位，蓋以滿洲為唯一之勢力範圍也。張氏心中唯有權勢利慾，別無他種知識。彼認日本在滿洲有絶大勢力，反對日本于彼不利，傾向日本于彼有益。如果利用此特殊之地位，照其心中所認識者而行，則張氏為滿洲專制之王，而日本亦得利用張氏，在滿洲為所欲為。』

後藤新平的一番話入木三分地刻畫了張作霖的嘴臉，同時也使日本人的險惡用心暴露無遺。

自此以後，日本對張作霖的支持日益加强。張作霖既攫取了奉天軍政大權，便在日本人的支持下，開始編織『統一東北』的美夢。

對張作霖來説，通向『東北王』寶座的道路似乎並不怎麼艱難，因爲他爭奪東北霸權的每一個步驟，都得到了日本人的諒解與支持。特別值得一提的是，第二十八師師長馮德麟和吉林督軍孟恩遠是通往『東北王』寶座之途上的兩大障礙，如果缺了日本的贊助和支持，張作霖是很難搬掉這兩塊石頭的。

一九一七年二月十九日，張作霖委托菊池顧問和日本駐奉天總領事館坂東書記轉告日駐奉天總領事赤冢說，他決定對馮採取最後手段，倘若日本在當時能保持『好意的中立，並給以精神上的援助』，他『不惜給以任何報酬』。

赤冢認爲，應當全力援助張作霖，並將張掌握在日本手中，因爲這是推進日本在南滿各項事業的千載良機。

東京也是這個意思。外務大臣本野立即電令駐奉天總領事赤冢：『帝國政府十分同情張作霖的立場，因而對他這次採取的行動，絶不加以任何直接或間接的妨害。』

得到了日本的保證，張作霖放心大膽地全力對付馮德麟，對馮採取軍事行動。一番爭鬥之後，馮德麟的二十八師兵權落入張作霖手中。

在奉天的統治地位既已得到鞏固，張作霖便張大胃口，積極向吉、黑兩省擴張勢力。

一九一七年七月，張作霖借口派兵進入黑龍江省境，趁機安派親信鮑貴卿當上黑龍江省督

軍，從而掌握了該省的軍政大權。次年九月，北京政府任命張作霖為東三省巡閱使。

一九一九年七月，日本蓄意製造『寬城子事件』，迫使吉林督軍孟恩遠向張交出兵權。張作霖在走向『東北王』寶座的道路上又邁出了一大步。

同年九月十九日。長春車站，日本人船津不顧哨兵阻攔，强行通過駐長春北部的吉林軍營地，引起衝突。事後，船津立即報告長春日本駐軍。日軍馬上開到吉林軍營地，同時又從公主嶺、鐵嶺等地調來大批關東軍。衝突不可避免地發生了，廝殺中雙方互有死傷。日軍以此事件為借口，蠻橫地要求吉林軍全部撤出長春。他們還惡人先告狀，煞有介事地向北京政府提出抗議。在親日派段祺瑞控制下的北京政府，乖乖地立即下令將孟恩遠、高士儐免職。吉林也落到張作霖手裏。

張作霖如願以償地登上了『東北王』的寶座。

本該『終生感恩』的張作霖竟然打起自己的小算盤

『東北王』的寶座是日本人幫助張作霖坐上去的。張在東北的『自治』和整軍經武，與日本的援助密切相關。奉軍向關內的擴張，在二次直奉戰爭中得勢，均得益于日本在裝備、經濟上的大力支持。在郭松齡事件中，如果沒有關東軍强有力的側面工作，『東北王』的寶座恐怕早就易主了。日本人對張作霖『恩重如山』。

其實，張作霖也不是白沾日本人的便宜，他是以出賣東北主權的巨大代價來換取日本的支持

的。張作霖的地盤有多大，日本人就可以隨心所欲地在多大的地盤上强取豪奪。

但日本人胃口很大，慾壑難填。他們不希望張作霖有絲毫自己的主意，他們需要的是一個完全依日本人意旨行事、要什麼給什麼的傀儡。

而張作霖有時卻不那麼乖，不那麼馴服，甚至打起自己的小算盤，把對自己有『洪恩』的日本放在不適當的位置。關東軍高級參謀河本大作大佐這樣指責張作霖：『因爲幫助過他，所以應當終生感恩，他卻没有這樣的義氣。這已經在郭松齡事件中試驗過了。』

没錯，張作霖是日本帝國主義扶植起來的。但張投靠日本是爲了借勢擴張自己的實力，統治東北，控制中央，從而獨步天下。他可不甘久居人下，給日本人當孫子。

因此，隨着奉系軍閥集團勢力的不斷擴大，張作霖同不斷提出索取東北權益的『恩人』日本之間，也發生了利害衝突。

從一九二五年起，張作霖對日本方面提出的一些要求，往往採取拖延甚至拒絕的態度，不願意完全按日本帝國主義的意圖辦事。

一九二七年六月，張作霖沐猴而冠，在北京就任所謂『中華民國陸海軍大元帥』，組織『安國軍政府』，君臨北洋軍閥政府小朝廷。張作霖自以爲成了中央，更不願意像過去在關外一樣仰日本人鼻息了。

張作霖甚至認爲：既然控制了北京政府，要穩定政局，保住自己的實座，單靠日本的支持是不夠的，還需要取得英、美等國的支持。于是又同英、美拉扯關係，從他們那借錢修建打通（打

虎山——通遼）、奉海（奉天——海龍）等鐵路。儘管這些鐵路和一九二四年以來奉張當局修建的所有鐵路都加在一起，也難以與日本控制下的南滿、安奉、吉長、四洮等路相抗衡，但是如果能與中東路、京奉路聯運，將使『滿鐵』處于被包圍的態勢。因此，日本人感到『滿鐵』生意受到威脅，甚是不悦。

並且，與南滿鐵路平行的打通綫和海吉綫的貫通，違背了日中一九〇五年『北京會議』的約定。日本方面再三提出抗議，張作霖均置之不理。

他拒絕了日本提出的在奉省帽兒山設立領事分館的建議；他還下令禁止日本人在奉天經營的中文報紙《盛京時報》的發行……

日本出兵山東、召開『東方會議』、逼取東北權益等一系列明火執杖的侵略行爲，激起了中國人民的憤怒，掀起了大規模反日示威游行和罷工運動。其中以東北地區的反日、排日運動最烈。僅奉天一地，一九二七年八月就有十萬人舉行示威游行，甚至連日本卵翼下的奉天省議會也開始協商反日辦法。全國各地則掀起一股抵制日貨浪潮。

懾于排日運動的浩大聲勢，張作霖不願、也不敢完全聽命于日本帝國主義。否則，不僅要落個賣國賊的罪名，而且有可能丢掉自己的『寳座』。

因此，在這個時期，對于日本方面提出的各種要求，張作霖一般採取拖延的辦法。即使是被迫答應，也是私下應允，避免以官方的形式公開答覆。

例如，『東方會議』之後，日本趁張作霖還掌握北京政權，抓緊時間向張索取『滿蒙』權益。

一九二七年十月，滿鐵總裁山本條太郎直接與張作霖秘密交涉，雙方達成諒解，訂立被稱爲『山東與張作霖協定』的密約，即所謂『滿蒙新五路協約』。根據這個密約，應將五條鐵路的修建交由滿鐵承辦。密約議定之後，日本政府唯恐與張作霖之間訂立的秘密協約不合法定手續，又要求將上項密約改爲政府間的正式協定。但張懾于羣衆反日運動的壓力，不同意日方要求，懇求無論如何，作爲日本政府與張之間的密約，由地方解決。後來日本政府幾次三番地要求張作霖履行正式手續，都未得到滿意答覆。直至一九二八年五月，乘張作霖敗北之際，才逼迫張履行了正式簽約手續。

張作霖的這種不積極合作的態度，當然上日本人感到十分不滿。日本政府間有相當一部分人力促日本重新確定對張的策略。

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七日至七月七日，日本政府召集『東方會議』，決定了對中國的積極侵略政策。

期間還討論了對張作霖的處置辦法。

當時，張作霖剛當上『陸海軍大元帥』，組織『安國軍政府』。但某些敏銳的日本人已經看到張氏地位難保，遲早要敗給南方國民黨軍隊，因而極力主張挑選適當人物代替張作霖。其中以外務省亞洲局局長木村最堅決。他在所提交的《有關中國時局對策考察》這篇報告中說：

『……任何時候都以張作霖爲唯一目標，是極其短見的，而且是極爲失策的。……』

『……要想在這種妥協的結局中成爲優勝者，就必須有一定的人緣，即有威望。從這種觀

點來看張作霖的現狀，衆所周知，他是一個沒有任何政治手腕的武夫；在中國本土沒有威信，這在各政治家、各團體、各軍人之間已成定論。而且他長期扶植起來的勢力在東三省也是最不得人心的。……現在他已進入老年，要想改變他的思想、恢復其威望，只不過是空想。』

『……帝國應當盡快把張作霖個人的浮沉同維護帝國在滿蒙特殊地位的問題，截然區別地予以考慮；把這種看法付諸實施的時機已經到來。這就是說，鑒于張作霖今天所處之困境，只要我方不予援助，他的自我消亡也就是時間問題。這時，日本必須拋棄那種擔心在對華關係上，在整個中國和世界上失掉聲譽，以及認爲將縮短張的壽命，而要同他生死與共的想法。因此，對他不僅不予援助，必要時，甚至還要對他施加相當的壓力。』

上述引文，字裏行間充滿對張作霖的失望情緒。關于張作霖的下場，報告作了三種設想，明確提出要拋棄張作霖，尋找大日本帝國在中國的新的代理人。

政務次官森恪和關東軍一部分人則堅決主張釜底抽薪，一腳踢開張作霖，武力佔領東北。但同時也有相反的意見，如日本駐華公使芳澤認爲：內戰對奉軍不利，但無人可取代張作霖爲奉軍統帥；即使奉軍在敗退之後，也只能依然推舉張作霖爲滿洲的當權者，除此別無他策。

田中首相也傾向于繼續利用張作霖。一九二六年北伐開始時，田中曾對張作霖感到絕望，甚至打電報給駐中國的大使，提出改爲支持楊宇霆，遭到拒絕。此時他又轉爲支持張作霖，其中的原因就不得而知了。

由于田中等人的堅持，『東方會議』認爲，當前中國形勢對張作霖不利，張『應充實東三省

的基礎，維持治安，安定人心，以便防止動亂的波及。』會議發表的《對華政策綱領》中明文規定：『東三省實力人物如能遵守我國在滿蒙的地位，……則帝國政府應予以適當的支持。』

田中首相主張保留張作霖，繼續利用他；而陸軍部、參謀本部和關東軍都主張解除張作霖的武裝，趕張氏下野。岌岌可危的張作霖的命運，將受哪種主張所支配呢？

張作霖破口大罵：『他媽拉巴子的，豈有此理！』

一九二八年一月，蔣介石重任『北伐軍』總司令，決定北代攻打張作霖。該年四月，蔣與馮玉祥、閻錫山、李宗仁等組成四個集團軍，興師北上伐張。

當『北伐軍』進入濟南時，日本借機二次出兵，在濟南槍殺中國軍民，製造了『五三慘案』。懾于日本人的軍事恫嚇，蔣介石忍辱屈服，繞過濟南繼續北進，于五月中旬將兵鋒逼近京津一帶。

在北京當了將近一年的『陸海軍大元帥』的張作霖，也抖擻精神欲與蔣軍決一死戰。『張上將軍』本人和張學良、楊宇霆分別擔任總、副司令，在京津一帶佈置了三路大軍，嚴陣以待。一時間劍拔弩張，戰爭一觸即發。

不過，形勢已明顯不利于張作霖。在已經發生過的戰事中，奉軍（東北軍）所屬張宗昌、孫傳芳部不堪一擊，節節敗退。奉軍的全面崩潰只是早晚的事。張作霖慘淡經營了一年的北京政權已是危在旦夕。

一九二八年四月二十日，關東軍曾以參謀長齋滕恒少將的名義向陸軍省提出：『帝國政府應于奉軍敗退前聲明，爲使關内戰亂不致波及滿洲，帝國政府將採取適當的自衛手段。另外，如奉軍或南方革命軍的武裝部隊無視這一聲明侵入關外時，關東軍應不失時機地把駐紮師團主力調至山海關或錦州附近，不管他們是張軍還是革命軍，均以武力阻止他們出關，必要時可解除其武装後再准許其進入關外。』

前文説過，關東軍對張作霖已完全絶望。上述齋滕恒少將的建議表明，關東軍的意圖在于單方面解除奉軍武裝，逼張下野。狡猾的關東軍考慮到中央對張的不同態度，因此没有過分地明目張膽，而是給這一强烈意圖包上了『嚴正中立』的外衣。

京津地區的緊張局勢對東北可能造成的影響，引起了田中内閣的關注。五月中旬接連召開兩次内閣會議專門討論這一問題，通過了『關于維持滿洲治安的方案』，並立即把一份備忘錄交給張作霖和蔣介石。備忘錄説：

『由于中國連年戰亂，一般國民生活陷入極度不安和困苦之中。居住在中國的外國僑民亦不能安居樂業。因此，中外國民無不希望戰亂早一天結束，在中國實現和平統一。特别作爲中國的鄰邦，與中國有着至深利害關係的日本帝國，亦在翹首以待。然而，如今戰亂已經波及平津，滿洲也將受其影響。日本帝國對維持滿洲治安至爲重視，帝國政府極力阻止擾亂該地區治安，或有可能導致治安紊亂事態之發生。因此，鑒于戰亂已經波及平津，其禍亂殃及滿洲之際，作爲帝國政府爲維持滿洲治安計，不得不採取適當而有效的措施。然帝國政府對交戰之雙

方，採取嚴正中立之立場不會改變。因此，在採取以上措施時，將考慮到時機和方法，儘量做到對雙方都公平合理。』

這個方案還規定，如果奉軍盡早撤退，主動脱離接觸，秩序井然地退出關外，不影響治安，則日軍不一定非解除其武裝不可。但若是北伐軍進入關外，不管其採取何種形式，都要斷然予以阻止。

就實質而言，日本内閣的方案與關東軍向陸軍部提出的建議没有什麼兩樣，都有解除兩軍武裝的打算。不同之處在于：前者主張，在一定條件下，可以准允張作霖和他所統率的軍隊平安地撤回滿洲，讓他實行保境安民之策，最終實現滿洲與華北的分離。

備忘錄和十六日通過的決議案，當天就電告了呆在北京的芳澤公使，並令芳澤帶着備忘錄去説服張作霖撤兵關外。

十七日深夜，張作霖正在中南海『統一齋』内與梁士詒、李宣威等幾位客人打麻將牌，突然芳澤來訪。梁、李等人起身欲告辭，張則擺擺手道：『諸位稍候，我與芳澤没什麼可談的，不大功夫就能説完。』

實際上這是一次漫長的會談。

芳澤没有單刀直入地談撤退的事。他先提出了簽訂中日合資修築吉會鐵路合同的要求，並以日軍出兵協助奉軍爲籌碼。他説：『如果大元帥能答應我們的要求，則大日本帝國的皇軍可以採取有效措施，阻止北伐軍隊渡黄河北上。』

張作霖不爲所動，正色答曰：『我們家中的事，不勞鄰居費心，謝謝你們的好意。』

芳澤問：『你們打得過北伐軍嗎？』

張作霖淡淡答道：『打不過他們，我們可以退出關外。』

芳澤弦外有音地說：『恐怕未必能回得去吧。』

張作霖說：『關外是我們的家，願意回去就回去，有什麼不行呢。』

『我想，如果回關外的話，等打了敗仗之後恐怕不是最好的時機。形勢迫人，宜主動不宜被動，宜早不宜遲啊！』芳澤邊講邊把『備忘錄』呈交給張作霖，並詳細陳述了日本政府的方針，他說：『大勢已經如此，爲使戰亂不波及更廣，收拾軍隊撤回滿洲以維持滿洲治安，是萬全之策。東北軍如果不願意被解除武裝，就應毫不猶豫地立即撤退。』

張作霖對芳澤所說的『萬全之策』很不感興趣。他當然希望能借助日本人的勢力，繼續留在關裏，以中央政府的名義『君臨全國』。他深知日本人恐『赤』，因此極力强調自己在反『赤』方面的重要性。他說，日本人讓他下台的想法是不明智的，如果他下台，滿洲必將赤化，大大影響日本的利益。

但張作霖這一着是不靈驗的。在田中內閣的棋盤上，逼張作霖回關外是與反赤密切相關的一步棋。田中認爲，在與蘇聯關係密切的馮玉祥進入京津地區之前，讓蔣介石進入該地區是十分必要的，因此他才極力主張張作霖盡快撤出關外。

誰知張作霖自有主張，並不很痛快地聽日本人安排。

芳澤知道一時勸動不了張作霖，便話頭一轉提起了另外一件事：『張宗昌的兵在濟南殺死幾十名日本僑民。』

張作霖道：『尚無這方面的報告。』

芳澤以恫嚇的口吻說：『張宗昌的軍隊是你的部下，你對此事應該負一切責任。』

張作霖聞聽此言勃然大怒，『騰』地由座位上站起，把手裏的翡翠嘴旱煙袋猛地向地下一摔，磕成兩段，聲色俱厲地衝着芳澤說：『此事一無報告，二未調查，叫我負責，他媽拉巴子的，豈有此理！』

張作霖說罷就丟下芳澤，怒氣衝衝地離開了客廳。將近四個小時的會談就這樣收場了。

出兵不成，關東軍氣得暴跳如雷

關東軍司令官村岡長一郎于五月十八日凌晨兩點接到陸軍次官通報的『備忘錄』，立即以解除奉天軍的武裝爲目標，着手準備把關東軍派往錦州和把軍司令部遷往奉天。

設在旅順的關東軍司令部突然忙碌起來。

入夜，司令部各個房間裏燈火通明。總參謀長齋藤掩抑不住興奮之情，到處跑着喊叫着：『打仗了！打仗了！』

當天下午四點，司令部已經給關東軍駐紮師團第十四師團和由朝鮮駐屯軍緊急抽調來的第四十混成旅團，發出了準備出動的命令，並和南滿鐵路簽訂了運兵協定。次日，還給第十四師團下

達了『二十日在奉天集結後繼續向錦州進發』的命令，給混成四十旅團的命令是『二十一日在奉天集結』。

蠢蠢欲動的關東軍決心出兵，已是箭在弦上。

但關東軍的擅自出兵的決定遭到外務當局的反對。外務省認爲，關東軍的這一舉動超出了樸茨茅斯條約所規定的範圍，將會使關東軍進入附屬地以外的地區，因而對此表示反對。條約規定，駐滿洲的關東軍，在日本租借地關東州和南滿鐵路附屬地兩側六十二米的帶狀地帶內有行動的自由。但如果要進入像錦州和山海關這樣既不屬于租借地又不屬于附屬地的地方時，相當于『出兵國外』了，那就非有奉敕命令的傳宣不可。因爲日本陸軍自一九〇〇年爲鎮壓義和團起義而出兵中國時起就形成了一個慣例，即出兵國外需經內閣會議討論批准並等待奉敕命令（參謀總長奉天皇之命下達的命令）的傳宣。

參謀總長鈴木莊六認爲出動軍隊需得到政府的諒解，關東軍自作主張是不妥當的。因此，他于十九日零時二十五分打電報給關東軍司令長官村岡長太郎，要關東軍部隊在接到敕命之前不要進入附屬地以外的地區。

村岡司令官接到這個電報後立即回電，力陳迅速出兵的理由。他强調說，關內情況緊急，而京奉鐵路的利用實際上已非常困難，于兵力運輸不利。現在出兵已爲時太晚，若不想喪失全部機會，當機立斷決定出兵是必要的。與此同時，村岡將原定二十一日向錦州出動延期一天。

在打電報給村岡的那天，鈴木專門會見了田中首相並說服他同意于二十一日下達敕令。次日

鈴木即電告關東軍司令官說：『決定二十一日傳宣奉敕命令，因此向附屬地以外出動，需等傳宣之後。』

村岡司令官接到電報立即興奮起來，他馬不停蹄地把關東軍主力集結到奉天，並且着手準備使用京奉綫進行運輸，軍司令部也遷往奉天。只等敕令一下，關東軍迅即出動。

但是，外務省在同一天卻電訓芳澤公使說，在北伐軍不追擊撤退的奉天軍的情況下，不要解除其武裝。就這樣，與參謀本部要求待敕命下達後出動的命令，出現了微妙的差異。傍晚，日本駐奉天總領事會見齋藤參謀長和特務機關長，讓他們看了亞洲局局長有同樣內容的訓令。

因此，關東軍急切盼望的奉敕命令未傳宣，這並不讓人感到意外。

爲了爭取早一點出動，關東軍繼續向中央打電報催促，可田中卻不肯改變既有的態度。五月二十九日，贊成關東軍向錦州出動的參謀本部與陸軍、外務兩省首腦召開會議，爭吵良久也沒有就出兵的時間問題達成一致意見。三十一日，陸軍省在又接到關東軍一封催促出兵的電報之後，即設法通過軍務局長阿部信行直接向有田亞洲局長提出堅決出兵的要求，仍無結果，因此最後只好請田中首相作出裁決。

三十一日夜，有田八郎與阿部信行二人來到修善寺，拜訪了正在修善寺的菊屋別墅休養的田中首相。阿部在首相面前打開一幅地圖，大講特講出兵的必要性和緊迫性。等阿部說夠了，說累了，田中才不緊不慢地說了一句話：『還不忙吧！』仍決定延期出兵。

田中的最後裁決，使關東軍出兵的計劃落得個竹籃打水一場空。結此，島田俊彦在其《關東

軍》一書中有如下評說：『……關東軍雖曾一度獨斷專行地決定出兵，然而認爲有可能得到奉敕命令傳宣，于是最後又放棄了獨斷專行出兵的方針，結果中了田中首相的緩兵之計，因而氣得暴跳如雷。但這一切都爲時已晚。如果把這時拘泥于奉敕命令傳宣的關東軍與以後的（如滿洲事變）關東軍加以比較，會看到它們之間存在着很大差別。』

其實，如果極言關東軍的獨斷性格，也用不着等到它發動『九·一八』事變。這次出兵不成，固然是等候奉敕命令傳宣的結果；但關東軍『踢開張作霖』的既定方針並未變更。此番喪失了解除東北軍武裝的機會，但它會主動出擊，製造新的機會。除掉張作霖，這就是關東軍獨斷專行的新抉擇。

不想當賣國賊的張作霖踏上了兇險的歸途

張作霖最終還是決定撤回東北。五月三十日，他召集奉軍將領會議，決定總退卻，並與北洋元老王士珍商定了臨時維持北京治安辦法。

回兵奉天並非出自張作霖本意，這是無可奈何的選擇。他看到戰況對他越來越不利，日本人也決心讓他回奉天，更要命的是，他身邊的『新派』人物如張學良、楊宇霆等均主張撤回東北，與蔣介石合作。因此，是去是留已不完全由着他了。

六月一日，張作霖設茶話會招待外交團話別，借機大談其『始終矢志討赤』的老調。他深知自己得罪過日本人，可又幻想能繼續得到日本人的支持，于是大放『討赤』之詞，以討日本人的

歡心。

第二天，張作霖還冠冕堂皇地發表了一個『出關通電』，大肆往臉上塗脂抹粉。通電說：他『本爲救國而來（北京），今救國志願未償，絶不忍窮兵黷武，整飭所部退出京師。』

儘管說得這樣好聽，可在北京當了一年多的『大元帥』，現在卻不得不班師回奉，無論如何心裏總有些灰溜溜的蒼涼感。

六月二日晚八點多鐘，張作霖在文臣武將的簇擁下進入火車站。儀仗威武，軍樂陣陣。隨行的人除大元帥府人員和衛隊外，有靳雲鵬、潘復、何豐林、劉哲、莫德惠、于國翰、閻澤溥，張作霖的六太太和三公子學曾，日籍顧問町野和儀我等。

專列共有二十二節，張作霖乘坐的包車在中間，是前清慈禧太后所乘的花車。包車後邊是飯車，前邊是兩輛藍鋼車，劉哲、莫德惠、于國翰等在這兩輛藍鋼車中。在專列前面，還有一列壓道車。

張作霖令其第五夫人乘坐由七節車廂編組的特別列車先行出發，大約六小時後，即六月三日凌晨，張本人乘坐的專列才緩緩駛出車站。

車廂裏，張作霖立于窗前，心事重重地向北京城投去最後一瞥，而後悄然拉上了窗簾。他依賴過日本人，並希望繼續以日本爲靠山，支持他留在關内擴充勢力。可他無疑又對貪得無厭的日本人恨之入骨。尤其讓他生氣的是，小日本竟然乘人之危，掐脖子要好處。張作霖眼前清晰地浮現出芳澤那副令人痛恨的嘴臉。

芳澤是在『大帥』臨行前爲催簽『日、張密約』的事而專程來訪的。說起『日、張密約』，還得暫時把時間倒回去一段，這是郭松齡反奉那陣發生的事情。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間，郭松齡反奉軍隊將抵新民，奉天省城空虛，人心動搖，張作霖準備逃往旅順。正在這緊張時刻，某日，關東軍司令官白川義則派其參謀長齋藤偕同三浦中佐到達瀋陽與張作霖會談。

齋藤對張說：『現在郭軍先鋒部隊已過錦城，在攻佔新民以前，閣下如果有需要關東軍幫忙的地方，即請不客氣地提出來，我們情願協助一切。』

一番話正中張作霖的下懷，危難之中是根稻草也要不顧一切地牢牢抓住。他直言不諱道：『目前省城空虛，雖已電告吉、黑二省軍隊前來援助，但恐遠水不解近渴！如果郭軍進逼省城，我想去旅順暫避，希望關東軍予以方便。』

齋藤說：『閣下想去旅順暫住，我們非常歡迎，屆時，定當準備一切，保護閣下的安全，請放心吧！不過，我看不要緊，即使郭軍進抵新民，關東軍若通知他們，根據條約規定：中國軍隊不得在南滿鐵路附近作戰，到必要時，關東軍還可出兵阻擊，他們是無法進入省城的。閣下若能同意這種辦法，即請考慮關東軍的幾項要求，假如閣下認爲可行的話，即請在書面上簽字。』

齋藤說完，便將事先用打字機打好的五項要求，讓翻譯念給張作霖聽。其內容大意是：

（一）日本臣民在東三省和東部內蒙古，均享有商租權，即與當地居民一樣有居住和經營工商業權利；（二）間島地區行政權的移讓；（三）吉敦鐵路的延長，並與圖門江以東的朝鮮鐵路接軌

和聯運；（四）洮昌道所屬各縣均准許日本開設領事館；（五）以上四項的詳細的實施辦法，另由日中外交機關共同協商決定。

張作霖聽完了這五項要求，即不假思索地答應：『行，行。』隨即在日方準備好的草約上簽字。這就是所謂『日、張密約。』

飢不擇食，慌不擇路。張作霖爲保命而匆忙間答應了日本關東軍的條件，可一旦意識到這些要求的嚴重性，他又後悔不迭。張作霖曾對東三省交涉總署署長高清和說：『上當了，上了日本人的當了。讓日本人在那裏，租一點土地做買賣那又有什麽關係！他媽的，誰想到那就是雜居權！吉林省延吉縣一帶居民都是朝鮮人，土匪很多，即使不是土匪，也是通匪的，不然就是反對日本政府的青年黨。我以爲讓日本人在琿春、和龍及江清各縣，派駐些警察、憲兵，還可以幫助我們維持地方治安呢，所以就答應了。哪知道，這就是把咱們的地方行政權讓給他們了！總而言之，日本人没有好下水，全是欺騙人！』他讓高清和與吉林省長王永江、政務廳長王靖寰等大家想辦法研究對策，以應付日方，並反復强調：『咱們絶不能承認二十一條要求以内的事項，以免讓東三省父老罵我張作霖是賣國賊。』

反悔已經承諾的事情，最有效的應付辦法就是拖。

此後，日本關東軍幾次三番地要求張作霖進行協商密約實施辦法，均被張以各種巧妙的借口拒絶。

前文談及，一九二八年五月，正當東北軍各路戰況不利的時候，日本駐北京公使芳澤謙吉到

中南海會見張作霖，其重要使命之一便是催促張在日方準備好的密約實施辦法簽字。那一次，芳澤留下了文件，張作霖隨手鎖進了辦公桌的抽屜裏，並滿口答應簽字。

十幾天之後，芳澤又來見張。燕澤問道：『上次我交給閣下的文件，已經簽字了吧？』張答：『近來我很忙，還沒詳細看呢！等我簽字以後，再通知你來取。』

又過大約兩週，即六月二日那天，芳澤打電話問張那個文件簽字了沒有。張回話讓芳澤次日下午五時來取。

六月三日午後四點半，芳澤很守時地出現在中南海。想到經過三年爭取終于要有了個結果，芳澤內心湧動着一股難以抑制的興奮。他坐在張作霖辦公室對面的客廳裏，耐心地等待着。

此時，張作霖卻在辦公室裏提高嗓門破口大罵：『日本人不夠朋友，竟在人家危急的時候，掐脖子要好處，我張作霖最討厭這種辦法！我是東北人，東北是我的家鄉，祖宗父母的墳墓所在地，我不能出賣東北，以免後代罵我張作霖是賣國賊。我什麼也不怕，我這個臭皮囊早就不打算要了！』

芳澤聞聽對面傳來陣陣高聲叫罵，唯恐會有什麼變故，因而急得坐立不安。

過了約半個小時，有人從張的辦公室裏出來送給芳澤一疊文件，並說：『他今天太忙，不能會見了，還請原諒。』芳澤接過這些文件，以爲簽了字，看也沒看即匆匆離去……

專列在平穩地運行。

張作林想到自己臨行前對芳澤的打發，鼻腔裏不禁『哼』了一聲，鄙夷地自言自語道：『你

不仁，我姓張的也不義。乘人之危沾老子的便宜，他媽的沒門！』

原來，張作霖只在有關文件上大筆一揮批了個『閱』字，並沒有簽署他的姓名。芳澤回到公館發現如此，急掛電話詢問緣由，得到的回答是張已啓程回奉天了。

張作霖至死也沒在密約實施辦法上簽字。這也是日、張關係日趨緊張的重要原因之一。關東軍因此對張作霖徹底絕望，以至于下決心採取軍事行動，解除奉張部隊的武裝，關東軍高級參謀河本大作大佐譴責張作霖沒有終生感恩的義氣，並說『已經在郭松齡事件中試驗過了』，指的就是這件事。

對于日本人的陰謀，張本人是有所警惕的，對回奉日期一再更改。但他誤認爲日本還不致要他的命，因而未採納總政提出的乘汽車回奉的建議。事實表明這是一個多麼致命的失誤！

考慮到險惡的日張關係及張作霖與芳澤之間的面對面的嚴重衝突，隨張出關回奉的人當中，有相當一部分心裏都惴惴不安，擔心會發生什麼事故。至于所發生的事故究竟會嚴重到什麼程度，沒有人會預想到。人們只是擔心着，彼此間爲一種不祥的預感所籠罩。沿途各大站都發現有日本特務鬼鬼祟祟活動的身影，這在證明着、加重着人們的擔心……

張作霖踏上的是一條充滿兇險的歸路。

『只要幹掉張作霖就行』

出兵錦州解除奉軍武裝的計劃一泡湯，上任不久的關東軍司令官村岡便下決心除掉張作霖，

製造混亂，借機解決奉軍，實現日本對全東北的武裝佔領。

村岡暗殺張作霖，是在極秘密的情況下策劃的，甚至連關東軍參謀長齊藤和高級參謀河本大佐事先也不知道。村岡是通過駐華公使館建川美次秘密進行聯絡的。五月三十一日，村岡密令駐哈爾濱武館竹下義晴少佐，赴京刺殺張作霖。

村岡的暗殺計劃被河本大佐知道了，他當即找下竹下說：『最好不要幹没有用的事情。萬一失敗了怎麼辦？在華北方面，果真有能夠完成那樣大膽謀略的可以信賴的人吧？很不放心。萬一的時候，如果不讓國家和軍方承擔責任而只以個人的責任來結束的打算辦不到的話，那麼虎視眈眈的列國一定認爲好極了，不知會怎樣乘機指責呢。讓我幹吧！別無他途。你若是去華北，要一直徑去北京，詳細偵察張作霖的活動，如幾月幾日乘火車逃往關外呀，只要把這些偵察清楚，通知我就行。』

河本大佐接過了刺殺張作霖的『使命』。

河本大佐似乎在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就懷有殺害張作霖的野心。一九二八年初，他與川越守二大尉和北滿土匪頭子中野密謀，接連兩次炸毀了東支鐵路東綫和西綫兩座鐵橋。這是一個用意深遠的試驗。他們的目的在于以此觀察一下中國、蘇聯和日本的反響。果然，鐵路被炸的第二天，各國報紙都作了報道。這些報紙一般都認爲東綫鐵路橋是哈爾濱的張作相或是白俄炸的，以此來反對張作霖的暴政；西綫橋是齊齊哈爾的吳俊升幹的。竟然没有一家報紙懷疑日本人或日本軍隊。這種情況使河等人認識到，反張作霖的不乏其人，因此即使殺了張作霖再嫁禍于中國人，也

不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

河本一直想通過謀殺張作霖來製造關東軍解決東北軍武裝的借口，而且認爲必須秘而不宣地幹，因而才說服了向他泄露村岡計劃的軍司令部的竹下義晴少佐，要他向建川武官傳達自己制定的爆炸計劃。河本將這個計劃報告給了關東軍參謀長齋藤，並得到村岡司令官的默許。河本設想的步驟是：先殺掉張作霖，再使東三省權力地方軍閥化，爾後擾亂治安，最後出動關東軍。河本在五十年代寫過一篇《我殺了張作霖》，文中講道：

『特別是這樣的結合，常是頭目一死，他們立即四散，直到第二個張作霖出現，那是毫無辦法的。這和土匪頭子沒有任何不同。

『一定要殺死頭目，看透了除此以外，沒有解決滿洲問題的辦法。只要幹掉張作霖就行。……』

可是，在什麼地方？用什麼辦法呢？

起初，河本等人經過研究，認爲奉天境內唯有巨流河鐵橋是最理想的地點。于是派工兵中隊長，詳細偵察那裏的情況，發現奉軍的警戒十分嚴密，在那裏要準備好至少需要一星期左右的時間。要想避開奉軍的嚴密警戒，無論如何是不可能的。

後來，殺害張作霖的地點定在南滿綫與京奉綫交叉的地點——皇姑屯。河本認爲，做這件事，必須選擇一個能夠比較自由進行的地方。而此處是兩條鐵路綫交叉點，南滿綫在橋上，京奉綫在橋下，日本人稍微走來走去，也不會引人注意。

至于殺張的手段，可能有兩種：一、襲擊列車。二、用炸藥炸列車。用第一種方法，必將留下是日軍襲擊的明顯證據；用第二種方法，也許可能不留痕迹地完成。于是河本確定了選擇第二種方案。萬一這一爆破計劃歸于失敗，還可以馬上制定作爲第二個步驟的使列車脱軌的計劃。而且不失時機地乘一片混亂，讓大刀隊衝進去結果了他。

萬全周到的謀殺計劃就這樣形成了。

派往京奉沿綫的情報人員已各就各位，嚴密監視着張作霖的動向。

狡猾的河本殺人還想不讓刀子沾血，他又出籠了一個試圖嫁禍于中國人的陰謀。

在大石橋做煤炭和滑石生意的伊滕謙三郎，是個狂熱的軍國主義分子，曾向關東軍建議用激烈的辦法打開局面，與河本不謀而合。

伊滕很支持河本的炸車計劃，當河本透露要炸毁鐵橋需僱用幾個中國人時，伊滕爽快地答應想辦法。伊滕托了曾當過吉林軍騎兵營長的劉戴明，其時劉是奉天日本隊屬地煙花巷投資匿名合作社的成員。

劉戴明共計僱到三人，其中兩個是劉當年的部下，無賴、嗎啡中毒症患者，另一名姓王。給他們每人各發了一百元至一百五十元錢。六月三日一早，讓他們洗了個澡，又理了髮，換上乾淨衣服，把他們送到伊滕那裏。其間，姓王的察覺事有不妙，趁日本人不注意溜之大吉了。

伊滕等人對剩下的兩人説，你們的任務是向火車投炸彈，把列車炸毁。並讓他們帶上三封信，其中兩封是劉戴明僞造的南方軍隊的爆破命令，另一封是什麼人在印有凌印清名字的便箋上

寫的密信。凌印清是國民政府任命的直隸、山東、河南三省宣撫使，當時正在滿洲一帶活動，煞是引人注目。

一切準備就緒之後，兩個人被送到瀋陽河本參謀那裏，河本又用汽車把他們送到爆破現場。東宮大尉立即下令日本兵用刺刀把他們扎死，然後在他們懷裏塞上早已準備好的炸彈，把屍體丢在現場，以掩蓋關東軍的罪行。

『在轟隆的爆炸聲中，黑煙飛升上空，高達二百公尺……』

竹下義晴中佐看到張作霖已從北京出發，馬上打電報給關東軍司令部，報告張作霖已令其第五夫人乘坐由七節車廂編組的特別列車先行出發，五六小時後，張本人乘坐的專列向奉天進發。不久，山海關的石野芳男大尉，報告第五夫人的列車已通過山海關。竹下和石野是特別派到北京和山海關執行諜報任務的。

當張作霖的專列路過天津時，町野顧問和潘復下車。天津軍司令部迅速將這一情況報告給關東軍。

專列行至山海關，車站上只有一兩名日本守備隊站崗，態度如常，看不出緊張的樣子。吳俊升已先由奉天趕到山海關站迎接，並將其所乘車廂插入張車之前。吳上車後還同張見面，彼此說了幾句話。

列車裏的張作霖編織着東山再起、捲土重來的美夢，哪裏知道等着他的是什麼。當他正一點

一點地向爆破地點駛去的時候，他心裏或許還在爲放棄華北而悔恨不已呢。

專列出關前，隨行人員手裏都揑着一把汗，擔心會發生什麼不測。可是車一出山海關，大家覺得終于脫離險境，回到老家了，都放心地解衣而睡。吳俊升則與劉哲、莫德惠、常蔭槐等人玩了一夜撲克，快到皇姑屯時才散。

哪裏知道，山海關外，日本關東軍已設下了死亡陷阱。真正的危險正一步緊似一步地向人們逼來。

與河本共同密謀的是曾經一起做過爆破『試驗』的川越大尉；爆破的具體操作則由東宮大尉進行。

川越大尉擔心東宮錯把先行的第五夫人的列車當作張作霖的專列炸掉，于是急忙趕到現場對他說：

『午夜十一點通過的是由七節黃色車廂編組的，是第五夫人乘坐的列車。五六小時後，由二十節天藍色車廂編成的列車，才是張作霖乘坐的專列。』

東宮答道：『知道了。一切準備就緖。已把那兩個中國人幹掉，把他們的屍體丟在現場，在其中一個人的懷裏裝了南方革命軍的密信，在他手裏塞了一顆俄國製造的炸彈，把他們僞裝成一看就知道列車是他們炸的樣子。』

川越回去時特地乘汽車在瀋陽站和奉天城內轉了圈，看到中國哨兵的警戒情況與平時沒有什麼兩樣，臉上不禁流露幾分得意之色。

時間不長，派到奉天西北約六十公里新民屯去的神田泰之助和武田丈夫兩位中尉，用領事館的專綫電話報告了第五夫人的列車通過的情況。關東軍很重視對新民的監視，特派兩名中尉到那裏執行任務。

接着，山海關方面也來電說，張作霖的專列已經出關，預計凌晨五六點鐘抵達奉天。石野芳男大佐還將張的部將吳俊升和日本顧問儀峨少佐陪張同行的情況加以匯報。

六月的東北，早晨五點天已大亮。這樣一來，就不能像原來計劃的那樣『乘夜暗行事』了。川越與河本商量了一下，再次驅車趕赴現場，詢問東宮天亮能不能幹？

東宮咬牙切齒地只說了一句話：『箭已離弦。』

簡短的四個字，川越聽了非常滿意。返回的路上他又一次到瀋陽車站和奉天城裏察看了一番，發現中國方面警戒情況依舊，于是回到瀋陽館，向河本作了報告。河本自言自語道：『姓張的，等着瞧吧！』

專車過皇姑屯時，奉天憲兵司令齊恩銘來迎接。齊登車後，專一即向東行駛，開往小西邊門外奉天車站。

六月四日早晨五點二十三分，列車正穿過南滿鐵路橋洞，突然間『轟隆、轟隆』兩聲山崩地裂般的巨響，張作霖乘坐的車廂被炸得破敗不堪。多少年後，河本在其回憶文章中得意地記述道：

『在轟隆的爆炸聲中，黑煙飛升上空，高達二百公尺。我只能想象張作霖的骨頭是否也飛

上天了呢？可是對于這猛烈的黑煙和爆炸聲，連我自己也很驚恐，有些提心吊膽似的。藥力實在太大了，的確如此！』

沒錯，『藥力實在太大了』。將近二百斤烈性炸藥突然引爆所造成的巨大破壞力，是常人所難以想象的。日本人竟使用如此毒辣之手段，可見他們對張作霖憎恨到了何等程度。

親身經歷張作霖被炸事件的周大文爲我們留下了關于炸車現場的真實而寶貴的記錄——

『……數分鐘後穿過南滿鐵路橋洞時，我正在走廊向外張望，忽見南邊有兩個着黃色制服的人跑上南滿鐵路大堤。我進入包房，尚未坐定，即聞轟然一聲巨響，刹那間又是一聲，比前一聲更大，車才煞住，我被震昏倒在地下。等我恢復知覺，睜眼一看，包房裏車窗和窗前小桌不知去向，滿地都是玻璃碎片。當時我疑惑已經受傷，可是試試四肢皆能轉動，站起來又摸摸身上，也如平常，並無疼痛之處，只發現左手掌流血，可能是被碎玻璃扎破的。我取出藥布藥棉擦了傷口，沒來得及包扎，就趕快跑出包房。在車廂走廊上看見我們的機槍衛隊，排列向南北兩方掃射約數秒鐘，經何豐林喝令停止射擊，槍聲停止。我下車一看，大喫一驚，張作霖那輛包車全部車廂塌下，已不成車形，後邊那輛飯車也是一樣，還直冒煙，開始起火。再一看南滿鐵路橋東面橋欄矮鐵墻炸得向天豎立起來，洋灰橋墩東面上半截炸去三分之一。這時大家忙于搶救受傷的人員。首先我看見吳俊升被數人架上一輛皮棚馬車，向市內而去（據聞當時已死，頭頂穿入一大鐵釘）。又看見日籍顧問儀峨滿面是血，向車頭方向跑去，又看見莫德惠從車上抬下來，送赴小西邊門外奉天市立醫院，劉哲是帶着傷自己走去的。這時張作霖已經被抬

上憲兵司令齊恩銘的一輛破舊汽車，由副官王憲武抱着横卧車中，回轉帥府去了……」

身受重傷的張作霖被送回帥府，大家慌作一團，趕緊跑出來迎接，並請醫官來施行緊急救治。張作霖滿袖是血，用剪刀把衣服剪開，發現一臂已經折斷。他奄奄一息地對盧夫人說：『我受傷太重了，兩條腿都沒了（其實他的腿並沒有斷），恐怕不行了！告訴小六子（張學良的乳名）以國家爲重，好好地幹吧！我這臭皮囊不算什麼，叫小六子快回瀋陽。』

言畢不久即瞑目長逝，時年五十四歲。

就這樣，借助日本人的勢力擁有東北、進而君臨北洋政府小朝廷的張作霖，最後卻死于日本人的毒手，落個如此悲慘的結局。

其實，還在十幾年之前，張作霖便成了一部分日本人謀殺的對象。當時，以關東都督中村爲首的土井、小磯、川島等擁立宗社黨肅親王一派，反對日本政府拉攏張作霖的計劃，甚至作出要炸死張作霖的決定。

一九一六年五月二十七日，日本關東都督中村覺大將『訪問』奉天，張作霖率其部下湯玉麟等乘五輛俄式馬車赴車站迎接，在返回途中，日本預備役少尉三村豐向一輛馬車投擲炸彈，將車炸毀。但張作霖卻坐在另一輛馬車上，幸免于難，不過也驚出了一身冷汗。

十幾年前，張作霜僥幸躲過日本人炸彈的襲擊；十幾年後，日本人的二百斤炸藥到底還是要了他的命。

皇姑屯重重煙幕的背後

皇姑屯方向傳來的轟然巨響和炸車後騰起的濃濃的黑煙，令事件的製造者及關東軍的首腦們欣喜異常。

炸死張作霖，當然並不僅僅爲了要一個軍閥的命。關東軍的真正意圖是想通過炸張挑起軍事衝突，造成混亂，從而出動關東軍，乘機佔領全東北。

因此，在炸車前，河本曾秘密在奉天大和旅館前集中了一個旅團的兵力，準備炸車後舉事。『萬一奉軍起兵，張景惠就做我方內應，發動成立奉天獨立軍。』在得到張作霖返回東北的消息後，關東軍一部立即開往錦州方向；在炸車事件發生的同時，關東軍又借口維護治安，向奉天方向移動。

關東軍炸張之後，又在瀋陽製造了一系列事件，企圖引起東北混亂。在炸車的第二天，日本人即在山海關錦州間的某一車站製造奉軍軍車脫軌事件。六月十日和十二日，又在瀋陽連續四次投擲炸彈，並想謀殺張學良。

當時，『日兵在奉，蟻屯雲集，其全部爲三師弱，有二萬人，觀其耀武揚威之情，似有躍躍欲試之心』。十六日，日軍一萬八千人在瀋陽城南的渾河沿岸演習，高唱『南滿是我們的家鄉』，刺激奉天軍民的情緒。

但是日本人的陰謀被奉省當局識破，採取了相應的措施。這多虧了精明善斷的臧式毅（此人

後來當了僞滿漢奸）。

臧式毅時爲軍署參謀長。張作霖死的時候，張學良還未回來，『朝中無主』，臧式毅敏鋭地覺察到若把張作霖去世的消息透露出去，很有可能引起地方人心不安，而日本關東軍則可能乘機有所舉動。因此他果斷決定對張的死嚴守秘密，封鎖消息。

爲此，六月六日，奉天省公署發表通電：『主帥由京回奉，路經皇姑屯東南滿鐵道，橋樑發生炸彈，傷數人，主帥亦身受微傷，精神尚好，……省城亦安謐如常。』

廚房每日照常開張作霖的飯，杜醫官天天來帥府假裝換藥並填寫醫療經過和處方，以瞞過日本人的窺探。日本方面不斷有人來『慰問』求見，都被婉言謝絶。

直到張學良返回瀋陽，奉省當局始宣佈張作霖于六月二十一日因傷逝世的消息，在哀挽錄、行狀内也是填的六月二十一日，其實都是假日期。

臧式毅等人處變不驚，面對錯綜複雜的局勢，採取了鎮靜處理的政策，從而保持了東三省的穩定。關東軍預料中的奉軍發瘋似的混亂也没有出現，河本所期待的武裝衝突終未發生。因此可以說，河本大作等人的計劃，除了炸死張作霖之外，整個來講是遭到了失敗。

炸車事件發生後，各方面都把懷疑的目光轉到關東軍的身上，而關東軍卻矢口否認張作霖是它殺害的。六月七日，關東軍以齋藤參謀長的名義打電報給陸軍次官煙英太郎，不但佯裝不知，而且用心險惡地把髒水往中國人身上潑。電文中有這樣一段：

『關于爆炸原因，可以想象使用了相當多的炸藥。因此不可能是投擲的，一定是裝在列車

上部或橋梁下方的。如果是裝在橋梁下方的，必然與中方的警戒人員有聯繫，或乘中方警戒不嚴鑽了空子，乘機把爆藥送上橋梁。究屬哪種，尚難斷定，但絶不是裝在橋梁上部的。這由爆炸後的現場可以作出明確的判斷。總之，這裏屬于中國方面監視的範圍。何況張作霖乘坐的列車運行情況非同一般，時快時慢。因此無法弄清開車通過的準確時間，更不能弄清楚張作霖在列車上的具體位置。……實際上，如果不是中方，特別是與張作霖週圍的人有聯繫，就不可能進行爆破。』

殺人不眨眼的强盜往往也是强詞奪理的詭辯家。

可事實是無論什麼樣的詭辯也掩蓋不了的。關東軍欲蓋彌彰，終于露出了馬腳：

關于事發當天的警戒任務，中國方面曾向日本憲兵分隊長三谷清提出，希望中國憲兵也能經常登上鐵橋與日本方面取得聯繫。三谷當時答應了，但三日夜晚當中國憲兵去現場時，日方卻借口軍司令官的命令，而斷然予以拒絕。此其一。

作爲僞裝用的中國無業游民之一的王某的逃亡，對關東軍無疑是一個沉重的打擊，正是他證明了日本人强迫無業游民裝扮南方『便衣隊』並在現場殺掉的情形。此外。給三名無業游民洗澡的那個浴池的老闆也是有力的人證。他在看了其他兩個被害人後肯定地説：『没錯，就是他倆。』此其二。

時至九月，陸軍總部派憲兵司令峰幸松，去調查關東軍各部隊保管炸藥的出入賬目。實際上這次爆炸事件使用的炸藥，是川越大尉爲實習從關東軍兵器庫領來的。後因他在旅順工科學堂擔

任的火藥課程學習停止了，未用。既然如此，如果接受峰幸松的調查，結果會對關東軍不利。因此關東軍拒絕調查。此其三。

關于殺害中國無業游民的時間，起初奉天特務機關和領事館警察報告，說是三日午夜十一點左右，後來關東軍司令部公佈的卻是四日凌晨三點三十分。此其四。

負責警戒工作的東宮大尉，聽到爆炸聲後本應立即趕赴現場察看緣由，實際上他卻做賊心虛地呆在瞭望台上，好久不敢出頭露面。此其五。……

這樣，關東軍的僞裝完全被撕破了。

在國際各國的壓力下，日本議會以『滿洲某重大事件』的名義追究內閣的責任，使天皇對田中的信任發生動搖，結果導致真正蒙在鼓裏的田中內閣的垮台。田中主張保留張作霖並繼續給他以支持，終因張作霖的被殺而倒台，這簡直是一個諷刺。

將近一年以後，對皇姑屯炸張事件負有直接責任的河本大佐受到退役處分。這不過是『捨車保帥』的伎倆而已。表面上看，對殺張負有直接責任的只有河本一人，但這卻是整個關東軍主張的解除奉軍武裝、逼張下野的翻版，並且關東軍首腦村岡司令官和齋藤參謀長以及他們下屬的許多幕僚，對此都採取了默許的態度。因此完全可以說，殺害張作霖的陰謀行動，是在整個關東軍參與下實施的。

皇姑屯炸張案，是關東軍侵略東北過程中的一件不容忽視的事情。通過炸張，關東軍並沒有實現其佔領全東北的預謀；但這件事爲此後的陰謀行動提供了經驗，可以說是『九·一八』事變

的前奏和預演。

且看關東軍又要上演一出怎樣的醜劇。

第三章

鐵蹄踏遍東三省

別有用心的『北滿參觀旅行團』

一九二九年七月，遼闊的松嫩平原上出現了風塵僕僕的一行人。夏天的太陽曬得人懶洋洋的，他們卻在興致勃勃地指指點點。

『真像大海啊！』一個二十來歲的年輕人看着微風拂動的一望無際的草浪不禁發出了感慨。

一位目光炯炯的中年人馬上接口道：『在這種大平原上作戰，得採取海軍的作戰方法。』

這位看起來十分精明能幹、野心勃勃的中年人，就是關東軍司令部的參謀石原莞爾中佐。和他一起的一行人，便是石原爲解決滿蒙問題策劃的『北滿參觀旅行團』。

石原莞爾年近四十歲。他曾是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第二十一屆畢業生，後又以優異成績升入日本陸軍大學。當他從陸軍大學畢業時，有人斷言：『石原的頭腦是陸大創建以來最出類拔萃的。』

石原對歐洲戰史有精闢的研究。他還是日本佛教十三大流派之一『日蓮宗』的虔誠信徒。他對戰史進行研究後，產生了自己的獨到觀點。他認爲，世界已面臨一場最後的戰爭，日本只有通過佔領滿蒙，才能解決人口、糧食及其它重要物資的問題。

石原是一個非常有煽動力的人。他的存在，總會在當時和當地掀起一陣旋風。一九二七年，當時還是一位小小少佐的石原在德國留學結束後經西伯利亞到哈爾濱時，據說有幾十個日蓮信徒舉着『南無妙法蓮華經』的長條旗，擁向車站去迎接這位身着舊式禮服悠然下車的年輕軍官。

一九二八年十月，石原由陸軍大學兵科教官調任關東軍參謀之職。這時距河本大佐炸死張作霖，只有四個月的時間。石原的到任，顯然體現了關東軍的某種考慮。

在對皇姑屯事件負有直接責任的河本大佐被當成替罪羊受到退役處分後，板垣征四郎大佐填補了他的空缺。上任伊始，板垣主持召開了關東軍情報會議。

在煙霧騰騰的會議室中，石原慷慨陳詞：『張作霖事件後的滿洲形勢一觸即發，有可能發展成為全面的軍事對抗。因此，當務之急是徹底研究對策。』石原的論調，得到了與會者的一致贊同。

石原還在他苦心策劃的《關東軍佔領滿蒙計劃》中赤裸裸地指出：『滿蒙問題的解決，對于因國內問題而不安的日本來說是唯一的出路。他積極主張，不管國內發生什麼事情，關東軍都要全力以赴地致力于滿蒙問題的解決。

于是，在研究『對蘇作戰計劃』的名義下，他組織了充滿火藥味的北滿參觀旅行團。這次旅行團的最高負責人是板坦大佐，然而，他也像普通學生一樣，熱心地聽取石原的講述。

在開始旅行的七月四日，石原在長春給大家講述他的戰爭史觀。當天夜裏，他的熱心支持者板垣深夜不眠地整理他當天演講的内容摘要。板垣沒有石原的那種敏銳的分析力和洞察力，但他

做事堅韌不拔，富有實幹精神。』『出謀是石原，實幹是板垣』，他們兩個人的聯袂，預示着一種危險已降臨到東北大地。據説，事後石原深有感觸地説：『長春這一夜，是滿洲事變前史的第一頁。』

離開長春之後，北滿參觀旅行繼續進行。在哈爾濱，他們乘坐汽車實地偵察了地形，研究了松花江渡江作戰的問題，還研究了佔領哈爾濱後的前進陣地。他們又繼續前往齊齊哈爾、海拉爾、滿洲里、泰來、洮南（今吉林洮安）等地旅行，根據各地實地情況研究了作戰方案。

十月，他們在遼西地區又進行了一次參觀旅行。這次旅行仍由板垣和石原共同帶領，包括了日本駐軍第十六師團的橫山貞槌、岡田菊四郎和關東軍的菅野、佐久間兩名大尉等人，採取了對抗演習的形式。此外，在奉天以及新民、錦州、山海關以西一帶還進行了實戰演習。這次演習，使石原對以後決定轟炸錦洲充滿了信心。

板垣和石原還委派北滿參觀旅行的成員之一佐久間亮三大尉研究滿蒙佔領區的統治方法。關東軍司令部對此十分重視，專門給他撥了一間房子，讓他專心致志地進行研究。

一九三〇年十二月，一本散發着油墨香味的小册子送到了三宅光治參謀長的手上，這就是佐久大尉一年來的研究成果——《統治滿蒙草案》。三長光治滿意地誇獎説：『寫得好極了！但願有一天能用上它。』石原的臉上露出了意味深長的微笑。他説：『再過兩年就會用上的。』

『中村事件』的前前後後

草木茂盛、沃野千里的大興安嶺地區，駐紮着一支中國軍隊——興安區屯墾軍第三團。大興安嶺地區是當時中國的邊防軍事要地，一九二八年被劃爲興安屯墾區。東北地方當局同時照會駐瀋陽的各國領事館：『興安區乃荒僻不毛之地，山源林密，惟恐保護不周，謝絕參觀旅行。凡外國人要求入區者一律不發給護照。』各國領事都對此表示認可，惟有日本領事表示抗議。

一九三一年六月中旬的一天早晨，屯墾軍第三團團部門前的操場上殺聲震天，第一營營長陸鴻勛正在率領士兵操練。突然，他發現操場西邊的大路上四個人騎着高頭大馬急匆匆地由北向南馳去，形迹十分可疑。

陸營長馬上派幾名士兵把這幾個人追回操場。他仔細一打量，發現這四個人中一個似是白俄，一個似是蒙古人，都穿着棉襖棉褲，化裝成中國農民的模樣。他們騎的馬也十分高大，顯然不是東北所産。

『你們是什麼人？』陸營長毫不客氣地盤問。這四個人卻搖頭晃腦直擺手，表示聽不懂中國話。陸營長無奈，只好請出了代理團長董昆吾。董團長來到操場一看有兩個看起來像日本人，他用日語一問，果不其然。一個中等身材滿臉大鬍子的人態度傲慢地掏出一張名片，上面寫着『日本帝國東京黎明學會會員中村震太郎』的字樣。

中村說：『我是東京農業學會派來東北的，打算去索倫山一帶考察當地的土質和農業狀況，

希望你們不要留難。』

然而，從中村的棉褲和他們的行囊中，即搜出了幾張中日文的軍用地圖、幾份關于興安區屯墾軍的兵力駐紮及當地人口、物產、風土的表册和筆記。從地圖和筆記可以看出，中村等人是一個月以前從海拉爾出發的，他們經過了興安嶺和索倫山一帶，詳細調查了各地的軍事地理。

董團長暗暗冷笑一聲，心想：『你們明明是軍事間諜嘛！』表面上他卻不露聲色，只是不由分辯地說：『前方經常有土匪出沒，很不安全，你們就在我們團部暫住一夜，等明天我們的出勤士兵回來護送你們一程吧！』

把中村等人軟禁起來以後，董團長不敢造次，馬上派人報告了正在巡查外防的團長關玉衡。關團長聞訊，馬上趕回團部。

查看了中村等人攜帶的物品之後，關團長馬上把中村召出進行審訊。中村態度蠻橫暴躁，拒不承認間諜身份，只承認自己是『退役』的陸軍大佐。

另一個日本人叫井杉延太郎。他也供認自己是『退役』的曹長，還供稱兩個俄國人和蒙古人是僱來問路的。

儘管兩名日本人不承認自己的間諜身份，但是，關團長從他們攜帶的文件已確認中村系『日本帝國參謀省情報科情報員陸軍大尉』身份。

如何處置這件事呢？關團長心裏犯開了嘀咕：一旦揭開這個案件，日本是非要恃强索回人證物證不可。不如召開軍官會議，先聽聽大家的意見再作決定吧！

暮靄初升時分，全團連級以上軍官會議在團部的大軍帳內緊急召開。大家七嘴八舌，紛紛發表看法。

董昆吾建議說：『現在我國是弱國，根本無外交可言。我們如果把中村等解送瀋陽，日軍一定會把他們及其所攜帶的調查筆記、地圖等全部索回。他們甚至會要求我方賠禮道歉，徒惹得許多麻煩。不如就把他們在這裏秘密處死算了。』

陸營長附和道：『我同意董團長的意見。按照國際法，外國的軍事間諜是可以處死刑的，何況他們進入了我們明令禁止進入的邊防軍事要地。處死他們，在我們是名正言順，在他們是罪有應得。』

也有人主張把中村等放走，在路上殺掉。關團長則提出明正其罪行公開處置。

會議結束後，關團長把中村等人提出再次審訊。中村不僅蠻橫如故，甚至變本加厲地和官兵格鬥起來，激起了大家的滿腔怒火。一頓拳打腳踢，中村等被打昏在地。

至此，在場軍官一致通過『秘密處死』的建議。當天半夜，關團長派副官趙衡率親信士兵把中村一行四人用繩子綁縛，並用棉花堵塞其口，用馬車拉到後山僻靜處處死。連同他們所帶的行李、馬匹，除重要文件呈報外，一律焚毀滅迹。

不料秘密處死中村等人的情況還是暴露了。最初是井杉延太郎的妻子報告中村等人已有將近一個月失去了聯繫，請關東軍協助尋找。

七月中旬，一個和屯墾軍軍官有曖昧關係的名叫植松菊子的日本女人，把她所知道的有關中

村等人被殺的情况悄悄透露給『滿鐵』職員佐藤的妻子。佐藤的妻子又報告了關東軍。關東軍得到消息後開始盡力搜集中村等被殺的證據。

日軍特務機關長土肥原親自出馬化裝調查，在第三團駐地附近，當地的一個蒙古奸細向日本人告了密。後來日本人又找到中村的一隻手表，便以此作爲中村被殺的鐵證。

正在千方百計地製造武裝侵略東北借口的日本帝國主義無疑是不會放過這個大好機會的。八月十日，關東軍以參謀長三宅光治的名義發出了一封題爲《關于搜尋中村大尉文件》的信。關東軍參謀石原莞爾進而提出了利用中村事件擴大事端，以武力解決『滿蒙』問題的意見。

八月十七日，日本政府在隱瞞中村等人進行軍事間諜活動的前提下，公佈了他們被殺死的情况。他們一方面向中國提出强烈抗議，並提出各種强硬要求；另一方面動員各種組織機構利用一切機會盡量渲染中村事件，故意擴大事態，宣傳所謂『滿蒙危機』，煽動戰爭狂熱。

在日本威迫之下，中國政府于九月上旬承認了處死中村等人的事實，並採取妥協退讓、委曲求全的辦法，逮捕了屯墾軍第三團團長關玉衡。

怎奈『醉翁之意不在酒』，日本帝國主義的目的並非只是單純解決一個中村事件，他們武裝侵略東北的步伐已經阻擋不住了。

『奉天軍爆破滿鐵线，日華兩軍啓戰端』

一九三一年七月，日本陸軍省制訂了《解決滿洲問題方案大綱》。《大綱》認爲，『萬一出現我

軍有必要採取軍事行動的事實，要使各國都能諒解日本的決心，不至于對我們採取無理反對或壓迫的行動。』

爲此，陸軍省認爲需要預先制定一個周密的方案，並把武力解決滿洲問題的時間定在大約一年以後。

于是，《大綱》提出：『盡力使關東軍首腦部熟悉中央的方針和意圖，要他們在今後一年裏隱忍持重，避免捲入因排日活動而產生的糾紛。萬一發生糾紛時，只限于在局部範圍内處理，不擴大其範圍。』

顯然，日本陸軍省試圖遏止關東軍急不可奈的行動。不過，他們的武力侵華的根本方針毫無疑問是一致的。

爲了適應『滿洲問題』的需要，陸軍省緊鑼密鼓地開始了準備。

早在一九三一年四月中旬，日本軍部就調駐仙台的多門二郎中將師團長率領的第二師團到中國東北，接替第十六師團的防務。

第二師團是日本陸軍的精鋭部隊之一，其士兵多數生長于日本北部的寒冷地區，適應在中國東北作戰的需要。

一九三一年八月一日，日本軍部又進行了重要的人事調整：由本莊繁中將接替菱刈隆中將就任關東軍司令官之職，建川美次少將爲新任參謀本部作戰部長，今村均爲新任參謀本部作戰課長。

本莊繁是一個有名的『中國通』，也是一個狂熱的好戰分子。他當過張作霖的顧問，熟知中國東北的軍政情況。他的到任，無疑適應了關東軍的需要。

幾乎與此同時，還經日本軍部批准，由東京運來了兩門二百四十毫米榴彈炮，以加強關東軍的火力配備。

爲了掩人耳目，日本軍隊在運炮和安裝過程中都採取了嚴格的保密措施。由神户到大連的運輸使用專門的客輪，到大連碼頭後，直接卸到地下室。卸貨的日軍一律穿上中國的服裝，裝扮成當地的搬運工。當時正處盛夏，當地許多老百姓通宵難眠，有的人甚至就睡在室外。日本軍隊只好用箱子密封拆開的重炮，謊稱是棺材、石碑、洗澡盆。

經過一番周密配置，兩門重炮九月十日在瀋陽附近的日本守備隊管區内安裝竣工。

然而，在此期間，關東軍急于行動的決心已經按捺住了。

八月上旬，在中村事件的交涉過程中，關東軍就密令在四平街組成裝甲列車和步兵、炮兵聯合部隊作開戰準備。一時間劍拔弩張，軍事形勢緊張到了極點。只是由于日本軍部的堅決反對，關東軍才十分不情願地放棄了這次行動。

不過，關東軍的準備是多方面的，他們已經秘密炮製了另一個計劃。

瀋陽，是東北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又是東北軍主力的駐地。關東軍武力佔領中國東北的計劃中首要的一步，就是侵佔瀋陽，也就是當時的奉天。

爲了製造侵佔瀋陽的借口，早在一九三〇年冬，關東軍就確定了在瀋陽附近製造事端的計

劃。他們選擇柳條湖這個地方。柳條湖位于瀋陽北郊南滿鐵路附近，離東北軍北大營很近。一九三一年六月末，關東軍進一步制訂了在柳條湖爆炸鐵路製造事端的具體計劃。

製造事端的時間原預定爲九月二十八日，一方面是因爲兩門重炮尚未運到；另一方面是想等當地的高粱等農作物收割完畢，便于作戰。

然而，到九月中旬，關東軍秘密炮製的柳條湖事件的計劃還是在日本國內傳開了。日本軍部仍然堅持不在近期内發動事變。爲了阻止關東軍的行動，陸相南次郎特派參謀本部作戰部長建川美次少將前往東北，向關東軍轉達軍部的意見。

不料建川美次也是急于在東北發動事變的人物之一。實際上，他一向是板垣等人的積極支持者。

怎麼辦呢？建川美次眼珠一轉，計上心來。表面上他欣然接受了陸相的派遣，實際上即陽奉陰違。尚未從東京出發，他就暗中指使陸軍情報課班長橋本欣五郎拍密電給關東軍的板垣等人，令其提前行動。

橋本受命，向板垣連發三封密電。

第一封電報：『事已泄露，立刻採取行動。』

第二封電報：『在建川到達瀋陽之前，應堅決行動。』

第三封電報：『不必擔心國内，應堅持行動。』

接到電報後，板垣等人馬上開會緊急蹉商，決定把原定日期提前十天，在九月十八日實施計

劃。

九月十八日午後，作爲日本軍部派赴東北制止關東軍行動的特使建川抵達瀋陽。板垣等人心照不宣地不露面，只派關東軍少佐參謀花谷正出面迎入當地最高級的飯店菊文飯店。

當晚的歡迎宴會上，建川美次也心照不宣地灌了許多烈性威士忌，喝得爛醉如泥，回到房間倒頭便睡。

關東軍一手製造的『柳條湖事件』終于發生了。參與策劃這個事件的花谷正，在他戰後寫的回憶錄中作了比較詳細的描述：

『十八日夜，彎月挂起，高粱地黑沉沉一片，疏星點點，長空欲墜。島本大隊川島中隊的河本末守中尉，以巡視鐵路爲名，率領部下數名向柳條溝方向走去。一邊從側面觀察北大營的兵營，一邊選了個離兵營約八百米往南去的地點。在這裏，河本親自把騎兵團的小型炸藥安放在鐵軌下，並點了火。時間是十點多鐘。爆炸時轟的一聲，炸斷的鐵軌和枕木向四處飛散。』

花谷的這段話，是關東軍製造『柳條湖事件』的可信證詞。但是，慣于賊喊捉賊的日本軍隊卻佈置了一個假現場，擺了三具身穿中國士兵服的屍體，反誣中國軍隊破壞南滿鐵路，襲擊日本守備隊。

這種拙劣的伎倆被許多現場參觀者識破了。

外國記者喬·畢·巴魯在戰後出席遠東國際法庭作證時說：『中國士兵的屍體放在離路軌約五十碼到一百碼的地方，用鐵板圍起來。他們的頭部衝着爆炸地點的方向。同行的一個伙伴，調查

了一具屍體，他見到的是一個沒有血迹、被放置了相當長時間的屍體。』

就連當時奉天省日本郵政局長歧部與平到現場參觀後也認爲，這種把死人扔到現場的做法太愚蠢了，讓人一看就明白現場是僞造的。

九月十九日凌晨一時零七分，日本陸軍本部突然接到一份電報：『十八日晚十時半許，暴戾的中國軍隊在奉天北面的北大營以西，破壞南滿鐵路，襲擊我守備兵，與我前來之一部守備隊發生衝突。據報告，奉天獨立守備第二大隊正向現場出動。』

當天日本各家報紙都刊出號外。在《奉天軍爆破滿鐵綫，日華兩軍啓戰端》的大標題下，各報派駐奉天特派記者以快訊的形式報道說：『十八日夜晚十點三十分，在奉天郊外北大營西北側，窮兇極惡的中國軍隊爆破滿鐵綫，襲擊日本守備隊，我軍奮起應戰。日軍于午夜八時立即命令駐滿全軍準備出動，目前正在激烈交戰中。』

一出多麽精彩的自編自導的活劇。

瀋陽城頭一夜之間飄起了太陽旗

事變發生時，關東軍司令官本莊繁正在旅順。

本莊繁于八月二十日到旅順就職以後，採取了多種措施加速戰爭準備。其中一項重要措施，就是以例行巡視爲名，對日軍第二師團和獨立守備隊進行檢閱。

新任司令官的本莊繁在短短十二天的時間裏，先後到了海城、鞍山、煙台、本溪、公主嶺、

長春、瀋陽、遼陽等地。他在各地對日本駐軍的應變準備工作進行檢察，並多次觀看各地的軍事演習，還作了戰前的軍事動員。

可以看出，所謂『本莊視察』，是對關東軍實力的一次考察，實際上也是製造柳條湖事件前的一次戰前動員。

無怪乎事變後一個日軍軍官說：『九·一八』夜間的軍事行動，使人『彷彿大夢初醒，這不是把白天的檢閱重做一遍嗎？』

九月十八日下午，這個積極好戰的本莊繁剛結束巡察回到旅順。當晚十一時五十分，他獲悉了由石原幕後策劃、板垣前台執行的『柳條湖事變』的消息。

對板垣等人的製造侵華事端的主動行動，本莊繁深表贊許。他馬上追認了板垣以代理司令官名義發佈的命令，並把這些命令和以自己名義發佈的八項電令一起，電告日本軍部。

本莊繁決定，迅速將關東軍主力向瀋陽集結，以便首先控制東北地區的中樞。同時他還要求駐朝鮮日軍司令官林銑十郎中將迅速派部隊增援東北。

命令發佈以後，本莊繁立即率步兵第三十聯隊和重炮兵大隊，乘當日三時三十分的火車奔赴瀋陽。

日本軍部收到電報後，于十九日上午七日召開緊急會議。會議一致認爲關東軍的行動是適當的，並當即決定給關東軍增加兵力。

由此可見，日本軍部雖然迫于外交及輿論壓力，在侵華具體步驟上和關東軍意見不盡一致，

但他們的根本方針是完全相同的。所以，關東軍一旦造成既成事實，軍部仍然全力以赴地支持他們的行動。其實，關東軍也正是因爲摸透了軍部的意圖，才敢這樣肆無忌憚地擅自行動。

按照日本軍部的命令，滿鐵沿綫的日軍急速向瀋陽集結。事變爆發僅二日間，集結到瀋陽的火車共達十七列。

滿鐵也不遺餘力地予以支持。事實上，滿鐵正是柳條湖事件的幫兇之一。關東軍炮製的柳條湖事件前後共花費三百萬元，其中就有二百萬元是由滿鐵慷慨解囊的。

在日本軍部的支持和關東軍司令的命令下，瀋陽城被侵佔的命運已是無法避免了。

事變發生時，東北軍駐瀋陽的唯一的一支正規部隊是陸軍獨立步兵第七旅，駐守在北大營。另外城内尚有警察和公安隊兩千餘人。張學良遠在北平，東北邊防司令長官職務由參謀長榮臻代理。

事變前，鑒于日軍準備發動進攻的緊張局勢，榮臻和七旅旅長王以哲曾先後赴北平向張學良請示應變措施。

張學良卻不敢擅自做主，又報告了蔣介石。

八月十六日，蔣介石電告張學良：『無論日本軍隊此後如何在東北尋釁，我方應予不抵抗，力避衝突。吾見萬勿逞一時之憤，置國家民族于不顧。』

就這樣，當日軍炮擊北大營，步兵在坦克和夜色掩護下向北大營逼近時，七旅官兵不知所措。參謀長趙鎮藩幾次用電話請示榮臻，得到的都是這樣的回答：『不准抵抗，把槍放在庫房

裏，大家成仁，爲國犧牲。』

十一時三十分，日軍守備隊第二大隊佔領了北大營西北角。十九日凌晨二時許，日軍實入營垣，展開了殘暴的屠殺。第七旅廣大愛國官兵怒眦欲裂，狂呼如雷，羣請一戰。然而，身爲軍人，他們不得不服從命令。有的人抱頭痛哭，有的人揮拳擊壁，心中激憤難以言表。

凌晨五時三十分，東北軍第七旅終于退出北大營。于是日軍將北大營全面佔領。

進攻北大營的同時，日軍第二十九聯隊對瀋陽展開進攻。十九日晨四時三十分，他們佔領西城牆。四時四十五分，日軍第二師團主力由遼陽和海城乘火車到達瀋陽。到上午八時，日軍幾乎未受到抵抗就將瀋陽城全部佔領。瀋陽地區的東北軍撤向錦州。

滿鐵也早已準備就緒，裝載着關東軍司令部人員的列車凌晨即向瀋陽進發。到達瀋陽後，他們佔據了瀋陽大廣場的東拓大樓，在門柱上掛上了關東軍司令部的牌子。

一夜之間，瀋陽城頭飄揚起了日本的太陽旗。

在『不擴大方針』煙幕下第一期作戰計劃獲得成功

事變既起，日本軍部毫無保留地支持關東軍的行動。內閣也馬上召開緊急會議。內閣首腦從若槻禮次郎首相到幣原外相都認定關東軍的軍事行動是自衛戰爭，然而，由于擔心受到國際輿論的譴責和其它列强的干預，會議決定採取『不擴大事態』的方針，並責成陸相南次郎通知關東軍。

可是，南陸相卻無意嚴格限制關東軍的行動。其實，即使南陸相企圖在某種程度上貫徹不擴大方針，但面對軍部內中堅將校陰謀集團積極擴大侵略戰爭的活動，他也只能是望而興嘆了。

于是，閣議之後，陸相和參謀本部分別給關東軍發了訓示電。這兩封電報雖然訓令關東軍本着政府的精神『妥善處置』自己的行動，同時也對九月十八日夜關東軍的行動加以肯定和鼓勵。

另外，軍部的橋本欣五郎又密電板垣：『參謀本部關于制止軍事行動的命令是應付閣議的表面文章，其本意並非要你們停止行動。』

關東軍領會了軍部的真實意圖，便完全置日本內閣的『不擴大方針』于不顧。因此，雖然日本政府一再聲言堅持『不礦大方針』，事實上關東軍的侵略行動卻有增無已。

若槻內閣也一次又一次地追認關東軍擴大戰爭的行動。九月二十一日，駐紮朝鮮的日軍司令官林銑十郎擅自命令第三十九混成旅團四千多人侵入中國東北，支援關東軍的行動。當陸軍省軍務局長小磯把這個情況報告首相時，若槻卻表示：『既然已經出動了，也就沒有辦法了。』二十二日上午，內閣會議決定承認駐朝鮮日軍越境的既成事實，並同意支付出兵經費。

事實證明，日本政府的所謂『不擴大方針』不過是欺騙國際和國內輿論的謊言，是掩蓋日軍擴大侵略戰爭的煙幕。

關東軍發動『九·一八』事變，首先就是想要侵佔以瀋陽爲中心的南滿路和安奉路沿綫的重要城市。這是他們的第一期作戰計劃。

按照關東軍的預定計劃，攻打瀋陽城的戰端一開，駐紮長春附近的日軍也開始行動。

長春是南滿鐵路的終點，又是南滿鐵路和中東路的交接點。它是吉林省的咽喉，又是北滿的門户。佔領了長春，就可東取吉林，北攻哈爾濱，西圖洮南，進攻齊齊哈爾。在瀋陽發動事變的同時攻佔長春，本是關東軍的既定方針。

當時，在長春南嶺的中國駐軍是東北軍炮兵第十團、步兵第二十五旅第五十團和一個輜重連；在二道溝的中國駐軍是步兵第六六三團一個營，此外，城外還有一個機槍連。而日軍在長春頭道溝只駐有一個聯隊，東北軍不僅在數量上遠遠超過日軍，裝備也是很佔優勢的。

然而，長春的東北軍也接到了當時代理軍政大權的參謀長熙洽『不准抵抗』的命佔領長春。

在攻擊瀋陽和長春的同時，關東軍獨立守備隊步兵第三大隊于十九日上午六時三十分佔領營口，步兵第四大隊于上午十時佔領鳳凰城。至此，南滿鐵路沿綫完全被日軍佔領。

關東軍順利實現第一期作戰計劃。

得意洋洋的關東軍遇到一場未曾有過的血戰

長得手以後，關東軍決定以東取吉林、北攻哈爾濱作爲第二期作戰的主要目標。因爲一旦佔領吉林、哈爾濱，既可以鞏固對南滿的軍事佔領，又可以進而奪取整個北滿。

爲了製造出兵借口，關東軍故技重演。二十日，關東軍的甘粕正彦憲兵大尉和日本吉林特務機關長大迫通貞步兵中佐秘密投彈炸毀日本僑民的房屋，又誣稱是吉林的中國軍隊所爲。

在石原、板垣兩參謀的强烈要求下，關東軍司令官本莊繁于九月二十一日午前三點，作出了

出兵吉林的決定。

當時吉林省主席兼東北邊防軍駐吉林副司令長官張作相因父親去世回錦洲治喪。省主席職務由熙洽代理。熙洽早就在和日軍勾勾搭搭，此時一看形勢不妙，馬上叛國投敵。在他的命令之下，吉林的中國軍隊陸續全部退出省城。

關東軍兵不血刃佔領吉林。

爲了侵佔哈爾濱，關東軍再一次使用慣技，製造戰爭借口。九月二十一日夜，哈爾濱的日日新聞社、日本總領事館、日本特務機關發生了突然被炸事件。這是哈爾濱日本特務機關長百武晴吉中佐、原憲兵大尉甘粕正彦等人一手密謀策劃的。

關東軍卻又把其反誣爲中國的『排日暴動』，一面報告日本軍部，一面調兵遣將準備出兵哈爾濱。

但是，由于擔心引起蘇聯的强烈反應，日本政府反對當時出兵哈爾濱。日本軍部也被迫下令制止。

當然，這並不是關東軍整個軍事行動的停止。日本軍部和關東軍在擴大軍事佔領上一直是以整個東北地區爲目標的。軍部對關東軍的所謂限制，只是時間的早晚而已。

于是，關東軍暫時繞開哈爾濱，由洮（安）昂（昂昂溪）路北進，進犯黑龍江省，準備實現自己的第三期作戰目標。

一直未遇反抗的關東軍勢如破竹。僅一週左右時間，就攻城三十座，控制鐵路十二條，攻佔

遼吉兩個省。

得意洋洋的關東軍不免有些大意了。就在這時，他們遭遇了一場進犯東北以來從未有過的血戰。

由于黑龍江省與蘇聯接壤，關東軍對自己直接出兵侵佔尚有顧慮。他們首先利用叛國投敵的原洮遼鎮守使張海鵬偽軍攻佔龍江（今齊齊哈爾）。

當時黑龍江省主席萬福麟遠在北平。張學良任命步兵第三旅旅長馬占山代理省主席職務並兼黑龍江省軍人的總指揮。

遵照張學良電示：『如張逆海鵬進軍圖黑，應予以討伐，但對于日軍務須避免直接衝突』的命令，馬占山在嫩江橋北岸佈防迎擊張海鵬偽軍的進攻。

十月十三日，張逆軍向江橋進攻，馬占山守軍當場反擊，將偽軍擊潰。爲防止敵軍再犯，守軍破壞了嫩江橋。

關東軍利用走狗未達目的，便迫不及待地親自出馬了。

爲了製造出兵借口，十月二十七日，日本關東軍代表林義秀少佐向馬占山提出了『要求書』：『黑龍江省政府在一週內將嫩江橋修復，否則，日方將自行修理。『屆時爲掩護工事進行，將訴諸武力。』這個『要求書』，實際是關東軍進攻黑龍江省的宣言書。

一切準備停當之後，十一月三日上午十時，關東軍在鐵甲列車和飛機、炮兵掩護下强行修橋。爲了避免和日軍衝突，馬占山將守橋部隊撤至北岸陣地。然而，而對中日軍隊的克制忍讓，

關東軍不僅沒有絲毫收斂，反而更加變本加厲。當日下午，日軍一個中隊在飛機支援下渡過江橋，對中國守軍陣地發起攻擊。

四日中午，日軍一個中隊又在飛機支援下向守軍陣地左翼前的後營子北側高地攻擊，並將大興車站炸毀。同日下午六時，日軍一個大隊在七架飛機、四輛鐵甲車的掩護下，向守軍衛隊團陣地正面發動猛攻。至此，守軍羣情激憤，忍無可忍，奮力自衛，英勇殺敵，展開了一場血戰。

嫩江橋戰鬥是自『九·一八』日軍發動對東北的侵略戰爭以來最激烈的一次戰鬥。在蔣介石的『絕對不抵抗』政策下，中國守軍完全是激于民族義憤進行了這次自衛行動。

消息傳出，全國振奮。賀電、慰問電雪片般飛向黑龍江，更加激發了廣大中國官兵的鬥志。

戰鬥至當日晚，守軍因傷亡過重，放棄了江橋陣地，乘夜後撤到大興車站北休整補充。十一月七日，馬占山發表通電，說明了連日戰況，及退保三間房陣地與敵繼續作戰，絕不屈服的決心。

這時，日本軍部由于擔心引起日蘇糾紛和國際輿論的反對，多次電令限制關東軍的作戰行動，並指示關東軍找出行使武力以外的手段達到目的。于是，關東軍暫時停止北進，企圖通過交涉迫使馬占山屈服。然而，馬占山態度十分强硬。

軟的不行，只好又來硬的。關東軍又發動了新的軍事進攻。

十一月十八日拂曉，關東軍向守軍陣地展開全綫進攻。激戰一整天，守軍因傷亡過重被迫再次撤退。

十九日上午九時日軍進入省城。至此，黑龍江省大部分地區也陷于敵手。

四個月時間關東軍鐵蹄踏遍東三省

由于蔣介石奉行不抵抗政策，日本侵略者自發動事變後長驅直入。面對國土的淪陷，舉國上下民情激憤，輿論沸騰。愛國學生紛起向南京政府請願，要求抗日救亡。

剛從『剿共』前綫返回南京的蔣介石卻于九月二十二日宣稱：『此刻必須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對强權，以和平對野蠻，忍痛含憤，暫取逆來順受態度，靜待國際公理之判斷。』

蔣介石所謂『靜待國際公理之判斷』，就是希圖英法操縱下的國際聯盟以及美國出面來制止日本的侵略。

然而，操縱國際聯盟的英、法與《九國公約》、《非戰公約》的發起國美國對日本侵略中國東北，都持姑息縱容的態度。

九月二十二日，國聯理事會會議要求兩國撤兵，但又拒絕中國代表『限期撤兵』的提議。三十日，國聯會議通過一項既不譴責日本爲侵略，又不主張採取任何實際措施的『不擴大事變』的決議。

蔣介石翹首以盼的『國際公理之判斷』第一次就這樣地發落下來。

在南京政府『逆來順受』的態度和國際聯盟及美國採取明顯的姑息政策的鼓勵下，野心勃勃的關東軍又進一步擴大侵略戰爭。

在佔領黑龍江省城龍江以後，關東軍已無北顧之憂，于是便調轉矛頭進攻錦州，襲取遼西地區，以實現其第四期作戰目標。

錦州乃遼西重鎮，也是東北通往關内的咽喉要地。奪得錦州，不僅能完成對遼寧省的全部佔領，而且也是繼續侵佔熱河和進入關内的最重要的基地。

由于錦州的戰略地位重要，它成爲敵我雙方特別重視的地區。

瀋陽淪陷不久，張學良就將東北的軍政指揮中心西遷錦州，在那裏設立了東北邊防軍司令長官公署和遼寧省政府行署。

此後不久，關東軍首腦會議即已確定覆滅錦州政府的方針。

十月八日，關東軍司令部下達了轟炸錦州的命令。

石原莞爾親自指揮十二架日本飛機飛臨錦州上空，一共投下二十五公斤重的炸彈七十多枚。轟炸的目標是省府、長官公署、車站、兵營等地。就連插有紅十字旗的鐵路醫院也未能幸免。

關東軍的這次空襲，不僅是爲了消滅在錦州的省政府根據地，而且也是對日本政府和軍部暫時制止它們出兵哈爾濱的一種反抗行爲，表明了關東軍要一幹到底的決心。

空襲之後，關東軍連續幾次發動對錦州的進攻，加快了奪取遼西的步伐。

然而，日本政府和軍部恐引起國際上的反對，幾次電令關東軍停止行動，把進入遼西的部隊一律撤回到遼東。

十二月中旬，日本政局發生變化。若槻内閣由于外失信譽，内受軍事法西斯發動的「十月事

件」和反對派倒閣的衝擊，難于維持下去，于十二月十一日實行總辭職。十三日，犬養毅内閣成立。爲了取得軍方的支持，犬養毅選任陸軍『皇道派』首腦、與關東軍侵華方略相同的荒木貞夫爲陸相。

新任軍部首腦支持關東軍進佔錦州，並派遣陸軍第四師團、第八師團前往中國東北，加强關東軍的力量。日本新内閣也同意了軍部進攻錦州的計劃。

關東軍擺脱了羈絆，又得援兵，頓時如虎添翼。經過多方準備，十二月十七日，日軍從北寧、大通、營綫三綫西進，揭開了攻錦之戰的序幕。

一九三二年一月一日，日軍發動了對錦州的總攻。三個師團達四萬人之多的日軍從三面包圍了錦州。

由于受蔣介石不抵抗政策的影響，錦州中國守軍缺乏抗戰的決心和反攻準備，又得不到必要的支援，從十二月二十九日起即開始撤退。一九三二年一月三日晨，中國守軍全部撤出錦州。

遼西重鎮錦州終于陷落了。

至此，哈爾濱成爲關東軍炮口的最後一個攻擊目標。

哈爾濱是東省特别行政區官署所在地，又是中蘇共管的中東鐵路的總樞紐。『九·一八』事變後，關東軍顧忌對蘇關係，暫時未行武力奪取，而是繞道先行奪取龍江。

經過一系列外交接觸之後，日本帝國主義消除了原來的顧慮。

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參謀本部批准關東軍向哈爾濱出兵。

二月二日，日軍迫近哈爾濱郊外。

二月四日下午四時，日軍兩翼進攻部隊向守軍發起攻擊。守軍利用民房、圍牆頑强抵抗，激戰兩天，守軍傷亡極大，難以支持，全綫撤退。哈爾濱也被日軍佔領。

從柳條湖事件到哈爾濱淪陷，關東軍僅用了四個多月時間，就侵佔了中國東北一百一十萬平方公里的神聖領土。

石原莞爾精心構思的武力佔領滿洲的計劃終于如願以償了。

第四章

滿洲舞台充導演

緊緊抓住『末代皇帝』這張牌

還在『九·一八』事變之前，日本人就對佔領東北後如何實行殖民統治問題，挖空心思地作了種種設想。關東軍發動『九·一八』事變後，馬不停蹄地醞釀在東北建立殖民統治的方案，並使之越來越具體。

事變後的第五天，板垣、石原、土肥原等人麇集于關東軍參謀長三宅少將的住處，商討對策，炮製了《滿蒙問題解決方案》，提出以末代皇帝溥儀爲『元首』，建立『新政權』，領土包括東北四省及蒙古；『新政權』的國防和外交由日本掌握，而交通、通訊的主要部分也要由日本管理；在國防和外交等方面所需要的經費，由新政權負擔；要利用熙洽（吉林地方）、于芷山（東邊道地方）、張景惠（哈爾濱地方）等軍閥拼湊傀儡政權。

這個方案剛剛出籠，關東軍就急不可耐地派出人馬，四處活動。首先通過駐天津軍司令官將溥儀及其親信羅振玉、徐良等人『保護』起來，然後板垣去策動張景惠，大迫通貞中佐和今田新太郎做熙洽的工作，今田大尉做張海鵬的工作，大矢進計則做于芷山的工作，促使他們起事。

但關東軍建立以溥儀爲首的『新政權』的計劃卻遭到了日本中央政府的反對。九月二十九日，陸軍部次官在給關東軍司令的電報中說：『閣員中風傳關東軍司令官參與了擁立宣統皇帝運動。望注意我軍切不可參與……』。在陸相寫給日軍司令官的私人信件中甚至寫道：我軍參與政權運動將導致陸軍自取滅亡等等。

中央部的態度使關東軍大失所望，于是，決定先發制人，發表聲明，明確否認張學良政權，向中外公開表明建立『新政權』的意圖，以迫使陸軍中央同意他們的『方案』。關東軍還請出朝鮮總督宇垣一成和滿鐵總裁内田康哉前往東京充當説客，勸説中央贊同關東軍的方案。有意思的是，内田康哉本來是幣原外相派去牽制關東軍的獨立行動的，可他卻在『九·一八』事變後迅速倒向關東軍，此番又作爲關東軍的代言人去東京游説。

關東軍的策動工作見了成效。陸軍省首先改變態度，中央政府的大部分閣員也開始追隨陸軍，『九·一八』之後中央所持的『不擴大方針』隨之黯然失色。而就在這時，發生了『十月事件』，導致内閣更迭，强硬的荒木貞夫成爲陸相。至此，日本政府完全倒轉支持關東軍。

關東軍在逼迫政府同意其《滿蒙問題解決方案》的同時，又起用了滿鐵調查課松木俠爲國際法顧問，駒井德三爲財政顧問，緊鑼密鼓地研究和炮製建立『新政權』的具體方案。

一九三一年十月二十一日，松木俠與關東軍參謀板垣、石原等炮製了一份《滿蒙共和國統治大綱草案》，其實質内容是由關東軍控制『新政權』的國防、外交和交通等，把中國東北變爲日本帝國主義的殖民地。不到一個月，松木俠又在同本莊繁司令官、板垣、石原等參謀進一步交換

意見後，起草了《滿蒙自由國建設方案大綱》，做賊心虛地指出：『將滿蒙作爲我國領土的一部分是爲上策，但鑒于以往的情況，目前突然採取這一步驟，恐將徒然引起國際上的議論。作爲中策，建設滿蒙獨立國，使其完全脱離中國的行政統治。』

關東軍建立『滿蒙獨立國』的設想越來越具體，而慢了一拍的陸軍中央部對即將誕生的『新政權』與中國本部的關係問題仍未能得出明確的結論，最後只得接受關東軍的意見：絶對不將『新政權』置于與中國本部的聯系之中。

接下來，關東軍加緊實施其方案，打出溥儀這張牌。

十月底，關東軍派土肥原賢二大佐帶着一筆數目可觀的經費前往天津。其使命是不擇手段地擾亂天津地區，乘機把隱居在天津日租界的溥儀帶到東北。

溥儀是清朝末代皇帝，辛亥革命爆發時，溥儀被迫退位。起先，根據『清室優待條件』，他在紫禁城內還過着保留皇帝尊號的小朝廷生活。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五日，被馮玉祥攆出紫禁城。不久，溥儀轉到天津日租界宮島街張園住下來。在退位的日子裏，溥儀受到一幫清朝遺老遺少的包圍，逐漸萌發了復辟的野心。『九·一八』後，關東軍想利用溥儀來實施其殖民統治，溥儀也巴不得能借助日本的勢力來實現他的復辟夢。這樣，溥儀就和關東軍勾結起來。

十一月三日夜間，溥儀會見了土肥原。

狡猾的土肥原鼓動如簧之巧舌，對溥儀百般誘惑。他説：『關東軍對滿洲絶無領土野心，只是誠心誠意地要幫助滿洲人民建立自己的新國家。希望閣下不要錯過這個時機。閣下應儘快回到

祖先發祥地，親自領導這個國家；日本將和這個國家訂立攻守同盟，它的主權領土將受到日本的全力保護；作爲這個國家的元首，閣下一切可以自立。』

土肥原表現出的誠懇的語調、恭順的笑容，加之他的名氣、身份，打消了溥儀原有的許多顧慮。

不過溥儀心裏還有一個極重要的問題，他問道：『這個新國家是什麼樣的國家？』

『我已經說過，是獨立自主的，是由宣統帝完全做主的。』

『我問的不是這個，我要知道這個國家是共和，還是帝制？是不是帝國？』

『這些問題，到了瀋陽都可以解決。』

『不』，溥儀堅持地說，『如果是復辟，我就去，不然的話我就不去。』

土肥原會意地微笑了，他聲調不變地說：『當然是帝國，這是沒有問題的。』

『如果是帝國，我可以去！』溥儀滿意地答道。

『那麼就請閣下早日動身，無論如何要在十六日以前到滿洲。詳細辦法到了瀋陽再談。』

土肥原安排吉田具體安排溥儀動身的辦法。

但是，幣原外相仍堅決反對抬出溥儀，他認爲『擁立宣統皇帝的計劃，完全是一個時代錯誤，它恐怕對將來帝國在滿蒙的經營也留下嚴重的禍根。』日本駐天津總領事桑島主計接到幣原的訓令後，嚴厲戒備，以防止溥儀出逃。

恰在此時，溥儀也對去不去東北猶豫起來。原來溥儀收到了劉驤業從東京發來的一封電報，

說『日本軍部方面認爲溥儀出山的時機仍然未至。』溥儀的親信陳寶琛也認爲『當前大局未定，輕舉妄動有損無益。』有的甚至勸溥儀『不要認賊作父，要顧惜中國人的尊嚴。』只有鄭孝胥等少數人力勸溥儀立即出關，不要錯過時機。

土肥原決定不顧外務當局的反對，力促溥儀出關。當他看到溥儀猶豫起來後，就派人給溥儀送去一份禮品，並在水果筐子裏放了兩顆炸彈，嚇得溥儀癱在沙發上站不起身來。第二天，吉田就找借口向溥儀說：『宣統帝不要接見外人了，還是早些動身的好。』此外，土肥原還通過日本間諜、溥儀的親信祁繼忠向溥儀散佈一些嚇人的消息。

爲了瞞過日本外務當局，土肥原于十一月八日晚策劃了一個『天津事件』。他組織漢奸便衣隊對華界大肆騷擾，製造混亂。然後，天津駐屯軍司令官香椎浩平中將宣佈戒嚴。斷絕與華界的一切交通。同時，日軍將靜園嚴密包圍，以免走漏風聲。

十一月十日傍晚，溥儀被放在一個敞篷汽車的後箱裏，送到一家日本飯店。然後，溥儀換上一件日本軍大衣，帶上日本軍帽，又坐上日軍司令部的軍車，來到英租界的一個碼頭上，一隻小汽船早已等候在那裏。在日本兵的押送下，溥儀、鄭孝胥一行人先到了大沽口，換乘日本商船『淡路丸』，十三日到達營口。在一家旅館稍事休息後，又乘火車抵湯崗子，暫住在翠閣旅館。第二天一早，關東軍派來負責『照顧』溥儀的特務甘粕正彥向溥儀提出了三個條件：一，既是到了滿洲來，可以保證生命安全；二，所有一切都須遵照關東軍的命令行動；三，沒有關東軍的許可，不許接見任何人。總之一句話，沒有關東軍的許可，什麼事情也不能做。

當時，國聯正在開會，日本處境孤立，日本内閣不能貿然行事。十一月十六日，陸軍大臣致電關東軍，說：『關于擁立溥儀，過早行之，徒然刺激列國，要求和中央聯系後處理。』于是，關東軍以湯崗子附近有土匪爲借口，在十一月十八日又將溥儀弄到旅順的大和旅館，並加以嚴密封鎖，不讓溥儀下樓，也不准外邊人上樓。夢想復辟的溥儀成了任日本人耍弄的一張牌。

關東軍安排想當皇帝的溥儀做了『滿洲國』的『執政』

正當土肥原到天津劫持溥儀的時候，關東軍也在東北各地積極扶持地方傀儡政權。早在十月十五日，漢奸趙欣伯就當上了僞奉天市市長，終日奔走于日本軍閥之門，十分賣力地爲日本帝國主義效勞。此前，趙就追隨關東軍積極拼湊省『地方維持會』等傀儡組織。他曾親自策動袁金鎧出馬，于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四日成立了『奉天地方維持會』，袁金鎧充當委員長。第二天，就以這個僞組織的名義，向關東軍司令官本莊繁遞交『請願書』，請求關東軍不要撤兵，幫助維持秩序。關東軍就勢以『維持地方』秩序爲借口，指使『維持會』各委員，策劃成立『獨立政府』，並與中國中央政府斷絶關係。于是『奉天地方維持會』一變而爲『遼寧省地方維持會』，代行省政府的職能。關東軍派了幾名日本顧問參加這個組織，以便從中操縱和控制。二十八日，僞『維持會』發表了一個『獨立宣言』，宣佈脱離張學良政權，建立『新獨立政權』。

關東軍因急于拼湊『遼寧省政府』，請出了被稱爲『奉天文治派三巨頭』之一的老牌漢奸于冲漢。十月七日，在于冲漢的恐嚇和慫恿下，袁金鎧將『地方維持會』遷入省政府院内，成爲變

相的省政府。然後，關東軍即以該組織名義『佈告安民』，並硬加進『與張氏舊政權及國民政府均斷絶關係』等語。

最早宣告『獨立』的是吉林。當時掌握吉林大權的熙洽是個『閑散皇族』，做夢都想着復辟。他曾發誓説：『爲恢復清朝的統治，就是肝腦塗地亦在所不惜。』『九·一八』後，熙洽爲借日軍的力量恢復清朝，拱手讓出吉林。九月二十八日，在關東軍的指導和監視下，熙洽召集吉林各團體機關負責人開會，宣佈僞吉林省長官公署組織大綱，並聲明：脱離與南京政府和張學良政權的關係。這樣，吉林就率先『獨立』。

此後，關東軍還策動漢奸張海鵬在洮南、張景惠在哈爾濱、于芷在東邊道等地宣佈『獨立』。溥儀出關後，關東軍于十二月十六日扶持原遼寧省政府主席臧式毅出任奉天省長，正式組成僞奉天省政府。一九三二年一月一日，張景惠也在哈爾濱宣佈就任僞黑龍江省省長，並聲明『獨立』。錦州陷落後，馬占山在日軍的威逼利誘下，也表示與張景惠合作。這樣，東北各地的僞政權基本上建立起來。

接着，關東軍開始實施其建立僞中央政權的計劃。

錦州淪陷後，關東軍加快了籌建僞滿洲國的步伐。一九三二年一月四日，新任日本陸軍大臣荒木貞夫，催令板垣或石原速去東京，同中央協商建立『滿蒙獨立國』的方案。六日，板垣帶着本莊繁的指示急速趕到東京，向日本政府彙報，然後，日本陸軍省、海軍省、外務省根據板垣的匯報，共同炮製了一份《中國問題的處理方針綱要》，交給板垣。

板垣回到瀋陽後，關東軍司令部連續召開『建國幕僚會議』，加緊策劃建立僞滿洲國的方案，同時，還指使漢奸出面，召開僞『建國會議』，演唱『雙簧式』的傀儡戲。

二月十六日晚上，『建國會議』在漢奸趙欣伯住宅舉行。由于出席這次會議的有張景惠、馬占山、熙洽、臧式毅四人，這次會議又被稱爲『四巨頭會議』。會議一直開到十七日凌晨三時，在板垣等人的授意下，會議決定除成立『東北行政委員會』外，還指定宋文林等三人起草『建國宣言』。十七日下午，僞『東北行政委員會』正式組成。板垣强迫這個僞組織在三月以前籌建成『新國家』。第二天，關東軍司令部依照荒木貞夫的指示，以這個僞組織的名義，發表了『獨立宣言』。

從這天開始，他們連日在奉天召開會議，當然是根據關東軍事先提出的建國方案進行的。而且，會議決定，新國家不是舊帝國的復辟，而是建立以溥儀爲首的立憲共和國。

溥儀從天津出走後到達旅順，即對關東軍感到不滿。他認爲，關東軍名義上是保護他，實際上則是把他軟禁起來。他降駕屈尊來東北，爲的就是復辟清國，重溫皇帝夢，而關東軍卻想在滿洲建立共和制政府。因此，當他聽說『東北行政委員會』通過在東北建立『共和國』的決議後感到失望和憤慨。他草擬了一封信，羅列了十二條必須恢復『帝制』的理由，讓人交給板垣。板垣只捎回話來說『可以理解』，從此未見下文。

一九三二年二月二十二日，板垣親自去旅順要求溥儀接受『共和制』，擔任『新國家』的『執政』。但溥儀表示不能放棄皇帝身份。最後，板垣冷冷地說道：『閣下再考慮考慮，明天再

談。」便告辭走了。

第二天早晨，板垣將鄭孝胥和羅振玉叫到大和旅館，威脅說：『軍部的要求再不能有所變更。如果不接受，只能被看作是敵對態度，只有用對待敵人的手段做答覆。這是軍部最後的話！』

溥儀聽到這個回答，嚇得呆若木鷄，決定妥協，可仍念念不忘帝制：『只有暫定以一年爲期，如逾期仍不實行帝制，到時即行退位。』

板垣對溥儀的條件表示可以接受。

關東軍作通了溥儀的工作，遂操縱『東北行政委員會』于二月二十五日開會通過了關于建設和統治『新國家』的原則：

一、新國家定名爲『滿洲國』；
二、滿洲國的統治者稱『執政』；
三、『執政』基于人民的擁戴，以立憲制行使統治權；
四、新國家的政治以民本主義爲依據；
五、滿洲國的國旗爲新五色旗；
六、廢除民國年號，改稱『大同』；
七、以民意爲基礎定未來憲法；
八、『執政政治』乃是制定憲法前的統治形態；

九、定國都爲『新京』(今長春)。

二月二十九日，會議又決定了《政府組織法》和《人權保障法》。經過討價還價，大小漢奸論功領爵，結果由鄭孝胥任國務院總理，張景惠任參議院議長，于沖漢任監察院院長等等。

三月一日，關東軍假借僞滿洲國的名義，發表了『建國宣言』，宣佈『滿洲國』成立。在關東軍安排的漢奸『請賀』戲中，溥儀表示『暫任執政一年』。三月八日，溥儀在一群漢奸和日本人的簇擁下，乘車到長春，次日舉行就職典禮，溥儀正式就任僞滿洲國『執政』。十日按照事先的分贓協議，溥儀簽字任命了僞滿洲的各級官吏。

于是乎各路傀儡小醜在關東軍的導演下陸續在『滿洲國』舞台上正式亮相。

被『皇軍』玩弄于股掌間的『獨立國家』

『滿洲國』這個歷史的怪胎一誕生，便一本正經地向全世界又是『宣告』，又是『照會』，儼然一自主獨立的國家。可傀儡終究是傀儡。『滿洲國』依順日本、仰人鼻息的性格是日本人特意塑造的，也是甘心當亡國奴的民族敗類自認的。在溥儀致關東軍司令官本莊繁的《溥儀——本莊換文》中就白紙黑字地赫然規定：

「一、關于敝國之國防和治安之維持，均委諸貴國，所需經費全部由敝國負擔」；

「二、爲貴國軍隊在國防上所需的已設置的鐵路、港灣、水路、航空之管理，以及有關新路綫的敷設，敝國均委諸貴國或由貴國所指定的機關進行；」

「三、貴國軍隊所需之各種設施，由敝國竭力援助；」

「四、參議府將選任貴國德高望重的有識之士爲參議，也可由貴國人充任敝國中央或地方官員；其人選，由貴軍司令官擔保和推薦，其解職也將征得貴軍司令官的同意；在改變參議人數之總數時，共同協議之；」

「五、將來兩國締結正式條約時，將以上述條項的宗旨及規定爲基礎。」

這個形式上由兩個獨立國家簽署的文件，卻沒有透出絲毫『滿洲國』的自主氣息。

《溥儀——本莊換文》的簽署日期爲僞滿洲國成立後的四月十日，但實際上三月六日板垣就讓溥儀簽好字，甚至更早些時候，在一月底，關東軍幕僚部就在旅順迫使溥儀做出了秘密許諾。

『滿洲國』的政治行政中心即總務廳，其長官由日本人駒井德三擔任，次長、外長等也都是日本人。所以可以説僞滿洲國政府完全操縱在日本人手裏。

僞滿洲國『開國』後立即向全世界宣告了『滿洲國』的成立。三月十二日，『外交部總長』謝介民還煞有介事地照會日、英、美、法、蘇聯、德、奥、荷等十七國，闡明『滿洲國』成立的宗旨及其對外方針，要求各國對『滿洲國』予以承認。

各國的反應不盡相同。首先是美國，它在『九・一八』事變後對遠東採取了不介入的態度。關東軍佔領錦州後，美國于一九三二年一月七日向中國和日本遞交了稱之爲『不承認主義』的備忘錄，内容是不承認『九・一八』事變後所發生的新事態。

英國在我國東北没有重要的權益，其態度比美國更加消極。以法國爲代表的其他歐洲國家採

取了同英國相同的態度。

蘇聯建議簽訂《日蘇互不侵犯條約》，等于承認了僞滿洲國總領事，對滿洲發生的事態，與其說是反對，不如說是默認。各國都考慮到本國的利益。不肯積極干涉，這實際上是縱容了日本對中國的侵略。

『九·一八』事變後，國際聯盟根據中國政府的起訴，召開了幾次理事會，于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日組成國際聯盟日華糾紛調查委員會，決定派出調查團。調查團由英、美、法、德、意五國派員組成，團長是英國人李頓。因而，這個調查團又被稱爲『李頓調查團』。調查團在東北兜了一圈之後，于十月初正式發表一份調查報告書，認爲『不能承認滿洲國』。氣得日本人暴跳如雷……

儘管國際上衆說紛紜，但絲毫不妨礙日本人將『滿洲國』更牢固地置于自己的掌握之中。其重要步驟之一便是公然承認『滿洲國』，繼而通過一系列條約控制住『滿洲國』的幾乎所有的權利。

僞滿洲國是關東軍一手導演出來的。但當時的犬養毅内閣害怕國際輿論的譴責，没敢立即承認僞滿洲國。即便在接到僞外交部長謝介民的照會時，日本政府的方針也是停留在給予援助和指導上，而没有從國際法上予以承認。

一九三二年七月，原滿鐵總裁内田康哉就任日本外相後，日本政府的政策發生了急劇的變化。内田康哉在八月召開的第六十三次會議上發表了臭名昭著的『焦土外交』的演説，鼓吹『在

滿蒙問題上要舉國一致』，不惜『把國家化爲一片焦土』。與此同時，關東軍爲使自己一手扶持起來的僞滿洲國成爲一個『獨立國』，也要求日本政府儘早予以承認。

九月十五日，日本政府公然冒天下之大不韙，發表關于承認『滿洲國』的聲明，正式承認『滿洲國』。同一天，日本駐僞滿特命全權大使武藤信義和僞滿洲國國務總理鄭孝胥簽訂了《日滿議定書》，其内容有兩條：

『一、滿洲國在將來，即日滿兩國尚未另行簽訂約款前，應確認日本國或日本國臣民在滿洲國領域内根據以往日華兩國間的條約、協定、其它條款以及公私契約所享有的一切權益予以尊重。

『二、日本國和滿洲國確認：對于締約國一方的領土及治安的一切威脅事實上同時成爲對于締約國另一方的安寧和存在的威脅，相約兩國共同擔負防衛國家的責任，爲此需要日本國軍隊駐紮于滿洲國内。』

在簽訂《日滿議定書》的同時，雙方還締結了《日滿守勢軍事協定》，規定『日滿兩國，如有一方或雙方無端遭受第三國的侵略，兩國軍隊將在日本軍指揮官的統一指揮下行動』；『日本軍在滿洲國境内享有軍事上所需自由、保障以及隨之而來的便利』。

通過以上兩個協定，日本在『滿洲國』這個新『獨立』的國度裏，繼續享有以前它所攫取的一切特權，並擴大了它在東北駐紮軍隊的特權。在此之前，關東軍在法律上只能駐紮于滿鐵沿綫，而現在則可以自由地在全滿洲駐紮。這樣，關東軍就能更有效地控制僞滿洲國了。

爲了控制僞滿洲國軍隊，關東軍于一九三三年九月制訂了《滿洲國陸軍指導綱要》。綱要規定，『滿洲國陸軍的兵力，鑒于其目的，應限制在所需最少的範圍内。其兵員總數（包括憲兵）目前應以六萬人爲標準，隨着治安的改善，逐步達到這個數量。戰時帝國應使用之重要鐵路的保衛工作不交給滿洲國陸軍。』『滿洲國陸軍的戰鬥兵種主要是步兵和騎兵……不必擁有坦克、重炮、飛機、毒氣設備等。』『滿洲國陸軍的訓練工作，爭取在帝國陸軍的實質性指導下，採取必要行動，充分完成其任務。』

按照這一規定，『滿洲國』陸軍的數量、兵種、裝備、訓練、指揮等一切權力幾乎都歸日本人掌握。『獨立』的『滿洲國』實際上没有任何防衛能力。非但如此，日本人還通過類似手段實際控制了『滿洲國』的其它各種權力，如日本政府的《滿洲國指導方針綱要》指出：『滿洲國的經濟開發，本着日滿共存共榮的精神，受帝國國防需要之制約，並置于帝國實權之下，也允許國内外其他人士在滿洲國的實權下貪污從事公正自由的經濟活動』；『滿洲國的交通及通信尤與國防和維持治安有密切關係，希在帝國政府的實權下儘可能從速統一配備並更新各種實施』；『滿洲國的財政，要考慮到國民負擔的限度，迅速確立起來，並負責分擔帝國駐滿軍費』。

關東軍正是通過這些條約操縱了東北的政治、經濟、軍事和文化的一切大權，把中國東北變成了日本的殖民地。所以，日本和僞滿洲國之間的關係，根本不是什麽國家關係，不論日本帝國主義玩弄什麽『承認』、『新國家』的把戲將其打扮成『獨立國家』的樣子，都不能改變僞滿洲國作爲殖民地傀儡政權的性質。『大日本皇軍』爲了侵略掠奪的需要，可以隨心所欲地把這個『獨

立自主的滿洲國』玩弄于股掌之間。

關東軍通知溥儀當皇帝，但登基時不許穿龍袍

前文說過，溥儀到東北的目的就是爲復辟大清王朝，重登皇帝寶座。但關東軍並未讓其如願，反讓其當了一個『執政』。雖然如此，溥儀的皇帝夢仍極爲强烈，就任『執政』時，就爲進一步做皇帝做了張本。他在對東北『代表』的答詞中說：『勉竭愚昧，暫任執政一年。一年之後，如多隕越，敬辟賢路。倘一年之內，憲法成立，國體決定，若與素志相合，再當審慎，度德量力，以定去就。』一九三二年三月，溥儀就任『執政』後五天，强烈主張帝制的陳曾壽拂袖而去，回到天津後，給溥儀上書，稱：『京津舊臣聞皇上就任執政，疑尊號自此取消，同深悲憤。』與溥儀關係不深的曹汝霖、汪榮寶等人，也認爲名義至關重大。至于溥儀本人，無時不沉醉于重登九五的迷夢之中，再加上週圍的人不斷向他打氣，直弄得他神魂顛倒，坐立不安，巴不得一步就登上皇帝寶座而後快。

但日本政府和關東軍是不會輕易就讓其登上皇帝寶座的，哪怕是一個兒皇帝。它要看溥儀的表現如何，要用皇帝這個虛名來換取溥儀的賣國密約。果然，溥儀就任執政一年多的時間裏，就和日本帝國主義簽訂了多項條約，將東北的政治、文化、經濟、軍事主權全都賣給了日本帝國主義。日本帝國主義和關東軍對溥儀的表現感到滿意，遂決定滿足溥儀的虛榮心。

一九三三年十月，關東軍司令官菱刈隆正式通知說，日本政府準備承認溥儀爲『滿洲帝國皇

帝』。溥儀一聽，大喜過望，急急忙忙派人到北京從榮惠太妃那裏取來龍袍。這件龍袍是光緒皇帝曾經穿過的，在榮惠太妃手裏保存了二十多年。但是，關東軍司令官說，日本承認的是『滿洲皇帝』，不是『大清皇帝』，不能穿清朝的龍袍，只能穿『滿洲國陸海空軍大元帥正裝』。

關東軍不許溥儀穿龍袍，這使溥儀大爲掃興。他面對着攤在桌上金光燦爛的龍袍，向鄭孝胥說：『我是愛新覺羅的後人，怎能不守祖制？再說，北京的宗室都要來，看着我穿洋式服裝登極，算什麼？』在這個問題上，鄭孝胥和溥儀的意見是一致的，溥儀穿上龍袍，過皇帝癮；他可以穿上蟒袍，過宰相癮。溥儀叫鄭孝胥去與關東軍交涉。第一次碰了板垣的釘子回來；第二次，溥儀說：『登左之前要行告天禮，難道叫我穿元帥服磕頭祭天嗎？』這一次，板垣同意溥儀祭天時穿龍袍，但登基大典時必須穿大元帥正裝。

一九三四年三月一日，在關東軍的嚴密警戒和保護下，溥儀的登基大典在長春舉行。清晨，溥儀身穿光緒皇帝穿過的龍袍，乘坐大紅色的『御用』汽車，由侍從武官長張海鵬、侍衛處長工藤忠陪乘，隨行人員一律乘紅色汽車，名爲『鹵簿』，其次爲『列外車』。一路車水馬龍，浩浩蕩蕩，到達了杏花村（事先在此搭了一座祭天的高台）。溥儀在前引、後扈簇擁下，先進入『八封紅黄幔帳』內，洗手洗臉，然後由前引、後扈和陪祀官鄭孝胥、張景惠、臧式毅等人陪同到『天壇』下敬獻帛、玉、爵、牲，對天恭行三跪九叩大禮。禮畢回宮，脱去龍袍，換上陸海空軍大元帥正裝，御勤民殿，站在裝飾着蘭花『御紋章』高背寳座前接受朝賀。以鄭孝胥爲首的文武百官行三鞠躬禮，溥儀答以半鞠躬。隨後日本駐僞滿洲國特命全權大使菱刈隆呈遞『國

書』；最後溥儀發佈『即位詔書』，國號『滿洲帝國』，年號『康德』。登基大典遂告完成。

退位多年的溥儀，在『皇軍』的卵翼下，終于又過了次皇帝癮。

一九三四年六月，日本天皇裕仁的兄弟雍仁親王代表天皇前來訪問，祝賀溥儀稱帝。雍仁親王向『康德皇帝』和『皇后』轉交了日本天皇的『親書』。同時，向溥儀贈授了『大勳位菊花大綬章』，向婉容贈授了『勳一等寶冠章』。

爲了答謝，溥儀在關東軍的安排下，于一九三五年四月六日至五月二日訪問了日本。溥儀到達日本橫濱時禮炮二十一響，樂聲大作，雍仁親王恭候迎接。溥儀在他的陪同下檢閱了日本海軍陸戰隊，隨後乘車去東京。在東京車站，天皇裕仁以及王公貴族，全體內閣成員一齊來迎接溥儀。在東京期間，裕仁天皇設宴招待溥儀，日本許多元老重臣也先後前來拜見他。裕仁還陪同溥儀，檢閱軍隊，參拜『明治神宮』，慰問日本陸軍醫院裏那些在侵華戰爭中負傷的官兵。

裕仁天皇的母親還特別打破常規，在後宮宴請溥儀。日本報紙曾大肆宣揚溥儀和『皇太后』散步的情形。據說，有一次上土坡時，溥儀親手攙扶着日本『皇太后』，並說這和他在長春宮內府攙扶他父親上台階時有着同樣的心情。

溥儀對受到這麼高規格的接待，感到受寵若驚。在離開東京時，他說：『我對這次日本皇室的隆重接待和日本國民的熱誠歡迎，實是感激已極。我現在下定決心，一定要盡我的氣力，爲日滿的永久親善而努力。我對這件事，是抱有確實信心的。』

這正是日本人所希望達到的效果。

吉岡對「皇帝」說：『關東軍是你的父親，我是關東軍的代表』

溥儀滿心想依靠日本人的力量來實現他復辟大清王朝的迷夢。可是到頭來雖說有了個『滿洲國皇帝』的虛名，卻完全沒有了自由，落得個地地道道的傀儡。

溥儀的牽絲人——日本軍國主義者，更具體些說是關東軍，以『東亞』和世界爲『江湖』，嚴格地控制着個政治木偶。

吉岡安直就是要弄木偶而獲得了成功的前台小醜。

溥儀就任『執政』以後，關東軍就給他派來『聯絡人』一名，所謂『聯絡人』，實際是監視溥儀的大特務。最早派來的是石丸志都磨，任『侍從武官』；其次是中島比多吉，任『囑托』。但這兩不久就調走了。溥儀稱帝後，接替中島的是吉岡安直，職稱是『皇帝御用掛』。

溥儀在天津時，吉岡任天津日本駐屯軍參謀，常隨日本駐屯軍司令官到靜園拜訪溥儀。那時候溥儀喜歡網球，吉岡也是個網球迷，二人經常打網球，成了球友。後來吉岡回日本，任日本陸軍士官學校戰史室教官。僞滿洲國建立後，溥儀爲實現他的『操練十萬精兵入主中原』的迷夢，派溥杰等人去日本學習軍事。這樣，吉岡就與溥杰有師生之誼，且關係很好。關東軍看到他和溥儀、溥杰都熟識，就任命他爲監視溥儀的『帝室御用掛』。吉岡當時官階僅是個中佐，任『帝室御用掛』後，因成功地控制了溥儀的一舉一動，很快連升三級，成爲陸軍中將了。

吉岡一貫地執行着日本關東軍司令官命令，管理溥儀的内外一切公私事務，干涉他的一言一

行。無論是在關東軍規定的宴會上，還是他們規定的臨時與僞總理、僞總務長官的談話，或是他們規定的僞省長、僞軍管區司令官的所謂『上奏』以及其他類似場合，都由吉岡預先寫了紙單，以限制談話的範圍，絲毫不許變更。吉岡其人驕傲自大，目空一切，猜疑之心尤大，佈置由關東軍推薦到宮內的日系官吏和日本憲兵層層監視。每天無論有事無事必到僞宮，真是風雨無阻，一天無數次地見溥儀。

吉岡自稱是溥儀的『準家屬』，包攬一切，隔絕了溥儀對外的一切聯絡，不許僞官吏和溥儀自由見面，凡老百姓給溥儀的來信，也一律由受他指揮的僞宮內府日系總務處長小厚二三夫等扣下、不給溥儀本人看。日本憲兵則駐紮在僞宮之內監視一切。

吉岡的實際職能就是一根電綫，關東軍的每道旨意都是通過這根電綫傳給溥儀的。『皇上』出巡、接見賓客、行禮、訓示臣民、舉杯祝酒，以至點頭微笑，都要在吉岡的指揮下行事。溥儀能見什麼人，見了說什麼話，以及出席什麼會，會上講什麼等等，一概聽他的吩咐。溥儀要說的話，大都是吉岡事先用日本式的中國話寫在紙條上的。

『皇上』對吉岡則是百依百順，敬畏如神。每天午後，溥儀照例都有一段休息時間，任何人也不敢驚動他的休息。但是一聽說吉岡到來，則立時穿好軍服接見。爲此，他在休息之前就把軍服預備好了。

盧溝橋事變以前，吉岡還不甚過問溥儀的家事。從關內來看溥儀的人，並不受限制。盧溝橋事變以後，情況就不同了。吉岡傳達關東軍的規定，只准列在名單上的幾個人在一定時間到長春

來。而且，除了溥儀的近支親族外，其餘的人見溥儀時只准行禮，不准談話，來信要先檢查。溥儀的住所緝熙樓在中和門內，這道門，任何人不許隨意進去，只有吉岡通行無阻，而且一天十趟八趟。來的時間也不一定，有時白天，有時深夜，有時只可一兩分鐘就走了，可過了三五分鐘又回來了。吉岡安直就這樣把溥儀控制得死死的。因而，福貴人李玉琴說吉岡是一張『貼樹皮』，把溥儀貼得緊緊的。

吉岡經常回日本，向日本政府匯報溥儀的情況，同時接受新的指示。每次回東京前，吉岡都要向溥儀建議：『可以做點心，或是找些東西，交我給日本皇太后送去！』而他每次從日本回來，也一定要帶來日本的點心或禮品，並說是天皇的母親交他送給溥儀的。可溥儀不敢吃，每次都讓孤兒吃掉，並且讓他們說出味道，以應付吉岡的查詢。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本每有『勝利』，吉岡一定要來『啓發』溥儀，請『康德皇帝』致電『日本天皇』，祝賀『皇軍大捷』。同時還要到僞建國神廟，默禱皇軍連戰連勝。日軍佔領新加坡後，吉岡還揮筆畫了一幅山水屏風圖。他把『作品』放在溥儀面前說：『這是我爲慶祝佔領新加坡的精心彈力之作，請皇上題幾句歌頌皇軍勝利的詩。』溥儀不得不提起筆來，做詩一首。詩云：

霹靂砰訇降自天，永掃妖氛開坤乾，
黎明初曙光海陸，偉哉皇軍功蓋前。

大義凜然北方鎮，日滿一心同苦甘，
捷報傳來無限喜，翹望東天申慶歡。

偽滿洲國原來稱日本爲『友邦』或『盟邦』，可從發佈『建國十週年詔書』開始，便改稱『親邦』。爲什麼要改呢？原來這是吉岡安直的主意。吉岡曾對溥儀說：『沒有日本，便不會有滿洲國。嗯，所以應該把日本看成是滿洲國的父親。所以，嗯，滿洲國就不能和別的國家一樣，稱日本爲友邦、盟邦應稱做「親幫」』。他還說：『日本猶如陛下的父親，關東軍是日本的代表，嗯，關東軍司令官也等于是陛下的父親，哈！』『關東軍是你的父親，我是關東軍的代表，嗯！』

從此，溥儀的父親不是同治、光緒和載灃，而是日本天皇、關東軍司令官和吉岡安直了。

『關東軍司令官……必須是皇帝的師傅和監護人』

如果說吉岡安直是要弄木偶的前台小醜，那麼歷屆關東軍司令官便可以說是傀儡戲的『舞台監督』了。

偽滿洲國實行帝制時所頒佈的《組織法》中，雖然規定：『滿洲國由皇帝進行統治』。但是實際統治大權卻歸關東軍司令官。

一九三六年九月，關東軍司令部炮製了一篇題爲《滿洲國的根本理念和協和會的本質》的文章。文章的第三章專門闡述了『天皇、軍司令官和皇帝之間的關係』。文章說：『滿洲帝國皇帝

基于天皇，即天皇之聖意而即位，因此，必須爲皇道聯邦的中心——天皇服務以天皇之聖意爲己心，以此作爲即位的條件。』滿洲帝國皇帝與天皇之間的關係『宛如月亮憑借着太陽的光芒而散發光輝一樣』。如溥儀『不以天皇之聖意爲己意時』，『則將立即喪失其地位』。文章明確地說：『關東軍司令官作爲天皇的代理人，必須是皇帝的師傅和監護人。』一句話，溥儀只有對關東軍司令官言聽計從，才能穩坐金鑾殿。

關東軍司令官爲有效控制溥儀，除給溥儀派了吉岡安直之類的監護人外，還要親自到僞帝宮會晤溥儀。關東軍司令官是可以隨時來教訓溥儀的，但爲了表示自己身份的尊貴，並不常來，一般情況下，每月依例來三次。武滕信義任司令官時期，在每月逢一的日子裏，即一日、十一日、二十一日，到勤民樓的『貴賓室』中會晤溥儀。菱刈隆任司令官時，會晤的時間又改爲逢二的日子。

按照日本政府的規定，關東軍司令官兼任日本駐滿全權大使。因此，每逢新司令官上任，都要進宮向僞滿皇帝『遞交國書』。溥儀則照例在接受國書後致答辭。溥儀的答辭肉麻得令人吃驚。當南次郎就任關東軍司令官兼日本駐滿全權大使時，溥儀在遞交國書儀式上的答辭就充斥着滿紙的阿諛奉承之辭：

『此次貴國大使，奉貴國天皇陛下之命，繼菱刈前大使出任駐滿特命全權大使，朕心慰悅良深。滿洲建國以來，一切政治制度，以次成立，境內亦漸致平。實深賴貴國之同心協力，多方援助，朕及臣民，皆甚感念。日滿兩國邦交親密，唇齒輔車之關係永遠無間。共行確保東亞

和平，以謀世界福祉，尤爲兩國最重大之使命。貴大使至誠毅力，朕深信必能盡達其使命而完成其志願。貴大使際茲就任，有期待于朕深厚之同情，與朕政府懇切之協助，朕與朕之政府，定當盡心協力，以慰所望也。敬祝天皇陛下慶福，貴國國運盛昌。』

關東軍司令官爲讓溥儀乖乖地聽話，還經常給他『上課』。一次，菱刈隆授溥儀以當好政治傀儡的要訣，他說：『愈是身爲人上的人，便愈發應該保持有裝聾作啞的雅量才行，只有這樣才能做到無爲而治的地步』。說到這裏，他還實際表演起來，以雙手做閉目、掩耳的姿勢，並說他這個『三軍司令』一貫採取『不聞不問』、聽之任之的態度，所以部下才能放手去幹、負責去幹。然後，菱刈隆又以教訓的口吻對皇帝說：『皇帝更應該採取「垂拱無爲而天下治」的態度。這就是『爲君之德』，也就是身爲皇帝所必須具有的最高政治道德和品質。』

司令官們的良苦用心沒有白費。溥儀對天皇的忠誠、對關東軍的順從，應該使『導演』們心滿意足了。

『文臣武將』在日本人面前的幾副嘴臉

僞滿國務總理大臣張景惠說：爲體現『日滿一德一心』，支援皇軍進行『聖戰』，日本人『要啥給啥』。

一九三五年五月十九日，張景惠取代『建國老臣』鄭孝胥當上了『國務總理大臣』。早在『九・一八』事變之初，本莊繁和土肥原就對張景惠感興趣，他們在給天皇的電報中，這樣評價張

景惠：『在滿洲有一定聲望，但毫無學問，人既顢，又無大老遠謀，手下盡阿諛之輩，全無人材之可言，臣等爲我帝國一貫政策速達之目的計，必使此等人物爲圖利用可也。』僞總務廳次長古海忠之後來回憶說：選中張景惠出任總理大臣，是因爲張景惠是僞滿政界的元老，投降派的巨頭之一，擅于得人和，是個『好好先生』。張景惠深知自己爲什麼會被關東軍看中，因而，他不僅對關東軍言聽計從，而且盡心爲日本主子『服務』，奉行『要啥給啥』主義。所以，關東軍讓他當了十年的『國務總理大臣』，直到僞滿政權覆滅。

那麼，張景惠都給了關東軍什麼？

第一，張景惠將大批糧食運到日本。一九四〇年征糧七百二十萬噸，到一九四五年增加到九百五十萬噸。直接運往日本國內的糧食，一九四〇年爲二百萬噸，一九四五年爲五百萬噸。張景惠爲了向日本主子表忠心，不僅到處倡導『要啥給啥』，還主張多給、給足、給夠。如在一九四三年，關東軍原定『糧穀出荷』七百二十萬噸。張景惠卻說：『今年年景不錯，可望豐收，出荷的數量一定要增加一些。』結果，這年的『出荷』量爲七百五十萬噸。

第二，張景惠使出渾身解數爲日本征搜發動戰爭所需要的鋼鐵。在張景惠主持制定的《金屬類回收法》中，將門拉手、湯匙、點心模子，甚至老年人的銅烟袋鍋都列爲回收對象。張景惠爲表示『以身作則』，將僞國務院辦公樓門窗上的鋼拉手全部卸下來，甚至連大門上的大銅吊燈也摘下來，獻給日本。當時，人們就說：張總理爲博得日本人的滿意，顧不上『擺譜』，連門面都不要了。

、正是在張景惠『要啥給啥』主張下，日本帝國主義從中國掠奪了無數的資財。據有關方面統計，以一九三三年到一九四四年，日本共從東北掠走煤炭二一六六一萬噸，鐵一一八三萬噸。這些數字，對于當時東北的生產能力來説，簡直是天文數字了。

僞民政部大臣臧式毅雖然賣了很多東西給關東軍，但因一句牢騷話而失了寵。『九·一八』事變時，臧式毅是唯一在東北的軍政要人，時任遼寧省政府主席。九月十四日，即被日本關東軍軟禁起來。關東軍爲迷惑東北人民，在軟禁了臧式毅三個月後，迫使其簽了賣身契，讓其出任奉天省省長。

臧式毅當上漢奸後，遵循關東軍之意，説明于芷山放下武器，投降日本。後又給張學良寫信，勸張將東北軍及機關撤進關内。當上僞民政部總長後，臧式毅以僞民政部總長的名義，派出日本官吏到各地建立縣級政權，推行保甲與户口制度，建立了五萬二千餘人『自衛團』，穩定了縣級以下基層的行政統治；臧式毅還下令擴建與加强了由日本人直接掌握的警察機構，爲法西斯統治打下基礎。爲防止人民的反抗，臧式毅下令公佈了《暫行取締槍炮規則》，强行收繳民間所藏武器；爲便于關東軍統治，臧還根據關東軍的旨令將東北原來的四省（含熱河省）劃分爲十省，確立了僞滿地方行政統治的新框架。日本對臧式毅的表現感到滿意，先後授予他一等瑞寶章、一等旭日章。溥儀也授予他勛一位景雲章、龍光大綬章。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末，關東軍讓臧式毅以民政部大臣身份訪問日本。臧在日本受到日本宮廷、政府官員及民間人士的熱情歡迎。這使臧産生了一個錯覺，以爲日本政府很尊重『滿洲國』，

只是關東軍太强横跋扈了。于是，臧式毅在一次招待會上發了一通牢騷説：『日本人對滿洲人不放心，不放手，凡事都要自己做，這像拉人力車一樣，在天黑，路不平，又不認識路的情况下，日本人還要自己拉車，當然車主要翻了，爲什麽不能放手讓滿洲人去拉，讓滿洲人去做，自己光站在指導地位呢？』日本政府怎會讓僞滿洲國獨立行動？因而對臧式毅的講話極爲不滿。臧回到長春後，就失寵了。關東軍將他明升暗降，讓他當僞參議府議長。

熙洽一心想恢復大清王朝，第一個打開吉林城門請關東軍入城，可換來的僅是一個僞滿宮内府大臣，與傀儡皇帝作伴。

『九·一八』事變後，主管吉林要軍政要務的熙洽立即宣佈『獨立』，脱離南京國民政府，並『禮迎』關東軍多門師團入境，想借助日本人的力量恢復大清王朝。

熙洽是清太祖弟弟穆爾哈赤的後人，從來不承認中華民國。他曾公開説：『這是什麽國家，我的國家是清王朝，早亡了。』因而，他一心想復辟清王朝。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南次郎到吉林就如何結束東北混亂政局問題密談。南次郎拿出了日本政府預想的兩個方案：一是趕走張學良，改用張作相，在東北建立特殊行政政權；二是徹底脱離南京國民政府，迎接溥儀來東北，建立滿蒙獨立國。熙洽立即表示贊成第二方案。從此，熙洽更加起勁地從事賣國活動。

熙洽給溥儀寫信，説他『期待了二十年的機會，今天終于到了請皇上勿失良機，立即到祖宗發祥地主持大計』，並説『可以在日本的支持下，先據有滿洲，再圖關内』。在召開『四巨頭』的『建國會議』時，祇有熙洽一人極力主張實行帝制。當關東軍決定讓溥儀就任『執政』時，熙洽

極爲不滿。在一九三二年三月八日，熙洽去四平『榮迎』舊主時，和他組織的『吉林滿洲舊臣迎鑾團』行跪迎禮，他激動得淚流滿面，幾乎不能自持。

僞滿洲國建立後，熙洽繼續抱着他的復辟夢，四處活動。一九三二年夏季，他串聯齊默持色木丕勒、凌開等人共同發起創立『滿蒙同志協進會』，企圖促使僞滿洲國實行帝制。關東軍哪能讓它正常活動，在利用它欺騙了國聯調查團後，就將它摧毀。關東軍看到熙洽對帝制念念不忘，對溥儀忠心耿耿，就對他極爲不滿，于一九三四年三月以『私養家兵』爲名，解除了熙洽的武裝。可熙洽仍不忘復辟大清王朝，又于一九三四年到日本遍訪日本朝野人士，兜售他的復辟計劃，結果空手而歸。但這使關東軍更加厭煩，先于一九三四年十二月解除了他的吉林省長職務，又于一九三五年五月撤掉了他的財政部長職務。把他打發到宮內，做宮內府大臣。這樣，熙洽只好退縮在宮內府內，與不爭氣的皇上作伴，心情很是凄涼鬱悶，再也不敢鼓吹復辟了。

第五章 黑手伸向華北

關東軍設計的『滿蒙自治國』藍圖，熱河省赫然紙上

侵略者的野心是巨大的。

早在一九二七年，田中在『滿蒙積極政策』中就提出要佔有包括熱河在內的整個內蒙古東部；

一九二九年七月，『九·一八』事變主謀、關東軍參謀石原莞爾在擬定《關東軍領有計劃》時，明白宣稱要使熱河直接受日本支配；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關東軍在其設計的『滿蒙自治國』藍圖中，熱河赫然紙上；

一九三二年三月一日，溥儀宣稱：熱河是『滿洲國』的一部分；同年八月，日本政府公然宣稱：熱河是『滿洲國』的一部分。

爲什麼關東軍如此熱切地希望把熱河劃爲其統治區呢？

熱河是當時我國的一個省。它地處遼寧、察哈爾兩省之間，南與河北省爲鄰，長城爲其南境。地理位置十分重要。一旦東北淪入敵手，其戰略意義便更爲突出。著名民主人士黃炎培先生

當時就曾指出：

『熱河是高地，東邊高過遼吉黑三省，南邊高于河北省，我國保住熱河，不惟華北一帶得了天然屏障，即由熱河向東出兵，依高層建築的形勢，雖欲收復東三省，也是不難。如果被日本佔據了，不但東三省無收復的可能，而且華北從此不得安忱。』

文人尚且明白此理，更何況處心積慮謀我中華的關東軍？

然而，事情畢竟有個輕重緩急之分。

『九·一八』事變之後，關東軍鐵蹄踐踏東北，扶植溥儀建立傀儡國——『滿洲國』。本想順勢拿下熱河。無奈，不甘淪爲亡國奴的東北人民奮起反抗，義勇軍鋪天蓋地，攪得關東軍不得安寧；更鑒于『九·一八』事變，世界震驚，指責之聲不絕于耳，東京也怕衆怒難犯。于是，關東軍決定在東北穩住陣腳，再行南進。

不過，明修棧道不行，暗渡陳倉是否可以？

老奸巨滑的石原、板垣等人在策劃『九·一八』事變時就考慮到自己無分身之術，一舉難以攻下東北、熱河，便決定先對熱河省主席湯玉麟進行策反工作。

『九·一八』事變後第四天，關東軍宣佈由湯主持熱河政權，爲其五個僞省政權之一；侵入瀋陽之後，關東軍又派人『保護』湯在瀋陽的親屬和財物；僞滿洲國成立，宣佈湯爲僞參議府副議長、熱河省長兼熱河軍管區司令官，與此同時，關東軍還指使湯昔日盟兄、僞滿政權的張景惠、張海鵬派人前去『問候』；讓湯的老熟人、日本浪人高原卡見化裝到承德與之面談……

面對日本人『糖衣炮彈』的輪番轟炸，湯玉麟態度曖昧，採取一種『虛與周旋』的態度，靜觀事態發展、這種伎倆不外是舊軍閥（湯乃是張作霖的舊部）所慣用的『騎牆』策略。

可惜，這種『騎牆』策略對關東軍没有用。

湯玉麟的敷衍拖拉令關東軍和日本軍部非常不滿，而且更重要的是，關東軍不會把侵佔熱河的希望完全放在湯玉麟身上，一旦關東軍在東北穩住形勢、鎮壓東北義勇軍之後，便會揮師南下。事實上，在策反湯的同時，關東軍就在作各種入侵熱河的準備：

調兵遣將：一九三二年四月，日本軍部把第八師團調入東北，安排在遼西；該年年底，又從日本本土調來第六師團，與第八師團一起準備進攻熱河。另外，關東軍還積極收買土匪，招募僞軍，建立所謂『謀略部隊』；

頻頻進行挑釁：一九三二年七月二十三日，駐義縣日軍借口一名叫石木權四郎的關東軍特務被抗日義勇軍抓獲，派兵進入熱河省境，向朝陽寺中國駐軍發動進攻，並一度佔領該地；八月十九日，日軍又一席佔領南嶺車站，炸毁南嶺鐵橋，並不斷地派飛機到熱河上空挑釁；

大造侵熱空氣：日本首相齋藤實，關東軍司令武滕信義，都一再宣稱：『熱河爲滿洲國之一部』，『所謂熱河問題，純粹爲滿洲國之内部問題』。並大言不慚地説『其在該省内搗亂治安者，爲滿洲國之不逞分子，其侵入省内者爲侵略者』。『根據日滿議定書規定，對滿洲國領域内之治安，兩國有共同維持之責任』。

種種迹象表明，關東軍的魔爪即將伸向熱河……

閃電進攻，十天時間佔領熱河全省

一九三二年底，關東軍種種侵熱準備工作都已齊備，而東京的進攻命令卻遲遲沒有下來。原來在侵熱時機選擇上，關東軍和東京大本營又發生了爭議。

照關東軍的意思，在鎮壓東北義勇軍之後，湯玉麟如不投降，便可對其發動攻勢。況且，發動對熱攻勢，于大局無礙，因爲『熱河問題』屬『滿洲國』內部事務，只要不越過長城到河北作戰，便不會引起世人指責。于是，一九三二年七月，當關東軍見湯遲遲不接受『滿洲國』委任狀，張學良又在熱河作種種抵抗準備時，便決定修改對熱策略。二十三日，參謀長小磯國昭在給東京的電報中，心情急迫地說：『無論關東軍情形如何，應立即採取軍事行動，攻佔熱河省，從根本上解決滿洲問題』。此後兩個月，司令官滕信義和小磯國昭又幾次打電報要求東京增兵攻熱。

然而，東京雖同意關東軍加緊攻熱準備，卻不同意它貿然行事。東京方面認爲攻熱時機還未到來。他們的考慮是：國聯正在日內瓦開會討論李頓調查團報告書，並將進行表決，如果此時攻熱，無疑會驅使國聯對日强硬，通過一項于日不利的決議；同時，圍剿抗日義勇軍和誘降湯玉麟工作還未完結。故不同意關東軍急躁冒進。

獨斷專行且自忖成氣候的關東軍不耐東京的緩慢，決定先斬後奏。他們首先把目標瞄準了其攻熱路綫上的一個大障礙，具有『天下第一關』之稱的山海關。

一九三三年一月三日，關東軍挑起了『山海關事件』。據關東軍自己說，是一個日本士兵被

來自長城上的一顆子彈打中了。日本方面提出抗議，遭拒絕。關東軍便決定採取行動。事實是，這又是一個賊喊捉賊的把戲。

一九三三年元旦夜，關東軍一列裝甲火車衝過鐵路隧道，接着湧出大量日本步兵，把事先製成的內裝炸藥的鐵皮罐頭，點燃後分別投擲到日本憲兵隊和日本崗哨所在地。鐵罐爆炸，聲響如雷。關東軍及駐紮在山海關的天津駐屯軍，便誣蔑是中國軍隊向其挑釁，提出無耻要求，其中竟有一條是要中國守軍退出山海關，但遭嚴厲拒絕。日軍借此發動進攻，于一月三日佔領了山海關。拉開了進攻熱河的序幕。

攻佔山海關，不僅是關東軍攻熱的一個步驟，同時也是做給東京看的，以顯示其攻熱決心與能力。

東京本部還想盡最後努力說服關東軍，派總務部長梅津美治郎赴長春勸阻，未成。事已至此，多說無益。日本政府遂決定支持關東軍的行動。一九三三年一月末，在國聯即將進行最後表決的時候，裕仁天皇批准了攻佔熱河和消滅一切可能威脅日本通往山海關走廊的中國部隊的作戰命令。

一月二十五日，小磯國昭在錦州召集日僞軍頭目開會，討論攻熱事宜。二十八日，武滕信義發出準備作戰的命令。二月十日，關東軍司令部部署攻熱計劃。

關東軍認爲此次攻熱的目的『在于使熱河真正成爲滿洲國的領域，並爲消滅擾亂滿洲國的禍根即華北張學良勢力，進而確立滿洲國的基礎』。由此可見，關東軍的目標不僅僅是熱河，而是

更大範圍的華北。

作戰計劃是：首先向熱河東境方面作戰，把『反抗分子』牽制在北方，再向熱南進兵，把華北和熱河省真正切斷，最後將熱境內的中國軍隊『壓向西面或西南聚而殲之』。

萬事俱備，祇等天皇一下令，關東軍便大舉進攻。

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日，就在國聯進行表決前四天，日本政府爲擺脫國聯對其侵略手腳的束縛，決定退出國聯。同時決定在國聯作出不利日本的決定後，發動對熱攻勢。

可惜還未等到結果出來，害怕國聯屈服于日本壓力而不敢作出對日不利決議，而使其攻熱計劃再次受阻的關東軍，決定提前發動進攻，造成既成事實。

二月二十一日，關東軍第六、八師團及僞滿軍數萬人，在飛機、大炮掩護下，分三路向熱河發動總攻。一夜之間攻佔熱河東部所有鐵路車站。第二天，關東軍攻熱的消息成爲世界各大報刊的頭條新聞。日內瓦會議上，日本代表成了衆矢之的，許多國家代表紛紛指責日本的侵略行爲。天皇裕仁對于關東軍司令部的過火反應，大爲震怒。

但戰爭的機器一旦開動起來便很難止住。關東軍在壓力之下，只好一方面盡力使自己的行動不要太張揚，另一方面向中國南京政府發出最後通牒：要張學良的軍隊立即撤出熱河，因爲『滿洲國的主權不容侵犯』。

二十四日清晨，即日內瓦表決前數個小時，南京方面拒絕了日本的最後通牒。數小時後，日內瓦會議上，以四十二票對一票的比數通過了譴責日本侵略行徑的勸告書。日本代表憤然退場。

還在攻熱前夕，隨日軍到戰場上考察的西方國家武官認爲，中國的張學良雖然在熱河省有所防範，但不過是匆匆拼湊起來的烏合之衆，雖然人數是關東軍的四倍，但仍構不成對强悍的關東軍的威脅。唯一構成關東軍進軍障礙的是嚴寒的氣候。當時正值寒冬二月，氣溫很低，再加上這個地區地形崎嶇，他們估計關東軍會有一個較長時期的苦戰。事實上他們的估計錯了一大半。

爲達目的不擇手段的關東軍，在進軍中只講效率不講手段。日本步兵爲了減輕身上的負荷，在春寒料峭的氣候下不穿大衣，只帶輕量的給養包。他們在二十四小時、三十六小時、甚至四十八小時内馬不停蹄地從一個城市攻向另一個城市，以保持身上的溫暖。關東軍的這種快速行動，後來被稱之爲『閃電戰』，在德國人身上更得到充分發揮。

日本人的閃電進攻，西方人没有估計到，但對中國守軍的估計卻不幸而言中了。

在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方針的指引下，張學良未在熱河、華北境内作充分的抵抗準備，只到危機迫近時，才匆忙組成了作戰部隊序列。第二集團軍總司令、熱河主戰場指揮官張作相還未弄清楚情況，便遭到日軍的進攻。張作相倉促應戰，屢屢失利。湯玉麟更是心無鬥志，在關東軍的閃電追擊之下，潰不成軍，而關東軍則所向披靡。二十四日，佔開魯；二十五日下朝陽；三月二日，陷赤峰、凌源；三月三日下午，關東一部乘汽車向湯玉麟老巢——承德追擊。湯玉麟等人聞訊後，驚慌失措，承德城内，一片混亂。事後，天津《益世報》記者是這樣形容承德的混亂情形的：

「承德風聲鶴唳，亂成一團，富室巨商，軍政眷屬，紛紛向平津逃竄，湯（玉麟）本人于三月一日也開始向天津征僱大批汽車，搶運私財，向天津租界輸送，置軍事于不顧。」

主將心中怯意已起，部隊更無鬥志，于是不戰而敗。四日黎明，湯玉麟棄城而走，退入察哈爾。當天上午，關東軍之一百二十八人先遣隊，輕鬆地襲佔了熱河首府——承德。

短短的十天之內，關東軍就進佔了這個面積相當于比利時、荷蘭、丹麥三國之和的熱河全省。第十一天，三月五日——即希特勒在德國國會贏得多數的這一天——日本的女招待已在熱河的省會承德的慶功宴上侍酒。這個成績，也令日本人十分自得，吹噓這『開創明治練兵以來行軍作戰之新紀錄』。

侵佔熱河之後，關東軍的鋒芒便直逼長城各口。

在長城各口關東軍遇到的是一支鋼鐵軍隊

在關東軍設計的『滿洲國』版圖裏，南邊的邊境就是長城。爲此，關東軍在制訂侵熱計劃時，就已經把攻佔冀熱邊界長城一綫各個關口列爲作戰計劃的一個組成部分。關東軍司令武滕信義在發出《關作命第四七三號》中，明確指示第八師團主力一部組成二路縱隊，『儘快向建昌營附近至其以南一綫挺進，並應不失時機以一部確保界嶺口、冷口、喜峰口等長城重要關口』。同時『派兵確保羅文峪、馬蘭關等重要關口』。

這樣，關東軍第六、八師團、混戰第三十三、十四旅、一個飛行隊，共約八萬人，再加上僞

滿軍六千餘人，在完成熱河作戰之後，便迅速于三月上旬，從冷口、古北口、喜峰口三個方向，向長城一綫的中國守軍發起進攻。

然而時過境遷。此時關東軍遇上的中國軍隊已不再是熱河作戰時的頹廢之師，而是一支充滿愛國之情的鋼鐵軍隊。

熱河的迅速失陷，全國上下一片譴責之聲。張學良被迫下野，成了蔣介石的替罪羊。更由于熱河的失落，平津、華北頓受威脅，愛國同胞强烈要求當局組織抵抗，挽救華北危機。蔣介石雖説乘張學良下野之機，奪取了對東北軍的直接指揮權，但面對全國的抗日聲潮，也不敢不有所表示。他派何應欽到北平接替張學良北平軍分會委員長之職，具體佈署抵抗事宜。何應欽到北平後迅速排兵佈陣，組成了抗御日軍的二道防綫。參戰將士在全國抗日救亡熱情的鼓舞下，大都充滿抗日殺敵的愛國激情，戰鬥力猛增。

于是，一場鏖戰在古長城各口展開。

冷口、界嶺口戰鬥　三月四日，關東軍混成第十四旅先遣隊首先向冷口發難，午後零時二十分，佔冷口。三月七日，領命前來保護冷口的第二軍團第三十二軍商震所部，由其一百三十九師黄光華部乘日軍立足未穩，果斷地實施反擊，將冷口收復。

到了口的肥肉又被迫吐出來，這令關東軍非常不甘心。爲了『確保長城一綫』，三月十三日，關東軍司令部再次命令進攻冷口、喜峰口。二十二日，第六師團以坦克開道，向冷口瘋狂進攻。中國守軍奮起抵抗，商震親自到前綫督戰。經二十三日至二十五日激戰之後，望着依然聳立着的

長城，關東軍不得不承認中國守軍『構築有極其堅固的陣地，而且縱深度相當大，其抵抗出乎意外地頑强』。遂于二十五日，中止攻勢，傾全力保護口外日軍營地。

在冷口激戰的同時，界嶺口、義院口的硝烟也正濃。從三月十一日至四月十二日，敵我雙方多次交換陣地。終因敵强我弱，在關東軍發動第三次界嶺口攻勢之後，守軍向背陰堡、雙望鎮撤退。界嶺口入關東軍之手。

喜峰口、羅文峪戰鬥　喜峰口、羅文峪系熱東通往平東的交通要道，山勢險峻。擔任防守任務的是第二十九軍宋哲元部。三月九日下午，關東軍混成第十四旅一部追擊萬福麟部至此，並佔領了口門。危機之時，二十九軍先頭部隊趕到，立即派一團兵力迎戰，方保住戰局。十日，二十九軍主力部隊到達，關東軍也佈署完畢。

一場肉搏戰開始了……

人三月十日晨六點至十一日下午，二十九軍將士與關東軍士兵在喜峰口兩側陣地上展開了肉搏戰。幾處高地，得而復失，失而復得，來回拉鋸，殺聲震天。在這樣的貼身廝拼之中，一切重型武器——飛機、大炮都絲毫派不上用場，人們只能用自己的意志、智慧、技能與對方較量，即進行人與人之間的較量。中國將士憑借着一腔愛國激情，揮舞着大刀衝向敵群，關東軍士兵則爲了『天皇』而戰。雙方都爲了各自的信念而戰鬥、戰鬥，終于愛國者的膽氣嚇破了侵略者的『勇氣』，經過一天一夜的激戰之後，關東軍撤退至長城北側，僅以一部確保喜峰口。企圖伺機再戰。

然而，中國將士不給日軍以喘息的機會。十一日夜，二十九軍決定根據自身的特點，揚長避

短，避開日軍的空軍和炮兵，採取『夜、近戰』的戰術，夜襲敵營。具體佈署爲：趙登禹旅長率兩個團從左路進攻；佟澤光旅長率兩個團從右路包抄；王治邦旅長待左右攻襲開始後，從正面出擊。

這是異常寒冷的夜晚，凜冽的寒風似乎要把人的骨頭穿透。可二十九軍的將士們，在趙、佟二位旅長的率領下，不顧激戰一天的疲乏，身背着大刀，在黑暗中踏雪急行。十二日拂曉，趙旅首先到達目的地。已在白天拼殺負傷的趙登禹旅長，身先士卒，率領士兵衝向熟睡之中的日軍。待日軍驚醒之時，明晃晃的大刀已架到了脖子上。與此同時，趙旅的士兵們還將日軍的糧草、錙重武器燒燬、炸盡。一時之間，潘家口日軍陣地火光衝天，爆炸聲不絶于耳。附近的老婆山日軍聞訊趕來救援。在黑暗中，雙方混戰在一起，正在搏鬥中，從右路包抄的佟旅趕到。正面進攻業已發動。在趙、佟二旅的合擊之下，關東軍傷亡慘重，終于後撤。夜襲部隊得勝回營。是役，殲敵一千五百餘人，破壞其全部鐵甲車、炮十八門，支隊長植田被當場擊斃。

遭此重創之後，關東軍將主力移至老婆山以北長城最高峰的炮樓一帶。十三日拂曉，關東軍又組織一次新的攻勢，欲報一箭之仇。但仍以慘敗而告終。對此，後來日本參謀本部也承認：『這次攻擊由于敵衆我寡，彈藥準備不足，不能收到大的戰果。』

此後，關東軍攻勢頓挫，雙方形成拉鋸狀態。攻擊重心轉移到羅文峪一帶。

喜峰口受挫之後，關東軍企圖用另外的勝利加以彌補。三月十六拂曉，新調來的第八步兵師和騎兵第三旅各一部，在僞軍協同下，向羅文峪猛撲過來。企圖從右後方威脅喜峰口。哪知道，

在喜峰口未得到半點好處的關東軍，在羅文峪也照樣沾不到便宜。還未到峪口，就被擋了回去。十七日，惱羞成怒的關東軍在飛機、大炮的配合下，大舉進攻羅文峪、山渣峪和沙寶峪。守軍將士吸取喜峰口之戰的經驗，誘敵至眼前時，方揮舞着大刀衝向敵群，與之展開貼身搏鬥。竟日，日軍撤回鷹子營。十八日晨，心尤不甘的日軍再次叫陣。又被中國軍士的大刀擋了回去。是日夜，中國守軍又採取喜峰口的夜襲戰術，分三路襲擊敵人。天明之後，被殺破了膽的日軍撤向梅花谷、古山子一帶。

至此，關東軍只能望峪興嘆。

喜峰口、羅文峪一役是關東軍出師以來所遭到的最大的失敗。大刀隊的威名幾乎把現代化的精良火器都掩蓋了，中國軍威因之大振，全國人心也大振。

古北口附近的戰鬥　古北口是由承德至北平最近的關口。一九三三年三月四日，關東軍佔承德之後，即以第八師團主力向古北口方向追擊。擔任古北口防守任務的是東北軍王以哲部與中央軍第十七軍第二十五師的關麟征部。

三月七日，關東軍命令『第十六旅團的主力擊退古北口方面之敵，奪取該地附近的主要關口』。第八師團長西義一乃親赴古北口前方督戰。三月九日，關東軍突破青石梁之後，進逼古北口。古北口戰役打響。

三月十日下午三時，關東軍發起試探性的進攻，被打退。十一日拂曉，日軍主力在炮火掩護下大舉進攻。防守古北口正面的第一一二師未盡全力便撤退。關東軍遂佔古北口關口。並繼續向

南城猛攻，並以主力向二十五師右翼陣地包圍。駐該地第七十三旅傷亡慘重，聯繫中斷，幾成一座孤島。危機之時，師長關麟征令副師長杜聿明指揮南城正面戰鬥，自己帶七十五旅前去解圍。途中遭關東軍伏擊，關負傷，但仍指揮戰士與敵拼搏。終于使七十三旅與主力恢復聯繫。雙方激戰一日，二十五師守住了自己的陣地。

十二日上午，關東軍再次發動猛攻。戰況較前兩日更爲激烈。戰至下午，守軍大部不支，被迫後撤。三時許，關東軍佔領古北口。

古北口一戰，雖以關東軍得勝而告終，但它再次嘗到了中國軍隊鐵拳的滋味，並付出了傷亡不下二千人的代價。

從三月上旬至下旬，關東軍在長城一綫遭到了前所未有的猛烈抵抗。這對目空一切的關東軍來說是一個沉重的打擊。自熱河取勝以來所養成的驕狂之氣不得不有所收斂，攻勢也隨之有所緩和。到三月底，長城一綫中日二軍呈現出對峙之勢。

對于這一次長城各口之戰，日本史書是這樣評述的：

『華軍抵抗，意外堅强，日方支隊，屢陷苦戰』。連日本人自己也這樣評價，可見當時戰況之烈。

可惜，中國軍隊的長城抗戰並未能阻止肝火正旺的關東軍的進攻。他們正策劃着更大的進攻陰謀。

從『謀略爲主，作戰爲輔』到『迫和爲主、內變策動爲從』

關東軍向來比較崇信武力進攻，但並不排斥政治謀略。而且許多時候是雙管齊下，在華北這個問題上尤其如此。

在關東軍制訂的熱河作戰計劃上，就已經把華北列入了它的下一個目標。但華北不屬于『滿洲國』國土，一旦進入華北，就意味着中日全面戰爭的爆發。而日本政府當時還沒有做全面侵華的準備。所以裕仁天皇在批准關東軍入熱河作戰的計劃時，要陸軍省和參謀本部的『北進派』官員作出保證：他們不得讓野戰軍追擊張學良的部隊到長城以南，並且在結束熱河戰役後至少一年內，絕對不可以向中國本部進攻。而且關東軍本身也自忖擔負不了這挑起全面戰爭的責任，所以關東軍司令開滕信義在其熱河作戰訓令中明確告誡部下：

『開發熱河純屬滿洲國的國內問題。所謂引起對華戰爭的說法，那作爲國策是不可取的。如果沒有特別命令，不許越過長城在河北省作戰』。『如有人強行把熱河與華北等同視之，並把正規軍開入省內，那猶如對帝國懷有侵略的意圖……。』

因此，關東軍的攻勢最多只能達到長城一綫，並不能深入華北內地。那它對華北的企圖怎樣實現呢？只能靠與軍事進攻相配合的政治謀略，即在平津等地收買漢奸，製造叛亂，建立親日政權，造成華北分裂局面。這就是所謂的『內變策應』。具體實施這一策略的是關東軍瀋陽特務機關長板垣征四郎。

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三日，東京參謀本部給關東軍發來一紙密令，要板垣擔任策動華北內變的任務。板垣征四郎曾成功地策劃了『九·一八』事變及『僞滿洲國』成立，因而受到東京方面的青睞，再次被委以重任。

板垣到天津後，立即組織了特務機關，着手進行策反活動。他首先對其『內變策應』計劃成功的可能性進行分析，得出的結論是：成功的希望很大。一、在華北的許多北洋軍閥舊人本就與日本有染且反蔣；二、東北軍、西北軍與中央軍及南京政府有矛盾，可以加以利用；三、一部分本就是牆頭草的小軍閥更容易收買。所以板垣在自己抓緊策反活動的同時，要求關東軍『以戰促變』。

一九三三年三月底，關東軍在長城受阻後，中日雙方在長城一綫形成對峙。爲了打破這個僵局，配合板垣在平津地區的策反活動，關東軍決定背叛自己對天皇的許諾，越過長城綫，向灤東地區進攻，威脅中國守軍的側背。

三月二十七日，關東軍發佈第四九一號命令，決定『軍主力重新轉向積極作戰』。

三月三十一日晨四時，關東軍砂田部隊和岩田支隊，由九門口、義院口向石門寨進犯。四月一日，守軍何柱國部退守海陽、秦皇島、石門寨淪陷。四月九日，關東軍第六師團主力在混成防綫被突破，冷口易手。四月十一日—十四日，關東軍分路攻下界嶺口、喜峰口。中國守軍奉命退往灤西。關東軍跟踪追擊。十七日，關東軍佔領整個灤東。

關東軍擅自越過長城，佔領灤東，完全違背了天皇及東京本部的原意。而且，關東軍勢力進

入灤東，直接威脅英國的利益。英方向日本提出警告。英美兩國也在關東軍佔領秦皇島時，派海軍陸戰隊『維持秩序』。如果聽任關東軍留在灤東，威脅平津，勢必引起國際糾紛，甚至國際干涉。所以，天皇聞訊後大爲惱怒，決定斬斷關東軍這支伸得過長的手。

四月十九日，日本參謀次長真崎甚次郎在覲見天皇時，天皇不悦道：『關東軍何以尚留灤東？』真崎惶恐退下。隨即以日本參謀本部的名義電令關東軍將在灤東的兵力一律撤回。

四月二十日，關東軍密令第六師于二十一日前逐次從灤東東撤回長城一綫。爲了保住自己的顏面，並爲自己進兵灤東辯護，二十二日，關東軍司令部以幕僚談話的方式，在宣佈撤兵的同時，反誣是中國軍隊迫使其出兵灤東的：

『關東軍本擬確保長城綫後，不欲向關內進擊，惟因華軍逆襲挑戰之態度熾烈，玆爲確保國境綫起見，遂不能不進擊灤河右岸地區之華軍，現已達成所期之目的，……乃漸次退還本來之配備地點。』

好一個强盜邏輯！

就在關東軍大兵越過長城之時，板垣的策反工作也在加緊進行着。

板垣把在華北的官僚政客分爲四類：蔣介石派、反蔣派、現狀維持派、態度模糊派。除了第一派外，板垣認爲其它三類均可列爲其『策應對像』。

俗話說：有錢能使鬼推磨。板垣就是以錢開道，再加以高官厚祿，軍火供應，誘使那些與南京政府有異心的人叛變。他首先把目標瞄準了北洋軍閥頭子、北洋政府總理段祺瑞。哪知，蔣介

石早有察覺，于一月初就把段招到了南京。板垣轉而策劃另外兩位北洋軍閥頭子吳佩孚、孫傳芳。吳斷然拒絶，孫借口皈依佛門，以不願介入政治爲由而推辭掉了。最後，板垣找到了前湖南督軍張敬堯和失意軍閥赫鵬、石友山等人。張敬堯原是皖系軍閥，曾任湖南省省長兼督軍。因統治殘暴，遭到湖南人民驅逐。毛澤東就在湖南領導過兩次驅張運動。北伐戰爭時，張軍被打敗。張敬堯成孤家寡人，退居平津。當日本人找到他時，他閑賦已久，且手頭拮据。于是，對錢的渴望，對權的野心，使得他欣然答應幫日本人的忙。並投其所好地吹噓説自己與許多東北軍、西北軍長官如宋哲元、張作相、方振武、孫殿英等人都頗爲熟悉，策動他們起事易如反掌。板垣聽後大喜，遂向張行賄二十五萬元，孫殿英也得了十五萬元。據日方披露，到五月底止，板垣用來收買漢奸所用費用已達三百萬元。拿到錢後的張敬堯等人，便積極行動起來，到處游説，並不斷地向板垣提供着『可靠』的『叛變』消息。

四月十八日，板垣密電關東軍司令部，説張敬堯預定于二十一日在北平發難，屆時宋哲元部響應，希望關東軍以發動長城綫的攻勢相配合。雖説，關東軍參謀部的人懷疑這個情報的真實性，但司令官武滕信義認爲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遂令第八師團猛攻南天門，以策應平津『内變』。之後，板垣連連向關東軍司令部提供許多策反信息。二十四日報告中説，張作相將于二十六、二十七日糾集灤東方面之東北軍反蔣。三十日又説：張作相、孫殿英、馮占海部，將于月底『内變』。宋哲元、方振武、沈克亦有所行動。更有甚者，板垣竟在五月八日電報中説，宋哲元決意反蔣，並將配合關東軍攻打中央軍的行動。這些信息多屬無稽之談，不過是張敬堯等人爲邀功

而編造的罷了。板垣爲顯示自己的能力，竟信以真。可宋哲元、方振武等人的繼續抵抗使得這些計劃很快就泡了湯。

而張敬堯等人的蠢蠢活動，使得蔣介石頗爲惱怒。五月七日早晨，蔣介石指使力行社特務處華北區派行動組組長白世雄，在北平六國飯店用手槍將張敬堯打死。此事在其餘的漢奸，親日分子中引起了强烈的震撼，一時間，行動不敢再張狂了。板垣的『內變策應』計劃受到沉重打擊。爲了報復，他三次派人暗殺抗日堅決的東北軍高級將領、河北省主席于學忠，但均未成功。

到四月底，板垣的策反活動毫無結果，關東軍和東京參謀本部漸感失望。而進一步用武力進攻平津，勢必加深日本與英、美、法等國的矛盾，弄不好，列强將會出面干涉。日本還不敢冒此風險。更何況，關東軍準備下一階段的侵略，需要一個加强和組織其已佔領地帶的時間。所以，種種形勢迫使關東軍和參謀本部考慮在何種有利形勢下準備停戰的問題。

此時，關東軍參謀長小磯國昭正在東京，得情況後，便與參謀本部和陸軍省商討下一步行動方針。小磯國昭提出以『迫和爲主、內變策動爲從』的『沿長城作戰』的方案，取代三、四月底『謀略爲主、作戰爲輔』的作戰方案，得到同意，並奏請天皇批準。在這個計劃中，小磯國昭玩弄了一個不大不小的花樣，即用『沿長城作戰』的含糊字樣，從天皇處取得了關東軍突破長城、向關內作戰的令箭。

五月二日，小磯國昭回到大連之後，立即用電話向關東軍傳達了參謀本部越長城作戰的命令。本來關東軍內部在是否再次越長城在灤東作戰的問題上還存在分歧，這一下，遂決定發動新

的大規模進攻，即第二次關內作戰。五月三日，關東軍發出《關作命第五〇三號》，命令關東軍『打擊長城南側地區之敵』。

對于這一次入關作戰的目的，關東軍司令部在停戰後有如下解釋：

『鑒于（關東）軍本來之任務及兵力，並考慮關內外之情勢，自不能長驅直入平津，並進一步攻佔保定，但作反復不斷之攻擊，而每次撤回長城之綫，對我軍隊士氣亦有不良影響，實非各級指揮官所願意，故本軍切望在長城南側近距離地區，予敵以鐵錘打擊，並以此次作戰爲最後，盡速屈服敵人。』

由此可見，武力逼和是這次作戰的主要目的。而且，東京參謀本部爲了防範關東軍再次越過界限，當時就對武力逼和作了詳細的界定：

『此次用兵目的，旨在以武力壓迫中國華北官憲，使其屈膝，引起華中華南解體；至于奪取平津之工作，則宜讓諸天津特務機關之內變策動，若內變策動不能如期應手，則關東軍司令亦宜在有利條件與時機之下，從速與中國華北當局訂結一成文停戰協定，所有侵入河北之日軍，則宜于保持長城各口有利態勢之下，退回長城以北，從事于綏靖滿洲國內部事務。』

五月七日，關東軍司令部令其東綫第六師所屬各部，分別從山海關、石門寨、抬頭營、建昌營等地出發，分數路向灤東地區中國守軍發動進攻。五月十二日，關東軍憑借着飛機、坦克、大炮等重型火力，再次佔領灤東，並向灤西地區追擊。五月十二日，關東軍越過灤河後，即以主力向豐潤追擊。中國守軍奉命向西退卻。關東軍連佔豐潤、遵化，並迫使中國守軍繼續西撤。二十

二日，第六師輕鬆地佔領灤西。主力全部推進到薊運河一綫。

當第六師在灤東、灤西發動攻勢時，西綫的第八師主力亦于五月十日向新開嶺地區的中國守軍發難。經過幾番激戰之後，十三日，中國守軍奉命西撤。關東軍尾隨其後。十九日佔密云。並繼續向懷柔、順義二縣進逼。鋒芒直逼北平城。

爲了在停戰談判中更加重自己這邊的砝碼，關東軍決定擴大戰果。二十二日，中國守軍退到平津郊區防御。二十三、二十四日，關東軍第六、第八師主力形成了對北平的三角包圍。北平城內一片混亂。軍政大員們紛紛準備南逃。日本政府見有利時機已到，遂提出停戰談判，國民黨政府欣然應允。雙方于五月二十五日開始停戰，兩軍于平津與平榆大道之間形成對峙。

據日本參謀本部統計，這一次關內作戰，關東軍死一百六十三人，傷八百三十八人。

武力逼和既達目的，下面的問題，就是簽訂一個于日本有利的停戰協定了。

『以戰逼和』奏效，關東軍打開了侵入華北的方便之門

早在關東軍向長城各口進攻初期，正忙于在江西等地『圍剿』工農紅軍的蔣介石，不願意把過多的兵力放在抵抗外侵上。更何况裕仁天皇曾通過其侍從長鈴木，向蔣介石承諾道：

『日軍不怕全面戰爭，但誰也不喜歡和自己的弟兄打仗。如果蔣介石願意加倍努力，平息中國的反日勢力，消滅毛澤東手下的共匪，撤掉年輕的軍閥張學良的官職，那麼日本天皇願保證不讓日軍在攻佔熱河之後衝入長城。這是天皇的諾言，我除了再表示希望日中兩國有朝一日能如兄

第一樣，共同統治亞洲之外，别無可説的了』。

蔣介石竟然信以爲真，並在事實上按照日本天皇的意思去做着：逼張學良下野、圍剿紅軍、壓制國内抗日運動……企圖以此換取天皇的守信。

可惜，關東軍卻無意爲天皇守諾，他們不僅侵我長城，而且大兵壓向灤東。蔣介石在驚恐于關東軍的膽大之時，並不想改變其『攘外必先安内』的國策。只好按汪精衛所説的『一面抵抗、一面交涉』了。

四月十一日，正當關東軍大兵壓進灤東之時，蔣介石就開始打通過調停實現停戰的主意。他準備委任息隱于莫干山的前外交部長、老親日派黃郛主持華北政務，便電邀黃郛至南昌與之密談。十九日，黃郛受命，並與張群、陳儀在上海開始與日本軍部助理武官根本博接觸。與此相呼應，何應欽等人也在北平進行着邀請第三國出面斡旋的活動。他們希望英、美出面調停。但英美對此並不甚熱心。蔣、汪無奈，遂決定拋棄『不與日本直接談判』的諾言，乘關東軍在天皇壓力下撤兵灤東之時，與日本直接談判。

但這次停戰談判活動卻遭到了板垣征四郎及駐北平陸軍助理永津佐比重的堅決反對。他們看清了蔣汪毫無抵抗決心的弱點，認爲這時與之妥協，于日本無多大利。關東軍司令部接到報告後，決定接受他們的意見，繼續在長城地區用兵，並提請參謀本部修改行動計劃。東京遂于五月六日命令關東軍在灤東、灤西作戰，造成華北當局『實質性的屈服或分裂』。隨即開始了關東軍武力逼和的作戰行動。

雖然這次停戰談判未出戰果，但蔣汪並不死心。一九三三年五月四日，成立行政院駐平政務整理委員會，任命黄郛爲委員長，出面主持對日直接交涉，處理華北停戰談判等事宜。黄走馬上任之後，繼續與根本博進行停戰洽談。

正當南京政府頻頻表示求和意圖時，板垣征四郎的『内變策應』計劃走到山窮水盡之處。關東軍在實行『逼和爲主，内變策應爲從』方針過程中，要求板垣加緊配合，速起内變。並説關東軍因『滿洲國内綏靖工作』，不能長期待在長城各口與中國軍隊周旋，『貴機關宜速作乾坤一擲之壯舉』。此時的板垣早已没有先前的豪言壯語了。他被關東軍逼得只好亮出了底牌：『(一) 華北反蔣部隊，缺乏統一號令之中心人物。(二) 反蔣派内容複雜，合流不易。(三) 反蔣派不必即是親日派，更不必即是親滿派。(四) 南京中央政府之威權，尚未墜失，反抗中央仍多顧慮』。因而策反工作實難有大效果。關東軍據實秉報參謀本部。東京回電曰，結束天津特務機關的工作，全力進行武力逼和工作。于是，日本方面與黄郛的停戰談判的工作加快了步伐。

爲了爭取南京國民政府更多的退讓，關東軍決定繼續加强軍事壓迫。到五月二十日左右，關東軍的主力已進佔北平遠郊懷柔、密云等縣。

還在五月中旬，關東軍進攻密云等縣時，蔣、汪就深恐日軍會進軍平津，便急令黄郛北上直接與關東軍進行停戰談判。黄郛北上，意味着蔣介石及國民政府已在日軍的壓力下屈服。關東軍也認爲『黄郛之出馬，確系中方讓步之第一階段』。

于是，五月十七日，東京參謀部下達《停戰善後處理方案》。五月十八日，又下達《指導華北

方面停戰要領》，指定關東軍爲簽訂停戰協定的當事人；令日本使館駐北平武官永津佐比重在關東軍指導下具體接洽停戰談判；同時對關東軍追擊範圍和中國軍隊撤退綫作了規定。武滕司令官接令後，令關東軍繼續對北平取包圍之勢。二十一日，陷香河，其前鋒已到離北平東面通縣七公里的地方。北平形勢陡然緊張。由于關東軍及東京本部並無攻取平津的計劃，包圍北平的目的不外是壓迫南京政府接受其愈來愈苛刻的停戰條件。而且，這時就是中國方面誓死抵抗，關東軍也是强弩之末，亦無力與何應欽的華北大軍對抗。因爲它的軍事行動已經達到極限。所以較中國軍隊遠爲劣勢的關東軍，戰鬥力殆已用盡，因此，必須乘勝一短時間内導致停戰。二十二日，武滕信義根據東京電示，令永津武官接洽停戰。其停戰條件爲：（一）中國軍隊從速撤至延慶、順義、寶坻、寧河、蘆台綫之西、之南，此後不得越綫前進。（二）中國軍隊照綫退卻，日軍不追擊。（三）日方如確認第一項實行後，自動撤退到長城綫。並囑咐永津不必强求中國派軍使到陣前求和。

面對着關東軍頻頻的武裝進攻，華北當局一籌莫展。他們既無堅決抵抗的決心和信心，更没有意識到關東軍實無再戰之能力，只能一面求和，一面準備在北平難保之時撤出。

五月二十二日晚十一時，日本海軍武官滕原喜代間約黄郛到丁香衚衕滕原住處與永津會談。原本以爲停戰無望的黄郛一聽喜出望外，立即前去。至次日凌晨四時半，黄郛完全接受了日方提出的四項條件和三步停戰辦法。二十三日，何應欽、黄紹竑、張羣按照日方要求，派軍分會參謀徐燕謀前往密云與關東軍接洽談判。同時電告蔣介石和汪精衛。汪精衛立即回電支持。蔣于二十

四日回電曰：『事已至此，委曲求全，原非得已，中正自當負責。唯停戰而形諸文字，總以爲不妥』。原來蔣介石是怕給人留下把柄，而不願意簽訂停戰協定。但不訂協議，日方又不允。于是國防會議作出了下列決議：

『與對方商洽停戰，以不用文字規定爲原則。如萬不得已，只可作爲軍事協定，不涉政治，其條件須經中央核准』。

五月二十五日，按照三步停戰辦法，北平軍分會高級參謀徐燕謀到密云關東軍第八師司令部『陣前求和』。第八師長西義一讓徐簽訂所謂請求停戰的《覺書》（即備忘錄），提出五項條件：（一）對于徐東謀的停戰申請受諾之。（二）貴軍應撤至延慶、昌平、高麗營、順義、通州、香河、寶坻、林亭口、寧河、蘆台以西、以南之綫，此後不再越該綫，亦不得有挑戰之行爲。（三）日軍爲認識對方誠意，得隨時派遣飛機及必要人員，視察中國軍之撤退情況，中國應予以保護及便利。（四）上列各款確立後，由關東軍司令與北平軍分會代委員長各派全權代表在北寧路某一地點會合，提出正式委任狀，經相互承認後訂立停戰協定。（五）迄至成文協定成立，以中國不挑戰爲限，日本不向中國軍撤退綫追擊。以上條款，明顯是要中國軍隊投降，但徐僅認爲第三條對中國含有侮辱之意，要求修改。日方只答應另立覺書時，在用詞上稍作變動，但原意未變。徐無奈，只得在《覺書》上簽字。

《覺書》簽訂以後，南京方面孫科、羅文幹等人反對簽訂停戰條款，蔣介石也還有所顧慮，故要求何應欽、黃郛等人『設法延緩』。黃郛等人害怕繼續拖延下去地使日本人改變停戰主意，再

次進攻，便連電蔣介石訴說自己不得已而爲之的苦衷，希望蔣『勿爲外來蠱惑之詞所蒙蔽』。黃紹竑特專程跑到廬山說服蔣介石。結果，蔣汪同意華北當局與日本簽訂停戰協議，汪並說：『倘因此而招此國人之不諒，反對者之乘間抵隙，弟必奮身以當其衝』，蔣也表示『諸事弟必負責』。

在獲得蔣汪的上方寶劍之後，黃郛、何應欽等人便放心地與關東軍交涉。

五月三十日，中日雙方代表到塘沽舉行停戰談判。中方首席代表是參謀本部廳長、北平軍分會總參議熊斌。代表有錢宗鐸、徐燕謀、殷汝耕、張熙光。日本方面的全權代表爲關東軍副參謀長岡村寧次，代表有喜多誠一、遠藤三郎、藤本鐵雄（均爲關東軍參謀）及河野悅次郎（第八師團參謀）、岡部英一（第六師團參謀），顧問是永津佐比重等人。三十一日上午九時，談判正式開始。岡村寧次拿出事先早已准備好的停戰協定草案，並聲言這是關東軍的最後案，一字不容更改，中方必須于一個半小時以內作允諾與否的答覆。

熊斌在閱讀草案之後，提出一個書面的《中國軍代表停戰協定意見書》，希望以後在撤兵區內如發現妨礙治安之武裝組織，必須由中國處理，日軍不要因此引起誤會。

但是岡村寧次絲毫不理會中國代表實際上是在已經同意日方提案前提下提出一點可憐的要求，他蠻橫地說：現在我們是在討論日方的提案，你們只需要回答『行』與『不行』就行了，別的一切事情，都須等停戰協議簽訂以後再說。

中國代表面面相覷，不知如何是好，時間就在這種難堪的氣氛中悄悄溜走。一瞬間，離關東軍規定的一個半小時只差十分鐘了。『簽還是不簽？』在經過一番靈與肉的搏鬥之後，魔鬼終于

佔上風。中國代表最後在一字不容更改的情況下，簽訂了停戰協定，即《塘沽協定》，除序言外，全文如下：

『一、中國軍隊即撤退至延慶、昌平、高麗營、順義、通州、香河、寶坻、林亭口、寧河、蘆台所連之綫以西以南之地區，爾後不越該綫而前進。又不行一切挑戰擾亂之舉動。

二、日本軍爲確認第一項實行之情形，隨時可用飛機或其他方法施行視察，中國方面對之應行保護，並予以各種便利。

三、日本軍確認中國軍已撤至第一項協定之綫時，即不超越該綫續行追擊，且自動撤歸還至長城之綫。

四、長城綫以南及第一項協定之綫以北以東地城內之治安維持，由中國警察機關任之。右列之警察機關，不得以刺激日本感情之武力團體擔任。

五、本協定簽字後，即發生效力。』

三十一日下午四時，中日代表繼續開會討論熊斌上午提案。岡村寧次明確表示『斷難照辦。』經中方代表多方力陳，日方方同意增加一個備忘錄，內容爲：『萬一撤兵地域，有妨礙治安之武力團體發生，而以警察力不能鎮壓之時，雙方協議之後，再行處置。』但與此同時，岡村寧次也得寸進尺地表示四項希望：（一）豐寧西南面之騎兵第二師，望即撤去；（二）平、津附近之四十個師，望即調往南方；（三）百河附近塹壕及其他軍事設備，望即撤去；（四）徹底取締排日。熊斌見那麼苛刻的停戰協定都已經簽了，這些條件有什麼不可以答應的。遂口頭應允前三

項，至于第四項，他表示做不了主，但可以代爲轉達。

《塘沽協定》簽訂後，南京政府急急忙忙出來辯解。大談什麼由于國力不夠，『失敗乃必然』。此停戰協定『完全屬于軍事範圍』，不涉政治。六月五日，蔣介石在日記中毫無愧色地說：

『協定成立，停戰政策得告一段落，人民暫可安息；國際形勢，當有進步。對內對外，得此整頓准備之餘豫，其足以復興之基乎！』

好一個『人民暫可安息』，這只不過是蔣介石的自欺欺人的言辭罷了。事實上，《塘沽協定》不僅没有給華北人民換來『安息』，反而帶來了巨大的災難。華北危局進一步擴大了。從内容來看，《塘沽協定》是繼袁世凱承認『二十一條』之後最嚴重的一個賣國條約。即使從文字上看，此條約通篇充滿着戰勝者對戰敗者那種盛氣凌人的口吻，絲毫没有顧及中國人民的顏面。其具體條文更是對中國主權一次大掠奪。此協定雖然没有涉及政治問題的詞句，但實質上使長城變成了新的政治分界綫。關東軍實現了以長城爲界，並在長城以南建立新控制區的目的，爲日軍進一步侵入華北打開了方便之門。因此它遭到了舉國一致的反對。戰後許多外國學者也對此持否認態度。日本著名史學家井上靖坦然曰：

『協定中承認滿洲國的既成事實，在長城綫以南的河北省東北部設立廣大的非武裝區，對中國來講，是賣國的協定。』

美國女學者多羅西·博格，更是直接引用畢遜的話說：此協定實際上是授與『日本以後侵略華北的特許狀』。

在日本政府這一次擴大在華利益的行動中，關東軍無疑是立了大功。雖說有幾次獨斷專行之舉動，但最終逼出了《塘沽協定》，也是功過相抵。不過在天皇、參謀本部、陸軍省的心目中，關東軍的任務是綏靖『滿洲國』及對付『北方的敵人』——蘇聯，因此完成熱河作戰之後，就應該安心于滿洲事務。可惜，關東軍的野心卻不僅是滿洲，内蒙古，還有整個華北，以至于最後脫離東京，成立『獨立國』。于是，他們繼續將勢力浸入華北，導演起『華北五省自治』的醜劇來……

土肥原說，冀東政權和冀察政務委員會是服從關東軍命令的

關東軍很早就希望把華北納入自己的勢力範圍。關東軍自扶植『滿洲國』以來，掌握着『經營滿洲』的領導權。爲了把中國東北建成進攻蘇聯和進佔中國本部的大本營，關東軍提出了『日滿經濟一體化』的口號。這就勢必要給『滿洲國』造成一個相對穩定的環境。而且華北豐富的資源也讓他們垂涎。但他們知道：

『如想在滿洲的週圍都建立緩衝地帶，在中國中央政府的强烈影響下，是沒有可能的。最理想的是由既不傾向滿洲，也不傾向中央的人掌握華北政權』。即把華北變成一個特殊地區。

關東軍的這一設想得到了陸軍部的支持。

由于當時日本的軍事力量和戰爭準備尚嫌不足，大規模侵佔華北還做不到。而且因日本退出國際聯盟，又撤廢限制海軍軍備條約後，日本逐漸成爲被國際舞台遺棄的國家。如公開侵佔華

北，勢必加深日本與英、法、美等國的矛盾，他們不會對此袖手旁觀。關東軍也承認這一點：

『北京、天津這一地區的國際問題錯綜複雜。首先，這裏根據《辛丑條約》，各國駐有軍隊，多田司令官不可能根據日方的需要獨斷專行從事新政權工作。』

所以他們找到了條風險小、收獲大，且不會給歐美各國干涉找到口舌的途徑——策動『華北五省自治』，達到『以華治華』的目的。

在他們看來，這條途徑是可行的。

華北『五省當局，又皆與蔣委員長有敵對之歷史，分化種子，既已潛植，誘脅手段，正可運用。』

《塘沽協定》、《何梅協定》、《秦土協定》簽訂以後，日本陸軍、關東軍和天津駐屯軍一致認爲推行『華北自治』的大好時機已經來臨。

一九三三年七月六日，日本陸軍省和參謀部向內閣提出《對華政策大綱》，針對華北，他們提出：

『（一）雖然我們暫時容忍華北政權保持爲南京政府的一部分，我們應當壓迫它去實現塘沽協定的意義。排除對日貨的抵制和抗日運動，保持並延伸這一形勢的發展。

『（二）我們必須使華北政權壓制國民黨在華北的抗日運動，並使國民黨逐漸減少力量，最後被迫肢解。』

之後，陸軍部不斷地和內閣討論『分離華北』的議案。

一九三四年六月，在陸軍的主動要求之下，日本陸、海、外三省官員開始會商分割華北的策略。還在此之前，即一九三四年四月十七日，日本外務省情報部長天羽英二就在記者招待會上發表了『日本的東洋門羅宣言』，公開宣佈中國爲其勢力範圍，反對各國對中國的哪怕是『財政的或技術的援助』。在《天羽聲明》的第二天，日本策劃華北自治的重要人物、關東軍瀋陽特務機關長土肥原賢二，就借『華北人民愛國協會』的名義，向日本陸軍參謀部提交了所謂《挽救華北的政策》的機密文件。土肥原説：

『爲避免在遠東爆發大戰及爭取東亞的和平，目前最迫切的需要便是建立一個新的華北政權』。

經過半年多的密謀策劃之後，日本陸、海、外三省共同制訂出了《有關對華政策的文件》，規定日本在華北的基本宗旨是：

『對于華北政策，希望其臻于爲國民政府政令所不能及。在華北地區，當前的目標應當是按照當地實際情況，使南京政權的政令越來越不起作用，在努力維持和發展我方權益的同時，至少應使其黨部事實上停止活動，並且把華北政權下的官員更換爲便于推行我方政策的人員，以造成華北地區官民在當地不進行排日的先入爲主的氣氛』。

上述方針確定以後，一九三五年一月四日，關東軍在大連召開了有天津駐屯軍、日本在華武官及一些地方的特務機關長參加的關東軍幕僚會議，專門討論分割華北等的具體步驟。主持會議的板垣征四郎向會議提出一份《關東軍説明事項》，聲稱：

『在華北方面倘非具有誠意、忠實實行我軍要求之政權，不能任其存在』，並『應更傾注全力于獲取利權，俾使華北必成爲日滿經濟發展之根據地。』

這表明關東軍不僅要分割華北，更要掠奪華北的經濟資源。

大連會議以後，土肥原根據會議精神飛赴香港，向正閑居香港的國民黨元老胡漢民游說，要他與日本勾結，反對蔣介石南京政權，被胡拒絕。三月四日，土肥原回長春向關東軍司令部報告。三十日，關東軍據此作出了《關東軍對華政策》，提出『對于華北——（一）依據塘沽協定暨附帶協議事項伸張日本既得權，引導華北政權絕對服從。（二）爲使將來以民衆爲對象，在經濟上造成不可分離的密切關係，即須迅速促進棉、鐵等産業的開發和交易』。

四月，關東軍司令南次郎與中國駐屯軍（即天津駐屯軍）司令梅津美治郎共同協商策動『華北自治』。對此，曾任關東軍參謀並主持內蒙特務機關工作的田中隆吉一九四六年在遠東國際法庭上作證說：

『一九三五年四月間，我是關東軍的參謀，負責所有關于自治運動的電訊工作。自治運動的主張，是由關東軍司令南次郎和華北日本派遣員司令梅津在這個時候決定的。這個運動的目的，是在內蒙和內蒙以外的華北地區製造自治政權。……在華北是要使這五省脱離南京政府，建立一個在日本領導下同「滿洲國」有密切關係的特殊區域，從而削弱南京政府對這個區域的影響和消除對「滿洲國」的威脅』。

爲了師出有名，減少來自南京、英美等方面的壓力，南次郎、板垣、土肥原等人爲這次『運

動』安了一個『反共』的口號。對此，田中隆吉在證詞中交代：
『當南次郎派遣土肥原到華北煽動自治運動時，我曾參與幫助有關策劃這一運動的文件起草。在起草過程中，我們感到在發動這個自治運動中，尚缺少一個明確的動機，而事實上非有這樣一個不可……後來經板垣、土肥原和佐佐木研究後，乃選擇「反共」這個口號作爲樹立「華北自治政府」的目標。』

一九三五年七月二十二日，繼任梅津美治郎任天津駐屯軍司令官的多田駿，在天津召集日本記者，發表談話。被稱爲《多田聲明》，公開宣稱：

『依靠華北民衆力量，逐漸使華北明朗化，這是形成日滿華共存的基礎』日軍『需要指導結成親日反蘇的華北五省聯合自治體。』

這就公開暴露了日本分割華北的野心。當時國內外輿論大嘩。中國當局也提出抗議。可是東京方面對中國的抗議置之不理，反而于十月四日內閣會議上通過了陸軍大臣川島義之提出的『鼓勵華北自治案』，確立了分離華北的政策，並對關東軍和天津駐屯軍的活動表示鼓勵。

在日本政府的支持下，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六年，關東軍和天津駐屯軍在華北地區展開形式多樣的侵略活動，製造大大小小的陰謀事件，掀起了所謂『華北五省自治運動』。

最初實施這一計劃的主要是天津駐屯軍多因駿等人，關東軍起的是協助作用，土肥原賢二是主要執行人。多田駿和土肥原在私人感情上並不好，但在推動華北五省自治問題倒是做到了步調一致。他們的主要策略是：對華北五省上層人物實行誘逼政策，促使其與南京政府脫離關係；對

下層及下野反對勢力，廣泛收買，誘使其叛亂，建立『自治政權』。

然而，不但多田駿策動上層人物，如吳佩孚、孫傳芳、閻錫山、宋哲元、商震、韓復榘等人『自治』的工作毫無進展，就是策劃漢奸白堅武『正義自治軍』叛亂及挑起『香河事件』，也遭到了失敗。關東軍便不滿意起來，決定從配角的位置走到主角的位置上來，直接插手『華北自治』。

于是，關東軍司令南次郎十月上旬派土肥原去華北，積極建立滿洲所希望的親日親滿政權。土肥原到天津後，就擬定了一個『三步驟』計劃：第一步先說服並切實掌握殷汝耕；第二步，在宋（哲元）、閻（錫山）、韓（復榘）、商（震）四人中選擇突破口，首先切實掌握其中之一人，使之與關東軍結合起來成立一個新政權；第三步再將其他三人包括進來。

由于殷汝耕原本就是一個臭名昭著的親日派，與日本關係密切，拉攏他比較容易。所以土肥原工作的重心開始不是放在殷汝耕身上，而是在宋、閻、韓、商四人之中選擇突破口。在這四人之中，土肥原認爲商震當漢奸的可能性最小，至于閻錫山、韓復榘，多田駿曾做過他們不少的工作，他們雖暗中與日本人勾勾搭搭，但公開『自治』卻還不敢，所以收效甚微；宋哲元，多田駿也打過他的主意，但結果與閻、韓二人一樣，土肥原認爲：

『宋哲元的勢力範圍，雖因失去了河北省北部及察哈爾省，從華北全區來看是比較狹小了。但是卻包括了天津、北京這兩個華北政治、經濟重地，而且最鄰近滿洲國，如與冀東的殷汝耕攜手起來最爲理想』。

于是，土肥原首先全力進攻宋哲元。

他首先向宋提出，由其建立『自治政府』，日本給予政治經濟幫助。宋不幹。十一月六日，土肥原又向宋哲元提出兩項要求：（一）政治方面，通電宣佈成立華北自治政府，將南京所任命之華北官員，一概罷免，並控制平津及對華北自治之言論；（二）經濟方面，修築津石（家莊）鐵路，修改津海關進口稅則，便利日貨輸入，打擊英美貿易。這明擺是要宋哲元建立一個傀儡政權。宋雖然與蔣介石有矛盾，希望借日本的助力與蔣對抗，但不願當漢奸，遺臭萬年，所以一口拒絕了土肥原的建議。

但土肥原並不死心，十一月十一日，他又向宋哲元提出了經過南次郎批准的所謂《華北高度自治案》。土肥原在其炮製的方案中，把『自治政權』定名為『華北共同防赤委員會』。宋哲元為委員長，土肥原為總顧問。主要內容為：『（一）自治領域為華北五省，推宋哲元為委員長，委員會中聘日本人為顧問；（二）由最高委員會主持五省軍事，截留五省關稅、鹽稅、統稅分配給五省；（三）向確立日滿華三國的合作經濟圈邁進，即：開發礦藏資源，振興棉花栽培，脫離國民政府的白銀國有令，通貨與日本建立連鎖制等；（四）撲滅三民主義和共產主義，宣揚東洋主義』。

為了壓迫宋哲元屈服，土肥原又使出了慣用伎倆——恫嚇。時任外務省東亞局課長桑島主計，後來對此回憶道：

『土肥原在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八日揚言，如果華北不宣佈自治，他准備派五個日本師團到華北，六個師團到山東。他把最後通牒的時間限定在十一月二十一日的上午，同時還通知新聞界

在這一天齊集北平，因爲他希望很快就要宣佈新政權的成立。

爲了加重對宋哲元威逼的砝碼，支持土肥原的行動，南次郎決定以武力相逼。桑島主計作證道：

『在這以前，爲了支持土肥原的行動，關東軍司令南次郎在十一月十二日，對他的軍隊就發佈動員命令，限十五日前作好從長城外向華北進軍的准備，並且在十六日動員空軍作好在二十日進駐北、津地區的准備』。

東京參謀本部『同意調動兵力』，但告誡關東軍『根據我國政策，目前華北問題尚未至訴諸武力之程度』。

然而，土肥原的《高度自治案》遭到了來自兩個方面的阻力：

東京方面。就在土肥原向宋哲元提交《華北高度自治案》之後，十一月十三日，南次郎以兼駐『滿』大使身份向外相廣田提出了『關于促進華北分離工作的建議』。南次郎認爲當時南京政府在英國支持下的幣制改革，『有從根本上破壞（日本）帝國的根本方針——即以日本爲盟主確立東亞和平的基礎——的危險』。因此，必須『利用這個機會一擧而堅決進行華北工作』，即『使華北各省無論在政治上、經濟上都完全脫離南京政權而自行獨立，但是要尊重其領土權，不加侵害。』

蔣介石南京政府。華北事變以來，日本步步進逼，不僅與蔣介石南京政府矛盾日益激化，而且也構成英、美在華利益的危脅，雖說此時蔣介石還沒有完全放棄『攘外必先安內』的策略，但

對日本的態度也開始强硬起來，並謀求與蘇聯改善關係，與共産黨對話的途徑。基于這些原因，蔣介石對日本大張旗鼓進行的『華北自治運動』，不僅不接受，而且採取了有限度的抵制，並在軍事上作了一些準備。如，爭取閻錫山、穩住宋哲元，隴海東段中國駐軍西移，南京至上海鐵路沿綫屯集重兵，等等。十一月二十日，蔣介石明確對日駐華大使吉明表示：

『凡違反中國國家完全主權，妨害中國行政統一之自治制度，中國均難容忍。』

但也給談判留有餘地：

『關于華北特殊事態，予在兩週以前已內定辦法，將軍委會北平分會撤銷，另派大員坐鎮北平，並與貴方就地商討調整關係。』

也就是説，日方要談判，只能與國民政府談判，不能與地方直接交涉。這實際是對日本策動『華北自治』的一種抵制。

面對這重重阻力，特別是東京的壓力，土肥原十一月二十日以前迫使宋哲元『高度自治』的計劃落了空。于是只得『決定暫時停止對宋哲元的説服工作，而去全力扶植殷汝耕單獨成立一個反南京政府的新中央政權』。想以此在華北打開一個缺口，促動其他人『自治』。土肥原認爲以此促動，『説不定宋哲元也會屈服』。

殷汝耕時任薊密區行政公署專員兼榆區行政公署專員，這兩個區是《塘沽協定》劃定的『非武裝區』。地處冀東，與僞滿地域相聯，又瀕臨天津、北平，位置十分重要。所以土肥原看中了它。另外，殷汝耕本人與日本有着特殊的親密關係。他不僅積極推行汪精衛等人的『親日外交』，而

且在其範圍內任由日貨『走私』，是一個臭名昭著的『親日派』。

當土肥原提出讓殷汝耕首先在其『戰區』『自治』時，殷汝耕受寵若驚，欣然應命。十一月二十三日，土肥原與殷汝耕在天津密謀劃『自治』事宜後，二十四日，殷汝耕即回通電，當晚發表『自治宣言』。二十五日，建立『冀東防共自治委員會』。殷汝耕運動如此迅速，且盡心盡力，連土肥原的助手專田盛壽都認爲『大大出乎我們的意料』。一個月以後，這個『自治委員會』改爲『自治政府』，殷汝耕自任政務長官，『總攬全區軍事事宜』。這次改組，不僅是日本將冀東變成『第二個滿洲國』的一個措施，同時也是推動華北分離的一個陰謀。

正當中國國內同聲聲討冀東傀儡政權的時候，關東軍和天津駐屯軍按照東京的要求，以當月三十日爲限實行華北『輕度自治』爲目標，繼續對宋哲元施展工作。十一月二十一日，土肥原在天津逼迫宋哲元于當月三十日前宣佈自治，同時電邀商震、韓復榘來北平，共商進行。宋哲元虛以委蛇，予以拒絕。同時電告南京。

針對華北形勢，十一月二十六日，南京政府決定：一、撤銷軍事委員會北平分會；二、特派何應欽爲行政院駐北平辦事長官；三、特派宋哲元爲冀察綏靖主任；四、撤銷薊密、灤榆兩區行政專員公署，免殷汝耕之職，拿職懲辦。三十日，蔣介石與行政院五院長制定『華北自治辦法』，准備給予華北地方以較大的權力，來遷就日本關于華北『自治』的要求。當日晚，何應欽赴北平。在徵得關東軍等同意後，十二月三日入北平。四日，何與宋等舉行會議，討論解決辦法。宋表示願意在何領導下解決華北問題。由于日本方面警告宋不能距離日本要求太遠，五日晨，宋突

然宣佈到西山『休息』，『此後一切困難問題，當悉聽命何部長負責處理』，留下秦德純等人與何周旋，會談實成僵局。宋此舉實際上是壓迫南京給他以更大的權力。十二月五日，日軍又出動飛機在北平上空低空盤旋，又投下『華北五省人民要求脱離中央建立自治政府』的小册子。

在此情況下，何應欽決定再次讓步。與秦德純、蕭振瀛擬定一個方案，決定設立一個『冀察政務委員會』來管轄河北、察哈爾及北平、天津地區。宋哲元任委員長兼綏靖主任。六日晨，蕭振瀛攜計劃赴天津與關東軍與天津駐屯軍官員商量。土肥原不太滿意，多田駿據實匯報東京。七日，東京來電同意接受成立以宋哲元爲首的冀察政務委員會的方案。

日本在華北的分裂活動及國民黨當局的一再妥協退讓，遭到了全中國人民的堅決反對。中國共産黨連續發表通電反對國民黨的賣國行徑，號召全國人民起來進行鬥爭。全國各地抗日救亡熱潮一浪高過一浪。終于在北平爆發了聲勢浩大的『一二·九』愛國學生運動。運動的聲勢持續到十二月十六日，使得原定于這一天開成立大會的『冀察政務委員會』推行到十八日，並且是匆匆收場。

冀察政務委員會是國民黨政府對日妥協的産物，是一個名義上主權屬于中國的半自治地方政府。委員多半是冀察兩省地方實力派和原直、皖兩系政客及平津士紳等親日派人物。而且其下設的經濟、外交、交通等『特種委員會』，多爲親日分子把持，並設日本顧問。在行政上與南京保持半獨立關係，在經濟上與日本保持『特殊關係』，所以實際上是一個特殊的、親日的政權。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底，當土肥原向南次郎報告工作時，我適在場。土肥原說：『以殷汝耕

爲首的冀東政權和以宋哲元爲首的冀察政務委員會，雖然未能完全滿足關東軍的要求，但這兩個政權是可以服從關東軍命令的。將來的華北政權可以利用冀察政務委員會作它的核心。』

正當關東軍准備利用華北這個『特殊』政權在華北大施淫威的時候，東京方面要它脫離華北事務的命令業已下達。當時東京參謀本部以蘇聯爲頭號假想敵的，他們認爲關東軍的主要任務是全力作對蘇作戰的准備，華北工作應由天津駐屯軍來做，再加上關東軍總是獨斷專行辦事，東京也深爲惱火，于是在一九三六年一月前後，命令關東軍退出華北，全力對付蘇聯。

關東軍雖然不大情願。卻也無可奈何，只得縮回東北。

第六章

『蒙疆自治』始末

關東軍幾經篩選，看中了成吉思汗的第三十世孫

侵略者貪慾無窮。關東軍在侵略中國東北和內蒙東部的同時，又把魔爪伸向内蒙古西部地區。按照他們的設想，倘若控制了整個内蒙古地區，便可以此爲基地，向南北張弓。向南進一步侵略中國内陸各省，向北進逼威脅蘇聯和蒙古人民共和國，向西控制青海、新疆等地。同時，亦可使内蒙成爲僞『滿洲國』的堅强護冀和幅員遼闊的緩冲地帶，以便收到進可攻、退可守的雙重效果。這一設想是何等美妙，何等誘人。然而，理想與現實的差距是巨大的。現實中往往出現許多人所始料未及的事。關東軍的西侵，遭到了當地軍民的頑强抵抗，損失慘重。若照此下去，勢必會造成無法收拾的局面。爲解決這個令人頭疼的問題，軍部的魁首們不得不老調重彈，在内蒙地區，又玩起了尋找代理人、建立傀儡政權的鬼把戲，試圖『以華治華』。在當時内蒙古各盟的王公貴族中，能擔當起如此重任的人寥若晨星。原錫林郭勒盟盟長索王，在諸盟中德高望重，具有很好的群衆基礎，是個合適的人選。但因種種原因，此人未能受到關東軍的青睞。事情發生在一九三二年，當時，日本關東軍派參謀田中玖率翻譯金永昌前來錫林郭勒盟烏珠穆沁右旗索王

府，勸誘盟長索王趙僞『滿洲國』參觀，並在該旗設立日本特務機關和電台。索王在『九·一八』事變後，曾派人到呼倫貝爾盟海拉爾向凌升探詢過日本對蒙旗的態度。當時，凌升答覆索王說：『日本最厲害，我們與任何人合作都可以，但不能與日本合作。』從此他對日本帝國主義便存有戒心，于是，當田中玖要求在他所轄的旗裏架設特務電台和邀他訪僞滿時，他便應付說：『你們日本有力量，你們就設電台，要是征詢我的意見，我是不同意。』同時推説他因身體肥碩多病，動轉艱難，不能前往僞『滿洲國』參觀。後只派了一名協理胡里圖前往瀋陽、長春等地走了一趟。因有此隔閡，日本便把注意力轉移到成吉思汗的第三十世孫德穆楚克棟魯普（以下簡稱德王）身上。

在關東軍看來，德王是位年輕有爲的王爺，精力充沛，頭腦靈活，出身望族，有政治野心，是個非常合適的理想人選。經過密謀，皇軍便對德王展開了全面的拉攏攻勢。一九二九年冬天，日寇駐張家口的著名特務盛島角芳等四人，到錫林郭勒盟各旗和蘇尼特右旗德王府進行拉攏活動。一九三一年夏，德王偕同補英達賴等赴北平，日特盛島角芳也尾隨到北平，並和在北平的日本軍事教授英德佐等共同邀請德王到扶桑館進餐。同年，『九·一八』事變以後，日本帝國主義以武力侵佔東三省，次年三月一日建立僞『傀儡政權；接着又出兵奪取熱河，使內蒙古的東三盟完全置于它的侵略魔爪之下。關東軍的軍事佔領和政治陰謀產生了强烈的震懾作用。在它的拉攏腐蝕下，東部各盟旗蒙古封建上層中的一部分人，已經公開投日，認賊作父，成爲蒙奸。而西部盟旗的另一部分蒙古封建上層分子，以德王爲代表，也在日本侵略者的誘惑下，乘中國民族危機嚴

重的時刻，打起了保衛邊疆安全和維護民族利益的旗號。接受了日本的誘惑與拉攏。德王企圖依靠關東軍的支持加强自己的封建統治地位，進而實現他統治整個蒙古的政治野心。而關東軍此時也需要有一位像德王這樣的代理人，于是，兩方面一拍即合。

田中隆吉對德王説：『我們還要幫助你們建立蒙古國……』

百靈廟蒙古地方自治政務委員會（以下簡稱『蒙政會』）成立後，關東軍也加快了推行其『滿蒙政策』的進程。一九三四年初，日本關東軍特務笹目，率前川、野中等人，來到蘇尼特右旗，並向德王饋贈收音機、電台等禮物。同時在蘇尼特右旗和貝子廟（今錫林浩特）等地設立善鄰協會的分支機構，以辦理衛生、文化事業爲掩護，進行拉攏各旗封建王公的特務活動。同年夏天，日本大特務盛島角芳也潛來百靈廟，住在由外蒙逃亡來的活佛迪力瓦領導的外蒙人聚居的瓦齊爾達拉部落。德王偕同韓鳳林秘密前往會見盛島角芳。

盛島角芳告訴德王：『前次你派補英達賴向關東軍接洽購買槍支，現在關東軍叫我來通知你，準備無價送給你步槍二千支，現已運到林西，請你派汽車運回。』德王當即表示感謝。盛島角芳走後，德王即派汽車前往熱河省林西洽運，第一次運回來的新的捷克式步槍二百支，後又運回一些套筒式舊槍。是時，日冠又派僞『滿洲國』興安南警備軍司令巴達瑪拉布坦，興安西警備軍代理司令官烏古廷和一個日本軍官植山，前來蘇尼特右旗德王府，因德王不在，他們當即返回。德王偕同韓鳳林由百靈廟回到德王府後，聽説他們已走，就乘小汽車追趕到阿的善圖廟，始

將他們趕上。德王首先用蒙古語問道：『東蒙情形怎樣？』巴回答說：『日本幫助我們組織了興安警備軍，設立了興安軍官學校，情況還好。』接着他問德王：『西蒙情形如何？』德王說：『現在蒙政會雖已成立，而綏遠省當局卻從中破壞，不斷發生冲突。察哈爾省當局雖不明面破壞，卻在嘉卜寺增設化德縣，意在化我。』繼而烏古廷對德王說：『日本軍將來可能要西進，望你要與之合作，並予協助。』德王當即回答：『這要看日本是否誠意幫助蒙古，再做決定。』

爲盡快控制蒙古地區，在德王由歸綏（今呼和浩特市）會見蔣介石後返回蘇尼特右旗王旗不久，關江軍駐天津的大特務頭子土肥原賢二，乘專機前來蘇尼特右旗德王府與德王進行勾結活動。土肥原賢二對德王說：『你進行的蒙古工作怎樣？有沒有困難？如果有困難時，可向我說，我當盡量幫忙。』接着又自我吹噓說：『我到了哪裏，中國官員都怕我，因爲中國政府的事情都瞞不了我。』此語正中德王下懷。近些天來，德王爲韓鳳林之事弄得焦頭爛額。韓是德王的密友，得力幹將，又是蒙政會保安處的科長。一九三四年八月，韓由百靈廟赴北平回家戒除鴉片煙癮，到北平後不久，便被國民黨憲兵三團密捕。德王心想，憑借土肥原賢二的實力和影響，一定能弄清楚韓鳳林事件的真相。于是，德王提出希望他能幫助調查一下韓的生死問題。當即，土肥原賢二很自負地向德王表示說：『我能有辦法知道，等我調查清楚了再來告訴你。』

土肥原賢二走後一個時期，日寇駐蘇尼特右旗特務機關長宍浦，就將探詢韓案的經過轉告德王說：『國民黨中央憲兵三團團長蔣孝先，赴廬山向蔣介石請示機要工作時，蔣介石命令蔣孝先速把韓鳳林設法逮捕處死。蔣孝先即密電駐在北平的中央憲兵第三團吳團副負責處理。當韓來到

北平時，就有特務人員尾隨，韓到北平後，即行逮捕，當天晚上即行槍殺。

韓鳳林案件的發生，破滅了德王對依靠蔣介石擴充自己實力的夢想，他認爲這等于與虎謀皮。過去向蔣要武器，總是敷衍應付，多少給一點，但從來不能滿足他的慾望。同時，在國民黨政府的統轄之下，從不承認蒙古是民族，而只承認是宗族，所以，他能得到的，充其量也不過是地方自治，這當然很難滿足他所謀求的實現『大蒙古主義』的政治野心。于是，德王便加緊和日本帝國主義勾結，幻想利用日本的力量來擴充政治勢力。此時的關東軍似乎早已摸透了德王的心理。一九三五年，關東軍又鬼使神差般地把宍浦調任蘇尼特右旗（德王的家鄉）特務機關長，並讓竇貴廷偕同宍浦返回蘇尼特右旗來見德王。宍浦見到德王後說明來意，架設電台，並和德王共同研究了保密辦法。宍浦化名石田三雄，仍以善鄰協會理事名義，暫時掩護其執行特務機關長的任務。從此，德王和日寇的勾結活動，通過宍浦正式建立了聯絡的渠道。接着，日本關東軍蒙事處第二課課長石本寅三與參謀田中隆吉等來蘇尼特右旗和德王進行政治陰謀的勾結活動。德王和石本、田中見面密談中，田中隆吉在一張紙上寫着『滿洲國』和『蒙古國』幾個大字，拿着向德王說：『我們日本已經幫助滿洲人建立了「滿洲國」，現在我們還要幫助你們建立「蒙古國」，今後日、滿、蒙可以共同合作。』

德王對他們的這種政治誘惑，很感興趣，並熱情招待了石本、田中二人。爲了掩人耳目，談完之後石本、田中當天便返回。他們走後不久，宍浦向德王說：『關東軍參謀副長板垣征四郎，要來和你晤談。』

在宍浦等人精心安排下，一九三五年七月，板垣征四郎偕同渡邊大佐、田中隆吉參謀和蒙語翻譯金永昌等人，乘坐飛機前來同德王進行了會談。德王首先向板垣說：『前次田中參謀前來我旗，曾提到幫助我們建立「蒙古國」問題，我們很高興，希望日本幫助我們早日實現，並把東西蒙古合併起來，完成蒙古獨立建國。』板垣答覆說：『蒙古獨立建國，我們是願意幫助的。但東部蒙古是滿洲國的領土，滿洲國是獨立的國家，我無權答覆。但是爲了幫助你們籌劃建國，可先派三個顧問前來幫助你們。』索王聽到這裏，馬上嚴詞拒絕說：『這不是滿洲國第二嗎？』板垣看到索王反對，使會談無法繼續下去，便回答說：『那麼，我們以後再詳細研究吧！』這次會談對後來『蒙古軍政府』的建立，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軟硬兼施，扶起一個馴服的『蒙古軍政府』

與板垣會談後，德王便開始了『蒙古獨立建國』的行動。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德王親自去僞『滿洲國』新京和日本關東軍進行所謂『日蒙合作』的談判。雙方商定：日本幫助德王在内蒙古西部地區盟旗先搞一個『獨立』局面，然後再建立一個獨立的『蒙古國』，並答應給德王以財政上的援助。德王接受了關東軍送給的五十萬日元和五千支步槍，作爲擴編蒙古軍隊的經費和武器之用。德王由長春返回蘇尼特右旗後，就和日本關東軍駐該旗的特務機關長宍浦共同研究了關于搞『獨立』局面，成立統一領導機構的問題。當時宍浦向德王建議說：『現在日、蒙既已合作，統一必須從速建立。我看最好是進一步强化百靈廟。「蒙古地方政務委員會」作爲統一指揮機構。

因爲這樣做是繼承已成事實，能駕輕就熟，易于發揮統一指揮的作用。』德王認爲，這個辦法倒不錯，但若不征求雲王的意見，則有失穩妥。于是，他就帶了十萬日元，作爲擴編保安隊之用，赴百靈廟向雲王報告了他長春之行及與日本關東軍勾結的經過。雲王聽後便說：『既然這樣做了，就應本着怕了不做，做了不怕的精神繼續進行，但必須慎重從事，力求穩妥爲宜。』當時，德王又向雲王提出：『現在急需成立一個統一指揮機構，一個辦法是成立「蒙古軍總司令部」，一個辦法是强化蒙政會，你看哪一個辦法好？』雲王在權衡了各方面利弊之後，採取了兩面討好的辦法，對德王說：『我看在你盟那邊成立「蒙古軍總司令部」，聯絡上較爲方便，在百靈廟這邊强化蒙政會，做爲統一指揮機構，不大方便。』

此時，日本關東軍派田中隆吉又來德王府，德王聞訊後，便由百靈廟急忙返因蘇尼特右旗，與田中共同商談這一問題。德王首先提出成立『蒙古軍總司令部』的意見，而田中則主張成立『蒙古軍政府』，並强調這個名稱響亮，包括政治和軍事兩個方面，可以指揮行政和軍隊。而德王則考慮到雲王的關係，堅持成立『蒙古軍總司令部』，並說這是和雲王商洽後得出的意見。當時田中隆吉因急于要返回多倫策劃指揮李守信僞蒙古軍進犯察東的事件，便沒有堅持他的意見。

經過幾個月的籌備，一九三六年二月十二日，在德王府舉行了『蒙古軍總司令部』的成立典禮大會。會上，德王以成吉思汗第三十世孫自居，宣讀就任僞『蒙古軍總司令』職的誓辭。誓辭的主要意思是：『我誓願繼承成吉思汗的偉大精神，恢復蒙古固有疆土，完成民族復興大業』等。開會期間，日本關東軍西尾參謀長特乘飛機趕到，並代表關東軍司令官祝辭。他在講話中主

要强調：『日蒙攜手，親密合作。』但是在他的祝辭中提到的是祝賀『蒙古軍政府』的成立，而不是祝賀『蒙古軍總司令部』成立。這說明在這個僞組織的名稱上，日本關東軍和德王是各行其是，沒有統一起來。

一九三六年，蒙古軍總司令部成立不久，由于地處偏僻牧區，交通不便，造成指揮失靈，物資運輸困難等許多棘手問題。在這種情勢下，關東軍又派田中隆吉、橫山順等飛來蘇尼特右旗對德王說：『西尾參謀長參加典禮後回去說：西蘇尼特旗這個地方，人口稀少，一片荒涼，怎能成立『蒙古軍政府』。這時，吳鶴齡爲了討好日本人，也向德王建議說：『既然日本關東軍喜歡「蒙古軍政府」這個名稱，我們就成立「蒙古軍政府」吧，何必非强調叫『蒙古軍總司令部』不可呢？是名稱上下不一致。』德王也以吳鶴齡的建議爲是。因此，召集幕下人員進一步研究改弦更張，成立『蒙古軍政府』。于是，出現一九三六年四月十二日，在錫盟烏珠穆沁右旗『索王府』召開第一次『蒙古大會』的鬧劇。

在大會進行中，日本關東軍又派參謀田中隆吉、橫山順等乘飛機趕來參加，德王因怕引起索王的不滿，首先向田中隆吉作個別密談說：『索王等最不願意的是怕你們派來顧問，過問蒙旗行政，希你以來賓的資格在大會上講話時，說明現在派來的日本顧問是幫助蒙古籌備建國，一俟工作就緒，就將派來的日本顧問一律撤回，決不干涉旗政。』田中隆吉根據德王建議，在大會上以關東軍司令部代表的身份致賀辭。他在宣佈『日蒙提攜』政策要旨時，惡意挑撥我國民族關係，他說：『成吉思汗的子孫，多少年來受盡了漢人的壓迫，大日本帝國政府體念蒙古民族的落後，

要幫助蒙古獨立進步，以繼承成吉思汗的事業。』接着又將他帶來的八音子手槍多支，分贈給各盟旗有實力的王公每人一支，以資拉攏。在大會宴會時，田中隆吉又向與會代表們宣佈：『滿洲國興安北省（呼倫貝爾）省長凌升私通蘇聯，被皇帝槍斃了。』當場許多王公聽了這個消息，都感到毛骨悚然。索王、卓特巴扎普因與凌升素有深交，聞聽之後，都有不勝嘆息之表情。而田中隆吉正是以此軟硬兼施的手段，威脅利誘參加大會的王公，使其馴服聽命于日本帝國主義的擺布。

最後，會議通過了吳鶴齡起草的《蒙古軍政府組織大綱》，根據這一大綱，德王掌握全部軍政大權，成爲名符其實的『獨裁者』。德王經過多年的鑽營投機之後，終于實現了『統治』內蒙的夢想。對此，他也不免有些飄飄然了。然而，在得意忘形之中，也常有不盡人意的事情。首先是日本軍方爲了進一步控制德王，常常採取恩威並施的手段，利用僞蒙古軍內部第一、第二兩軍互相勾心鬥角的矛盾，向他施加壓力。例如，僞蒙古軍成立不久，德化日本特務機關長田中玖，因德王有時不願聽從驅使，遂對德王產生不滿，曾以第一軍經費不足爲借口來威脅他。當時，田中玖帶着第一軍參謀長劉星寒前來見德王，以軍費不足，部隊供給困難爲由，故意給德王出難題。又如僞蒙古軍政府成立公路局以後，任命張少庭（恩和阿爾木）爲局長，負責輸德化至張家口各縣旗之間的汽車運輸。而當時滿鐵株式會社公路局的汽車，生意冷淡至極。田中玖爲了使日本人經營的滿鐵汽車公司賺取壟斷交通運輸的高額利潤，曾向德王提出不供給僞蒙古軍政府公路汽油，企圖迫使公路局停辦歇業。田中玖採取這些政策手段，無非是給德王點顏色看看，以便使其

成爲日本關東軍驅使的傀儡。

其次是在締結僞『滿蒙協定』的問題上，日本人大包大攬，橫加干涉。如在討論軍事問題時，德王提出，蒙古軍政府甫經成立，實力還不充足，如果受到外來威脅時，請『滿洲國』出兵援助，當威脅解除以後，『滿洲國』即應撤兵。但是，關東軍的代理人滿洲國外交次長大橋忠一則認爲這樣做有些不盡然。他說：『從外交慣例上講，滿洲國爲了援助蒙古實行出兵或撤兵，應當有一定的程序或規定，不能你們叫我們出兵就出兵，叫我們撤兵就撤兵。』

當時，田中隆吉看到德王和大橋忠一兩人爲此問題爭執不下，便插話說：『不必在這個問題上爭執吧，本着蒙滿親密合作的精神，就按照德王的意見辦也無不可，我看就這樣辦吧。』事實上，僞滿、僞蒙都不過是日本關東軍直接操縱扶植起來的兩個傀儡組織，它們所締結的『滿蒙協定』只不過是走個形式而已。至于出兵或撤兵的一切決定權，最後還得日本關東軍作出才能算數。所以，經田中隆吉這樣一說，雙方就不再爭執，談判至此便告結束。由此不難看出，新成立的『蒙古軍政府』只不過是個徒具形式的僵屍，沒有任何生機與活力。

由『軍政府』到『聯盟自治政府』

一九三七年十月十四日，李守信率僞蒙古軍隨同日寇佔領綏遠省首府歸綏市（今呼和浩特市）後，繼而吳鶴齡、陶克陶、王宗洛、德古來等率僞『蒙古軍政府』職員，由張北遷至歸綏。旋即給駐在百靈廟的德王打電報，催他速來綏商洽蒙古『建國大計』。德王接電後，即乘飛機自

百靈廟來歸綏。

此時，日寇自東而西在其所佔領平綏鐵路沿綫地區的張家口、大同等地，採取化整爲零、分而治之的政策，利用當地一小撮漢奸，相繼在張家口成立『察南自治政府』，在大同成立『晉北自治政府』兩個僞政權。繼而又指使德王以僞『蒙古軍政府』的名義通過各地于十月二十七日在歸綏市召開『第二次蒙古大會』，討論建立新的僞蒙古政權問題。籌備會議期間，在討論建立一個什麼性質的僞政權問題上，德王、吳鶴齡等與日本方面商洽時產生了分歧。當時，德王提出『蒙古獨立建國』的問題，請日本駐歸綏市特務機關長桑原中佐和僞『蒙古軍政府』日本顧問部主任村谷彥治郎轉請日本關東軍研究決定。村谷當即答覆說：『蒙古獨立建國問題，關係重大，牽涉到國際上的《九國公約》問題，需要關東軍和日本國內慎重研究，一時不能確定。』

此時，德王認爲村谷彥治郎和桑原職位不高，對蒙古建國這樣重大的問題，不敢自作主張。于是，他便去找駐在歸綏的日本關東軍部隊長酒井隆商量，希望他居中幫助。當酒井隆說不同意馬上建立『蒙古國』時，德王當即向酒井隆提出說：『蒙古建國是田中隆吉的諾言，爲什麼現在又不算數呢？』酒井當時答覆德王說：『田中隆吉這個人非常冒失，他主持進攻綏東時，我正在天津，曾去勸他不要這樣做，但他不聽，一意孤行，結果遭受失敗。至于蒙古建國問題，關係重大，非經日本帝國政府研究併經過御前會議，不能做出決定。田中隆吉僅是關東軍的一個參謀，怎能決定這樣大的問題。他當時敢于應承你們，是因爲非常需要你們，所以，你們要求什麼就答應什麼，實際上是不頂事。』

當錫察兩盟代表到達後，德王又慫恿各盟旗代表們共同向村谷彥治郎提出要求說：『蒙古建國問題，既經第一次蒙古大會決議，田中隆吉參謀也早有幫助蒙古建立的諾言，這次田中隆吉到達張北也是爲此問題，曾向駐大同的東條英機參謀長請示，據説俟攻佔綏遠就幫助建立蒙古自治聯盟國。現在已經攻佔綏遠省城，而蒙古建國反倒成了問題，我們身爲盟旗的代表，還在此地做什麽，各自回旗就算了。』村谷彥治郎回答説：『你們這樣説，不是連關東軍的話都不聽了嗎？希望大家耐心等待，不要急于回去。

嗣後，德王又和吳鶴齡等研究，認爲蒙古『獨立建國』既然一時不能實現就仍以『蒙古軍政府』作爲政權機構，不再成立新的政權。理由是：蒙古原有的領土還未完全恢復，現在仍是軍事時期，所以，仍以『蒙古軍政府』爲政權機構。但經和日本方面商量，他們仍然不同意這樣做，並授意德王等只能成立一個與察南、晉北相同的僞政權，從而達到分而治之的目的。

在無可奈何中，德王等只好遵照關東軍的授意，與陶克陶、吳鶴齡等人重新研究成立僞蒙古政權問題。他們商量成立『蒙古聯盟自治政府』，並責成吳鶴齡擬具『蒙古聯盟自治政府』組織大綱。大綱規定：設主席、副主席，下設政務院院長管理政務，蒙古軍總司令管理軍事。同時決定以歸綏爲新政府的『首都』，並將歸綏市改名爲『厚和浩特』。組織大綱擬定之後，即交由桑原和村谷彥治郎等，由他們轉請關東軍研究決定。日本關東軍迅即電話通知，表示同意成立『蒙古聯盟自治政府』，但在首腦設置問題上，僅列有主席，没有副主席，並指定德王爲行政院長，李守信爲蒙古軍總司令。德王、吳鶴齡看過這個電報以後，對關東軍在人事安排上這種越俎代庖，

先爲指定的做法極爲不滿。吳鶴齡對德王說：『如果不照關東軍指示行事，必然招致李守信的不滿。而主席一職應由你擔任，但必須雲王表示不就，才爲妥當。要不我們去面見雲王，勸他自動讓出主席一職，推他爲元老，你看怎樣？』

德王當時的主要目的是由自己直接抓軍政大權，至于擔任僞主席的職位，他考慮到當時的實際情況，認爲還是讓雲王擔任爲宜，因爲雲王出任僞主席，不過徒具虛名，而軍政實權仍掌握在自己手裏。這樣既便利于利用雲王的威望號召各盟旗王公，又符合關東軍的旨意，是一箭雙雕有利無害的事情。于是他便故作姿態表示謙虛說：『雲王年高望重，仍宜推爲主席，我當行政院長就行了。』至于把僞蒙古軍總司令的職務讓李守信擔任，德王從内心感到不滿。但爲避免發生矛盾，也只好依照日本關東軍的意見，仍内定李守信爲總司令。

商定之後，各地拼湊的代表均已到齊，通過預備會議，推選出九人主席團。但主席一職的人選還未作最後確定；是否設置副主席一職，也未得到解決。最後，只好由日本參謀長東條英機拍板，内定雲王爲主席，德王爲副主席兼政務院院長，李守信爲蒙古軍總司令，吳鶴齡爲參議會參議長。

日本關東軍爲了全面控制僞蒙政府的各級政權，特設日本顧問部，最高顧問金井章二，當時在張家口搞『蒙疆聯合委員會』，始終未到任，由次席最高顧問宇山兵士實際負責。其下設有：總務部顧問：中島萬藏；財政部顧問：櫛部正暉；保安顧問：大園長喜；軍事最高顧問：高場損藏。這些日本顧問，實爲僞『蒙古聯盟自治政府』和僞『蒙軍總司令部』各級領導的太上皇，即

使德王、李守信等人亦無不仰其鼻息。但在某些問題只要和關東軍的根本利益不發生矛盾，這些顧問有時還能表面上尊重德王的意見。因此，德王在日本帝國主義的支持下，爲實現了『蒙古獨立建國』的美夢，幹得很起勁。

關東軍不許提『蒙古建國』，令德王不勝煩惱

一九三八年秋，僞『蒙疆聯合委員會』改組後，根據日本軍部的安排，該委員會的訪日代表團抵達日本下關車站。德王向日本國內來歡迎他的人員發表講話時，聲稱他是代表『蒙古』而來訪問的，矢口不提『蒙疆』二字。德王的講話由他的隨同翻譯吉爾嘎郎譯成日語後，金井章二聽了很不高興，當德王講完話後，他便馬上向在場的新聞記者和歡迎人員解釋說，方才德王講話中所說的『蒙古』就是『蒙疆』。是時，德王對他這種糾正也很感不快。後在代表團到達東京時，日本內閣總理近衛文麿閑談時說：『現在蒙古民衆都不願用「蒙疆」這個名稱，仍願意用「蒙古」代表新的政權。』但德王剛談完這些話，日本政府官員便給近衛文麿送來宴會上的致辭稿。近衛看了這份致辭稿，把上面原有的『蒙古』二字都抹掉，換成「蒙疆」二字，近衛似有覺察地看着德王躊躇了一下，但是在他發表致辭時，仍然按照原稿宣讀了一遍。這是金井章二預先向日本政府做的安排。

不久，日本天皇又召見德王。在這次天皇召見時，金井章二又向德王告誡，讓他見到天皇時，只許說『蒙疆』不准他提『蒙古』這個詞，也不許他向天皇再提『蒙古獨立建國』問題。同

時他還把德王在日本各地演説中所用的『蒙古』二字的名詞，在譯成日語、日文發表時，一律改爲『蒙疆』。當時金井章二還對隨同德王作日語翻譯的吉爾嘎郎恫嚇説：『德王在日本不許説「蒙古」，也不許再説「建國」，如果他仍然這樣説，你也不許給他譯成日語，在翻譯時，要把「蒙古」二字，一律改稱「蒙疆」。你要不這樣辦時，要小心你的腦袋。』

『蒙疆』這個名稱，是當時日本軍部爲適應他們侵略中國的大陸政策需要而應用的。儘管德王對此心懷不滿，但是，出于對『主子』的恐懼和既得利益損失的擔心，在天皇召見他時，只説了他感謝日本給予的援助，再不敢提起要求『蒙古建國』的事。天皇對德王説：『希望協力維護東亞和平事業。』彼此應酬一番，没有談到實際問題。

當德王訪日行將結束時，東京放送局約德王向日本全國做廣播演説。金井章二認爲這是利用德王把『蒙古』改稱『蒙疆』的絶好機會，並向德王的翻譯吉爾嘎郎再次警告，但德王在廣播講話時，還是只説『蒙古』，不説『蒙疆』這個詞。金井章二對德王奈何不得，只好給吉爾嘎郎施加壓力，讓他在翻譯時把『蒙古』二字，都譯成『蒙疆』。

德王在訪問日本東京等地期間，對金井章二給他施加各種壓力，不許提『蒙古』和『蒙古獨立建國』的詞句，只許他説是代表『蒙疆』而來的種種控制等做法，深感不滿。因爲在他看來，『蒙古』與『蒙疆』不是簡單的名詞學義的問題，而是有着極爲重大的政治和民族問題的含義。他認爲，『蒙古』不僅代表着民族，並且代表着土地和人民的含義，而且一提起『蒙古』二字，世界上無人不知，無人不曉，它是歷史上早已確定了的名稱。如果把『蒙古』改成『蒙疆』，那

就意味着它仍然是中國的邊疆，不是獨立的蒙古政權，而仍是隸屬中國版圖内的地方政權。這一點最讓德王惱火。曾幾何時，他在向國民黨中央政府要求自治時，就把『復興蒙古民族』『實行蒙古自治』這兩塊招牌，作爲在政治舞台上向蔣介石討價還價和籠絡蒙古上層的『資本』。而今，日本帝國主義卻連『蒙古』二字都不讓説了，今後將何以號召蒙人，言念及此，德王不勝煩惱。

關東軍方面使用『蒙疆』二字，也有它的理由。按照他們的解釋：『蒙疆』，是代表蒙古之疆域的意思。既能包括察南、察北，代表新的政權，又能起到『協和民族』的作用。並且，『蒙疆』二字早已成了習慣用語，蒙古仍然是蒙古，不是因爲沿用『蒙疆』二字，而把蒙古取消了。

其實，關東軍堅持使用『蒙疆』一詞，是有其不可告人背景的。因爲這年十二月間，汪精衛已潛離重慶，至河内後發表聲明降日，響應日本内閣總理大臣近衛文麿調整中日關係的三原則。關東軍爲了在政治上利用漢奸汪精衛進而達到誘降蔣介石的目的，暫時改變了以前實行的分割統治中國的陰謀和策略。因此，當德王在『蒙疆』問題上與日本駐張家口軍部産生矛盾時，他們就採取了軟硬兼施的辦法對付德王。他們曾派李守信對德王説：『現在金井章二已表示願辭去代理總務委員長一職，請你前去就任。如你仍然表示不就，恐怕影響不好，胳膊還能扭過大腿嗎？現在日本軍部方面已經説好了，你還是到張家口就任吧。』

德王知道日本軍部已經這樣決定，是絶對無法改變的了，同時，也認識到再繼續討價還價，和日本軍部的矛盾大有不可終日之勢，因而向李守信表示説：『就任就就任吧。』

別有用心地炮製出『蒙疆聯合自治政府』

爲了進一步控制蒙古、察南、晉北地區的産業、金融和交通，加强殖民統治，削弱三個僞政權的實力，早在一九三七年十一月，關東軍就在張家口地區設立了統一的僞政權機構——蒙疆聯合委員會。這個僞組織的建立，不僅便于日本軍部的就近控制，而且在軍事上更有其重要的戰略意義。因爲一九三八年七月間，日本關東軍一部進犯蘇聯邊境，侵佔張鼓峰時，被蘇軍擊敗；次年五月，日本關東軍與僞『滿洲國』的蒙古軍又發動侵犯蒙古人民共和國國境的諾門坎戰役，再度遭蘇、蒙軍的挫敗；于是日軍對蘇、蒙便被迫由進攻改爲防禦。而『蒙疆』北部地區，正與蒙古人民共和國毗鄰，日本帝國主義把這一地區劃爲『防共』的特殊區域，因而急于要將蒙古、察南、晉北這三個僞政權合而爲一，以便于他們統一指揮，集中力量，發揮『防共前驅』作用。在三個僞政府的合併中，爲防止三個傀儡組織首腦人物之間的爭奪，日本軍部主張合併後撤消德王的僞『蒙古聯盟自治政府』的建制，而將原來察南、晉北兩個僞政府降爲兩個廳，由『蒙疆聯合委員會』直接領導；並在合併後的統一機構中，不設實際首領，由日本最高顧問金井章二大權獨攬，直接控制。

德王對此持有不同意見。他主張應以他的僞『蒙古聯盟自治政府』爲基礎，取消僞『蒙疆聯合委員會』，吸收察南、晉北兩個政權，在厚和浩特建立蒙古自治國。但這個打算遭到了關東軍的嚴辭拒絶，未能如願。于是，他便暗中與蔣介石勾結，待接到蔣介石囑他仍留『蒙疆』『忍辱

負重』，以圖將來的指示，並以汪精衛發表《舉一個例》一文中得知汪的投降日寇是汪蔣的共同主張時，德王又想：既然汪蔣都在向日本投降，他如再與日本公開決裂，當然害多利少。于是便使出他『狡兔三窟』的慣技，一面暗中與蔣介石保持聯繫，一面則公開對日本軍部表示順從。同年六月，他依照金井章二的囑託，邀同察南、晉北兩個僞政權的首腦于品卿、夏恭二人，前往軍部表示三個僞政權願意合併。此時，日本侵略者已在南京策劃成立了梁鴻志的僞『中華民國維新政府』，在北平又策劃了『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出于分割統治的需要，關東軍加緊了三個僞『滿洲國』的僞蒙古帝國或『蒙古聯合自治國』，使其在日本的操縱下，脫離中國的版圖。關東軍的設想與德王的夢想一拍即合。因此，德王對日本軍部更加順從。七月，德王派其心腹超克巴達爾夫帶着他的『蒙古自治國』的草案，去與吳鶴齡商量，吳將『蒙古自治國』改爲『蒙古自治邦』，即將這一草案呈交給日本陸軍相板垣征四郎。但是，這時汪精衛又與日本新任內閣總理大臣平沼騏一郎秘訂賣國協定。關東軍此時更想利用汪精衛來誘降蔣介石，所以對其先前推行的『分而治之』的策略，暫時有所變動，從而對『蒙古建國』的打算也取消了，只批准建立一個『蒙疆聯合自治政府』。

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經日本軍部和金井章二等精心策劃後，由『蒙疆聯合委員會』演變而來的『蒙疆聯合自治政府』正式宣告成立。根據日本軍部的決定，德王爲主席，于品卿、夏恭二人爲副主席。由德王宣佈日本軍部和金井章二早已內定好的僞政府各院、部、廳、局等官員名單。會議確定張家口爲『蒙疆聯合自治政府』的『首都』；應用成吉思汗紀元年號；規定統治區

域；說明政府旗幟制定的意義。

經過這次僞政府的大改組，日本人便以正式的官吏身份出現了。除了顧問外，有部長、次長、局長、處長等職。同時在僞政府之上，設立了日本帝國政府興亞院聯絡部，日本軍部兵團司令官蓮治藩和興亞院聯絡部長酒井隆，成爲高踞于僞政權之上的兩個太上皇。

大橋忠一答覆德王：『總務廳長我兼！我兼！』

在日本侵略中國的初期，關東軍控制僞蒙政權組織的主要機構是日本軍部。到一九四〇年前後，日本國內成立了興亞院。這個組織，在華北和『蒙疆』都設有它的聯絡部，名爲興亞院駐華北、『蒙疆』的聯絡部，實則是日寇統治這兩個地區的最高指揮機關。興亞院『蒙疆』聯絡部長官就是操縱『蒙疆』各地軍、政大權的重要人物。『蒙疆聯合自治政府』（一九四一年八月四日易名爲『蒙古自治邦政府』）最高顧問金井章二和僞『蒙古軍』最高顧問高場損藏等人，都是承聯絡部長官竹下義晴命令，來直接控制指揮『蒙疆』各級組織及其軍政官吏活動，並組織僞軍策動各種侵略陰謀的活動。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竹下義晴調走，岩崎民男少將繼任聯絡部長官，不久，日本又把駐『蒙疆』聯絡部改爲日本駐『蒙古自治邦政府』公使館，岩崎民男亦改任爲『公使』。同時，配合其進行統治的還有日本設立在『蒙疆』各地的領事館，其主要任務是搜集各種情報，爲日本實現侵略掠奪政策服務。日本在僞『蒙疆』還設有日本軍司令部。該部司令官名義上指揮駐在『蒙疆』

的日軍，實際是直接操縱『蒙疆』軍、政大權和支配『蒙疆政府』和『蒙古軍』各級官吏的實權人物。日軍司令部對『蒙古軍』自司令部至各師、團隊部，皆派有顧問、教官等進行控制、監督。這些人的權力是非常大的。不僅軍隊的作戰、移防命令，非由他們簽署不能生效，就是僞軍的補給供應和官兵的升遷調補等，也必須徵得他們的同意。此外，駐『蒙疆』各盟、旗、縣以上都有日本特務機關長。他們也是承日本軍司令部的命令，積極從事各項侵略陰謀活動，並監視僞蒙各級軍政機構的一切活動。

日本軍司令官、『蒙疆聯絡部』長官、『蒙疆聯合自治政府』最高顧問、『蒙古軍』最高顧問等人，不僅是高踞于德王、李守信頭上的太上皇，而且也是關東軍在『蒙疆』進行各種侵略掠奪活動的策劃者和直接指揮者。

考慮到來『蒙疆』的日本各類軍政人員的矛盾，關東軍也經常對這些人進行調整。例如：一九四二年元月，『蒙疆聯合自治政府』最高顧問金井章二被調回日本，由陸軍省新派大臣大橋忠一繼任最高顧問一職。金井章二是個口蜜腹劍、笑裏藏刀、陰險狡詐的家伙。他在擔任最高顧問期間，專横跋扈，動輒對德王採用高壓手段進行控制，德王對他極爲不滿。因此，他們兩人的關係非常緊張，幾欲陷入僵局。又如，在第五次『蒙古大會』決定推選德王繼任主席時，岩崎民男就向日本陸軍省派來參加會議的中島萬藏説：『德王這個人老是不聽話，總是嗷嗷不休，另換一個人代替他爲主席不行嗎？』但由于日本發動了太平洋戰爭，更需要利用德王調動『蒙疆』的力量來支援戰爭，因此，不僅没有更换德王的主席，反而派來了德王非常喜歡的大橋忠一來接替最

高顧問的職務，以加緊推行其侵略政策。

大橋忠一一上任，就擺出一幅『尊重』德王的姿態。他從日本來到張家口後，沒有先到日本軍部請授機宜，便先來面見德王。有人提醒他這樣做會招致日本軍部的不滿時，他說：『我是德王主席特意聘請來的顧問，當然要先拜會德主席。』

爲博得『蒙疆』政府中蒙古官吏們的好感，他甚至還對在『蒙疆』任職的日本官員們訓話說：『你們把日本對蒙政策執行錯了，在蒙古政府中，你們應當幫助現地的蒙系人做事，不應當對他們藐視。』

然而，這個表面冠冕堂皇、通情達理的日本軍人，不久便露出了他的猙獰面孔。大橋忠一到任沒幾天，便把原先由蒙古人擔任的『蒙疆銀行』總裁職位奪去，由日本人壽崎英雄擔任，而將原總裁特穆爾博羅特降爲副總裁。同時，金井章二調走以後，德王很想讓蒙古人擔任總務廳長。當德王向大橋忠一征求意見時，他立即答覆說：『總務廳長我兼！我兼！』德王又向他提醒說：『最高顧問是政務院長之上的，總務廳長是政務院之下的，你如感覺兼任不合適，可以改由蒙古人擔任此職務。』但大橋忠一仍堅持自己兼任總務廳長職務。可見，只要是對控制『蒙疆』組織有實權有位置，不管制度上是否合適，他是絕不放棄的。這表明，大橋忠一在對『蒙疆』政權上的控制上，比金井章二更高明、狡詐和陰險。

第七章
『黑太陽』籠罩關東大地

關東軍叫囂對『滿洲』須『繼續實行帝國的威力壓迫』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發生後，短短的幾個時間裏，關東軍就霸佔了中國東北一百三十萬平方公里的大好河山。東北淪爲日本人的殖民地，三千萬同胞開始了長達十四年暗無天日的痛苦掙扎。

關東軍不僅是『九·一八』事變的元兇，『滿洲國』的太上皇，更是十四年血腥屠殺、鎮壓和掠奪中國人民的劊子手。

一九三二年關東軍在《形勢判斷》中就赤裸裸的宣稱：『要使滿洲三千萬民衆不爲中國本部和蘇聯的蠱惑所動，使其相信新國家（即滿洲國）的永久性，而不敢有所蠢動，……須繼續實行帝國的威力壓迫』。

在這個法西斯的『威力壓迫』方針下，關東軍絞盡腦汁，發明了許多前所未聞而且慘無人道的辦法來統治、奴役中國東北及其佔領區人民，主要方式如下：

以『治安肅正』爲名，不斷進行殘酷的軍事『討伐』。這主要是針對抗日武裝力量而進行的，

但也涉及無辜百姓。在其『討伐』之處，實行『三光（即燒光、殺光、搶光）政策，製造了許多駭人聽聞的慘案。

强行建立『集團部落』。關東軍認爲軍事『討伐』只能『治標』，還應該『治本』。『集團部落』就是『治本』的主要方法。所謂『集團部落』，就是把農民趕到指定的地點居住，燒燬其原有的住房，妄圖隔絶人民與抗日聯軍的聯繫，使抗日聯軍成爲無源之水；同時通過『集團部落』嚴格控制廣大群衆。『部落』四週挖有很深的壕溝，再修上圍牆，架上鐵絲網，四角修有炮樓，負責監視人們的一舉一動。只設一個出入口，出入都要檢查搜身，連種地也不許走遠。據僞滿總務廳長古海忠之供認：『關東軍實行所謂「匪民分離」政策，在南起寬甸、北至撫遠長達一千餘公里、廣及三十九個縣（旗）以及熱河沿長城一帶的廣大地區劃分「無住地帶」和「集團部落」地帶，把五百萬以上農民趕入「集團部落」。「集團部落」的點數達一萬四千個。』關東軍統治下的每一個『集團部落』都有一部血淚史。

假手關東憲兵隊和僞滿政權的軍、警、憲、特，在東北實行白色恐怖。他們嚴密監視東北人民的一言一行，人民稍有不慎，如説一句『我是中國人』，便被扣上思想犯、政治犯的帽子；喫一口大米，就成爲『經濟犯』，遭到逮捕和嚴刑拷打，許多人被迫害致死。一九四〇年到一九四五年，僅被當作『經濟犯』遭受慘害的就有八十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人，被冠之以其他五花八門的罪名而遭集體屠殺或秘密處死的人就更不計其數了。爲了『管理』這衆多的『犯人』，關東軍在東北各地遍設監獄和『矯正院』，任意處置中國人。

進行滅絶人性的細菌戰試驗。早在本世紀二十年代，日本國内法西斯分子就提出用細菌武器征服中國、蘇聯的設想。關東軍是把這一設想變爲現實的積極實施者。『九·一八』事變後不久，日本陸軍省和參謀部就決定由細菌戰爭的積極鼓吹者、細菌武器研製的中心人物之一石井四郎在東北建立細菌戰實驗所。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一九三六年間，根據天皇裕仁的密令，關東軍建立了兩支秘密細菌部隊：由石井主持的『關東軍防疫給水部』，後改爲『第七三一部隊』；由若松主持的『關東軍獸疫預防部』，後改爲『第一〇〇部隊』。這兩個邪惡的魔窟，公然不講國際公法，在東北研製和使用細菌武器，大量殘殺中國人民，其手段之殘忍，行爲之野蠻，真是令人髮指。

利用『協和會』從精神上奴役和統治中國人民。協和會名義上與僞滿洲政府是『二位一體』，實際上由關東軍直接操縱，成立于一九三二年七月。它與僞滿政府的關係，正如僞滿國務院總務廳長阪谷希一所比喻的：『將滿洲國比做一件衣服，政府是面，協和會是裏，相結合而成一件袂衣。』協和會是日本『建國精神』的『思想的、教化的、政治的實踐組織』；是一支屠殺與掠奪的別動隊；是日本民族離間政策的實施者；是一個名副其實的法西斯黨，其所犯下的滔天罪行絲毫不遜于揮動大刀的關東憲兵隊。

支持滿鐵、滿炭、滿業、滿鹽等機構，在東北進行瘋狂的經濟掠奪。東北幅員遼闊，資源豐富。爲了把東北變成日本進一步侵略中國的軍事基地和戰爭資源供應地，關東軍不遺餘力地指揮着上述種種機構或指使僞滿政權，瘋狂地掠奪東北的工業資源和農業資源。從一九三二年至一九四四年，日本從東北掠走煤二萬二千三百多萬噸，生鐵一千一百多萬噸，鋼五百八十多萬噸。一

九四〇～一九四四年，關東軍用武力從農民手中搶走的糧食達三千六百六十多萬噸，其中一千一百三十萬噸運回日本，五百多萬噸供給關東軍。東北的民族工商業、農業遭到了毀滅性的打擊。與此同時，關東軍爲了達到永佔東北的目的，制訂了從一九三七年到一九五七年二十年內向東北移民一百萬户、五百萬人的龐大計劃。到一九四三年，日本移民達到四萬零七百七十一户，二十四萬多人，侵佔土地一百五十二萬一千一百公頃，約佔當時全東北土地的十分之一，三十萬東北農民的土地被剝奪，不得不流離失所。

關東軍還誘騙東北人民種植鴉片，鼓勵人們吸食鴉片。鴉片產量逐年上升，僅熱河種煙老區一九三六年一年就達八百一十五萬兩。無數中國人飽受鴉片之苦，僅一九三八年一年，東北就有十四萬多人因鴉片中毒而身亡。

瘋狂擄掠勞工，以實現其更大規模的經濟掠奪。『九·一八』事變之後，關東軍即專門成立了管理勞工的部門，並在天津和北平設置騙招關內勞工的公司。據不完全統計，一九三一年到一九四三年間，從關內騙招到東北的勞工即達八百五十七萬一千三百二十九人。除騙招外，關東軍還採取攤派、强征、抓捕等手段，搜刮勞力，以滿足其越來越龐大的經濟掠奪需要。這些勞工被騙到施工單位之後，受盡了人間的苦難，無數勞工含恨死去，留下了許多屍骨累累的『萬人坑』。據僞滿交通大臣供認，在東北地區爲日寇殘害致死的中國勞工，不下二百萬人。

通過僞滿政權的資政弘法處（後廢除，改設弘報處），和關東軍司令部內的報道部和調查部，壟斷東北的文化宣傳事業，宣傳殖民思想文化，摧殘中國的民族文化，推行殖民地奴化教育；利

用封建意識和宗教迷信，摧毁中國人的民族意識。如假借溥儀之口胡説什麼滿洲不是始源于清始祖，而是同日本一樣始于『天照大神』，即『滿洲』是日本的一部分。爲了加强明證，關東軍讓溥儀第二次『訪日』，捧回『建國神』供奉在長春，令僞滿大臣們天天『行禮』，以示尊重。總之，在關東軍的眼裏，中國人只能成爲日本『順民』。

關東軍對東北人民統治的十四年，東北變成了一座暗無天日的人間地獄。人性的光輝在關東軍身上見不到一絲一毫，所體現的只是獸性、獸性……。下面，我們僅從關東軍在東北犯下的千萬條罪行中採錄幾條，讓人們窺見一下關東軍對中國人民的暴虐行徑。

被驅趕前來『照相』的三千鎮民遭到的是一個多小時的瘋狂射殺

一九三二年九月十五日晚十一時，以梁竭夫爲首的遼寧民衆抗日自衛軍約一千二百人，路經平頂山攻打撫順。在平頂山燒了配給店，然後奔向東崗、老虎台等地，半途打死楊柏堡炭所礦長渡邊寬一，夜襲時打死關東軍自衛團長平島善長和勞務系佐彌作等七八個日本人，並燒了楊伯堡炭所的六所倉庫、機械工廠等地，夜半三時方才撤出。回經平頂山時又帶走了老虎台大把頭、漢奸鄭輔臣的白麵。當日本憲兵分遣隊隊長步川一郎得知這一消息後，立即通知了尚在瀋陽的關東軍撫順守備隊長川上精一。川上精一聞訊後大怒，認爲皇軍的尊嚴受到踐踏，遂決定進行報復。

九月十六日凌晨五點，川上精一趕回撫順。之後，率領日本憲兵隊和守備隊二百餘人，坐着汽車撲向平頂山，包圍了這個約有八百多間房子、四百多户居民、三千多人（大多數是礦工和小

販）的大鎮。隨後挨門挨户地把人們叫出來，説是要給大家照相。滿腹疑慮的鎮民在明晃晃的刺刀逼迫下，磨磨蹭蹭地向鎮南面的窪地上走去，有些纏足的老太太和病殘人，因爲走得更慢，就被打倒在地拖着走，或被當場刺死。

下午一點多鐘，全村三千多人集合到這個西有斷崖陡壁、北有鐵絲網的草地上。驚魂未定的人們發現在東面有幾個帶支架、蒙着紅布的東西正對着他們。『難道這些東西就是給我們照相用的相機？』正當善良的人們還在對這些蒙着紅布的東西東猜西想的時候，這些紅布被猛地掀掉了，『是機槍！』人們愣住了。隨即，槍響了，一連串無情的紅光向他們射來。一場野蠻的大屠殺開始了。頃刻之間，血肉横飛，婦哭孺叫，一排一排的人倒在血泊之中，有些人看情形不好，便想衝出去，可没跑幾步，就被機槍掃射在地。一個多小時之後，槍聲終于停止了，只留下遍地的屍體、成河的血水。正當劊子手們決定上車撤走之時，有人發現成堆的屍體中還有人在蠕動、呻吟，便又折回來，端起刺刀對傷而未死的人補上幾刀，他們用刺刀挑起嬰兒甩出老遠，用刺刀劃破孕婦的肚子……終于，死寂無聲了。這一次有計劃大屠殺的結果，三千多人慘死在日軍的槍口下，僅有幾個人死裏逃生。這就是震驚中外的平頂山大慘案。

第二天，爲了毁滅罪證，他們採取種種措施、嚴防事情泄露出去。時任僞撫順縣公署務科長的林喜岳供認道：

『爲了消滅痕迹，日本守備隊用三十二桶汽油，把屍體都燒掉了，並崩下半壁土山，掩蓋痕迹。同時，以守備隊的名義，命令夏縣長，盡速在栗子溝和東西兩個千金堡的廢墟上作成假

房子。之後，把那些假房子都拍了照片，企圖表明這三個地方並未遭受過破壞；另一方面，守備隊長川上精一親自到扶順縣署借五萬元錢送給當時在瀋陽的國聯調查團的新聞記者，要他們不要把平頂山的事登報。另外，依川上精一當時的意見，是要把礦區附近的二十幾個堡子完全毀掉，怕以後再同抗日軍有什麼勾結。這個計劃最後沒有實現』。

不僅如此，關東軍以後又抓來許多勞工在這裏鋪設鐵道，用電車拉來沙子，把燒後村鎮廢墟上的瓦礫掩埋起來。同時密佈特務，佈告全縣，不准收留平頂山跑出來的人。留者即是通匪，全家處死。

幸存者之一方樹榮回憶道：平頂山大慘案『第二天，我到大房子（工人單身宿舍）裏，就被煤礦工人藏起來了。當時我滿身是血，好幾處傷口，如今我的脖子、胳膊、腰部等處還有八處傷痕。事後鬼子還出佈告：「不准收留平頂山的人，誰要收留就把誰處死」。我姥姥得知我的下落後，才把我接到家裏。爲了避免別人懷疑我是平頂山的人，只好把姓改爲我姥姥的姓，姓方。』

平頂山大慘案，是關東軍在大規模鎮壓東北抗日軍的軍事『討伐』中濫殺無辜，所造成衆多慘案中最大的一件。事實上，關東軍正是希望通過這種對抗日軍隊及與之有聯繫的人或地區居民的殘酷『討伐』，來達到撲滅抗日火焰、穩定統治局面的目的。一九三二年，關東軍出動四萬多人對『東邊道』（即現在的通化、延邊地區）進行三次軍事大掃蕩。一九三三年以後，關東軍侵佔熱河計劃完成，轉而對抗日武裝力量進行更大規模的武力圍剿。推行的口號是『滿洲國內治安第一主義』。在全東北『一齊討伐』。這年年初，關東軍糾集僞軍，在臨江、通化、輯安、莊河等

地區和，岫岩、莊河、鳳凰城『三角地帶』，反復進行圍剿。據僞滿治安部編印的《滿洲國警察史》記載，到一九三三年三月底，就屠殺了我抗日武裝人員八千七百二十八人。一九三五年到一九三六年，被迫把伸向華北的爪子收回東北的關東軍更變本加厲地實行『冬季肅正』，對全東北『一齊討伐』。到一九三六年三月底，殺害我抗日人員五千九百九十九人，打傷五千四百三十一人。但並未達到消滅東北抗日武裝的地步，特別是『東邊道』地區楊靖宇將軍領導的抗日聯軍，依然十分活躍。一九三六年，關東軍司令部炮製《治安肅正三年計劃大綱》。這是一個以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聯軍爲主要目標，並且首先在抗聯活動頻繁的東邊道地區付諸實施的三年之內消滅一切抗日力量的計劃。這次運動，關東軍採取中國人打中國人的辦法，以僞軍爲主力，配合以當地的日僞軍警，輪番在東邊道掃蕩，使當地居民遭受極大災難。造成了柳河縣白家堡子慘案，共屠殺手無寸鐵的農民四百餘人，最後用九個大坑掩埋了事。『七七』事變之後，抗聯的活動更加活躍，給侵略者以沉重打擊。關東軍司令植田謙吉、參謀長東條英機制訂了大規模的討伐計劃。在這次從一九三七年十一月至一九三九年三月的大討伐中，許多抗聯的將士，如夏雲階、李泰、柴士榮、景樂章，等，都壯烈犧牲了。一九三九年，北部邦雄中佐炮製了一個爲期一年的大規模追擊抗日聯軍的討伐計劃，爲關東軍、僞滿總務廳和治安部所批准。方法：利用冬季降雪期預告確定目標，在積雪上尋找抗聯的足迹；一旦發現足迹，或山寨中發現炊煙，即全面包圍，一舉殲滅；或不容喘息地進行追擊，迫使其疲勞飢餓，最後投降。爲此，組成了以關東軍六六九部隊長野少將爲首的三省討伐司令部、游擊隊、特殊工作隊，參加的軍警憲特達七萬五千餘人。他們在

圍剿中步步爲營，蓖梳山林，使抗聯遭到很大損失，陷入極端困難境地。楊靖宇將軍就在這次殘酷的圍剿中壯烈犧牲。這次圍剿還給這一帶以百萬計的中國人民帶來了空前浩劫。據僞奉天省警務廳廳長兼地方保安局局長三宅秀一九五四年供認：『從一九三九到一九四〇年，對「東邊道」進行了歷時兩年的討伐，逮捕中國人二萬餘。討伐部隊對中國人民的生命和財產造成了莫大的損失。』僞滿後期，關東軍在熱河地區的軍事『討伐』愈來愈烈。一九四一年在西南地區防衛司令部司令大村少將的建議下，制訂了《西南地區肅正工作實施要綱》。在實施這個軍事追擊和政治迫害相結合的計劃過程中，殺害居民一千五百多人，逮捕一萬多人，其中投獄四千多人，處死一千八百多人，燒燬民房二千六百餘家。

關東軍發神經『歸屯併户』，帶來萬户蕭疏鬼唱歌的慘劇

在進行軍事『討伐』同時，關東軍還採取了一系列所謂『治本』措施。『集團部落』就是其中最主要的一項。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三日，關東軍指使僞滿洲國頒佈《關于建設集團部落》的通令。所謂『集團部落』，就是不惜使用各種暴力手段，强迫分散居住的農民群衆到指定的地點，組成由日僞軍直接控制下的大村落。農民稱之爲『歸大屯』，俗稱『人圈』。關東軍此舉的目的，是切斷人民群衆與抗日武裝的聯繫及其對抗日聯軍的物質支援。同時通過這個『集團』嚴格監視人民群衆，防止抗日武裝力量的擴大。關東軍知道，東北抗日武裝之所以撲而不滅，就是因爲抗日武裝與人民緊

密聯繫在一起，互相依存。只有掐斷這二者之間的聯繫，才能熄滅抗日火焰。一九三五年，關東軍建立所謂『集團部落』的步伐大大加快。是年，根據僞奉天省、安東省的《東邊道復興計劃》，開始在這二個省實行歸屯併户。與此同時，僞吉林、濱江和三江各省也開始實施這一計劃。到年底，『集團部落』已達一千一百七十三個。一九三六年，根據關東軍指使僞滿當局制訂的《治安肅正三年計劃》，建成三千二百六十一個『部落』。到一九三九年底，『集團部落』共達一萬三千四百五十一個。

關東軍和僞滿當局歸屯併户和製造『集團部落』的過程，也就是其大發淫威，製造駭人聽聞的法西斯慘案的過程。

他們强迫小村莊的人民離開生息繁衍的故土，搬到指定的部落内居住。把原來的小村莊燒光、殺光和搶光，造成一片死寂的無人區。就這樣，在白山黑水之間，原本是樹木葱葱、炊煙四起的土地上，樹木被砍光，莊稼被糟踏，千萬個村莊化爲灰燼，一片凄涼景象！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六年，僅通化縣即因歸屯併户損失民房一萬四千間，放棄耕地三十三萬畝。一九三九年，日僞軍闖入哈綏綫大掃蕩，僞松江省撫遠縣有六千户被燒，方正、依蘭各地被燒光、殺光，形成一片荒涼的無人區。僞松江省、牡丹江省及佳木斯一帶，六十萬户居民房屋全部被毁。

鏡頭之一：一九三五年八月二十七日，關東軍五十多人闖入吉林省柳河五道溝區永善村，强令這個共有一百一十三户、七百三十多人，擁有耕地六千四百多畝、牛馬三百八十多頭的小村莊的農民，立即搬家，已熟的莊稼也不許收割。人們哀求着士兵發發善心，不要讓他們離開故土。

可是蠻横的關東軍根本不理。他們放火燒燬房屋三百九十八間，當場燒死二人，搶走糧食七百四十石，牛馬五十多頭，並抓走二十多人，企圖迫使人們搬走。但永善村的人們仍不願拋離家園。惱羞成怒的關東軍又抓走七人，拉到縣城西門外槍殺了。望着親人們流血的屍體，永善村的人絶望了，他們意識到鬼子已有毀滅他們的決心，于是不得不扶老攜幼地搬入『集團部落』，仍有一些不願住『大屯子』的人，便流落他鄉。原本人聲鼎沸、笑語喧嘩的永善村變成了荒無人煙的焦土。

鏡頭之二：一九三七年春的一天，天剛放亮，三十多個關東軍闖進黑龍江省湯的縣劉盛屯。見到有燈光的房子就開槍，打死農民劉奎昌的妻子和女兒。隨即挨家挨户地把人們敲起來。天亮後，日軍把全屯四十多户農民趕到場上，强令他們併入太平川屯『部落』。屯民們在這裏生活了幾十年，加上春耕又剛開始，根本不願意搬家。日軍强迫所有的人都跪在地上，用棍亂打一氣，一時間哭聲、喊聲、哀求聲四起。農民劉其昌的妻子剛生下孩子，身體虛弱，根本經不起毒打，没過兩天就死了，嬰兒没有奶喫，不久也餓死了。與此同時，爲了斷了人們的念頭，一部分日兵又去屯裏燒房子。眼看着自己這僅有的一點財産也要被燒掉，心急如焚的人們想去搶點東西出來，但隨即被雨點般的木棒子打了回來。就這樣，全村的房屋、家具、農具、糧食均被燒光。一無所有的農民被趕入了『部落』。劉盛屯被毁了。

搬入『部落』的人們也没有逃脱悲慘的命運。

每個集團部落容納的群衆爲三五十户，多者百餘户。日僞在集團部落週圍挖深溝，築高牆，

修碉堡、攔鐵絲網，部落內設僞警察署或派出所，駐有日僞軍或所謂的『自衛團』，嚴密監視人民的行動。人們一旦進了這種部落，就等于進了一座森嚴壁壘的法西斯集中營，不僅喪失了一切民主權利，而且基本生活絲毫沒有保障，常常陷入飢寒交迫、疾病纏身的境地。

鏡頭之一：太平川屯『集團部落』。內有憲兵一百人，警察二十人，一個能拘留六十人的拘留所。部落內實行保甲制度，一家犯『法』，九家連坐；規定三五個人不准結伴走路、談話；夜間不得插門、點燈，以便日僞軍隨時搜查；這樣，無數婦女被强姦、輪姦；警察特務兩天查一次户口，三天查一次夜，來客得報告，經過准許方能留宿，如果未經批准便留宿，一旦查出，便以『通匪』、『思想不良』罪加以逮捕。部落內，不管男女，十二歲以上的人出入『部落』必須帶證明書，接受搜身檢查、登記。早晚不許出入『部落』。關東軍憲兵、警察、特務是這裏的主宰。他們任意燒殺搶掠，無惡不作。僅一九三六年十月，該部落內以所謂『通匪』名義就逮捕了一百多人，不僅被關了三天三夜，而且遭受毒打。韓貴被砍了頭，韓賢被打成殘廢。對待抗日愛國志士，手段更爲毒辣，老虎凳、棍棒打、火鈎燙、灌辣椒水，等等。僅有案可查被他們的磨致死的愛國志士就有三十二人。

鏡頭之二：『部落』內人民過着牛馬不如的生活。由于糧食被毀，種地也不准離部落太遠，致使大片土地荒蕪，糧食奇缺。常常以挖野菜、剝樹皮來充飢。據敵僞材料自證，僅通化縣一九三六年末就有飢民一萬三千餘名。輯安（集安）縣除縣城以外有半數以上的農民過着『日無食、寢無被』的生活。『由于生活窮困而縊死者日有所聞』。住的房子更是破陋不堪。如通化縣的『集

團部落』裏住房大都是用樹皮、稻草等物臨時搭建起來的，牆壁有許多窟窿，根本遮擋不住東北那刺骨的風雪。據統計，當時該縣『集團部落』中有三千零二十一户居民家中無炕蓆，冬天有八千八百六十三人無棉衣禦寒。另外，『部落』裏勞役繁重。日僞强迫十五歲至二十歲的青年都要服勞役，或修警備路、或修飛機場，等，每年每户還要服勞役三十多天。如太平川屯『部落』有五百多人被强征到鶴崗煤礦和佳木斯兵營服苦役，李坤等數十人累死在礦上。

在『集團部落』裏，凍死、餓死、病死和被殺死的人數多得驚人。以撫順縣爲例，一九三七年，全縣因上述原因死亡的人佔全縣人口的百分之三十以上。

由于『集團部落』内人多，居住條件又極差，使得傳染病肆意蔓延。據僞滿警察部門調查，一九三六年『集團部落』傳染病的情況是：『通化縣的傳染病患者數爲一千一百三十二人，其中死亡一百五十三人；金川縣爲一千五百零八人，死亡一百三十七人；柳河縣爲四千三百八十五人，死亡三百零五人。傳染病的蔓延地區闗不止于上述各縣』。

整個東北因歸屯併户而受到非人待遇的人達五百萬人，佔全東北當時總人口的十分之一。

經濟犯·思想犯·大檢舉·矯正院·監獄……

在關東軍統治東北的十四年過程中，無情的屠殺與暴行，不僅發生在廣大的山區農村，而且也見于大大小小的城鎮、礦區。

一九三三年九月十日，僞滿政權公佈《懲治叛徒法》，同年十月公佈《出版法》，剝奪了人民的

言論、集會、結社、出版自由。一九四一、一九四三、一九四四年又分別頒佈《治安維持法》、《思想矯正法》、《時局特別刑法》，規定了各種罪名，諸如反對帝室罪、內亂罪、危害國交罪、軍機保護法罪、治安維持法罪、以及思想犯、經濟犯、國事犯、嫌疑犯、等等，共五十多種。一旦被抓住，便要給予極端嚴酷的處罰。根據這些『法律』，憲兵警察恣意橫行。

實證一：一九三九年，烏拉嘎金礦一個姓王的青年，因喫豆餅渣，肚脹拉稀數日，混身無力，實在沒力下礦，被日本監工發現，便衝到宿舍，不分青紅皂白，舉起鎯頭就打，王被打得心頭火起，就伸手擋了一下。哪知道這一下，就惹來了滔天大禍。當場被扣上『反滿抗日罪』被抓到警備隊，喂了狼狗。

實證二：十六歲的青年礦工劉麥來，在井下作業時被砸傷胸部，吐血、發燒，奄奄一息。鄰居見他年紀小小，病得實在可憐，便悄悄送來一小碗大米。還沒等把飯入口，便被前來查看的日本監工發現。他一邊大罵劉是『經濟犯』，一面舉起鎬頭亂打，原本虛弱不堪的劉麥來哪裏經受得起，慘叫幾聲，口吐鮮血而亡。

關東軍在農村對抗日武裝進行軍事『討伐』的同時，在城鎮利用『大檢舉』來迫害、殘殺抗日愛國人士和無辜百姓。後來，這種『大檢舉』也擴大到鄉村。規模較大的有一九三四年春哈爾濱『大檢舉』、一九三六年『四一五大檢舉』、一九三七年夏全東北『大檢舉』、一九四〇年北滿地區『大檢舉』、一九四二年巴彥、木蘭、東興等縣『大檢舉』，等。到一九四三年公佈的《思想矯正法》中乾脆規定，每年二月一日至四月一日、十月一日至十二月一日舉行兩次『大檢舉』。頻

繁殘酷的『大檢舉』使得無數同胞慘遭殺害。一九三六年僅在瀋陽因『檢舉』被捕殺的愛國志士和居民就有一萬九千六百二十三人。至于那些死于酷刑或未經審判便被處死以及被罰苦役折磨致死的人根本無法統計。

鐵證之一：安東救國會慘案。一九三五年九月中旬，駐通化的關東憲兵隊，突然以僞安東省立通化師範學校校長參加了天津組織的以教育者爲中心的抗日救國會爲名，將該校長和全部中國教師逮捕，後來擴大到小學校長、教員和其他人士，最後波及僞安東全省，連僞安東視學官、教育廳長等都沒有放過。在整個僞安東省；特別是文教界造成了一種極端恐怖的氣氛。在因受株連而被逮捕的八十多人中，除部分判處有期徒刑、無期徒刑外，其餘二十餘人全被處死：有的被投入渾江、有的被活埋、喂狼狗，也有的被槍決。當時的見證者之一、在女師任教的邢佐相在回憶安東教育局長鄧之杰被捕、慘遭殺害的情形時說：

『九月二十九日凌晨三點，日本憲兵幾十人團團圍住鄧之杰的住宅，虎狼一般的日本憲兵，破門而入，槍口直逼鄧的胸口，大肆翻箱倒櫃，從三點搜到六點，一無所獲，便把他綁走了。鄧之杰在被捕的當天就受到刑訊。日本憲兵用皮鞭打，接着灌涼水，隨後灌煤油。打得他遍體鱗傷，死去活來，昏厥數次。可是他閉目不語，憲失隊長氣急敗壞，便把他懸空吊起來，這位無辜者就這樣被活活吊死。死後屍體被丟到連山喂了狼狗。』

鐵證之二：三肇慘案。哈爾濱附近的三肇地區，曾經是抗日武裝比較活躍的地區，因而被關東軍恨之入骨，經常到這裏『圍剿』。一九四〇年十二月，關東軍伙同僞滿政權在哈爾濱設立了

所謂『治安工作指導部』，大搞白色恐怖達四個月之久。在四撮房、敖木台、黑窩舖射殺我抗日人員一百三十多人，在肇源縣西門外，一次集體槍殺和平居民四十二人。更令人不敢相信的是，日僞軍在肇源三江口將十九名無辜百姓用鐵絲穿在一起，投入冰窟凍死。這一次慘案的結果，據僞滿洲國司法部刑事局局長兼思想科科長木杉原一策一九五四年供認：『在被捕的人員中，徐澤民等七十二人被處死，一百零三人被判處無期徒刑，其中三十七人被轉到哈爾濱後殺害。』

一九四三年九月十八日，已在太平洋戰場上呈現出敗勢的日本軍隊，前途黯淡無光，爲了作垂死的掙扎，關東軍決定加緊對東北的法西斯統治，授意僞滿政府頒佈《保安矯正法》和《思想矯正法》。這樣，日本軍警只需加上個『有犯罪危險』的桌子，就可以隨意把一個人抓走，投入所謂『矯正院』中，接受『精神訓練』，並輔之以沉重的勞役。

日僞憲警捕人的方法大致有二種：一是『個別索出』。即日僞警憲根據自己的判斷，隨意逮捕任何『形迹可疑』的人；二是所謂『一齊索出』，即『抓浮浪』。這一般是經『刑事矯正委員會』事先策劃，由警憲派出所或關東憲兵隊執行的。如一九四三年四月，佳木斯市警察派出所在該市區、南北市場及中央大街把人圍起來，或者把街道兩頭堵起來，把『不順眼』者抓到檢察廳，再送到矯正輔導院。一九四三年奉天，四月二十七日『抓浮浪』三千五百七十六人，五月四日逮捕三百二十六人，六月二十二日抓到三千五百人。統統扣上『游民』帽子，送到矯正院。

所謂矯正院也是一個暴力野蠻的場所。以鶴崗矯正輔導院爲例。它成立于一九四四年五月，當時關押『游民』二百零一人，年底便增至六百人，後來又加到一千二百多人。院長和輔導官都

是關東軍派來的人。他們身上佩着槍支和戰刀。被關押的人，穿着黃色或紫色的號衣，帶着沉重的腳鐐。進行『精神訓練』與『矯正思想』的方法是：繁重的勞動、鐵骨鞭、老虎凳、火爐、棍棒等。矯正院的生活條件極端艱苦，『因衛生設備之不完全及防疫措施不足，以致罹惡疫而引起之死亡不幸事件甚多』。通化的某一矯正院，死亡率高達百分之四十。

關東軍統治下的東北，可以說就是一座大監獄，而在這所大監獄之中設立的許多惡貫滿盈的小監獄，更是一座座煉人爐。據僞滿洲國司法部司法矯正總局局長中井久二一九五四年供認，他當時『掌握本監九十九個，分監八十五個，代作監所約二十個，後來逐年增加。……我在司法部任職四年中，管理全滿監獄、關押抗日志士和中國人民總數每年約有十萬至二十萬。』實際上，數目遠遠大于中井久二的供目。據不完全統計，一九三四年，僅遼寧一省就有五十所，以後又陸續興建了許多。

在監獄這個公開的法西斯場所裏，各種各樣日本憲兵們能想出來的酷刑都被用在中國人的身上：烙刑、凍冰棍、烤刑、壓槓子、灌煤油、臘燒、開水澆、滾釘籠、坐老虎凳、刀劈、刀鍘、活埋、絞死、喂狼狗、開膛破肚，等等。

據哈爾濱副監獄長阿部源三郎供認：『我在一九四二年到哈爾濱分監任職。那裏監禁着九百多人，以後由警察、憲兵和鐵路警護團送來的犯人，一年就有一千人左右。中井久二曾下過爲了防止暴動和逃跑，必須嚴加警戒的命令，我曾督促部下防止事故，給犯人全部帶下腳鐐，發現細小的犯規行爲就踢、打和動用各種刑具，對閑談的人要打、對吵鬧的人要帶手銬。……一九四四

年就殺害了四百多人。』隨着日本的日益走向末日，監獄的判處手段大大簡化，使人民不僅輕易被捕，而且輕易被判刑。如關東軍監獄管理者爲審訊方便，在監獄裏開設『治安庭』。日本人坐在桌前，『犯人』排成隊坐在地上，日本人説判誰什麼刑，就判什麼刑，根本無需法律依據。判死刑的當場被拉出砍頭或槍斃。一九四二年，承德監獄就開了五次『治安庭』，在屠殺場一水泉溝砍了三百多人的頭。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一次就砍了七百多人的頭。屍體被扔在九個殺人坑裏。

總之，在監獄和矯正院裏慘遭關東軍殺害的中國人民與在其他場所被屠殺的中國人民的人數一樣，是無法統計的。關東軍統治下的關東大地，無論是農村還是城鎮，都是一片令人發悸的白色恐怖。

細菌實驗：『六十里地國境綫』裏釀造的人間罪惡

第七三一部隊，名爲『關東軍防疫給水部』，實際上是日本培植的一支世界上最大規模的細菌戰部隊。最初，日本人想方設法掩蓋它的性質，謊稱爲『石井部隊』、『另茂部隊』、『奈良部隊』。細菌試驗廠廠址在拉濱綫上的背蔭河車站附近。一九三六年初，這支部隊移駐哈爾濱以南二十公里的平房地區，改稱『東鄉部隊』。一九四一年蘇德戰爭爆發後，改稱第七三一部隊。

從一九三六年至一九三九年，七三一部隊在平房地區建成一龐大的軍用市鎮，其中設有許多辦公室和試驗室、秘密監獄、專用飛機及機場、焚屍爐等。部隊佔地三十多平方公里。就在這座殺人工廠主體工程『四方樓』竣工之時，三千多名中國勞工被秘密處死，以防泄密。

部隊四週警備非常森嚴。以該部隊爲中心，八公里半徑以內，是特別軍事用地。週圍幾十時内村莊的居民，受到嚴密監視，不得踏入禁區半步，一經發現就會被處死。飛機不得在其上空飛行，火車經過時，在前一站就得放下窗簾，任何人不得窺視。人們把這塊充滿神秘與恐怖的地方叫做『六十里地國境綫』。

原關東軍總司令官山田乙三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在伯力軍事法庭上供認，這支部隊的任務是大量培養致命性細菌，爲細菌戰作準備，矛頭針對中國、蘇聯和蒙古，也包括美、英兩國。

七三一部隊創始人和主要領導人是細菌戰鼓吹者、試驗者、日本軍醫中將石井四郎。石井四郎原是日本京都帝國大學的學生，後投效于日本陸軍。他奉命回京都帝大研究病理學和細菌學。一九二八年任東京軍醫院軍醫。不久被派往德國研究細菌武器。回國後就成爲細菌戰的積極鼓吹者。在他看來，用微生物製造細菌武器，既省錢、殺傷力又大，是未來戰爭的可靠武器。他的這些謬論，得到陸軍部支持，在陸軍軍醫學校建立了罪惡的『石井細菌研究室』。『九·一八』事變後，石井的實驗室進入實驗階段，需要大量『活體』實驗。一九三三年，經軍部批准，石井來到東北，在關東軍的領導下，建立了細菌實驗所，開始了石井在東北的罪惡歷程。

在石井的領導下，七三一部隊下設八個部：第一部從事鼠疫、霍亂、壞疽、炭疽熱、傷寒、副傷寒、結核、破傷風等細菌的研究和培養，並用活人進行實驗。第二部負責野外細菌武器試驗，製造鋼筆式、手杖式細菌放射器和石井式陶瓷細菌炸彈，並培育與繁殖供散佈鼠疫用的寄生蟲。爲此，第二部轄有專門的航空隊和建立在安達站附近的靶場。老一輩的東北人都還記得，一

九四五年春天，關東軍以五六九部隊的名義，强迫群衆捕田鼠三十萬隻。許多學校的學生不得不停止上課，終日在野外捕捉田鼠。正當天真的孩子們在田野上歡笑着捉田鼠的時候，他們哪裏知道這些田鼠是用來培養鼠疫菌苗殺他們的！第三部設在哈爾濱市内，進行表面的給水和防疫工作，暗地裏製造『石井式飛機彈』的特種細菌彈殼。第四部主要生産各種細菌；第五部負責訓練使用細菌武器的人員。另外，還有器材部、醫療部和總務部，外加一個直屬航空隊。

據第七三一部隊生産部長川島清和柄澤兩人于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在軍事法庭上供認，該部隊有各種細菌生産設備，在幾天裏，就可以製造和繁殖三十公斤的鼠疫苗，以一個月來計算，能培育出三百公斤的鼠疫苗，六百公斤炭疽熱菌、一千公斤霍亂菌。如果按這些數字生産下去，並全都投放的話，那人類將遭受多大的災難！

七三一部隊不僅進行着早已爲人類文明所唾棄的細菌武器的製造和研究，而且慘無人道地用活人進行試驗。他們爲了掩蓋罪行，把那些用來做活人試驗的中國抗日志士、無辜百姓、蘇聯人、蒙古人、朝鮮人，殘酷地稱爲『原木』、『木頭』，即可以任意宰割的意思。這項被關東軍司令正式批准的用活人進行實驗的方案，以令人發指的殘酷方式實施着。

在關東憲兵的正式文件中，把這種用來做細菌研究的『特別材料』（即活人），運送到細菌部隊的『運輸』，稱爲『特別運輸』。

在關東軍統治下的東北，是用不着擔心材料來源的。相反，在他們看來，這種來源是非常非常豐富的。爲此他們具體規定了這種『特別材料』的條件：所有『有親蘇反日心理』的人都要送

去消滅；被關東憲兵懷疑與『政府』有敵對行爲和情緒的人，也要送去做試驗品。這些條件是在一九四三年三月十二日關東軍憲兵隊司令部下達的『關于特別輸送』件的通報中規定的。

除了關東憲兵隊幹這種勾當外，關東軍情報部也同樣負有這項使命。他們把其負責管理外國人集中營（即『保護院』），主要關押蒙古戰俘或蘇軍戰俘）中那些不順從者，視爲極端危險分子，『特別輸送』到七三一部隊或一〇〇部隊用細菌加以殺害。

更令人驚訝的是，擁有外交招牌的日本哈爾濱領事館，竟也成了細菌戰部隊『實驗材料』的轉運站。據石井四郎的司機越貞夫揭露：『當時石井部隊每兩天去一次哈爾濱市內的日本領事館地下室，接收幾名中國人，這些中國人大都是用列車運送到哈爾濱的……』

據關東憲兵司令部的文件記載，從一九三九年起，就有『特別輸送』一事了。關東軍憲兵司令城倉少將在其第二二四號命令中明確規定：『第二批特別輸送人員約九十名……除留下六十名送到目的地外，其餘的人在哈爾濱即交付石井部隊長』。要求『哈爾濱憲兵隊長須與石井部隊長取得密切聯繫，保證哈爾濱站及以後途中竭力防止外國偵探，並採取必要監督辦法。』

凡是『特別輸送』的『犯人』，都按關東軍司令部頒發的特別命令，帶上手銬腳鐐，由關東憲兵隊用特別囚車或專用汽車押送到各細菌部隊。沿途戒備森嚴。

據原七三一部隊細菌生產部長川島清在軍事法庭上供認：從一九四〇年到一九四五年八月，每年有五六百人被『特別輸送』到七三一部隊中去。曾在七三一部隊動力班幹過苦力的工人證實：差不多每星期六下午有一輛囚車開來，把在押人員從南門或東門押進『兵營』，只見成年累

月地往裏抓人，從没見一個能活着走出那座魔窟的人。

這些被送到七三一部隊的人，一下子就被投到秘密監獄裏，禁止使用原來的姓名，每人編上一個三位數的號碼。這些人大都没過幾天就被斷送了性命，即使那些暫時從死亡綫上掙扎過來的人，還要繼續遭受各種致命細菌的實驗，一直到死爲止。大多數犧牲者後人已無法考證他們的姓名、籍貫，只知道極少數的人名，如牡丹江的鐵路工人孫朝山、木匠吳定興、修理匠朱志猛，瀋陽的愛國青年王英、共產黨員崔德恩等等。

這些被輸送過來的人，是無一例外的在實驗完成後要加以消滅的。據原關東軍幹部部長田村在一九四五年夏天視察完七三一部隊向關東軍司令官山田乙三的報告中稱：『我前往考察，先引我到秘密監獄，裏面有許多人，都用鐐銬鎖住。石井告訴我，這些活人……都是由日本憲兵隊和作戰部送來的，都是要加以消滅的。』

在七三一部隊中，用活人進行實驗的項目極多，手段更是極其殘忍。下面僅用幾個實例加以例證：

『菌液注射實驗』，即把含有病菌的溶液注入被實驗者的靜脈，以觀察其病變過程。據該部隊一六二支隊長神原秀夫等人揭露，石井對這種實驗特別重視。石井部隊常把『原木』提出來，關一間透明的隔離室裏，往『原木』身上注射鼠疫菌液，並觀察『原木』的病變情形。數小時後這些被實驗的人淋巴腺紅腫，面部和胸部皮膚變成紫黑色，其餘部位皮膚呈現暗淡粉紅色，……死後，被投入煉人爐。

『毒氣實驗』。一名原七三一部隊成員是這樣描述某次毒氣實驗的情形：

『在一間透明的玻璃房裏，關着母女二人，小女孩只有四歲左右。就在毒氣滲入的一瞬間，小女孩突然從母親懷裏抬起腦袋，瞪着一對圓圓的大眼睛，向四週張望。母親似乎在拼命地保護孩子，讓孩子盡可能少受毒氣的殘害。然而劇烈的毒氣和很快將母女倆毒死。母親在臨死前的痙攣之中，還死命抱着孩子不肯鬆手。我拿着秒錶，一邊冷漠地觀察着這全過程，一邊做記錄……』

『真空環境實驗』。這是爲了測量在真空中人體抵抗限度的試驗。這些實驗，希特勒在歐洲也做過，被紐倫堡國際法庭認爲是希特勒匪徒所進行的最不人道、最殘酷的一種實驗。原七三一部隊一名隊員是這樣揭露的：『有一次，我看見在一個實驗室裏，關着一個青年。他赤身裸體地站在裏面，抽氣機開動後，室內逐漸變成了真空，缺氧使他難以忍受，他用雙手抓着前胸，血順着傷痕迅速流了出來。他掙扎着……十六毫米攝影機自動攝下了全部情景。』

『野外活人細菌實驗』。這些實驗通常在安達特別實驗場進行，有時也在肇東縣的滿溝、呼倫貝爾草原、東北東部的山區臨時實驗場進行。如一九四三年夏的一天，在安達特別實驗場，七三一部隊的人把受害者押入坦克和裝甲車內，用火焰噴射器噴射，以觀察達到什麼程度可以把人燒死。又如一九四三年末，在安達靶場，有十個人被並綁在相隔五公尺的柱子上。然後在距離五十公尺以外的地方，借助電流爆炸一顆開花彈，使被實驗的人在被炸傷的同時，受炭疽熱菌的傳染。不幾天，這些人全部傳染死去。

除了以上這些實驗外，還有染菌飲食實驗、凍傷治療實驗，等等。凡是接受以上各種實驗折磨的人，如經治療痊癒，還要接二連三地接受試驗，直到死亡。伯力清在法庭上供認：『爲了研究各種治療方法，對已傳染的人加以治療，給他們飯喫，等身體恢復時，又對他們作另一種試驗。無論如何，從來没有一個人活着走出這個殺人工廠的。』

『活人解剖』。石井等人不僅用大量病菌在活人身上進行實驗，還要對那些已發病而尚未死亡的人進行活體解剖。更有甚者，是把健康的人解剖後用作標本。原七三一部隊一個成員揭露了一個這樣的事實：一九四三年的一天，一個剛才還歡蹦亂跳的十二歲少年被嚴刑拷打之後送到了解剖室。幾個早已等候在那的日本軍醫，如狼似虎地撲將上去，扒光他的衣服，把他按在手術台上，緊緊扣住，然後强行消毒，注射麻醉劑。待孩子昏迷過去之後，一個日本軍醫一刀將他的腹部切開，『按腸、胰腺、肝、腎、胃的順序取出各種内臟，經一一分理，呼呼地扔進鐵桶裏，再立刻把鐵桶裏的臟器放入裝有福爾馬林的大玻璃容器裏蓋好』。『取出的内臟中，有的還在裏面不停地抽動』。隨之，又從『小孩耳朵到鼻子横着切了一刀。頭皮切開後，就用鋸子鋸，頭蓋骨被鋸成三角形掀開了。大腦露出時，一個隊員用手伸進柔軟的保護膜，把腦子取了出來，立即放進裝有福爾馬林的容器中。手術台上只留下少年的四肢和一具空殼身軀』。一個幼小的身體，就這樣慘死在日本法西斯的『手術刀』之下了。

經過上述各種滅絶人性的實驗後慘死的人，根本無法統計其確切數字。僅川島清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在伯力法庭上供認：『在本部駐在平房的五年之内，即從一九四〇年至一九四五年間，通

過這個工廠，因染受致命細菌而被消滅的至少有三千人』。實際數目有多少？根本無法想象！

武器實驗的目的的在于使用。石井四郎更是一個細菌戰實施的狂熱鼓吹者。在他的策劃之下，七三一部隊使用各種方式，對中國人民實行殘酷的細菌戰。

一九四〇年七月，石井四郎親自出馬，率領一支航空隊到華中戰區，帶着七十公斤傷寒菌和五十公斤霍亂菌，及備用的五公斤染有鼠疫菌的跳蚤，分裝在投撒器裏，在寧波、金華一帶用飛機撒播。這次秘密作戰持續了將近四個月。直到十月二十二日，石井四郎還親自指揮在寧波上空投入摻有鼠疫的麥子、棉花等物。不久，這一帶發生了鼠疫。居民死亡慘重。據一位受害人向《新華日報》投訴説：『一九四〇年下半年，我離開浙東寧波地區到金華。當時，寧波由于日機投擲鼠疫跳蚤而突然地發生了鼠疫，並很快蔓延開來。到後來，鼠疫嚴重的地區只好被封鎖，不准與外邊接觸。然而，鼠疫並未因此而撲滅，疫情四處蔓延到附近地區，醫院都鬧人滿之患，一直鬧了很久。』

一九四一年夏季，石井四郎又派人攜帶五十多公斤鼠疫菌苗到洞庭湖常德一帶我抗日部隊和農村擲撒，造成四百多人死亡。川島清對此證實道：一九四一年夏季，『有一天，第二部長太田大佐告訴我：他將前往華中，並向我道別，不久他就回來了，又告訴我，曾用飛機在華中洞庭湖附近常德一帶上空投擲大批鼠疫跳蚤……結果造成該地區鼠疫流行，使許多人患了這種菌疫。』

一九四二年七月，七三一部隊遠征軍對重慶及沿浙贛鐵路幹綫的金華、龍游、衢縣、浦江一帶進行細菌戰。造成這些地區大範圍疫病，無數人喪生。僅義烏縣崇山村三百八十多户人家中因

鼠疫而死的就有三百二十多人，全家死光的有三十多户。

更有甚者，石井還指派人到南京中國戰俘營中去，把帶有傷寒菌和副傷寒菌的大餅分給在押的三千多人喫，然後放走他們，借以傳播疫病，達到大量殺人的目的。

在七三一部隊所在地東北，細菌戰的危害更是極大。一九三七年和一九三八年，僞滿興安北省蒙古族部落裏就發生過鼠疫。一九四〇年僞興安北省三河附近發生炭疽。一九四二年，七三一部隊在吉林省農安縣把帶鼠疫菌的跳蚤撒在田間、水源地和民房區，然後將這些村莊封鎖，並放火焚燒，結果造成四五千人死亡。據調查，東北從南到北，從東到西許多地方都有被撒播細菌的迹象。因此，日本投降後，東北各地傳染病横行，不能不説與七三一這支魔鬼部隊及其他細菌戰部隊的罪惡活動有關。如一九四五年八月，長春市内傳染病横行，病死者甚多；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六年，洮南、洮安、鎮賁、開通四縣四千三百餘人染上鼠疫，一千四百餘人死亡；一九四六年，平房一帶因鼠疫死亡五六百人。一九四六年，吉林省永吉縣有一個地方，最多每天死于霍亂的就有三十人。一九四七年，齊齊哈爾、三肇地區及上述一些地區，霍亂患者高達九千餘人，死亡七千五百餘人。

多麼殘忍的事實！多麼令人難以置信的數字！可這些事實僅僅只是石井部隊犯下的大量罪行中小小的一部分。一九四五年關東軍覆滅前夕，自知難以逃脱罪責的石井四郎，命令七三一部隊把所有的犯罪證據都加以銷毁。因此後人只能根據戰犯的供詞及少得可憐的文件中窺視這個殺人工廠的全貌……

黑土地上的瘋狂大掠奪

日本侵佔東北的目的，就是想使東北成爲其擴大戰爭的戰略基地，成爲它商品輸出基地，戰爭資源、工業原料、農産品的供應基地。因此，關東軍完全統治東北的十四年，不僅是他殘酷鎮壓中國人民的十四年，也是他瘋狂掠奪資源、摧殘中國民族資本的十四年。

從『九·一八』事變起，特別是僞滿洲國建立後，關東軍千方百計地奪取東北的經濟命脈，控制東北的經濟，以便于它的掠奪。

首先壟斷交通，攫取通訊權。『九·一八』事變後，關東軍與滿鐵伙同起來，採用軍隊强佔、委托經營、僞組織接管及簽訂條約、合同等手法，奪取東北鐵路的所有權和經營權、修築權。一九三一年九月下旬，關東軍佔領瀋海鐵路的撫順站、瀋陽站。隨後，土肥原賢二、山口、第三課長竹下等人拼湊了一個『瀋海鐵路保安維持會』。漢奸丁鑒修任會長，土肥原任監事長，從而控制了瀋海鐵路的路權。同年十月十日，關東軍司令官本莊向滿鐵總裁内田提出，利用『九·一八』事變的絶好機會，通過『委托經營』的辦法，奪取東北原有一切鐵路的路權，並按照原來計劃和軍部的要求，新建一批鐵路。僞滿政權成立了，關東軍改變這種逐一奪取的辦法，轉而採用一攬子解決的方式。一九三二年三月六日，本莊司令官與溥儀簽訂密約，將已修鐵路港灣水路空路等管理與新建『委諸』日本『所指定之機關』。十日，本莊與滿鐵總裁簽訂《關于鐵路港灣河川委托經營及新設等之協定》，把僞滿的交通設施全都交由滿鐵經營。一九三三年二月九日，關東軍又

迫使僞滿與滿鐵簽署了《滿洲國鐵道借款及委托經營細目契約》等一系列條約，使得滿鐵『名正言順』地取得了除中蘇合辦的中東路以外的東北所有鐵路的經營權。一九三五年三月二十三日，日僞以一億七千萬元的代價，從蘇聯手裏取得了長達一千七百公里的中東鐵路的經營權及附屬財產。至此，東北全境的鐵路置于滿鐵的統制之下。

關東軍認爲：『把握滿洲國的通訊權，在推行我國的國策上是絕對必要的。』因此，關東軍在佔領東北全境的同時，也佔領了東北各城市的通訊設施。一九三二年七月，關東軍司令部提出《對滿洲國通訊政策》，策劃在僞滿建立電信電話公司。一九三三年三月二十六日，日本政府與僞滿政權簽訂《關于設立日滿合辦通信公司的協定》。同年九月，成立僞『滿洲電信電話股份公司。』至一九三五年三月，中東鐵路歸日滿後，該公司壟斷了東北的通訊事業。

攫取金融大權。金融機構是經濟命脈之一，關東軍在奪取路權的同時，也迫不及待地搶佔銀行。『九·一八』事變後，關東軍搶佔了東三省官銀號、邊業銀行、吉林永衡官銀號和黑龍江省官銀號（即四行號）及其他中國銀行，美其名曰：『實力保護與監視』。爲了操縱東北金融，吞併四行號，一九三二年一月中旬，以關東軍參謀長的名義，關東軍在瀋陽大和旅館召集日本金融家、實業家、學者參加的幣制與金融咨詢會議。此後制訂了《貨幣及金融制度方針要綱》等一系列方案。同年六月六日，在關東軍的授意下，僞滿政府通過了《滿洲中央銀行法》等法令。並于六月十五日公佈了僞滿中央銀行的主要頭目，還先後設立僞中央銀行及其總、支、分行共計一百二十個，四行號撤銷，日本人就此壟斷了金融市場。

此外，關東軍對于作爲國家經濟門户的海關也同樣没有放過。一九三二年六月二十六日，關東軍首先奪取了佔整個東北海關收入的三分之一的大連海關。此後四天内，關東軍連續將濱江、營口、安東、琿春、延吉五個海關控制在手。一九三三年一月，關東軍取得了全東北海關的控制權。與此同時，關東軍還以各種借口强佔工廠和礦山。至一九三二年九月，關東軍佔領了奉天紡紗廠和復州、八道壕、孫家灣、尾明山各煤礦，取得了東北及内蒙計三十八處地方重要礦産的開採權。

在對我國東北實現武裝佔領之後，怎樣才能使東北的經濟變爲日本經濟的附庸，並實行統治政策，爲其侵略戰爭服務，是關東軍『九·一八』事變之後面臨的一個重大課題。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八日，關東軍第三課提出了所謂《滿蒙開發方策案》。要點是：『（一）要確保平戰兩時的軍需資源；（二）滿蒙開發要爲日本經濟發展作出貢獻；（三）所需資本，除日本和土著資本外，還要利用外國資本；（四）開發滿蒙政策，要實行日滿一體的經濟計劃；（五）現在的商業組織，雖要逐漸近代化，但目前要尊重原來的商業慣例和交易機構。』

爲此，關東軍司令部指示剛成立的關東軍統治部（後改爲特務部），具體加以落實方案。制訂具體計劃；並要求滿鐵進行協助。一九三二年一月，滿鐵設立滿鐵經濟調查會。在關東軍統治部與滿鐵經濟調查會通力配合下，經過一年多的精心策劃，于一九三三年三月一日炮製出了《滿洲國經濟建設綱要》，交僞滿政府公開發表。

在這個充滿了美麗詞句的《綱要》裏，猙獰面目也露得很明顯。如明確宣稱『對重要經濟部

門，要進行國家統制』；『特別要密切與日本國的互相扶助和協調關係』，即使東北成爲日本的經濟附庸。對于『經濟統制』方式，《綱要》規定『要進行經濟調查』，『以經濟計劃進行統制』；『對國防、公共和公益的重要事業，以官公營或特殊公司經營之』；『除上述以外的經濟事項，要在法律的統制下，由民間自由經營之』；『但爲了國民的福利和維持生計，對生產消費要進行調節。』

在這個綱要指導下，關東軍又伙同陸軍省及滿鐵經調會制訂了兩個瘋狂掠奪資源的『產業五的計劃』（第一個是在一九三六年，第二個是在一九四一年）。就這樣，根據這些掠奪、編制方針、計劃，關東軍協助、支持、指揮僞滿政權、滿鐵、滿業等一大批特殊公司，不僅掌握了東北的經濟命脈，對東北人民進行敲骨吸髓的强制搜刮，而且對東北的工業資源、農業資源進行了一場無耻的、公開的、瘋狂的大搶奪，東北的民族工業、農業遭到了極大的破壞，東北逐步成爲日本的經濟附庸。在本章前所列舉的一些數字已足以表明日本對東北經濟的摧殘程度。

在關東軍刺刀下淋腥沐血的死亡工程

爲了滿足日本對東北的貪婪，每年需要大量的勞動力。可東北的勞動力遠遠不夠，怎麼辦？向華北、華中等地區，奪！在這場擄掠勞工的大慘劇中，關東這不僅扮演了主要擄掠者的角色，每年採用各種途徑强抓二百萬以上勞工（一九四一年以後）到東北，接受各種慘無人道的奴役，而且把其中四分之一的人擄在自己的刺刀下，用勞工們血淚以至生命壘起一座座『死亡工程』。

日本一直把蘇聯作爲假想敵。『九・一八』事變後，關東軍加緊準備進攻蘇聯。一九三三年，東京參謀本部作戰課長鈴木率道等人視察了『滿』蘇邊境後，決定要在重要地點設置國防陣地工事。爲此關東軍把同蘇聯國境接近的北滿和東滿所謂『北邊地區』，規定爲三綫部署的、綜合性的大軍事基地地區。根據石原莞爾和僞滿產業部長岸信介的策劃，這三綫爲：第一綫爲軍事工事和軍用道路。第二綫爲軍事基地和特殊道路。第三綫爲日本開拓團的基地和移民道路，與第二綫作犬牙交錯的配置。爲促使這一目標實施，關東軍假借僞滿政權的名義，于一九三七年制訂一項所謂三年『北邊振興計劃』，納入僞滿政權的三大國策之一。在此之前，第一綫方面的各種軍事工程已于一九三九年秘密完成，現在需要的是加緊建設第二、第三綫工程，以不耽誤一九四三年進攻蘇聯的預計。因此，關東軍決定從一九三九年起，用三年的時間完成這些工程。

就這樣，他們每年從東北和關內各地抓來幾十萬勞工，由關東軍工兵部隊直接指揮，在極其惡劣的條件下實施强制性的勞動。勞工們進了這些基地，就等于走進了地獄一般。

據《呼瑪縣誌》記載：當時僅參加修築從呼瑪經過樺皮窰通往黑河的軍用公路的，就有幾千名勞工。這些勞工喫在工地，睡在工地，完全與世隔絕。在工地上，勞工們的死活根本没有人管；患病了，無醫無藥，只有在呻吟中死去；死了，就往山谷一扔；有些還未死的，也一樣一扔了事。爲了防範勞工們受不了虐待逃跑，日本兵設置了層層哨卡，嚴密監視。尤其惡毒的是，當一些工程完成之後，日本當局竟殺人滅口，將勞工統統殺掉。如在漠河縣栖林集修軍事秘密陣地的勞工和在呼瑪縣河南屯修盤旋地道及軍事暗堡的勞工，都隨着工程的竣工而從地球上消失了。

據《愛琿縣誌》記載，在關東軍佔領期間，曾從關內和南滿抓來大批勞工，在神武屯、山神府、納金口子等地，修築永久性軍事工程，還在金水、山神府修了兩處軍用機場。勞工們食不飽肚、衣不遮體，還要一天幹十幾個小時的活。凍、餓、極度地疲勞，使得大批勞工死在工地上。就是那些好不容易熬到工程完工，以爲可以返回家園的勞工，也被關東軍以怕泄露機密爲由，全部槍殺或毒死。

據《台安縣誌》記載，一九四一年，關東軍從台安縣強征勞工一千三百七十二人，到軍事工程中去服苦役，被折磨致殘、致死的有八百多人。一九四二年被抓去的一千六百多人中，又死去七百多人。

據不完全統計，僅關東軍修築完七項軍事工程之後，就有近三萬中國勞工被秘密殺害。

一項工程完成之後的集體屠殺現象並不僅見于『北邊地方』軍事工程，關內、關外的許多日本軍事工程都是如此。一九四二年，關東軍在哈爾濱近郊修建了一個面積爲五平方公里的飛機倉庫，參加這一工程的勞工，在工程完工後大部分被活埋。一九四四年，關東軍在內蒙古烏蘭浩特附近的興安嶺『築城工程』完工後，將從各地征去的五千多名勞工全部殺害……

第八章

向俄國人挑戰

此伏彼起的滿蒙邊界衝突

前文述及，一九〇五年日俄戰爭後，日本一直將俄國列爲第一假想敵。『滿洲國』建立後，爲加强對蘇戰備，日本迅速地加强關東軍的作戰能力，使之很快成爲日本陸軍中最大的戰鬥單位。面對關東軍對遠東地區的威脅，蘇聯政府也不斷地增加駐遠東兵力，並于一九三六年三月以關東軍爲假想敵，舉行了一次規模空前的軍事演習。

日蘇兩軍沿滿蒙邊界對峙，氣氛緊張，戰爭大有一觸而發之勢。

在海拉爾西南約二百公里處，有個貝爾湖，水源豐富。僞滿洲國和外蒙古都認爲湖北岸的哈爾哈廟地方是本國的領土。

一九三五年一月八日，外蒙古騎兵數十名進入哈爾哈廟附近。爲擊退他們，關東軍騎兵部隊從海拉爾出動，一月二十八日未經交火就佔領了哈爾哈廟。

以此事件爲契機，同年六月一日在滿洲里召開了滿蒙邊境會議。可就在滿洲里會議召開後不久的六月二十三日，兩名關東軍測量隊員在浩爾斯丁河流域被外蒙古兵抓走。關于事件發生的地

點，僞滿洲國和外蒙古都説是自己的領土。七月四日，在滿洲里會議上，僞滿洲國代表向外蒙古代表提出解决浩爾斯丁河事件的要求。其要點：要求外蒙古方面懲處肇事者，承認滿洲國代表常駐外蒙古。而且提出，如果不答應上述要求，滿洲國將迫使塔木斯克——斯梅一綫以東的外蒙古軍隊撤走。這實際帶有最後通牒的性質。

七月六日，蘇聯駐日大使對此向日本外相廣田提出抗議：『與其説是滿洲國官憲，勿寧説是關東軍正在外蒙古挑起事端，甚至强硬地提出最後通牒性質的要求。可以認爲，這具有製造糾紛的傾向。例如關東軍在七月四日提出的要求，可以推測這是爲日滿軍佔領塔木斯克——梅斯地方製造借口。蘇聯政府從防衛自己國境的立場出發，對于外蒙古領土之不可侵犯表示關心。相信日本政府爲了維持滿蒙國境的和平與秩序，能夠對關東軍給予適當的指令。』

蘇聯方面如此迅速地作出反應，這表明僞滿洲國以强硬態度提出的要求對蘇聯是一個極大的刺激。由于外蒙古没有接受僞滿洲國的要求，結果滿洲里會議于八月二十六日休會。

此後，邊境衝突事件接連不斷。據統計，一九三五年發生了一百三十六次，而一九三六年則發生了二百零三次。

一九三五年發生的楊木林子事件是雙方首次交火。這天，由十一名關東軍官兵組成的偵察隊在東部邊境楊木林子附近巡邏時，與蘇聯國境警備兵發生衝突，打死蘇軍士兵一人，繳獲軍馬一匹。同年十月份，關東軍同蘇聯騎兵部隊再次交火，雙方互有傷亡。

一九三六年二月十二日，關東軍的一個騎兵中隊同外蒙古軍隊在貝爾湖西南奧拉霍德卡附近

的邊境綫上進行交戰。三月二十九日至四月一日間的衝突規模則較大。關東軍的一個步兵中隊，一個機槍中隊和一個坦克中隊同外蒙古部隊（約三百名騎兵，十二輛裝甲車，三門炮）在達烏蘭地區展開了激戰，結果，關東軍戰死十三名。

針對關東軍不斷地騷擾邊境，一九三六年三月十二日，蘇聯和外蒙古修訂了爲期十年的蘇蒙互助條約。其中第二條規定：『如果發生締約國某一方受到武力攻擊時，則另一方要予以包括軍事援助在内的一切援助。』實質上，這個條約不過是規定了蘇聯對外蒙古的單方面援助，而所謂軍事援助，可以理解爲包括有向外蒙古出兵的權力。不久，蘇聯就向外蒙古派出軍隊。

蘇聯政府爲了應付西面的德國，對日本採取了軟弱態度。一九三六年三月，蘇聯方面提議成立邊境糾紛處理委員會和邊界劃定委員會。通過確定雙方邊界來消除邊境糾紛。但到了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日德兩國公佈締結防共協定後蘇聯政府改變了原來的態度，不理睬邊境問題了。同時，參加第三次滿洲里會議的外蒙古代表也回到外蒙古。這樣，日蘇間的空氣急劇緊張，日蘇對立到了一觸即發的地步。終于在一九三七年六月爆發了千岔子島事件。

千岔子島（俄國叫申奴哈島），位于愛琿東南約一百公里的地方，是黑龍江上游的一個島嶼。再往上，還有一個金阿穆河島（俄國叫大島），中蘇兩國船舶過去一直航行于這兩個島嶼北側河道，即靠蘇聯一邊的河道。關于這兩個島嶼的歸屬問題，僞滿洲國根據國際法，主張以主航道的中心綫爲兩國的邊境綫，因而認爲這兩個島嶼是僞滿領土。而蘇聯則根據《北京條約》，認爲這兩個島嶼已劃歸俄國，因此是蘇聯領土。

一九三七年六月十九日清晨，二十名蘇聯國境警備隊士兵登上千岔子島。同一天，四十名國境警備隊士兵也登上了金阿穆河島。六月二十三日，十幾艘蘇聯炮艇也開到這兩個島嶼附近。

鑒于這種情況，日軍參謀本部下達指示：『純屬滿洲國之領土，爲蘇軍非法佔領，其後果不堪設想，故必採取適當措施，以保持原狀爲妥。』六月二十四日，關東軍司令官植田謙吉大將根據這個指示，命令駐紮北滿的第一師團進入戰備狀態。第一師團長河村恭輔中將把部隊部署在黑龍江沿岸，主要兵力有步兵、炮兵各一個大隊，工兵一個中隊，準備行使武力。

這時，蘇軍也調動了三個步兵師，集結在河對岸。于是兩軍形成對峙。就在日蘇可能爆發大規模戰鬥的時候，參謀本部認爲，對這樣一個地處偏遠的小島，不值得傾注國力，于是採取了不擴大方針，決定委托外務方面談判解決，同時令關東軍停止反擊。蘇聯政府也接受日本政府的建議，同意恢復該島原狀，撤回集結在發生事件地區附近的部隊。

但是，關東軍不滿意參謀本部的這一消極態度。三十日，竟獨斷專行地擅自向經過千岔子島附近蘇聯炮艇開炮，擊沉一艘、傷一艘。七月五日，蘇聯從這兩個島嶼上撤走了它的部隊和炮艇。蘇聯撤退的原因據說與國內的清洗有關。正是在這個時候，屠哈切夫斯基等八名蘇軍高級將領被捕。

但在關東軍中，卻產生了另一種想法。他們以爲蘇聯之所以同意恢復原狀，是因爲日軍擊沉了蘇聯炮艇。這種看法後來又有所發展，認爲如果出現邊境糾紛，只要給蘇軍一點顏色，蘇軍就會乖乖地退回去。後來竟發展到這種程度，以致于認爲通過外交途徑總不如使用武力解決收效

快。從這個意義上説，千岔子島事件給關東軍帶來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它直接影響到關東軍在後來發生的張鼓峰事件和諾門坎事件上的所做所爲。

蘇軍出現在張鼓峰上

張鼓峰位于圖們江口上游二十多公里的東岸，是一個海拔只有一百五十米左右的高地。站在山頂上，可以清楚地看到蘇聯波謝特平原。沙草峰是位于張鼓峰北方二公里多的一個隆起山峰，其高度略低于張鼓峰。張鼓峰事件就是日蘇雙方軍隊圍繞着這兩個山峰，進行決死戰鬥的事件。由于在兩個高地東側有一個哈桑湖，因而，蘇聯方面將張鼓峰事件叫做『哈桑湖附近的戰鬥』。

僞滿洲國建立後，和蘇聯就這兩個高地的歸屬問題發生了爭論。僞滿洲國認爲邊境綫在張鼓峰東側，因此張鼓峰屬于僞滿洲國領土，而蘇聯方面則堅持主張邊境綫是通過張鼓峰山項的。

由于琿春縣靠近朝鮮，日本陸軍當局將保衛該縣的任務交給朝鮮駐軍。然而，朝鮮駐軍司令部從一九三六年三月起採取了『不向邊界不明確的地區派遣兵力』的方針，没有向張鼓峰、沙草峰地區派遣一兵一卒。而蘇軍也没有向張鼓峰山頂派遣兵力。

一九三八年六月十三日，蘇聯内務人民委員部遠東地區長官、三等政治大將留希科夫由于怕遭到肅反，從第五十九國境警備隊管轄的正面地區逃到琿春。留希科夫的出逃，使蘇聯方面認爲是蘇聯遠東地區邊防上的漏洞，決定重新部署邊防工作。

七月九日，十幾名蘇聯士兵出現在張鼓峰山頂上，並在山頂西側山坡上開始構築陣地。到七

月十一日，蘇軍人數已達到四十名左右。

對此，大本營陸軍部的反應是複雜的。當時，日本的侵略戰爭已進入長期消耗戰階段，陸軍正在集中兵力進行漢口會戰。因此，對在這裏同蘇聯打一場真正的戰爭，多持批判態度。朝鮮軍司令官小磯國昭大將也向大本營提出如下方針：即使蘇聯侵犯邊境一事已一目了然，鑒于正處于進行漢口戰役這一重要時期，作爲我軍，首先要弄清形勢，顧全大局，要求當地駐軍立即撤出戰鬥。大本營可以説基本上同意這一方針。但以作戰科長稻田正純中佐爲首的少壯派參謀，即主張進行一次有限的戰爭，以挽回面子。與此同時，通過有限戰爭，以弄清蘇聯是否有介入日中戰爭的意圖。關東軍在此之前已派參謀人員去現場，確認蘇軍越境後，立即通知大本營和朝鮮軍，並且要求在這一事件發生後動用武力，態度非常強硬。

大本營在日益高漲的積極論的背景下，大部分主張採取有限戰爭的方針。七月十六日命令朝鮮駐軍司令官中村孝太郎中將『根據形勢需要，可在邊境附近集中朝鮮駐軍所屬部隊，但行使武力要根據另外下達的命令。』

朝鮮駐軍司令官立即命令第十九師團長尾高龜藏中將做好隨時緊急派兵的準備，動員的部隊大致有步兵四個中隊，山炮炮兵兩個大隊，野戰重炮炮兵一個大隊。第二天，朝鮮駐軍司令官又對第十九師團長下達命令，要把準備出動的部隊集中在圖們江西岸地區，並嚴令，如果向圖們江東岸地區（張鼓峰和沙草峰一側）前進和行使武力，必須按另外下達的命令，不得擅自行動。第十九師團出動部隊于十九日拂曉在慶興、阿吾地區集中完畢。

但是，由于外務省和海軍方面的反對，天皇不同意對蘇軍進行一場真正的戰爭。這樣，參謀本部不得不停止進攻和解除動員。朝鮮駐軍司令官根據大本營的指示，命令在圖們江西岸集結完畢的第十九師團部隊于七月二十八日返回原駐地。

然而，一直在等待進攻命令的現場駐軍，對這樣的命令難以接受。使問題更複雜化的是大本營的少壯參謀也不滿足這一決定。他們的態度傳到現場駐軍中去，現場駐軍遲遲不願撤回原來的防綫。終于在二十九日捲入一場真正的戰爭。

尾高師團長認爲：『必須趁此機會給蘇軍一次打擊……』

七月二十九日上午九點三十分左右，日軍發現十名蘇軍士兵在沙草峰構築陣地。尾高師團長認爲，蘇聯進兵沙草峰這一非法行徑，純屬無理挑釁，因此，必須把它作爲與蘇聯進兵張鼓峰毫無相關的獨立問題來加以處理。于是，他決心立即擊退進入沙草峰的蘇軍，後果由自己負責，從而向部分隊伍下達了攻擊命令。同時還採取了相應的措施，下令部隊不返回原駐地，並且召回了正返回原駐地的部隊。

第十九師團出擊部隊于同日下午三點擊退了蘇軍。可到下午四點三十分，八十名蘇軍又越過國境綫。結果雙方軍隊對峙入夜。

朝鮮駐軍司令官接到第十九師團的第一個戰報後，雖感到這個既成事實違背自己的意圖，但還是肯定了尾高關于這次事件應同上次蘇軍進入張鼓峰一事區別對待的意見，並再一次指令尾高

無論如何要堅持不擴大的方針，禁止在追擊時越過邊境。然而，尾高師團長本來就屬于强硬派，常爲自己没能參加侵華戰爭而抱怨不已。現在，他怎能放過這一大好機會呢？因而，他不滿意不擴大的方針，事先也不向朝鮮軍司令請示，就決定向蘇軍出擊。

七月三十日，師團長尾高認爲：『必須趁此機會給蘇軍一次打擊，使它嘗到日本軍的威力，否則難以完成切實保障邊境安全的重大任務。』決心向張鼓峰的沙草峰的蘇軍發起進攻。促使尾高下決心的基本因素就是上述千岔子事件一節中所談到的用武力解決邊界糾紛的思想。

尾高的部署是：首先拿下俯瞰沙草峰的張鼓峰，然後向沙草峰發動進攻。七月三十一日拂曉，日軍一個大隊衝上張鼓峰並將其佔領。另外一個大隊在猛烈炮火掩護下向沙草峰發起進攻，于上午六時佔領沙草峰。據參加進攻的日軍估計，蘇軍遭受的損失如下：

1．張鼓峰之戰，蘇軍傷亡估計爲二百名至三百名，炸毁坦克約十輛，繳獲武器有速射炮兩門、重機槍四挺、輕機槍六挺等。

2．沙草峰之戰，蘇軍傷亡估計爲二百名至三百名，炸毁坦克七輛。

日軍第十九師團兩個大隊共戰死四十五名，受傷一百三十五名。

出乎尾高師團長所料，蘇軍儘管在張鼓峰和沙草峰遭到打擊，但絲毫没有敗退之意，相反它更加頑强地咬住不放。蘇軍步兵反復發動進攻，企圖奪回陣地，炮兵猛烈轟擊日軍炮兵陣地。八月二日，蘇軍大批飛機轟炸日軍前綫部隊，並猛烈轟炸慶興、古邑等北朝鮮各地。但第十九師團繼續堅守在張鼓峰至沙草峰一綫。

大本營在收到第十九師團向蘇軍發動進攻的報告後，反映是矛盾的。一方面爲進攻的成功感到高興，另一方面繼續堅持不擴大方針。這是因爲如前所述，大本營内部存在着分歧，而這種方針不一致，後果卻極爲嚴重。即儘管確定了嚴令當地駐軍專事防務，問題交由外交處理的方針。而最終也未能追究尾高擅自違令的責任。因爲在事件發生後，大本營陸軍部中大多數意見認爲第十九師團的行動屬于獨立判斷，從而予以肯定或默許。相反地，把它作爲獨斷專行而予以責難的意見卻微乎其微。

張鼓峰戰鬥使尾高師團損失了百分之二十的兵力

八月四日，蘇聯國防人民委員伏羅希洛夫命令蘇聯遠東軍第三十九軍軍長希特侖加緊進行作戰準備，無論如何也要奪回張鼓峰。

八月六日，蘇軍的第一綫部隊在炮火掩護下開始進攻。下午四時許，濃霧消散，蘇聯空軍抓住有利時機，反復轟炸張鼓峰和沙草峰。據蘇方公佈的史料，當時蘇聯出動TB_3型重轟炸機超過二百架次。

夜幕降臨，蘇步兵第四十師和一支部隊佔領了張鼓峰山頂。日軍經過夜襲又從山頂趕走了幾乎所有蘇軍。

尾高師團長命令第一綫部隊，實行專守防禦。專守防禦一詞，是當時日本陸軍的軍事用語，就是固守一地。它不同于攻勢防御（決戰防御），攻勢防御是指見機轉入攻勢，逼迫敵人進行決

戰，所以，執行專守防御的日軍，在蘇軍猛烈炮火的襲擊下，傷亡很大。

八月七日，蘇軍步兵第四十師對五十二高地發動猛烈轟擊，到中午攻佔了該高地與張鼓峰之間的日軍據點。同時，一部分蘇軍在炮兵掩護下，進攻張鼓峰，但沒有攻佔。

八月八日清晨，蘇軍炮兵猛轟張鼓峰山頂上的日軍陣地，然後，步兵在坦克掩護下發動進攻，但没有成功。中午時，蘇軍的又一次衝鋒也失敗了。

八月九日，大批蘇軍在黎明前和日落時，兩次攻擊張鼓峰，雖給日軍造成很大傷亡。但仍没有攻下。

八月十日，蘇聯炮兵整天猛轟張鼓峰山頂上的日軍陣地。入夜，一部分蘇軍突破了日軍陣地一角。

鑒于日軍損失慘重，日方向蘇軍提出了停戰建議。蘇聯方面儘管反攻獲得進展，但還是接受了談判。八月十日夜晚，雙方就有關停戰規定達成協議。蘇聯方面鑒于傷亡劇增，後勤補給出現困難等原因，在談判的最後階段，乾脆收回了它最初『日軍須由八月十日晚十二時的控制綫後撤一公里』的主張，目的是儘快停戰。

十一日下午，雙方召開了第一次現場停戰談判會議。第二天召開了第二次會議，十三日又開了第三次會議。八月十三日晚，在張鼓峰東南部山邊，雙方交換了屍體。

在此期間，八月十二日，朝鮮駐軍司令官根據大本營陸軍部的指示，命令張鼓峰、沙草峰方面的第十九師團在適當時機將其部隊集中在圖們江西岸。八月十四日，第十九師團在指定地區集

中完畢。

日軍撤後不久，蘇軍就在日軍原來死守的地區修築起野戰工事。可以說，張鼓峰事件是以日軍事實上的失敗而告結束。

這樣，因一個師團長的獨斷專行引起的這場戰鬥，不僅沒有取得任何戰果，而且使尾高師團損失了百分之二十的兵力（作廢總數爲一千四百四十名，其中死五百二十六名）。事後絲毫沒有追究尾高的責任，也沒有追究積極主戰的少壯派參謀的責任。結果，戰敗就是戰敗，沒有得出一個正確的認識，甚至對蘇聯遠東軍强大的戰鬥力，特別是其物質力量，也沒有做出正確的判斷。

對此種結果强烈不滿的是擔任蘇滿邊境防務，對邊界爭端採取積極態度的關東軍領導層。由于大本營特別是參謀本部作戰指導思想上的不一致，致使一個小小的邊界戰爭也打敗了。因此，增大了關東軍對中央的不信任感。張鼓峰一帶于事件後，交由關東軍管轄，一部分人主張利用這個機會，把蘇軍趕到日本認定的國境綫以外去。參謀本部考慮到日華戰爭的發展，主張盡量不要染指邊界糾紛，而關東軍則堅持在發生邊界糾紛時，在局部範圍内給蘇軍以致命打擊。由此可以說，張鼓峰事件已爲以後的諾門坎事件準備好了條件。

以强硬態度對待諾門坎事件

張鼓峰事件發生後的第二年（一九三九年）四月，根據關東軍司令官植田謙吉大將指示制定的『滿蘇邊界糾紛處理要綱』，典型地表示出關東軍對邊界衝突的强硬態度。這個要綱的中心點

是國境問題，要根據日本的單方面主張進行處理。它充分顯示出關東軍的基本性格。此文較長，在此僅歸納出其主要內容：

1.『我不犯人，也不准人犯我』。這就是關東軍對待邊境綫的基本立場。如果要突襲並殲滅越境蘇軍（包括外蒙古軍），則可以『暫時進入蘇聯境內』。

2.在邊境綫不明確的地區，各地防衛司令官可以『按自己判斷劃定邊境綫』，並要明確告訴前綫部隊。

3.一旦發生糾紛，要求前綫部隊採取堅決果敢的行動，至于對由此而產生的事態進行處理和收拾局面，要『信賴上級司令部』。

從以上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貫串這個要綱的基本精神，就是用武力解決糾紛的思想。這種思想，是千岔子島事件一直延續下來的，不過，想要動用武力的勁頭，現在比過去更大了。我們也可以看出，制定這個要綱的人完全沒有吸取張鼓峰事件的教訓，他有强烈的自命不凡的精神，認爲精銳的關東軍不同于朝鮮軍。

雖然這個『要綱』與在張鼓峰撤軍時參謀本部制定的方針是根本對立的，但參謀本部接到關東軍司令部這個報告後，未採取任何對策。不僅如此，作戰部一部分參謀認爲這一處置得當，表示贊賞。雖然這只是個人表態。結果，不但邊境地區守備軍司令官有責任自己確定國境綫，而且可以說還有責任恢復日本方面一貫主張的國境綫。如果在日本方面主張的國境綫以內有蘇軍，當地司令官就可以『爲奇襲殲滅之，可暫時引誘其滯留在滿洲領土以內。』這樣一來，只要當地軍

隊忠實地執行軍司令部的命令，或者蘇聯方面不做出讓步，不可避免地遲早會在邊境上發生一場大的衝突。諾門坎事件的第一份報告，傳到關東軍司令部，就是在這個『要綱』下達後不到二十天的時候。

僞滿洲國叫諾門坎的地區，是指海拉爾南約二百公里的地方，即從汗達蓋——將軍廟——阿穆古朗一綫到哈拉哈河的地區。在蘇聯的地圖上，哈拉哈河叫哈勒欣河，蘇聯之所以把諾門坎事件叫做哈勒欣河的戰鬥，就是起名于這條河的。

僞滿洲國和外蒙古在此存在領土爭端。僞滿洲國方面主張，諾門坎方面雙方的邊境綫是在哈拉哈河一綫上。而外蒙方面則主張，哈拉哈河是他們的領河，雙方邊境綫是通過哈拉哈河東側和北側。因而，關東軍和外蒙古軍隊經常在這一地區發生衝突。

發生『諾門坎事件』的第一份報告，是一九三九年五月十三日下午送到關東軍司令部的。駐海拉爾的關東軍第二十三師團長小松原道太郎中將的電報說：『約七百名外蒙古士兵于十二日晨，在諾門坎地區涉過哈拉哈河侵入滿洲國境，與滿洲軍之一部交火。由于其後方似乎有增援部隊，已令師團所部之一部和滿軍將其殲滅。』交火是在十二日還是十一日說法不一。關東軍特別是當時的關東軍作戰參謀服部卓四郎中佐和辻政信少佐等人，堅持說是在十二日，而蘇聯方面卻說是十一日。關于外蒙古軍隊是否越境問題，在關東軍和蘇聯方面也存在着分歧。當時關東軍主張國境以哈拉哈河爲界。這一主張似乎没有明確根據，許多地圖上標的是蘇聯主張的哈拉哈河以東一綫爲界。因而，毫無疑問，第二十三師團把渡過哈拉哈河看作是非法越境，並立即發起大規

模進攻是固守『國境爭端處理要綱』的結果。因爲在要綱下達前三四個月，外蒙古士兵越過哈拉哈河時，關東軍多不予理睬。

那麽，前綫的具體情況又是怎樣呢？

一九三九年五月十一日，數十名外蒙騎兵過哈拉哈河進入諾門坎西南約十五公里的地方。僞滿洲國警備隊立即把他們趕到西岸。第二天即十二日，約六十名外蒙騎兵再次進入東岸，並同僞滿洲國警備隊交火。

五月十三日，駐海拉爾的第二十三師團司令部正召開聯席會議，向各部隊傳達『滿蘇邊境糾紛處理要綱』。這時，從諾門坎送來了首批報告。師團長小松原道太郎中將是諾門坎方面的防衛司令官，決心殲滅越境的外蒙部隊，當即下令部隊出動。出動的部隊主要是師團搜索隊（騎兵中隊，重裝甲車中隊各一個）和一個步兵大隊（缺兩個中隊）。

奉命出動的部隊，于五月十五日，在一個輕轟炸機中隊的配合下，把外蒙部隊趕到哈拉哈河西岸。爾後，于五月十七日返回海拉爾。當時，第二十三師團以爲事件至此結束，不會擴大。但與第二十三師團的估計相反，第二十三師團出動部隊撤回後，外蒙古警備隊再次進入哈拉哈河東岸。帶有蘇軍標志的飛機也開始在發生糾紛的地區上空飛行。

面對此種情況，五月二十一日，第二十三師團重新下令部隊出動，由步兵聯隊長指揮。人數約二千名，聯隊所屬炮二門，速射炮四門。這支部隊于五月二十八日凌晨向哈拉哈河東岸發動進攻。日本方面把以步兵爲中心的主力配置在蘇蒙軍正面，派東騎兵聯隊迂回到敵人側面進攻，以

斷其退路。但是蘇軍的坦克、炮兵的進攻異常猛烈，使日軍主力陷于困境，特別是派去進攻蘇軍側背的東騎兵聯隊反被切斷退路，被坦克包圍殲滅。東騎兵聯隊士兵或倒在一起，或橫卧在燒燬的汽車上活活被燒死，其慘狀令人目不忍睹。小松原道太郎爲增援前綫，又派了三個炮兵中隊上去，但無濟于事，終難挽回敗局。小松迫不得已命令部隊撤退。五月三十一日，日軍狼狽地逃離戰場。

據蘇聯戰史記載，同第二十三師團交戰的部隊，除外蒙第六騎兵師外，還有蘇軍第十一坦克旅所屬的步槍機槍營，以及步兵第三十六師的部分兵力。

第一次諾門坎事件以日軍的失敗而告終，但關東軍認爲是『勝負各半』。由于真實情况連參謀本部也未能及時報告，以致參謀次長在三十日還打祝捷的電報。不難想象在這種事態下，小松師團長的心情。這種心情又成了導致第二次諾門坎事件的直接原因。另一方面，關東軍司令部表面上看來比較平靜，認爲基本上要採取不擴大的方針，可以作爲衆多邊界爭端的一個加以解決。但在内心裏，驕横一世的關東軍怎能服氣呢？這種不服氣不久就在第二次諾門坎事件中，以强硬的方式爆發出來，把那些主張慎重的人給一氣吹散了

關東軍參謀稀裏糊塗地翻着老皇曆

第一次諾門坎事件後，蘇聯遠東軍第五十七特別軍長由朱可夫擔任。軍司令部設在哈拉哈河以西一百三十公里的塔木斯克。

朱可夫認爲僅靠現有兵力很難阻止日軍的行動，因此向蘇國防人民委員部提出要增加兵力。他要求增加的兵力是航空部隊、三個以上的步兵師、一個坦克旅以及炮兵部隊等。六月八日，紅軍參謀部同意了這些要求。

六月中旬開始，西伯利亞鐵路上出現了繁忙景象。初期，幾列軍用列車爲一批，每隔一定時間持續東進。但到後來，各批列車在時間上的間隔越來越短。有時甚至由三十列軍車組成一批運行。在運送的物資中，有大批的載重汽車。

在這之前，關東軍作戰參謀還曾認爲，由于地形的關係，蘇軍在諾門坎地區將無法使用大量兵力。按當時日本陸軍的兵站常識，使用大兵團時，陸地兵站綫的長度一般不超過二百至二百五十公里。因此，在離鐵路綫七百五十公里的諾門坎地區，使用大量兵力的可能性不大。不過，這一兵站常識的前提是用大板車那樣的工具運送軍事物資，如果改用載重汽車，情况就不同了。然而關東軍作戰參謀卻仍然稀時糊塗地把『二百到二百五十公里』作爲標準。做出上述判斷。做出錯誤的判斷意味着要付出慘重的代價。

基于這樣的敵情分析，五月底，關東軍確定了作戰方針：『對于越境的敵人，作用空、地兩方面的機動力量，分期分批地給予嚴厲打擊，並防止陷于長期對峙的局面。』這種以進攻和機動爲中心的作戰方針，基本思想是對蘇軍在戰場上的兵力估計過低，輕視蘇軍的作戰能力，而又過高地估計了日軍的作戰能力。

六月十九日，關東軍司令部又接到小松原的電報。電報內容是：（一）蘇軍在諾門坎不斷增

兵，十八日把滿洲國軍驅逐出去；（二）敵機轟炸溫泉一帶和甘吉爾廟，造成損失。而且師團長從防衛責任上，建議主動給以嚴懲。關東軍司令部接到電報後，當天就改變了作戰方針，即『突擊殲滅越境蘇蒙軍，徹底粉碎其侵略野心。』二十日，命令向諾門坎方向調集兵力。調集的兵力有補充後的第二十三師團全部，有第一坦克團和第七師團的一部組成的安岡支隊，還有配屬的第二飛行集團。這是力量爭端中沒有先例的大規模調集兵力，其方針是不惜與蘇軍展開正面衝突，態度非常强硬。同時，它也表明，關東軍司令官開始親自指揮作戰了。

關東軍這一方針的確定，可以說經過了不少的挫折。關東軍的大部分作戰參謀考慮到日本正陷于侵華戰爭的泥沼和在天津租界問題上與英國的談判，主張與蘇妥協。但是，辻政信少佐和服部卓四郎則力排衆議，主張强硬對敵。結果，關東軍司令官植田謙吉大將和參謀長磯谷中將同意了這一意見。植田謙吉爲給蘇軍一次徹底的打擊，最初決定由精鋭的第七師團擔任主力，後考慮到第二十三師團有對蘇軍作戰的經驗，又改爲由第二十三師團擔當主力。

對關東軍的這一方針，陸軍總部表示同意。然而，當陸軍總部聽到關東軍有轟炸外蒙古境內目標的計劃時，立即打電報表示反對，隨後又派作戰班長有末次中佐去滿洲，企圖説服放棄轟炸計劃。但在有末趕到的六月二十七日那天早上，關東軍已對外蒙境內的塔木斯克進行了轟炸。這樣，第二次諾門坎事件終于演變成大規模的戰爭。

越境進攻，打響了唯一一場像樣的戰爭

爲確保日軍對蘇軍作戰的制空權，關東軍司令部決定轟炸外蒙境內的蘇空軍基地塔木斯克。六月二十一日，第二飛行集團把他的主力（共七十八架飛機）部署在海拉爾方面，把其餘兵力部署在白阿綫方面，完成了首次部署。六月二十三日，關東軍司令部向第二飛行集團下達進攻命令。要求它尋找良好戰機迅速轟炸塔木斯克等地。

六月二十七日，日空軍第二飛行集團一百一十九架飛機，出其不意地襲擊了塔木斯克地區的機場群。據日軍的報告，這次襲擊共擊落蘇軍飛機約一百架，擊毀約四十架。毫無疑問，日方的數字有些擴大。因爲據當時日軍的偵察，蘇軍在塔木斯克的機場群共有飛機一百一十六架。由于戰後蘇軍史書中没有提到這次轟炸，可以推測，蘇方受到的損失比較嚴重。

關東軍對蘇軍空襲後不久，關東軍又渡過哈拉哈河，向蘇蒙軍發動地面進攻。

六月二十五日，關東軍司令官植田謙吉大將命令第二十三師團長，儘快發動地面攻勢殲滅蘇蒙軍。到六月二十六日，參戰的安岡支隊（第一坦克師團主力）在阿爾山附近集結完畢，第二十三師（第七師團的一個步兵聯隊已配屬給該師團）也在將軍廟方面集結完畢。根據關東軍司令官命令，安岡支隊受第二十三師團指揮。由于日軍掌握了制空權，第二十三師團和安岡支隊認爲可以放心大膽地渡過哈拉哈河，衝入左岸的敵人陣隊，一舉殲滅蘇蒙軍。

七月二日夜間，第十三師團主力部隊按預定計劃到達哈拉哈河左岸，並佔領了由外蒙第六騎

兵師守衛的巴因·查岡高地。但在七月三日就遭到蘇軍的猛烈反擊。一百五十輛坦克和一百五十輛裝甲車配合步兵，在炮火掩護下，逐漸將日軍第二十三師團包圍。當天下午，關東軍司令部不得不向第二十三師團下達了停止進攻，撤回哈拉哈河東岸的命令。第二十三師團邊打邊退。直到七月五日才撤回東岸。

安岡支隊的進攻也遭到慘敗。在哈拉哈河東岸地區，蘇軍早已佔領了戰場正面長達四五十公里的據點式陣地。在和第二十三師團主力部隊渡過哈拉哈河的同一時間，安岡支隊（約六十八輛坦克，十七輛裝甲車和兩個步兵大隊）向上述陣地的蘇軍發起進攻，但很快就被擊退四十輛坦克，而敗退下來。

七月七日夜晚，安岡支隊和從西岸撤退下來的第二十三師團的部隊一起，再次發動了進攻，但也沒有成功。面對蘇軍猛烈的炮火，日軍放棄了白天進攻的念頭。在八日、九日、十日三天反復夜襲，但仍然不能奪取分散在廣大地區的蘇軍陣地。即使奪取了部分據點，由于天一亮就遭到蘇軍猛烈而集中的炮火轟炸而損失慘重。所以，日軍不得不停止進攻，整頓部隊。

七月二十三日，第二十三師團各部隊稍作喘息後，再次發動進攻。由于炮兵無法壓制住蘇軍的炮火，衝鋒的步兵很快便損失慘重，喪失了戰鬥力。

對哈拉哈河東岸的蘇蒙軍陣地，不管關東軍採取什麼辦法，夜襲也罷，白天進攻也罷，都無濟于事，無法喫掉他。七月二十五日，關東軍司令官不得不向第二十三師團下達了『停止進攻，佔領東岸重要戰綫，並構築陣地』的命令。這樣，關東軍司令官親自指揮的這些進攻戰，以失敗

而告終。八月三日，日軍開始修築陣地，準備持久戰。這時，在戰場上的日軍有十三個步兵大隊和三十六門大炮。損失慘重的安岡支隊退出了戰場。爲統一指揮諾門坎前綫的日軍，大本營陸軍部組建了第六軍，軍司令官爲荻州立兵中將。第六軍所轄部隊爲第二十三師團（包括臨時調配的部隊）和第八國境警備隊。

八月十二日，關東軍司令部擬訂了《諾門坎事件處理綱要》。《綱要》規定：『迅速做好準備工作，以便在嚴冬季節確保戰果，同時摧毀蘇軍戰鬥力，以期使敵人野心破滅。敵人如果企圖長期交戰，則予以徹底擊退。』

就在關東軍在做着利用嚴冬之機，再與蘇軍一戰的夢時，蘇軍在朱可失的指揮下，悄悄地完成了戰鬥準備。

朱可夫元帥排兵佈陣胸有成竹

七月十五日，蘇軍將第五十七特別軍改編爲第一集團軍。所謂集團軍，是爲了完成獨立作戰任務而臨時組織的部隊，它是由諸兵種合成的軍隊。朱可夫任第一集團司令。第一集團軍所轄部隊有步兵第三十六師、第五十七師、第八十二師和第六、第十一坦克旅、第七、第八、第九裝甲車旅，以及第二百一十二傘兵旅，再加上炮兵部隊等等。

爲統一指揮蘇蒙軍作戰，蘇軍又以貝加爾軍區爲基礎，編成了遠東集團方面軍。中央委員希特侖擔任了該方面軍司令。

在遠離鐵路的地區、進行大規模的攻勢作戰的最大問題是如何向前綫輸送和儲存軍事物資。據朱可夫回憶錄記載，爲了採取攻勢，第一集團軍需要一萬八千噸炮兵彈藥、六千五百噸空軍彈藥、一萬五千噸各種燃料和潤滑劑、四千噸糧食、七千噸燃料及四千噸其它物資。輸送這些物資需要三千五百輛載重汽車、一千四百輛油罐車。而當時只有一千七百二十四輛汽車和九百一十二輛油罐車。

朱可失認爲進攻成敗的關鍵在于突然襲擊，因此，爲了隱蔽進攻計劃，他要求部隊極其慎重行事。據朱可失在回憶錄中的記載，當時他要求部隊做到下列幾點：

1．在東岸的部隊，假裝積極構築，有計劃地散佈一些有關防御設施和準備越冬的假情報。有意識地拍發明碼電報請求調撥修築陣地用器材。在戰場附近，還故意使用器械發出釘樁子的聲音。

2．要求前綫部隊加强僞裝，並强調多利用夜間活動。對一批批開到前綫的坦克、裝甲車、大炮以及其它軍用器材採取僞裝、分散措施，蓋上用草木編成的僞裝網。部隊的移動、集結、展開，都在晚間進行。部隊在夜間移動時，還有意識地發出飛機轟鳴聲來迷惑關東軍耳目。

3．發動攻勢時，爲了一舉包抄關東軍的兩翼，在這些地區特別謹慎，設法不驚動對方。例如，向這些地區派出偵察隊時，給軍官特意穿上普通士兵服。同時，參加兩翼包抄的部隊，在發動攻勢的前天晚上進入預定地點，並且在哈拉哈河岸的草叢中隱蔽到天亮。

可以說，蘇軍的隱蔽計劃是成功的。到八月二十日，蘇軍發起進攻時，日軍仍在修築準備過

冬的工事。

在戰場上，錯誤的判斷意味着失敗。

哈拉哈河里湧流着關東軍的血污

八月二十日早晨五時四十五分，一顆顆炮彈飛向日軍陣地，一顆顆炸彈在日軍陣地上爆炸。八時四十分，蘇蒙軍分南、北、中三路向前進攻。中路部隊對正面第二十三師團陣地發起集團衝鋒，南路和北路部隊則包抄了第二十三師團的兩翼。

蘇軍的攻勢是猛烈的，也是銳利無比的。

第一天，南路蘇軍就前進了一大步。特別是第八裝甲旅，順利地迂回過了第二十三師團的南翼。

第二天，南路的第八裝甲旅協同第六坦克旅進入第二十三師團的後面地區。同時，中路繼續向日軍陣隊發動猛攻，北路到達了第二十三師團陣地北翼的弗伊高地。

第三天，蘇軍爲使弗伊高地的戰鬥獲得進展，朱可夫把軍預備隊第九裝甲旅調到北路。該旅一部迅速迂回了弗伊高地北側，進入阿布扎賚糊附近，切斷了關東軍的補給綫。

第四天，北路又調來了傘兵旅，佔領了弗伊高地的大部分。北路所屬的第九裝甲旅主力在浩爾斯丁河北岸進入第二十三師團的後面地區。

同時，南路在浩爾斯丁河南岸完全突破了第二十三師團陣地。

第五天，第二十三師團在第六軍司令官指揮下，以七個大隊步兵和九個中隊炮兵，對南路蘇軍步兵第五十七師進行反攻，企圖突圍，但遭到慘敗。

第六天，關東軍司令官又把駐在海拉爾的第七師團主力撥給第六軍，並決定駐滿洲的第二師團和第四師團開赴戰場。

第七天，第六軍司令官決定暫時停止攻擊，以待增援部隊。然而，蘇軍不給日軍以喘息之機，當天傍晚就完全包圍了日軍，並迅速收縮包圍圈。

第八天，蘇軍進一步縮小包圍圈。蘇軍優勢的炮兵、坦克和飛機，積極地投入戰鬥。當天晚上，圍在烏黑圈中的第二十三師團長，集中了一千五百名左右的兵力，企圖與圍在其它包圍圈中的日軍會合。

第九天，蘇軍繼續縮小包圍圈。整個第二十三師團完全被蘇軍坦克群包圍起來。

第十天凌晨，第二十三師團長率領的部隊終于與一部分日軍會合。但在蘇軍的强烈攻勢下，毫無作爲。山縣武光聯隊長燒掉軍旗，拔刀自刎，小松原師團長也給軍司令官寫好遺書，準備發起最後一次衝鋒，以死相拼。但軍司令官令他迅速率部隊突圍。

第十一天，日軍殘餘部隊在晚上撤退。日軍拿着手榴彈向蘇軍投去，費盡了九牛二虎之力，在付出慘重代價後，終于打開了一個缺口。

第十二天，二千來名日軍在小松原師團長的率領下終于衝出了蘇軍的包圍圈。能夠突圍出來，這已經是盡了最大的力氣，所以就根本没有餘力去收拾陣亡士兵的屍體。

蘇軍也在外蒙古所主張的邊境綫上停止前進，没有深入追擊日軍。其原因之一是蘇聯西部正面的德國軍隊很快就要開始進攻波蘭了。

諾門坎之戰，關東軍損失慘重，哈里哈河裏湧流着關東軍的血污。醫部調查，該師團在六月二十日至九月十五日之間，在參戰總人數一萬五千九百七十五名中間，損失了一萬二千二百二十名，其中戰死四千七百八十六名，受傷五千四百五十五名，失踪六百三十九名，患病一千三百四十名。這就是説，傷亡率達到百分之八十，第二十三師團被不折不扣地殲滅。而且許多指揮官戰死，僥幸活下來的也有許多怕擅自退卻，軍司令官會追究責任而畏罪自殺。師團長自己于事件後回到東京待罪，結果一病身亡。二十三師團組建剛剛一年就被殲滅，這一歷史事實具體説明了諾門坎的悲劇。由于師團長自己的强硬論引起的這一事件，由于關東軍也轉向强硬而得到擴大，終于師團自身走向進退維谷，難以自拔境地，最後遭到滅頂之災。

另外，第六軍的大炮（野炮級以上的火炮）在八月攻勢中被毀掉二十八門，自己炸毀二十門，損失率達到百分之七十二。

被打痛了的關東軍夾起了尾巴

日參謀本部面臨着决定性的失敗，即使條件多麽苛刻也決心接受，以了結這次事件衝突。八月三十日，參謀本部派次長中島鐵藏去長春説服關東軍首腦。但關東軍司令部仍堅持即使事已如此，也要在短期内集中兵力再戰。參謀次長也只好答應他們，預定九月十日向蘇軍發起進

攻。

參謀本部知道後大爲震驚，再次派中島去長春，嚴令關東軍在九月四日前，停止對蘇軍的一切進攻，把軍隊撤到有爭議的地區以外。對此，關東軍仍然要求允許他們進行一次小規模的戰鬥，打掃戰場，以收回陣亡將士的屍體，並且揚言這一請求如得不到允許，軍司令官準備辭職。

但是，參謀本部不僅沒有答應關東軍的請求，反而像追魂一樣，從六日到八日接連下達兩道命令，免去植田謙吉軍司令官及磯谷廉介參謀長、矢野音三郎副參謀長、寺田雅雄作戰科長的職務，服部卓四郎等兩位作戰參謀也被免職，副參謀以上一律退了現役。

這樣，關東軍的强硬派被一掃而光，諾門坎事件由外交談判解決。

梅津美治郎中將被任命爲關東軍司令官。梅津到任後不久，就從根本上修改了《滿蘇邊境警備要領》。修改的主要内容如下：除關東軍邊境陣地外，要在滿洲國主張的邊境綫後方二十公里地點劃定警備綫，在這個地帶内，除巡邏隊不再安排部隊，即使蘇軍越過邊境綫，只要不侵犯上述警備綫，就不准前綫部隊行使武力。結果，在梅津擔任關東軍司令官期間（一九三九年九月至一九四四年七月），一次也没有與蘇軍發生武裝衝突。

以關東軍違命和獨斷專行而引起的諾門坎事件，終于以關東軍的徹底失敗而告終。

這場戰爭不但對關東軍是唯一的一次真正的戰鬥，而且對整個日本軍隊來説，也是一場以用現代裝備武裝起來的軍隊爲對手的第一次戰鬥。

關東軍對蘇軍兵力的估計太天真了。蘇軍僅用坦克戰就打出許多新戰術使日軍無法招架。這

對于自封爲「常勝不敗」之軍的日軍來說，當然是一個沉重的打擊。

第九章

七十萬『精銳』灰飛煙滅

野心勃勃的『北邊振興計劃』

早在『九·一八』事變之後，在日本天皇裕仁的週圍，就發生了關于未來戰局如何發展的激烈爭吵。

『北進派』主張，在佔領滿洲之後，要抓緊積蓄力量，趁蘇聯第一個五年計劃尚未完成、國力不夠强大之機，早些進攻蘇聯。這樣可以確保北部後方的安全，『滿洲國』也會隨之穩定。『南進派』認爲，應該以滿洲爲立足點，抓緊時機向南發展，佔領中國海岸綫，進而控制南洋島嶼，掌握東南亞。這樣可以佔有太平洋地區的豐富資源。

爲了進一步擺脱國內經濟危機不斷加深的困境，和出于對太平洋地區資源的急切需求，『南進論』的呼聲在日本統帥部——大本營內外越來越高。天皇也較爲傾向南進。

于是，日軍製造了『七·七』事變，打響了全面侵華戰爭。

『七·七』事變之初，日本陸軍大臣曾向天皇信誓旦旦：保證兩個月結束戰事。

萬萬没有想到的是，中國這塊肥肉並不那麼容易喫。他們碰到了啃不動的硬骨頭。從一九四

○年開始，中日戰爭處于相持的膠着狀態。

就在這時，國際形勢發生了新的變化。

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法西斯德國撕毁『德蘇互不侵犯條約』，以閃電戰術向蘇聯襲擊。蘇德戰爭終于爆發。

面對國際戰局的這種突然變化，日本應該採取什麼對策呢？『南進派』與『北進派』的爭論又一次加劇。

『北進派』鼓噪說：『蘇德開戰，意味着北方蘇聯力量的削弱，應該趁機北上，配合德國攻打蘇聯，以消除隱患。』

『南進派』也不甘示弱振振有辭地反駁說：『德蘇戰爭正意味着出現了日本可從北方蘇聯的沉重壓力下脱身的最好機會，應該趁機大膽南進，以便從東南亞取得大量石油、鋼鐵、橡膠等戰爭急需物資，以建立日本能自給自足的態勢。』

形勢發展逼人，不容日本當局猶豫。于是大本營作爲最高當局作出了一個十分狡猾的決策。六月二十四日，大本營發佈了由陸海軍擬定的《帝國國策綱要》。

『綱要』對『南進』和『北進』這一關鍵問題採取了折中調和的態度，但還是更傾向于『南進』。日本侵略者準備孤注一擲，向南挺進，發動太平洋戰爭。

然而，在主要堅持『南進』的同時，他們也想不放棄『北進』，準備坐山觀虎鬥，只等德蘇戰爭進展順利，蘇聯無力招架之時，再出兵西伯利亞，摘個現成的桃子喫。

外相松岡洋右堅決反對這種做法，給『北進派』增加了希望，壯大了聲勢。他認爲，德蘇既已開戰，日本遲早是要捲進去的；如果等到德國打敗蘇聯以後再行動，外交交涉上就不好辦了。他還從國際戰局的格局變化來分析説：『現在攻打蘇聯，估計美國不會參戰。但如果先在南方動手，可能會釀成對美英的戰爭。』

然而，『南進派』堅持認爲，『北進』解決不了日本的全部生存危機，又容易碰蘇聯這個硬釘子；『南進』攻中國容易取勝，以戰養戰，再向東南亞發展。

七月二日，御前會議上終于批準通過了《帝國國策綱要》。『北進派』雖然最後受挫，但在《綱要》中畢竟也提出了『秘密做好對蘇作戰準備』的要求。而一向對蘇躍躍欲試的關東軍，也由此找到了擴展實力的合理借口。

對于和『滿洲國』毗鄰的蘇聯，關東軍一向虎視眈眈。一九三八年春天，也就是張鼓峰事件前夕，關東軍指令『滿洲國』和『滿鐵』等特殊會社一起研究擬訂對蘇戰爭的準備計劃。

四月，關東軍第四課長片倉衷率領一批參謀人員，和以僞滿總務長官星野直樹爲首的僞國務系統的白系官員和特殊會社的首腦人物共同組成了二十來人的邊境視察團。

在中蘇邊境綫上進行了一番實地勘查之後，組成視察團的各系統人員分別開會進行了研究，擬就了所謂《國境建設施策基本要綱》的草案。考慮到外交因素，對外以『北邊振興計劃』爲名發表。

關東軍如此興師動衆制定的『北邊振興計劃』以三年爲期，即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一年。實

行的地域是僞滿洲國與蘇聯相鄰的八個省，即間島（今延邊地區）、牡丹江（今牡丹江地區）、三江（今佳木斯地區）、黑河（今黑河地區）、東安（今虎林地區）、北安（今北安地區）、龍江（今齊齊哈爾地區）、興安北省（今呼倫貝爾盟）。

這個計劃在擴建國境地區的軍事設施的同時，廣泛涉及從生産開發到『民主振興』的所有領域，實際上是一個將『國防、産業、民生』結合爲一體的綜合性計劃。其目的在于提高關東軍在對蘇戰爭中的總體作戰能力。

『北邊振興計劃』的內容是十分龐大的。爲了實現這一龐大的擴軍備戰計劃，提出了十億元以上的預算。其中僞滿政府承擔二億，『滿鐵』分擔六億，另外一些特殊會社共分擔二億。

爲了實現這一計劃，『滿洲國』政府于一九三九年七月專門成立了北邊振興計劃委員會，其中包括關東軍高級參謀片倉衷。

這個委員會在表面上是計劃執行北邊地區的各種佈置，實際上卻是規定了關東軍司令部對于僞中央政權享有特殊的權利。

關東軍乘機把北邊地區的一切行政機關抓在手裏，任意發號施令，準備進攻蘇聯的措施。

北邊地區原來實行的是以中國人爲長日本人爲次的傀儡體制。關東軍爲了方便控制，直接由日本人擔任地方長官，以便與當地日軍密切聯繫建立起日本人『軍政一致』的體制。

關東軍還在有關各省設置防衛委員會，以當地駐軍參謀長爲委員長，以省、滿鐵、特殊公司和協和會的『一流人物』爲委員，在關東軍當地駐軍直接指揮下完成有關戰備設施。

在『北邊振興計劃』的規劃下，各地開始大興土木：

以富錦爲中心，沿小興安嶺東側、松花江南岸修築了異常堅固的國境陣地，分甲乙丙地區，碉堡成群，還有炮兵掩體；

在黑河以孫吳爲中心，在山神廟、雙橋修築了大批的兵營和堅固的坑道，更利用山地地形，在山洞中修建軍用倉庫，儲存各種武器，甚至還修了規模宏大的山洞汽車庫和飛機庫；

各縣都增修了兵營和軍用道路，這些道路十分寬闊平坦，能并行兩排汽車；

總之，邊境八個省密佈了各種軍用設施和通向各地的軍用公路。

東起琿春，北至漠河，這一段長達二千四百公里的漫長的邊境地帶，作爲『北邊振興』的主要地區，被關東軍分成三綫地區：

第一綫爲防守軍事地區，即進攻蘇聯最前沿的軍事陣地；

第二綫爲後方軍事基地，主要是策劃用兵，進行兵力集結與分散，是兵力策源地和活動區；

第三綫爲移民開拓區，爲後方軍事基地的後方，是前方兵力補充，退役軍人就業、從事生產的基礎。

由此可見，在『北邊振興計劃』的背後，關東軍是怎樣大搞戰備建設的了。

爲了把北邊建成大軍事基地，關東軍經常把中國居民在零下三十多度的嚴寒中趕出家園。僅在虎林、密山、穆棱、綏陽、東寧等五縣，被驅趕的百姓就有四千多户。

許多人背井離鄉，無處安生，凍餓路邊。

然而關東軍一心大搞北邊戰備，他們是不會關心中國老百姓死活的。

『陸軍驕傲』跌落爲徒有虛名的紙老虎

在推行『北邊振興計劃』的過程中，關東軍對蘇聯的兩次較大的武力試探——張鼓峰事件和諾門坎事件都以失敗而告終。

由此關東軍更加明確：光是加强設施還不行，更需要的是擴軍，是充實和加强關東軍的兵力。

憑借《帝國國策綱要》中『秘密做好對蘇作戰準備』的要求，關東軍加强了擴展軍事實力的工作，于是在『北邊振興計劃』之後，又有了『關東軍特別演習』。

就正式動員和發佈動員會的時機問題，參謀本部和陸軍部之間進行了多次蹉商。

在參謀本部中，主張對蘇作戰最積極的是作戰部。他們認爲，目前至少應對在滿洲和朝鮮的十四個基幹師團進行動員，並對在內地的兩個師團和相應的軍直部隊進行動員，把它們派到滿洲去。

話雖這麼説，實際他們的目的遠遠不止于此，而是想動員二十至二十五個基幹師團，並把它們派到滿洲去。

在陸軍部裏最積極的要算東條英機大臣。然而陸軍軍務科特別是軍事科長真田、高級科員西浦進中佐等人是强硬的反對派。他們對解決北邊問題的時機是否成熟抱消極態度。

性急的作戰部長田中對陸軍部的優柔寡斷十分不滿。七月四日晚，他單獨跑到陸軍大臣官邸說服東條英機同意參謀本部希望動員的意見。酒過三巡，趁着東條高興，田中終于把事情辦成了。

七月七日，東條陸軍大臣和松山參謀總長就軍隊動員之事上奏天皇，請其允諾。開始天皇有點不放心地說：『這裏也增兵，那裏也增兵，就沒有重點了。而且兵力增强了，關東軍更會亂插手了。』但是，最終他還是答應了。

這樣一來，一切必要手續都辦完了。

在『關東軍特別演習』的名義下，關東軍進行了大擴軍。

一九四一年七月三十一日、七月十六日，接連兩次在日本國内進行了陸軍征兵的大規模動員，二十五歲至四十五歲的預備役青壯年，分別在日本和『滿洲國』被征召入伍。

一時間，在中國東北的鐵路車站、海港碼頭，到處擁擠着新入伍的士兵。

這次軍事動員，由日本向東北運送了空前的兵力和器材。動員是在極端保密的情况下進行的。爲此，動員會的傳達一律禁止使用電報，而改用書面形式。召集會的用詞都有所改動，如『補充召集』改爲『臨時召集』，『動員』改爲『臨時編組』。就連爲應征者舉行的壯行會和歡送會，也一律被禁止。

在東北的運輸是在野戰鐵道司令部的指揮下由滿鐵完成的，從七月二十九日起連續進行了四十二天。在此期間，單是滿鐵的牡丹江鐵道局，每日到達的軍用列車就達四十列。

關東軍的兵力迅速膨脹起來，它們不僅擁有四個軍，還有直轄部隊十三個師團，九個獨立守備隊、十三個國境守備隊、十六個野重炮聯隊、一個航空兵團、十六個野戰高射炮大隊以及琿春駐屯軍等。關東軍的總兵力增加到七十萬人，佔當時日本總兵力的百分之二十五。關東軍的發展達到了它的頂峰時期。

『關特演』是日本進攻蘇聯的認真準備，在增加東部北部國境綫地帶兵力佈置的同時，還進行了攻擊作戰的研究，沼澤、河川突破的訓練、部隊駐屯設施的增强等工作。

在進行『關特演』的同時，關東軍司令官梅津美治郎還指令僞滿政府做好對蘇作戰的後勤供應準備，包括出錢、提供軍需物資、保證勞工的征用等等。

『關特演』在大擴軍的基礎上，還搞了兩次大規模的軍事集結演習。第一次動員調動了三十一個戰鬥部隊、五十四個兵站部隊；第二次動員調動了二百七十六個戰鬥部隊和二百六十八個兵站部隊。

關東軍如此興師動衆是有其考慮的。

其一是這一演習行動是在德蘇戰爭爆發不久進行的，既能牽制蘇聯遠東的部分兵力，也可以視爲與希特勒閃電攻蘇相配合的一次策應活動；

其二是滿足了國内强烈主張『北進』的一些陸軍首腦的要求，穩定了陸軍内部；

其三是關東軍借機加强了在北滿、東滿以及西滿的軍力部署，爲他們的最後掙扎提供了急需的人力、物力和財力的保證。

關東軍利用『關特演』迎來了它的鼎盛期，眼看就要全面發揮其『對付北方敵人』的作用時，没想到在關鍵時刻又停了下來。

原來，希特勒的閃電戰在蘇聯斯摩棱斯克受到蘇聯紅軍阻擊後，德蘇戰爭開始進入相持的膠着狀態。蘇軍並未大量西調，日本帝國主義所預期的解決北方問題的有利時機並未出現。

一九四一年八月下旬，日本陸軍參謀本部終于決定：『無論德蘇戰爭如何，日本將專心致力于南方。』

至此，參謀本部多年來企圖對假設的蘇聯進行孤注一擲的決戰的願望終于化爲泡影。『南進派』的主張完全佔了上風，日本開始積極籌備向太平洋地區發動進攻。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本偷襲美國海軍基地珍珠港成功，太平洋戰爭全面爆發。日本大本營的指揮重心也隨之南移了。

最初，日本在南方各地的進攻節節勝利，戰果輝煌。但是，好景不長。到了一九四二年六月的中途島戰役時，日本海軍戰敗，從此一蹶不振，美軍終于轉入反攻。

這時關東軍依然借『關特演』的機會集結和擴大了兵力，也積極籌劃了對蘇作戰的有關事宜，並于一九四二年十月一日組編了關東軍總司令部，大將山田乙三出任總司令官。司令部内新設第五課，以參謀長秦彦三郎爲機關長，專門負責對蘇聯的情報工作以及處理一旦佔領西伯利亞後的各種問題，諸如經濟、治安等問題的落實。

甚至在關東軍司令部作戰室裏，連對蘇蒙發動攻擊的路綫、作戰態勢圖都描繪好了。然而，

那些全都只能是紙上談兵了。隨着南邊戰局的緊張，關東軍逐漸地連『兵』也保不住了。

一九四三年春起，日美兩國在東南方面展開了拉鋸戰，日軍完全陷入困境。這樣一來，中央統帥部當然不會讓只是爲了對付蘇聯而佈置在遼闊的北滿土地上的一支龐大軍隊閑着了。面對南方戰綫戰鬥之激烈殘酷，自一九四三年下半年起，日本陸軍中央部決定，開始大批從關東軍中抽調軍隊到南方戰場、中國戰場和日本本土，以補充南方戰綫。以一九四三年十月第二方面軍被抽調去澳大利亞北部作戰爲開端，關東軍被一批又一批地調往南方戰場。

我們不妨看看具體調動的情況：駐守齊齊哈爾的第二方面軍司令部和第二軍司令部在一九四三年十月調往菲律賓；駐守遼陽第二十九師團一九四四年二月調往關島；駐守牡丹江的第九師團調往衝繩；而哈爾濱的第二十八師團開赴空谷島，綏陽的第八師團調往呂宋，孫吳的第一師團調往萊特島。

從一九四三年十月到一九四五年三月，不到兩年的時間，關東軍已有二十個師團、九個旅團、一個方面軍司令部、三個軍司令部、九個炮兵、工兵、運輸兵司令部被陸續調往東南亞。其調動之頻繁，調動數量之大可見一斑。

其中大部分都是裝備精良、訓練有素的『精鋭之師』，關東軍逐漸成了空架子，從頂峰上跌落下來。

此外，爲準備本土決戰，關東軍又有七個師團被調往國內和朝鮮半島南部。關東軍貯備的軍用物資的三分之一以及一大批軍事指揮官也被調回國內。

號稱『皇軍精銳』的關東軍元氣大傷，已經成了外强中乾的紙老虎。

但到了一九四五年八月，關東軍兵員有了補充，改稱關東總軍，總計擁有二十四個師團、九個混成旅團、二個坦克旅團、一個摩托化旅團，共約七十五萬人；還有飛機一千二百架，坦克一百六十輛。

統算起來，關東總軍擁有三十一個師團，兵員人數不少。但就軍事素質而言，已根本說不上『精銳』了。當年號稱『精銳』的老部隊，幾乎全被抽空了。

新組建的部隊，除個別是從中國內地或朝鮮調入的師團之外，主要是在中國東北大肆征募臨時拼湊起來的，編制、裝備、素質和訓練都極差。

這些新征募的兵，年齡不是偏大，就是太小，有些才是十五六歲的孩子，就成了日本帝國主義的炮灰。

這些臨時拼湊起來的部隊，武器更是嚴重缺乏，共缺少野炮四百門，機槍二百三十五挺，擲彈筒四千九百支，至于槍支則差更多，有十幾萬人無槍可持。

就連日本陸軍部也評價當時關東軍的戰鬥力實爲以前的三分之一。

關東軍這隻紙老虎，已經根本應付不了即將到來的激烈的戰鬥了。

從奉命忍氣吞聲到手忙脚亂地對蘇備戰

『關特演』前後，關東軍在進行對蘇作戰準備時，確立了『主動出擊，毁滅蘇聯沿海空軍基

地』的作戰方針。

一九四二年以後，大本營放棄『北進』，對蘇方針也隨之有所改變，重新確立了『大體維持現狀，加强防衛，嚴密警戒，盡量避免發生戰爭』的方針。

根據這一精神，關東軍總司令部于一九四三年修訂了《對蘇作戰計劃方案》。其要點是：

（一）對來犯之敵，從北朝鮮東部山脈至大小興安嶺一帶予以打擊，以四洮鐵路爲綫，在綫以外地區阻擊敵人，使其緩進；

（二）利用滿朝的遼闊土地，截擊敵人，開展游擊戰；

（三）在大連至新京（長春）鐵路綫地區，切斷進攻敵人之主力，堅決予以反擊。

不難看出，關東軍的作戰部署已從攻勢轉爲守勢。所謂有的游擊戰和阻擊戰，並不能從根本上遏止蘇軍的攻勢。

隨着日本在太平洋戰爭的形勢發展的日益險惡，爲了挽救日本面臨的全面頹敗的形勢，一九四四年九月十八日，大本營又給關東軍司令部下達了新的部署命令。大本營指示，關于滿洲國及其所屬領土，凡與鄰國有爭議的地區、不便使用兵力的地區，以及有可能發生邊界爭端的地區，均不得以武力進行防衛。

滿洲國成立以來，大本營交給關東軍的任務是讓它們肩負起對滿洲國的防衛。現在這一任務在某種程度上已被解除，即使在蘇軍侵入滿洲國土時，也等于讓關東軍忍氣吞聲、袖手旁觀。

這樣，從一九四四年下半年開始，大本營也好，關東軍也好，對蘇聯簡直連碰也不敢碰。

『關特演』時的那種威風，早已蕩然無存了。

大本營所以如此部署，是因爲南方戰局不利，無暇顧及北方，只好把賭注擁在一九四一年四月十三簽訂的《蘇日中立條約》上，幻想蘇聯不會很快進攻日本。

而在《蘇日中立條約》裏，也的確寫着『蘇方保證尊重滿洲國的領土完整不可侵犯』的字樣。不料，一九四五年五月八日德國戰敗，嚴酷的事實使大本營的幻想破滅，開始意識到『滿洲國』面臨的事態嚴重。

五月三十日，大本營命令關東軍完全轉入臨戰狀態，給它下達了《對蘇作戰計劃要領》，並指示它根據這個要領，對蘇進行戰爭準備。

《要領》指出，關東軍對蘇作戰之目的是『擊潰入侵滿洲之敵，確保京圖綫（新京—圖門）、連京綫（大連—新京）以東重安地區，以利于全面持久作戰。』

《要領》要求關東軍死守在中國東北南部、西部、特別是東邊道一帶。而關東軍幾年來卻一直圍繞在中蘇東部邊境主動出擊的作戰方針慘淡經營。

根據大本營新的佈署，關東軍要大大收縮東部、北部防綫，而把重點轉向南部和西部。但是，改變作戰的軍事部署並不像在棋盤上擺棋子那樣簡單。關東軍要把散佈在東部、北部國境綫各據點的兵團撤出去，大批軍需物資也必須同時轉移，還要重新構築和加强『滿洲國』南部和北朝鮮的陣地。

時間要求緊迫，必須以最快的速度進行這一切，對于關東軍來説，真是困難重重，有些措手

不及了。

爲此，新上任不久的參謀總長梅津美治郎根據天皇的命令于一九四五年六月四日專程來到大連，向關東軍司令官山田乙三和中國派遣軍司令官崗村寧次傳達了《對蘇作戰計劃要領》，並面授機宜。

梅津解釋說，大本營是在堅持本土作戰的基礎上來規劃安排『滿洲國』防務的，可以說滿洲是帝國的第一道防綫。

把這種堅守的重任交給關東軍來承擔，可見日本當局對關東軍還是寄予厚望的。

山田乙三等人果然不負梅津參謀總長的重托，立即行動起來，于六月十四日召開兵團長會議，要求所屬部隊制定作戰計劃，敦促他們立即備戰。

爲了加强東部防綫，關東軍特別改編和加强了工兵部隊，專門組織了一個建設兵團，在通化一帶搞防禦性大工程，修建最後抵抗陣地的復廓工事。

從六月末開始，關東軍動員了三萬僞滿洲國軍，又强抓了一批勞工，用武力逼迫他們趕修這些軍事工程。

但由于期限短，資材又不足，人員消極怠工，一直到七月末，這些計劃中的軍事大工程也沒什麼進展，大部分還只停留在紙面計劃上。

這時，大本營對蘇聯的軍事行動作出了錯誤的判斷。大本營認爲，蘇聯只有在『滿洲國』邊境集結到擁有四十個步兵師時，才能形成對關東軍的威懾力量。而蘇聯要完成這一兵力部署，大

約要在一九四五年八月末。至于蘇軍要對關東軍發動攻勢，非擁有五十個師團的兵力不可，這一兵力集結完成需要到一九四五年九月末。

關東軍則更懷僥幸心理。正如作戰參謀草地卓吾說的：『我們還没有做好充分準備，如果蘇聯馬上來打，我們真難以應付，倘若再過一段時間，在編制、裝備、訓練上或可有所改進。但願蘇軍在今冬以前不來打！』

這位大佐的坦白自供，充分地展示了關東軍的僥幸心理。他們幻想能把秋季熬過去，而到了十一月蘇滿邊境冰封雪凍不宜打仗，就可捱到一九四六年春天了。

直到一九四五年八月八日十七時蘇聯發出對日宣戰通告，大本營才于八月十日下達命令，要求關東軍做好發動全面對蘇戰爭的準備。

正是由于各種戰略失誤，關東軍十分被動。到蘇軍發動全面攻勢之時，關東軍便只有招架之功，没有還擊之力，似雪崩一般地潰敗了。

『第四號作戰計劃』破壞空前

僞滿洲國臨近末日，殖民統治岌岌可危。爲此，日僞統治當局一反過去公開推行赤裸裸的掠奪與血腥彈壓政策，暗中策劃新的陰謀勾當。

在關東軍參與下制定的秘密進行經濟掠奪的計劃被稱之爲『一號工作』。

由于戰局的發展對日本不利，敗像日漸顯露，僞滿洲國人心浮動，反滿抗日的離心傾向日益

嚴重。關東軍想繼續採用强制的搜刮辦法進行經濟掠奪已十分困難。

這時，不少中國商人害怕僞滿垮台後自己手中的僞幣變成廢紙一堆，于是爭相甩錢，搶購各種物資，以避免損失。黑市交易十分活躍。

關東軍也只好將計就計，唆使日本在華的一些商人在『滿洲國』各地參與黑市交易活動，借機收買各種軍需物品。關東軍給他們高額提成，並派憲兵暗中保護。

以『新京』第一旅社爲秘密交易點，僅一九四四年上半年就購買了價值二億多元的緊缺物資，其中有鋼材、電器材料、工業用寶石、白金、鋁、水銀以及各種機械。

被列爲關東軍直屬工程的還有一項工作，這就是秘密研製原子彈。

早在一九四二年，日本國內就組織人力積極研製原子彈。當時提出由『滿洲國』幫助解決原料，前後由遼寧運去約有三噸鈾235。

隨着日本戰局形勢發展日趨不利，大本營方面更加快了研製原子彈的步伐。然而由于日本國內經濟困難，而研製中最核心的被稱爲甲液和乙液的東西，又需要消耗大量的水和電氣，日本國內無力承擔。

因此，一九四四年日本陸軍省要求關東軍在『滿洲國』建立原子彈製造工廠，有關研製原子彈的種種事項，在關東軍的組織領導下，由『滿洲國』承擔。

關東軍立即把這項絕密軍事工程列爲第一特需的代號計劃，撥出大量款項，並出動人馬選中哈爾濱郊區爲原子彈工廠廠址。但直到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投降，這項絕密軍事工程還没

有完成。

最爲罪惡的，要算『第四號作戰計劃』了。

一九四四年八月，鑒于戰局發展日漸險惡，日軍陸軍方面開始策劃以二百五十萬兵力和七百架飛機進行『本土決戰』。

關東軍對此積極響應。爲配合『本土作戰』，經多方研究，擬定了『第四號作戰計劃』。該計劃的一個主要內容是軍事部署。關東軍總司令部仍設在『新京』，第一方面軍司令部設在牡丹江，擔任東部正面防禦；第三方面軍司令部設在奉天，擔任西部正面和南滿防禦；第四方面軍司令部設于齊齊哈爾，擔任北部正面防禦。

『第四號作戰計劃』的另一主要內容，就是破壞、焚燒、殺戮計劃。該計劃規定各地在撤退時，一定將公路、橋樑、各種建築物、電話綫、火車站、鐵路隧道等，凡屬蘇軍能利用的公共設施，全部予以破壞。至于軍用被服、鞋襪等盡力運往以通化爲中心的主陣地，運不完的也要就地燒燬。

此外，該計劃還決定，在西部和中部地區施放毒氣和細菌；更準備炸毀當時『滿洲國』最大的水電站——豐滿電站，使吉林、長春兩大城市被洪水淹没……

以上這些計劃，有些由于蘇軍突然進攻來不及進行，尤其是軍事部署計劃幾乎全亂了套。但是喪心病狂的關東軍在敗逃的同時依據『第四號作戰計劃』第二方面內容的要求進行大破壞，導致了各種暴行的發生。

在東滿地區，一九四五年八月九日至十日，日僞退時炸毀了西車安、西鷄寧的火藥庫、油庫，車安被服廠內所存可供一個師團一年穿用的被服全部付之一炬，而貯存糧食足夠一個軍喫三年的林口糧食廠也被付之一炬。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東京城獨立守備隊在撤退時，破壞了鏡泊湖水電站，使之喪失了發電能力。

在哈爾濱市郊平房，研製細菌武器的罪魁石井四郎，爲了消滅其罪證，炸毀了七三一部隊的所有設施，使這一殺人魔窟變成一片廢墟。

在黑河，官舍、民舍等建築物一百五十棟被燒。

關東軍在大連也準備實行焦土計劃，想在最後關頭，進行全市大爆炸……

總之，在關東軍大潰敗時，按第四號作戰計劃所進行的破壞是空前的。到處都是火在燃燒，四面是濃煙瀰漫，爆炸聲不絕于耳，焦糊味撲鼻而來。

在放火焚燒的同時，按『第四號作戰計劃』，又颳起了殺人抓人的邪風。

由關東軍參謀長授意，關東軍司令部第二課牽頭組織，由僞滿警務總局執行的《戰時有害分子處理要綱》就是颳這股邪風的風源。

該《要綱》將所謂『反滿抗日』人員分成甲乙丙丁四級，制訂成『戰時有害分子名本』。其中甲級是戰時嚴重有害分子，即爲中共黨員、謀略員、諜報員等（多爲在押分子）可以立即殺掉。

各監獄均接到通知，對早已關押的『政治犯』按『要綱』紛紛進行處理。

牡丹江監獄首先大開殺戒。八月十二日，關東憲兵隊監獄中反滿抗日的『國事犯』一百多人從獄中提出，派兩輛大汽車押運至郊外刑場準備集體屠殺。途中一輛汽車出了故障，車身翻倒，車中部分人被壓死，多數人摔得頭破血流，當場均被槍殺。

剩下那一輛車被拉往鐵嶺河監獄，日僞警獄人員假惺惺地送水送飯進行安撫，實則在水、飯中下了毒。一些人不知内情喫喝之後被毒死，不少人見情拒絕喫喝。窮兇極惡的日本警憲非欲置這些人于死地而後快，撤下假面，露出劊子手的本相，從一號監房開始挨個監房射擊、還扔了手榴彈，當即弄得血肉横飛，死傷無數。

總之，關東軍不甘心退出歷史舞台，甚至在天皇裕仁已正式宣佈日本投降之後，他們仍不肯放下屠刀，頑固執行罪惡的『第四號作戰計劃』。

這一計劃的實行，就成了關東軍在最後滅亡時猖狂一跳的具體寫照。

戰局正式進行了二十四天，關東軍宣告壽終正寢

德意戰敗後，同盟國爲解决日本問題，先後召開了德黑蘭會議、雅爾塔會議和波茨坦會議。一九四五年七月十七日至八月二日在析林附近的波茨坦召開的蘇美英三國首會議還于七月二十日發表了一個宣言，這就是著名的《波茨坦公告》。公告敦促日本政府立即無條件投降，並提出停止戰爭的七項條件，其中包括永遠鏟除日本軍國主義勢力、懲辦戰爭罪犯、扶植日本實現民主化等。

《波茨坦公告》的公開發表，使處于窮途末路的日本雪上加霜，遭受了沉重的一擊。圍繞着對《公告》是反對還是接受，在政府和軍隊內部形成尖銳對立，並發生激烈爭吵。七月底，日本最高戰爭指導會議決定對外暫不表態，新聞報道發表公告時要做刪節。

美蘇不容日本有喘息的機會，接連對日施加壓力：

先是八月六日，美國向日本廣島投下人類歷史上第一枚原子彈，一瞬間使這座繁華的城市變爲廢墟，二十多萬人因毫無戒備而受傷害。

繼而是八月八日，蘇聯外長莫洛托夫緊急約見日本駐蘇大使佐藤，當場宣佈蘇聯政府聲明：八月九日與日本處于戰爭狀態，即蘇聯開始對日作戰。

同日，美國餘興未盡地向長崎投下第二枚原子彈……

短短三天内遭受如此沉重的打擊，日本人覺得支撑得很痛苦，戰和問題的爭執也趨于白熱化。八月九日召開最高戰爭指導會議，在戰與和的問題上分歧仍然很大，兩個小時的會議始終以三比三對峙。當日下午的内閣會議，陸軍大臣阿南唯几高聲喊叫：『不管形勢多麽不利，戰爭非打到底不可！没有任何商量的餘地。』没有辦法，鈴木總理大臣和東鄉外相只好呈請天皇裕仁召開御前會議，親自裁決。當天深夜十一點五十分御前會議召開，裕仁天皇表示，繼續將戰爭打下去，只能使日本生靈塗炭，國力疲憊。他説：『想到忠心耿耿的皇軍要被解散，我心不忍，但實在無可奈何了。』最後天皇裕仁表示，按外務大臣提出的條件，接受《波茨坦公告》。緊接着召開的内閣會議也形成決議，在保留天皇制的條件下接受《波茨坦公告》。

日本大本營光忙于爭吵，甚至連蘇聯宣戰這樣重大的消息都忘記通知位于日蘇之戰第一綫的關東軍。有關蘇聯宣戰的消息，還是關東軍自己從前綫直接獲得的。

八月九日夜，約一百五十萬蘇聯紅軍在蘇聯元帥華西列夫斯基指揮下，分東、西、北三路進入中國東北，另一路攻入朝鮮。向中國東北日軍發起進攻的三路是：

外貝加爾方面軍，由馬列諾夫斯基元帥率領，在一部分蒙古人民共和國騎兵的配合下，突破了日本關東軍的滿洲里至扎賚諾爾與呼倫貝爾至阿爾山的防綫，直至長春、瀋陽、承德、旅大以及齊齊哈爾等地；

遠東第一方面軍，由麥列茨科夫元帥率領，强渡烏蘇里江，突破綏芬河、虎頭、東寧等地關東軍築壘的防御陣地，兵鋒直指牡丹江、密山、吉林、延吉、哈爾濱等地；

遠東第二方面軍，在仙爾卡也夫大將統帥下分東西兩路前進，東路從伯力突進關東軍在黑龍江和烏蘇里江之防綫，兵力直達撫遠、同江、佳木斯、依蘭、巴彦等地。西路攻勢從海蘭泡一帶强渡黑龍江，隻鋒指向瑷琿、遜河、隔江等地……

蘇軍的突然出動，使蒙在鼓裏的關東軍一時摸不清究竟怎麼回事。關東軍司令部根據前方發來的有關蘇軍開始進攻的消息，難以判斷是全面的正式的進攻，還是局部的和一時的進攻。

直至八月十日晨六時，關東軍才綜合各方陸續報來的情況，以及蘇軍飛機轟炸『新京』等地情況，正式判斷蘇軍已經開始了全面進攻。

于是，秦彦三郎總參謀長匆書記召開會議，下達了全面對蘇作戰的命令，要求各方面軍及各

軍要根據作戰計劃粉碎各侵入之敵。同時廢棄《滿蘇國境警備綱要》，另外施行《戰時防衛規定》和《滿洲防衛法》。《防衛法》使『滿洲國』進入了日滿一體的防衛態勢。

當天中午，關東軍總司令官山田乙三乘專機匆匆忙忙由大連返回。這位總司令官，應關東局總長三浦之邀，于前一天去大連觀看歌舞伎演出。蘇日戰爭已經打了老半天，他才被專機接回。

同日，關東軍接到大本營對蘇全面作戰的決定，其主要內容有兩項：（一）大本營企圖在勝利完成對美作戰的主作戰的同時，開始對蘇全面作戰，擊潰蘇軍，以粉碎蘇聯的狂妄企圖，維護國體，保衛皇土。（二）關東軍司令官要把主作戰指向對蘇作戰，隨處擊潰來犯之敵，保衛朝鮮。

這是一個內容過于空泛的決定。不過有一點還算明確，即對關東軍規定了其基本作戰任務是保衛朝鮮。大本營要求關東軍『根據帝國全面戰況，以朝鮮爲最後一綫，必須絕對予以保衛。以滿洲全土爲前沿陣地，在萬不得以的情況下，可以放棄』。

大本營還決定駐朝鮮的日本第十七方面軍和空軍第五集團軍隸屬于關東軍，使關東軍所轄部隊增至三十一個師團。與此同時，僞滿洲國軍事部最高顧問秋山義隆下令，滿洲『國軍』也轉入關東軍戰時的指揮下。

手忙腳亂的關東軍，力不從心地抗擊着蘇聯軍隊的凌厲攻勢。怎奈蘇軍的機械化部隊所向披靡，『喀秋莎』火箭炮威力無比，關東軍在各條戰綫上都只有被動挨打的份，毫無招架還手之力。

日蘇之戰打響的次日，僞滿總務長官武部六藏奉關東軍之命，召集僞政權各部局負責人開會，會上宣佈『滿洲國』要立即進入戰時體制，防御戰要以通化爲中心逐步展開，因此『滿洲

國』政府要遷往通化，並且要立即動身。十二日，『滿洲國』皇帝溥儀悄然東逃。關東軍司令官山田乙三等人先後遷往通化，準備進行最後決戰。

正當關東軍在中國東北疲于應付，並不自量力地要與蘇軍決戰時，日本國內最高決策層正準備向同盟國無條件投降，以終止這場毫無勝利希望的戰爭。

八月十四日上午，裕仁天皇召見兩位陸軍元帥畑俊六、杉山和海軍元帥長野，對這三位軍界元老聲稱，他已決定結束戰爭，要求陸海軍全力支持。

同日中午又召開御前會議。裕仁天皇面色沉重地說：

『我研究了日本和世界目前的形勢，認爲繼續將戰爭打下去，無一是處，徒然造成破壞，……同盟國的答覆是可以接受的。……我認爲立即結束戰爭，總比目睹日本徹底毀滅爲好，根據目前情況看，馬上結束戰爭國家還有一綫生機。』

『我想起了明智天皇在三國聯合干涉時的悲憤之情，同他一樣，我現在也必須忍受不能忍受的局面，而寄重振日本的希望于未來。』

『由于國民對目前局勢一無所知，我想當他們聽到我們的決定時，當然會萬分震驚。如果大家認爲由我親自向國民解釋爲宜，我義不容辭。特別是軍人，對決定一定會感到格外沮喪，陸相和海機要說服軍隊接受這一決定是很容易的。無論需要我到什麼地方去解釋，我都可以去。』

『我要求內閣儘快準備宣告停戰的詔書……』

在場的各位大臣聽了天皇的這番話，早已失去自制力，或雙膝跪倒向天皇致意，或坐在那裏

任憑眼淚流淌顧不上擦拭。儘管這樣，最後大家還是同意由天皇親自向全國播放停戰詔書。

八月十五日，這是個令日本人難以忘記的日子。正是在這一天，天皇向全體日本臣民廣播了停戰求和的詔書。中午，幾乎所有的日本人都聚集在收音機旁，聆聽天皇裕仁發出的『神鶴之天聲』：

『朕深鑒于世界大勢與帝國現狀，欲以非常措置收拾時局，茲告爾等忠良臣民，朕已命令帝國政府，通告美英中蘇四國，接受其聯合公告，……

『且若繼續交戰，不但我民族終被滅亡，且人類文明亦被毀，如斯朕何以保全億兆赤子，謝皇祖皇宗之神靈？』

人們明白，『接受聯合公告』意味着無條件投降。突然而至的冷酷事實令人震驚。絶大多數日本人一直陶醉在大日本皇軍的『赫赫戰果』之中，他們不願相信也難以相信戰無不勝的皇軍就要無條件投降。

最不能接受這一現實的是軍人。

當裕仁天皇的聲音通過無綫電波傳到關東軍司令部時，齊集在這裏的主要首腦及主要參謀幕僚們竟然掩飾不住失望的心情，在播音結束後失聲慟哭起來。『光榮無敵的關東軍』，怎肯甘心放下揮舞了多年的軍刀。更何況昨天夜裏陸軍大臣還電告關東軍繼續執行以前的命令，大本營也没有下達停止戰鬥的命令。于是，一部分頑固的主戰派繼續鼓譟把戰爭打下去，妄圖在最後關頭顯示一下『帝國皇軍戰魂』。

關東軍總司令官處于進退兩難之中。要停火不打吧，還没接到正式軍令；若繼續打下去吧，卻明明天皇已決定投降並發了停戰詔書。他和總參謀長秦彥三郎知道大勢已去，應該停戰，但又深知屬下中存在很大的不同意見。爲此，八月十六日夜，關東軍總司令部召開參謀幕僚會議，中心議題是討論關東軍下一步該怎麼辦。

在這次會議上，主戰派幾乎喪失了理智，拼命地發出把戰爭打下去的狂妄叫囂。主和的聲音幾乎完全被主戰派的喊叫淹没了。面對此情此景，秦彥三郎總參謀長只好站起身，哽咽着説：『作爲軍人除服從陛下命令外，再没有别的忠節之道。不服從的，將永遠被人們看做亂臣賊子。至死也要支持抵抗的人，不要再説什麼了，應該把我們的頭砍掉，然後再走！』

秦彥三郎點出了軍人的天職在于必須服從天皇這一要害，猶如給主戰派當頭澆了瓢冷水，開了鍋似的鬧轟轟的會場陡然安靜下來，剩下的是泣不成聲的絶望的嗚咽聲。就在這個時候，一直緘口不語的總司令官山田乙三也站起來，以十分嚴肅的口氣作了總結：『諸君心情我十分理解，但是聖斷已下，本軍只能奉戴聖旨，立即結束戰爭！』

這樣，侵略中國東北達四十年之久的日本關東軍，終于無可奈何地決定要結束它的使命。

次日，天皇特使竹田宮飛抵『新京』，帶來了大本營要關東軍『立即停止戰鬥行動』的命令。命令指示關東軍可與蘇軍進行停戰談判和移交武器等。

再次日，山田司令官致電遠東蘇軍總司令官華西列夫斯基元帥，正式要求停戰並交出武器。蘇軍司令官當即覆電，指出日方雖主動提議停戰，『但卻隻字不提日軍投降問題』，並宣佈：『茲

向關東軍司令提出，從八月二十日十二時起，在全綫停止對蘇軍的任何戰鬥，並繳械投降。」

曾經不可一世的關東軍此時完全沒有了脾氣。十八日凌晨三時半，山田即通過電台答覆蘇軍總指揮部，説日軍準備履行一切投降條件，並派人去哈爾濱聯繫此事。

然而，潰不成軍的關東軍，已根本無法作有組織的全面投降，而只好隨着蘇軍的進駐，各地的日軍分別投降。

十八日，駐哈爾濱的日軍投降。

十九日，關東軍總司令官山田簽署無條件投降書，駐長春的日軍投降。同日，駐吉林的日軍投降。

二十日，駐瀋陽的日軍投降。

二十二日，在老牌根據地旅順大連駐紮的關東軍也向蘇軍交出了武器。……

從八月十八日到八月底，關東軍各部隊到處都在忙着繳械投降。這期間，蘇軍共俘獲日軍高級將領一百四十八名和官兵五十九萬四千多名。華西列夫斯基元帥在總結這次對日作戰時滿意地説：『戰局正式進行了二十四天，但戰鬥行動實際不到一半時間。』

九月五日，關東軍總司令部被蘇軍解除武裝，山田等關東軍高級將領紛紛淪爲蘇國的階下囚。關東軍，這個日本侵略中國東北的主要工具，就此宣告壽終正寢，永遠地退出歷史舞台。

籠罩東北幾十年的黑太陽，就這樣墜落了。

淒惶末日裏的無奈與瘋狂

現在我們不妨再回過頭來，看看處于窮途末路的關東軍的狼狽相。曾耀武揚威、不可一世的『戰無不勝的陸軍驕傲』，敗亡之際竟是如此嘴臉，實在可笑可嘆。

八月十一日以後，關東軍司令部倉皇逃往通化，準備與蘇聯紅軍決一死戰；傀儡皇帝溥儀也在文武群臣陪護下緊隨關東軍之後出逃，將行宮安在通化大栗子。

被遺棄的日僞統治中心長春，呈現一片敗亡景象。

關東軍司令部大樓上鑲的象征日本殖民統治的菊花皇室紋章被取下來了。司令部内桌椅東倒西歪，文件堆得亂糟糟的到處都是。進出的關東軍軍官一個個步履沉重，眼臉低垂，晦氣滿面，緘口不語，昔日那種踩着釘刺馬靴，挎着戰刀，威風不可一世的武士道形象再也看不到了。電報板上貼着日本陸軍大臣阿南惟几最後發表的指示：『只有堅決把保衛神州的聖戰進行到底，縱使茹草啖泥，卧伏山野，只要堅決戰鬥，相信死中自有活路……』如今這如同夢囈般的誑語再也打不起軍官們的精神，孤零零地呆在那裏，無人理睬。

更慘兮兮的是被關東軍拋棄不管的日本居民。

蘇聯對日宣戰的次日，關東軍命令其所屬系統在長春的軍人家屬，一律于十七時在忠靈塔前集合。十一日凌晨一時四十分，第一列遣送列車從長春站開出，爾後每隔兩小時開出一列。這些遣送車分别經吉梅綫、安奉綫，接着轉往朝鮮新義州、平壤等地。緊接着，『滿洲國』政府日系

官吏和國策會社有關人員的家屬，也都被運往朝鮮，在朝鮮集中後再圖回國。

這下可苦了那些沒人組織遣送的一般日本居民。他們出于求生的本能，自發地湧往火車站。在東北各大火車站的站台上，到處擁擠着逃難的日本人。此情此景，溥杰夫人嵯峨浩在回憶錄中有一段生動的描述：

『她們擁擠在站台上，其中有些人用盡全力緊緊抓住車不肯放開，大聲哀告着：「哪怕只讓孩子們上去也行啊！站在廁所裏也沒關係。已經等了兩天了，就讓我們上去吧！行行好，拜托了……」可是憲兵們怒氣沖沖地說：「不行！這列車不准上！快走開！」把那些死也不放手的婦女和孩子們推了下去』。

在長春，當一般日本居民眼見關東軍一車一車地拉運自己的親屬逃跑時，他們發瘋一樣地去攔截每一輛關東軍家屬的車，幾乎釀成流血衝突。關東軍第四課代理課長原善四郎不打自招地向政府當局解釋道：『因爲蘇聯突然宣戰，情況緊急，關東軍家屬容易組織，準備工作也進行得快，因此首先讓軍人家屬逃難先走了。』

無論怎樣解釋，關東軍都無法坦然地面對這樣一個事實，即，承擔保護日本居留民責任的有『皇軍之花』、『陸軍驕傲』之稱的關東軍，竟在日蘇開戰的第二天，就拋下廣大被保護的居民于不顧，先後開始後撤了，並自私地先運走自己的家屬。

最不幸、最悲慘的是那些遠在邊境的日本開拓民。這一百三十二萬左右的開拓民居住一國境綫附近的危險地帶，被劃在保護圈以外，不僅關東軍，就連專門負責組織動員他們來的僞滿開拓

總局和日本拓務省也沒有對撤出開拓民作任何安排。八月九日蘇聯宣戰後，這些開拓民立即陷入沒頂之災，他們利用一切可能利用的交通工具，自發地陸續向哈爾濱、長春、瀋陽等大城市集中，一路上遭蘇軍襲擊傷亡而死的，缺喫少穿凍餓而死的和染病不治而死的，差不多佔了一半。剩下的一半遭遇也十分悲慘。嚴寒的冬天來臨，許多出逃時穿着夏季服裝的開拓民，只好將破麻袋套在身上，在零下三十幾度的寒風中到處奔波。

哈達河開拓團的難民在一個山間谷地與關東軍駐滴道野炮一二六聯隊相遇，他們慶幸遇到了救星，這下有人保護就好了。誰知他們想錯了，他們的要求一提出就遭到關東軍拒絕。這時，一二六野炮聯隊在谷口遭遇蘇軍，一經交火便潰不成軍，退到谷裏又和開拓民混雜在一起。開拓團團長見沼得知這支關東軍與他們走的是同一條路綫，再次懇請關東軍帶他們一塊逃亡，實在不行，哪怕留下一個小隊也好，路上安全也有些保障。關東軍的回答卻是冷冰冰的：『走開，不要擋路，我們沒有保護開拓團的任務！』說完，關東軍部隊就拋下手無寸鐵的開拓民，夾着尾巴逃之夭夭。遭到蘇軍攻擊的開拓民把孩子藏在叢林溝裏，孩子們撕心裂肺地向遠去的關東軍哭叫：『軍隊叔叔，救救我們啊！』關東軍根本不予理睬。聽到槍聲跑得就更快了。在被蘇軍包圍又無路可逃的危急情況下，開拓民開始絕望地採取所謂『自決』手段。不少男人先用槍將正在雙手合十祈禱的妻子打死，再把哭涕不已的獨生女打死，最後自己也飲彈自殺。

『八·一五』日本投降時，在烏蘭浩特，雙手沾滿中國鮮血的關東軍，又對自己的骨肉同胞造下了難以洗刷的大罪惡。

這是關東軍戰敗怨情的發泄。

這是窮途末路的關東軍的無奈的瘋狂。

丈夫剛被動員走了，剩下的是一群孤苦無助的婦女和孩子。她們需要關東軍的保護，可關東軍卻在最後關頭欺騙了他們，殺害了她們。關東軍盡施『遣返』、『疏散』等花言巧語，將這些無依無靠的婦女和孩子帶到荒野，進而引誘至山崖旁，用槍托把她們往崖下驅趕。出于求生的本能，婦女和孩子們拼命抗拒，並和關東軍廝打起來。頃刻間，槍聲響了，暴風雨般的子彈夾帶着武士道的瘋狂，把這些無辜的弱小者推入了百尺深澗。當時八歲的笠花珠美，就是在這一瞬間失掉了媽媽、姐姐、弟弟、妹妹。作爲幸存者，她從死人堆裏爬出來，在冤魂游蕩在山谷中爬來爬去。餓了從死人身上翻找些食物，渴了喝一口混着血污的雨水。四天之後，一個好心的老人發現了她，收養了這個可憐的戰爭孤兒……

人類若是没有了理智，不過是畫上的圖形，無知的禽獸。敗亡之際的關東軍究竟與禽獸何異？

經關東軍這支貪婪的殖民統治的黑手，不知從中國東北掠去多少財富。即便臨近戰敗之時，關東軍在匆忙撤往通化的時候，也還念念不忘攜帶作爲重要財源之一的鴉片。八月十三日，關東軍要求『新京』現有的鴉片全部交給關東軍，統一運往通化，準備經吉林運往通化。爲保證行車安全，特意在車上插了日本太陽旗，結果車還没出長春城區，就遭到中國暴動群衆的襲擊，司機當場被打死，押車的士兵也被打傷。負責交接事務的參事官尾形棄車逃命，事後感慨萬千，逢人

便說：『世事才幾天功夫全變了，過去只要插上太陽旗，就可以到處橫衝直撞，通行無阻，如今有了太陽旗，倒成了中國人攻擊的目標。』

鴉片無法運輸，關東軍又打起金銀鑽石財寶的主意。

僞滿政府經古海忠之經營一些白金和鑽石，作爲經濟平衡資金，保存在僞中央銀行裏。其時，大部分已分批運往日本，剩下的約五公斤左右白金，未來得及向日本運，仍存在『中央銀行』裏。鑽石則是因工業生產需要從上海買來的。關東軍敗逃之時蠻橫地提出要將白金和鑽石帶走。當『中央銀行』董事生松淨來向古海討對策時，古海說：『關東軍提出來要，不給是不行的；讓他們留下收據，你們就給了吧！』出乎預料的是，關東軍將白金和鑽石提走後兩天又乖乖送回，重放在銀行金庫裏保存。對此，生松淨以不屑的口吻說：『關東軍平時强橫得不得了，事到臨頭，又什麼膽量也没有了。將這些白金鑽石拿走，將來作日本人的救濟費有多好，這種玩意兒很小，哪裏都能藏匿，幹嘛退回來，真是一群没出息的膽小鬼！』

生松淨的話一點不錯。事到如今，關東軍真的成了一群膽小，甚至連藏匿一點白金鑽石的膽量都没有了。想想以前關東軍在東北大地上耀武揚威、横征暴斂的情景，真是河東河西，今非昔比！

日本投降，關東軍覆亡在即之時，關東軍一手扶植起來的僞滿洲國也迎來了自己的末日。八月十七日，關東軍操縱溥儀在大栗子鐵礦公司的一間辦公室裏宣讀了『退位詔書』，僞『滿洲國』永遠成爲歷史，不久，溥儀在瀋陽機場被蘇軍俘獲。關東軍在東北導演的傀儡戲，降下了最後的

帷幕。

瘋狂也好，無奈也罷，關東軍作爲日本軍國主義侵華的得力工具，留下罪惡累累的記錄之後，終于在歷史舞台上消聲匿迹了。

第十章

關東軍『將星』隕落

本莊繁畏罪自殺

本莊繁，一八七六年生于日本兵庫縣，一八九七年畢業于日本陸軍士官學校。一九〇七年，從陸軍大學畢業後，歷任日本駐華使館副武官，參謀本部中國班班長，『滿蒙』班班長、中國課課長、參謀本部部附、步兵第四旅團旅團長、第十師團師團長等職。

本莊繁長期在中國活動，熟悉中國內情，精通漢語，被稱爲日本陸軍中的『中國通』。早在一九〇七年，本莊繁就從事侵略中國的活動。他以日本駐華使館副武官的身份，穿梭活動于北京、天津、上海等地，刺探中國的政治、軍事情報。一九二一年五月，本莊繁又以參謀本部部附、陸軍少將的身份出任奉系軍閥張作霖的軍事顧問。一九二二年，奉軍在第一次直奉戰爭中遭到慘敗後，本莊繁乘機唆使張作霖宣佈東三省『自治』。

一九二五年五月，本莊繁調任日本駐華大使武官。一九二六年三月，爲阻止馮玉祥國民軍同奉系軍閥作戰，本莊繁一手導演了『大沽口事件』。由于本莊繁積極從事侵略中國的活動，深受日本軍部賞識。一九二七年，本莊繁晉升爲陸軍中將，一九二八年又擔任第十師團師團長。

一九三一年八月一日，本莊繁被任命爲關東軍司令官。此時，關東軍正在緊鑼密鼓地進行武力佔領中國東北的陰謀活動。八月二十日，本莊繁一到旅順關東軍司令部，就召見關東軍司令部高級參謀土肥原賢二、板垣征四郎等人，聽取他們的匯報，並和他們一起商定行動的具體時間。隨後，本莊繁逐次視察駐紮在東北大石橋、鞍山、連山關、瀋陽、鐵嶺、公主嶺、長春、遼陽等地的日軍，要求他們做好準備。九月十七日，本莊繁在視察將擔負進攻瀋陽任務的關東軍第二師團時，對師團長多門二郎中將訓斥說：『現在，滿蒙形勢日益不安，不許有一日偷安。當萬一發生事端時，希各部隊務必採取積極行動，要有決不失敗的決心和準備，不可有半點失誤。』

在得知參謀本部奉天皇旨意，委派建川美次少將來阻止關東軍擅自行動的消息後，本莊繁同意了板垣征四郎和石原莞爾將行動時間提前到九月十八日的要求。隨後，本莊繁于十八日下午二時，乘火車回旅順關東軍司令部，以製造他毫不知情的假象。但他在回旅順前，已指使板垣征四郎留在瀋陽指揮。

九月十八日晚十時二十分，坂垣征四郎指使日軍炸毀柳條湖東側的鐵路，製造事端借口，隨後命令日軍攻擊北大營和瀋陽城。這樣，震驚中外的『九·一八』事變爆發。

九月十八日晚十一時五十分，本莊繁在關東軍司令部演了一番他毫不知情的戲後，下達了一連串的作戰命令：調第二師團進攻瀋陽；第三旅團第四聯隊及騎兵第二聯隊進攻長春；獨立守備第三大隊進攻營口；獨立守備第四大隊進攻鳳凰城和安東。接着，本莊繁又打電話給日本駐朝鮮軍司令官林憲十郎大將，請求他迅速派部隊援助關東軍。十九日三時三十分，本莊繁率領關東軍

司令部，步兵第三聯隊、重炮兵大隊，連夜乘火車趕赴瀋陽。

在本莊繁的指揮下，日軍很快侵佔了東北三省。同時，本莊繁還和板垣征四郎等人導演了建立僞滿洲國的戲。一九三二年三月九日，本莊繁出席了僞滿洲國執政溥儀的『就職典禮』。這樣，日本帝國主義侵佔中國東北的野心，終于通過本莊繁之手得以實現。

爲表彰本莊繁的『功績』，天皇特意授予他一枚一級『金鵄』勛章和一等『旭日』大綬章，還調他擔任了侍從武官長。一九三三年六月，晉升他爲陸軍大將。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十六日，天皇又將他列入華族，賜予男爵爵位。

日本戰敗投降後，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九日，駐盟軍總部向本莊繁發出逮捕令，限定他在九月二十三日以前到東京巢鴨監獄報到。爲逃脱審判，本莊繁決定自殺。

十一月二十日上午十時，年已七十的本莊繁，步履艱難地走進已被美軍佔用的舊陸軍大學院內，在一個空房間內，按照日本武士的傳統，用刀割腹自殺。當一名湊巧路過此處的美軍士兵發現他時，處于彌留之際的本莊繁，睜開眼睛，用喑啞的聲音說了最後一句話：『我是天皇陛下的侍從武官長……』

本莊繁雖然逃脱了國際軍事法庭的審判，但他卻逃脱不了歷史對他的懲罰，他被永遠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

R. D. S. 2011.11.17

南次郎被判無期徒刑

南次郎，一八七四年生于日本大分縣，一八九五年畢業于日本陸軍士官學校。一九〇三年，南次郎從陸軍大學畢業後，歷任騎兵第一聯隊中隊長、參謀本部參謀、陸軍大學教官、騎兵第一聯隊聯隊長、陸軍省軍務局騎兵課課長、陸軍士官學校校長、陸軍第十六師團師團長、參謀次長、日本駐朝鮮軍司令官等職。一九三〇年，晉升爲陸軍大將。

一九三一年四月十四日，南次郎被陸軍推舉出任若槻内閣的陸相。上任後，南次郎積極推行侵略中國的政策。一九三一年八月十四日，他在日本陸軍師團長會議上發表訓話時說：『滿洲、蒙古和日本之間是有密切關係的』，『滿蒙是日本的生命綫』，鼓勵他們加緊訓練部隊，隨時準備完成『大任』。

一九三一年九月中旬，天皇了解到關東軍要在中國東北發動戰爭的消息後，召見陸相南次郎，詢問有關情況。熟知内情的南次郎面對天皇的追問，裝聾作啞，推説自己毫不知情。當天皇要求南次郎制止關東軍行動時，南次郎爲給關東軍贏得提前行動的時間，借口關東軍屬參謀本部調遣，説應由參謀本部派人阻止。這樣，南次郎就天皇的旨意泄露給參謀本部。參謀本部俄國班班長橋本欣五郎得知這一消息後，立即給板垣征四郎和石原莞爾連發三封密電，稱『内機已露，請在建川到達前行動。』于是，板垣等人將原定在九月二十八日的行動時間提前到九月十八日。

『九·一八』後，南次郎欺騙天皇和内閣，積極支持關東軍侵佔整個中國東北。若槻首相説：

『(事態)一天比一天繼續擴大，我和南(次郎)陸相不知會商了多少次。我每天翻出地圖指給他看，而南就指出日軍今後再不會越出的境界綫，但幾乎每天所得到的都是不顧這些境界綫而擴大了的報告。可是每次南都作了這是最後行動的保證。』在這種情況下，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一日，若槻首相承認他的內閣没有約束陸軍的能力，宣佈內閣總辭職。

若槻內閣辭職後，南次郎改任軍事參議官。此時，關東軍建立僞滿洲國的工作進入緊張階段。南次郎也積極參加進去。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南次郎以軍事參議官的身份，爲天皇作了《滿洲的近況》的專題報告，説服天皇默許了關東軍建立僞滿洲國的計劃。不久，僞滿洲國宣告成立。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南次郎出任關東軍司令官兼日本駐僞滿洲國大使。南次郎不僅竭力加强對僞滿洲國的法西斯統治，還在關東軍參謀長坂垣征四郎的協助下，插手內蒙古和華北，籌劃建立『內蒙古自治政府』和華北五省『自治』政權，企圖使上述地區變爲第二個僞滿洲國。

一九三六年三月，南次郎再次出任日本駐朝鮮軍司令官。爲宣揚『皇軍軍威』，南次郎請木村兵太郎送一千名英國戰俘到朝鮮游街示衆。這些戰俘在游街示衆後，被南次郎送到鐵路、碼頭和煤礦服苦役。由于受到非人的折磨，這些戰俘大多悲慘地死去。

一九四五年九月十九日，南次郎被駐日盟軍總部逮捕，關押進東京巢鴨監獄。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二日，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叛處南次郎無期徒刑。法官在《叛決書》中指出：『早在「九·一八事變」以前，他就參與倡導軍國主義，對外擴張，與滿洲是「日本的生命

綫」的陰謀者具有關係。他事前就知道會發生這個事件。但他沒有採取充分辦法防止其發生。事件發生時，他說陸軍的行動是「正當的自衛」。內閣立即決定不使事件擴大。南也同意實行內閣的政策，但作戰地區一天一天擴大，南未曾採取充分手段抑制陸軍。在內閣會議中，他曾支持陸軍所採取的步驟。』『由于他未曾採取措施統制陸軍以支持首相和外相，使內閣終于垮台了。其後，他倡導日本應接受保衛滿洲和蒙古。他早就倡導，必須在滿洲建立新的國家。』

一九五四年，南次郎因獲假釋出獄。第二年，病死在家中。

梅津美治郎嗚呼獄中

梅津美治郎，日本大分縣人，一八八二年生。一九〇三年，畢業于日本陸軍士官學校，一九一一年，從陸軍大學畢業後，歷任駐德國、丹麥使館武官、參謀本部德國班班長、陸軍省軍務局軍事課課長、編制動員課課長、第一師團第一旅團旅團長、參謀本部總務部部長、參謀本部部附等職。

一九三四年三月五日，梅津美治郎出任天津駐屯軍司令官。此時，日本軍部正圖謀侵佔華北，企圖變華北爲第二個僞『滿洲國』。梅津美作爲天津駐屯軍司令官，積極推行日本軍部的侵華政策，不斷在平津地區製造事端，向中國政府施加壓力。

一九三五年五月三日，梅津美治郎派人指使天津日租界內的青紅幫分子，刺殺了漢奸、僞『滿洲國』中央通訊社長記者、天津《振報》社長自逾桓和《國權報》社長胡思溥。梅津遂以此事爲

借口，向時任國民政府部長兼北平軍分會委員長的何應欽施加壓力，威脅說：『事態恐會擴大』。恰在此時，東北的抗日義勇軍孫永勤部被日軍壓迫進關內。梅津又以此爲借口，單方面宣佈：北平和天津也應列爲停戰區。

此後，梅津利用這兩件事大造聲勢，要求國民黨軍隊撤出平津，罷免與這兩件事有關的憲兵第三團團長蔣孝先、藍衣社天津辦事長處長何一飛等人。爲迫使中國政府接受上述條件，梅津還調集軍隊在省政府門前游行，並請求關東軍在北平和天津上空低飛示威。

在日本的威逼下，中國政府採取了免去天津市市長張延諤，調走第五十一軍等措施。但梅津並不滿足，六月九日，又向何應欽提出最後通牒，要中國政府取消河北省内所有的國民黨黨部、要國民黨中央軍離開河北省境等四項措施，『若在六月十二日以前不能答覆，日軍會採取斷然措施。』爲此，梅津讓關東軍和天津駐屯軍作出一副隨時準備進攻平津的架式。爲免事態擴大，中國政府屈辱地接受了梅津的最後通牒。

但梅津得寸進尺，六月十一日，又將日本單方面擬定的《覺書》送交給何應欽，要求何應欽簽蓋印章，予以承認。七月六日，何應欽屈于梅津的壓力，覆函梅津，表示接受《覺書》所提各項要求。梅津的《覺書》和何應欽的覆函歷史上被稱爲《何梅協定》。

梅津美治郎炮製的《何梅協定》使日軍不費一炮一彈便佔領了平津一帶的戰略要地，爲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埋下了禍根。

由于炮製《何梅協定》有功，梅津于一九三五年升任第二師團師團長，後又擔任陸軍省次官。

全面侵華戰爭爆發後，梅津又擔任日本華北方面軍第一軍司令官，指揮日軍在中國犯下累累暴行。

一九三九年九月，關東軍司令官植田謙吉因諾門坎慘敗而被免職。日本軍部調梅津任關東軍司令官。梅津上任後，對蘇採取緩和態度，致使關東軍在他任期內，沒有與蘇軍發生衝突。在此期間的一九四〇年八月，梅津美治郎晉升爲陸軍大將。

一九四四年七月，梅津美治郎回國，擔任參謀本部參謀總長。此時，日本的失敗已成定局，但梅津仍作垂死掙扎。在中國戰場上，他批準日軍先後進行了桂柳會戰，老河口戰役，芷江戰役；在太平洋戰場上，他指揮日軍進行了萊特決戰、呂宋決戰、琉球島戰役和冲繩戰役。可梅津並不能挽救日本滅亡的命運，到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已走投無路。

《波茨坦公告》發表後，梅津反對接受，並主張盡全力進行最後一搏。後來，又不顧外相東鄉等人的强烈反對，極力主張有條件投降。在天皇做出『聖裁』後，梅津爲逃脫審判，開始大量銷毀罪證。九月二日，在天皇的親自敦請下，梅津美治郎極不情願地代表軍部出席了日本向同盟國投降簽字儀式，親手爲他畢生效力的日本軍國主義『事業』畫上句號。

一九四六年四月二十六日，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國際檢察團下令逮捕了梅津美治郎和重光葵，這是最後一批被捕的日本甲級戰犯。

五月三日，遠東軍事法庭開庭審判日本甲級戰犯。檢查官指控梅津美治郎犯有策劃並參加侵略中國、美國等國家的多項戰爭罪行。在審判期間，梅津雖也像土肥原賢二一樣沉默不語，但卻

聘請了美國律師布來克尼和日本律師宮田光雄、小野喜作等人爲他辯護，企圖減輕罪責。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二日，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判處甲級戰犯梅津美治郎無期徒刑。由于梅津身患重病，不能出庭，由他的美國律師布來克尼代表接受了判決。

一九四九年一月八日，梅津美治郎在東京巢鴨監獄一命嗚呼。

山田乙三走上蘇聯軍事法庭

山田乙三，一八八一年出生于日本長野縣。一九〇二年，畢業于日本陸軍士官學校，一九〇五年，日俄戰爭爆發，參加對俄戰爭。戰爭結後，入陸軍大學深造。一九一二年，山田乙三從陸大畢業後，歷任陸軍第二十六騎兵聯隊聯隊長、陸軍大學教官，陸軍騎兵學校教務部長、騎兵第四旅團旅團長、陸軍交通學校校長、陸軍士官學校校長、關東軍第十二師團師團長、關東軍第三方面軍司令官等職。一九三八年，山田乙三晉升爲陸軍大將，任中國派遣軍司令官。一九三九年十月至一九四四年六月，先後擔任軍事教育總監和日本防衛司令官。

一九四四年七月十一日，山田乙三接替梅津美治郎擔任關東軍司令官兼日本駐僞滿洲國全權大使。自一九三二年僞滿洲國建立到一九四五年日本戰敗投降，關東軍共有七任司令官。山田乙三是最後一任。

山田局三上任之日，正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節節勝利，日本帝國主義走向窮途末日之時。爲將東北變成日本的永久殖民地，大本營交給山田乙三的使命是，無論形勢發生什麼樣的變化，即

使關東軍被迫進行游擊戰爭，也絕不可丟失滿洲。山田乙三上任後，根據大本營的訓令，殘酷迫害東北人民。僅在一九四五年三月二十日這一天，從鶴崗矯正院一處就抬出了三十具中國老百姓的屍體。在加强法西斯統治的同時，山田乙三還以『支援聖戰』爲名，大肆掠奪東北人民的財物。

爲了準備對蘇戰爭，山田乙三强征東北老百姓修築軍事工事。由于勞動與生活條件十分惡劣，大批勞工被迫害致死。此外，因太平洋戰爭爆發，大批關東軍精鋭部隊被調往太平洋戰場，使關東軍在東北的戰鬥力急劇下降，山田乙三一邊下令從日本移民中征召後備兵員，一邊積極準備細菌戰。山田乙三在視察第七三一部隊時説：『我相信七三一部隊的生産能力足以供應在大規模戰爭中使用細菌武器。』結果，到一九四五年七月，第七三一部隊所儲備的細菌武器『足以毁滅全人類』。

但細菌武器並不能挽救日本關東軍覆滅的命運。一九四五年八月九日〇時，蘇聯紅軍出動百萬大軍，在遠東蘇軍總司令華西列夫斯基元帥指揮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迅速擊潰了關東軍。八月九日晨，山田乙三命令銷毁所有可能暴露關東軍準備細菌戰的罪證。十日，他狼狽逃出長春，向瀋陽撤退。十七日，被迫發出了向遠東蘇軍總指揮部進行投降談判的命令。遠東蘇軍總指揮部在收到山田乙三命令關東軍各部隊立即停止軍事行動，向蘇軍繳械的無綫電報後，華西列夫斯基元帥于當日十九時發電報給山田乙三，要求關東軍『從八月二十日十二點起在全綫停止對蘇軍採取任何軍事行動並繳械投降』。八月十八日三時三十分，山田乙三通過電台答覆蘇軍總指

揮部，準備履行一切投降手續。從這天起，關東軍開始向蘇軍繳械投降。不久，山田乙三也成了蘇聯紅軍的俘虜，被關押進蘇聯西伯利亞戰俘收容所。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蘇聯濱海軍區軍事法庭在遠東的伯利城開庭審判以山田乙三爲首的十二名日本細菌戰犯。檢察官斯米爾諾夫對山田乙三以關東軍總司令資格領導第七三一和第一〇〇兩個特種部隊準備細菌戰爭的罪行起訴。山田乙三對此供認不諱。經過六天的審判，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三十日，蘇聯濱海區軍事法庭庭長契爾特科少將宣佈：叛處山田乙三在勞動感化營內禁閉二十五年。

一九五〇年七月，根據中國政府和蘇聯政府達成的協議，山田乙三等九百六十九名在中國犯有嚴重戰爭罪行的日本戰犯被移交給中國政府。山田乙三在撫順戰犯管理所接受教育和改造。由于山田乙三認罪態度良好，積極接受改造，中國政府將山田乙三等人特赦回國。

一九六五年七月十八日，山田乙三在日本病死。

東條英機走向絞刑架

東條英機，一八八四年生于日本東京，一九〇五年畢業于日本陸軍士官學校。一九一五年，東條英機從陸軍大學畢業後，先後擔任近衛步兵第三聯隊中隊長、陸軍省副官，日本駐德國大使館武官等職。

在任武官期間，東條英機召集日本駐歐洲各國使館的武官永田鐵山、岡村寧次等十一人，在

德國南部的巴登溫泉聚會，訂立『盟約』，發誓要共同刷新陸軍人事，改革軍隊體制，推行總體戰體制，完成發動侵略戰爭的準備。

爲此，東條英機回國後，絞盡腦汁，四處鑽營，爲自己謀取職位和權力，先後擔任陸軍省整備局動員課課長，參謀本部作戰課課長等職務。由于東條英機辦事果斷，爲人兇狠猖狂，獲得了『剃刀東條』的綽號。

一九三五年九月，日本政府和軍部任命東條英機爲關東軍憲兵司令官兼警務部部長。東條英機上任後，大力增加關東軍憲兵隊的勢力，向僞滿洲國各行政區派出憲兵隊、憲兵分隊和派出所，大肆屠殺我愛國同胞，殘害抗日志士。

一九三七年三月一日，東條英機又接替板垣征四郎擔任關東軍參謀長。東條英機上任時說：『現在，我受天皇之命擔任參謀長之要職。作爲在國內外有崇高威望的前參謀長之後進行工作，我甚感惶恐。尤其當此國內外多事之秋，考慮關東軍的任務以及圍繞滿洲國週圍之情勢，越發痛感責任之重大。今後要很好地體察司令官閣下之意圖，依靠各方面的協力，一道完成任務。』爲完成他的『任務』，東條英機協助關東軍司令官植田謙吉，制訂了一個大規模的『討伐』抗日聯軍的計劃。在三萬多日僞軍的殘酷圍剿下，使東北抗日聯軍遭到了很大的損失。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中日全面戰爭爆發後，東條英機立即指揮由三個旅團，二個步兵支隊組成的關東軍『察哈爾兵團』（又稱『東條兵團』）向察哈爾和綏遠撲來。『東條兵團』于八月十二日越過長城，八月二十四日即佔領張家口，九月十二日又佔大同。『東條兵團』進攻神速，贏

得日本軍部的連聲贊嘆，被吹捧爲關東軍的『閃電式作戰』。東條英機也因此獲得日本政府在全面侵華戰爭後頒發的第一張『戰功獎狀』。

一九四〇年七月十八日，東條英機出任第二次近衛內閣的陸相。東條上任後，在强化侵華戰爭的同時，積極推動日本政府的『南進』方針。一九四一年十月，東條英機迫使不贊成『南進』的近衛文麿辭職。十八日，東條英機出任內閣首相。十二月八日晨，日軍突襲美國海軍太平洋艦隊基地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在戰爭爆發時雖進展神速，但不久就陷于困境。一九四四年七月十八日，東條英機不得不率領內閣總辭職。

日本戰敗投降後，東條英機收到許多要他自殺以向國民謝罪的來信。東條爲逃脱正義的審判，也準備自殺。他讓醫生在自己胸前標出心臟的部位，準備在美軍逮捕他時開槍自殺。

九月十一日下午一時，三十多名美國憲兵包圍了東條的住宅，準備逮捕他。東條英機遂向心臟部位開槍。但子彈没有打中心臟。十幾分鐘後，東條英機忍着疼痛爲自己辯解，他説：『大東亞戰爭是正當的，正義的。我對不起我國和大東亞各國所有民族。我不願在征服者的法庭上受審。我等待着歷史的公正裁決。』當日本醫生搶救他時，他又説：『我没有朝腦袋開槍，因爲我要人們認出我的容貌，知道我已死了。』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二日，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判處罪大惡極的頭號日本甲級戰犯東條英機死刑。

十二月二十一日，東條英機將他寫的一首俳句交給監獄教誨師花山信勝，並提出一個要求：

臨死前喫一頓日本式的飯菜。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〇時，東條英機與土肥原賢二，松井石根，武藤章一同被押上絞架。臨死前，東條英機提議：『請松井君帶領大家三呼天皇陛下萬歲。』于是松井石根嘶喊一聲：『天皇陛下萬歲！』

東條等隨聲附和：『萬歲！萬歲！萬歲！』

〇時十分三十秒，東條英機氣絕斃命。當天晚上，東條英機等七名甲級戰犯的屍體被秘密火化，骨灰被美國軍艦運到一百海里以外，並撒進大海中，目的是不給日本軍國主義分子留下可以悼念的遺物。

石井四郎被美國『赦免』

石井四郎是臭名昭著的細菌戰犯。他于一八九二年六月二十五出生于日本千叶縣山武郡千代田村的一個大地主家庭。一九二〇年，從京都帝國大學醫學院畢業後，石井四郎入近衛師團第三步聯隊服役。一九二四年，石井四郎被保送進京都帝國大學研究生院學習，專門研究細菌學、血清學、防疫學和病理學。一九二七年獲醫學博士學位。在這期間，石井四郎先是對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歐洲列强進行的毒氣戰產生了濃厚的興趣，繼而設想製造細菌武器用于戰爭。他說：『日本沒有充分的五金礦藏及其他製造武器所必需的原料，所以日本務必尋求新式武器，而細菌武器便是其中一種。……所有其他各强國都在這方面進行相當的工作，因而在這方面日本也不能落後。』

一九三三年十月，關東軍在哈爾濱附近的背陰河地區建立了細菌研究所，石井四郎被任命爲所長。爲保守秘密，這個細菌研究所對外稱『東鄉部隊』。一九三六年八月，根據天皇密令，參謀本部和陸軍省以『東鄉部隊』爲基礎，建立了一個更大的專門研究和製造細菌武器的基地，這基地對外公開稱『關東軍防疫給水部』，石井四郎是首任部長。一九四一年八月，爲統一部隊番號，『關東軍防疫給水部』改稱爲關東軍第七三一部隊，仍由石井四郎擔任部隊長。

第七三一部隊是日本帝國主義在中國建立的研製細菌武器的主要基地，它擁有製造細菌武器和準備細菌戰所必需的龐大的、現代化的技術設備，以及大批研究人員。在石井四郎的指導下，第七三一部隊將鼠菌和霍亂菌作爲進行細菌戰的兩種『基本武器』。爲大量製造細菌，石井四郎發明了細菌培養器。石井四郎還培養出了乾燥鼠菌，這是一種比普通鼠疫毒性大六十倍的變性鼠菌。經過大量的比較研究，石井四郎將跳蚤選爲散佈鼠疫菌的媒介物。爲將帶菌的跳蚤有效地送達目的地，而又不留下罪證，石井四郎煞費苦心地研製出一種新式硅藻土製炸彈，又稱爲『石井式細菌炸彈』。這種炸彈是用粘土製造的，它可以在低空條件下用少量低溫炸藥引爆，即可爆炸成碎片，既不會損傷生物，也不會留下物證。

由于石井四郎不遺餘力地研製細菌武器，並有大量的『發明製造』，被日本軍部吹捧爲『世界少有的』、『首屈一指』的細菌戰專家。

石井四郎進行細菌武器的研製和發明，都是活人身上進行實驗的。其中最慘無人道的是用活人進行生理解剖實驗。第七三一部隊一名曾親眼目睹過活人解剖的隊員，在幾十年後膽戰心驚地

回憶說：『在手術台上，對受實驗者施行麻醉後，便開始動刀了。手術刀從喉嚨外一條綫割下來，從左邊繞過肚臍，一氣割到陰部（恥骨縫），受害者渾身是粘乎乎的鮮血，露出了白色的脂肪。手術刀在腹腔上打開一個小孔，執刀者插入兩個手指，使勁地把腹壁往上一拉，插入鐵夾，然後把手術刀插進腹腔裏，往下方割，裏面露出複雜的糾結在一起的内臟……』受害者就這樣不知不覺被活活地解剖了。據不完全統計，僅在一九四〇年至一九四五年八月這段時間裏，第七三一部隊就殘害了三千多人。此外，石井四郎還親自率領第七三一部隊將細菌武器大規模用于侵華戰爭，殺害中國軍民幾千人。

一九四二年七月，石井四郎因貪污軍費被解除了第七三一部隊長職務。但在日本帝國主義戰敗前夕，日本參謀本部爲作垂死掙扎，喪心病狂地進行了一場細菌戰，重新啓用了石井四郎，將他晉升爲軍醫中將，重新擔任第七三一部隊長。石井四郎就任後，發狂地喊道：『關東軍除細菌戰外，没有得勝希望。』但石井四郎還没來得及動用他的細菌武器，關東軍就被蘇軍徹底擊敗。在撤退前夕，石井四郎下令銷毁了所有的罪證。爲了不走漏其罪惡秘密，石井四郎于八月十六日在長春火車站威脅準備撤退的第七三一部隊隊員和家屬說：『日本戰敗了，你們就要回到國内去。你們無論到哪裏，都要保守第七三一部隊的秘密。如果誰要泄露了軍事機密，我石井就是追到天涯海角，也要把他找到。』說完就先期逃遁回國。

一九四六年五月，當遠東國際軍事法庭開庭審判甲級戰犯時，蘇聯政府根據已掌握的材料，要求將石井四郎列爲甲級戰犯逮捕並審判。但美國政府出于其反共目的，決定給予石井四郎等第

七三一部隊的骨幹以庇護，以換取他們提供有關製造細菌武器的材料。一九四七年九月八日，美國國務院給太平洋戰區美軍司令兼駐日美軍最高司令麥克阿瑟發來一封密電：『美國當局從美國安全保障的立場出發，不追究石井及其同伙的戰犯責任。』因爲『日本的細菌經驗，對美國的細菌研究計劃具有重要價值，』『第七三一部隊的細菌資料對于美國國家安全保障上的價值，遠遠比利用它追究石井等人的戰犯罪重要。』這樣，雙手沾滿中國人民鮮血的細菌大戰犯石井四郎，輕易地被美國政府『赦免』了。

一九五九年十月九日，石井四郎因患癌症病死在日本千叶縣的家中。

板垣征四郎留下絶命詩

板垣征四郎，日本岩手縣人，一八八五年生。一九〇四年從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畢業。一九一六年從陸軍大學畢業後，入參謀本部服務，歷任參謀本部部員，日本駐華使館副武館助理等職。

一九二九年五月，晉升爲陸軍大佐的板垣征四郎調任關東軍司令部高級參謀。板垣征四郎任關東軍高級參謀期間，策劃發動了『九·一八』事變，參與拼湊『滿洲國』。因此，板垣征四郎受到日本統治集團的賞識，平步青雲，于一九三二年破格晉升爲少將，一九三六年八月又升爲中將，並出任關東軍參謀長。

一九三七年三月，板垣征四郎調任日本陸軍中最精鋭的第五機械化師團師團長。『七·七』事變後，板垣征四郎率第五師團參加侵華戰爭，指揮部隊進犯華北。同年九月，該師團一部在平型

鬮遭八路軍重創，被殲一千餘人。一九三八年四月，板垣師團又在臨沂被張自忠和龐炳勛合力擊敗。

在戰場上連遭敗績的板垣征四郎，在官場上卻官運亨通。一九三八年六月，板垣出任第一次近衛組閣的陸相。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又留任平沼内閣陸相，繼而調任日本中國派遣軍總參謀長。一九四一年四月，板垣征四郎成爲陸軍大將，並改任日本駐朝鮮軍司令官。一九四五年四月，板垣征四郎出任日本第七方面軍司令官，指揮所部在爪哇、蘇門答臘、馬來亞、安達曼、尼科巴群島及婆羅州等地同英、美軍隊作戰。一九四五年九月，板垣征四郎在新加坡率第七方面軍向英軍投降。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駐日盟軍總部下令逮捕了甲級戰犯板垣征四郎。在法庭上，板垣被起訴犯有侵略中國等十項戰爭罪行，板垣拒不認罪。當檢察官問到實質問題時，板垣就生硬地頂撞說：『不知道』。來自中國的檢察官倪征㬋，就板垣犯下的策劃『九·一八』事變、誘拐溥儀、成立僞滿洲國等侵略中國的罪行，對他進行了三天的訊問，並特地傳當時被拘押在蘇聯的僞滿洲國皇帝溥儀到庭作證，迫使板垣承認所犯侵華罪行。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二日，遠東軍事法庭判處板垣征四郎絞刑。十二月二十三日夜十一時四十分，板垣被押進東京巢鴨監獄行刑室。死到臨頭的板垣征四郎還不忘往臉上搽脂抹粉。他對教誨師花山信勝博士說：『根據波茨坦宣言，我們就是永遠和平的犧牲者了，而跟隨日蓮和尚，爲了永遠和平而拋棄我們這把醜骨頭，是變糞土爲黃金的事，因此，我們可以瞑目了。』他還將所

作的三首詩交給了花山博士。第一首：『雙膝跪拜神靈前，一心乞恕罪不淺。』第二首：『無限懷念，中國友人。于今乃見，東亞之外，復有東亞。』第三首：『朝夕待死，片刻亦是。人生之途，全力以赴。』

十二時二十分，板垣被押上絞刑架。

十二分鐘以後，法醫宣佈板垣征四郎斃命身亡。

石原莞爾逃脱正義的審判

石原莞爾，日本山形縣鶴岡市人，一八八九年生。一九〇九年畢業于日本陸軍士官學校。一九一八年從陸軍大學畢業後，歷任陸軍大學教官、關東軍司令部高級參謀、關東軍司令部作戰課課長、作戰部部長、關東軍副參謀長等職。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任日本舞鶴要塞司令官，後又調任駐守京都的第十六師團師團長，同時晉升爲陸軍中將。一九四一年三月，轉入預備役，任立命館大學國防研究所所長。

石原是日本侵略擴張政策的理論奠基人之一。他在所撰《現在及將來的日本國防》、《戰爭史大觀》、《關東軍領有滿蒙計劃》等文章中，提出了一系列的侵略理論和主張，被稱爲『石原構想』。

石原認爲，源于中亞的兩支人類文明發展到今日，已形成隔着太平洋而相互對峙的局面。到一定時期，這兩支文明必將通過戰爭而走向統一。這次人類最後的大戰爭將是以日美爲中心而進

行的世界大戰爭。這場世界大戰爭首先是持久戰爭，最後是決戰戰爭。爲使日本在未來的世界大戰中能打好持久戰，並取得決戰的勝利，首先必須佔領中國東北，加以開發，使之成爲日本以戰養戰的戰略物資供應基地。侵佔東北，是『石原構想』中第一步要實現的目標。

『九・一八』事變使『石原構想』的第一步變爲現實。接着，石原提出第二步目標，即制服蘇聯，解除東北之威脅，以便在南洋及中國推行日本國策。而實現這一步目標的前提是進行國家改造。石原認爲，如果不建立軍部獨裁政權，就無法發動侵略蘇聯的大規模戰爭。爲此，一九三六年末，石原秘密擬定了一個《政治工作五年計劃》，準備建立『日本國權社會黨』，擬在一九四一年奪取全國政權，建立以他本人爲核心的，包括板垣征四郎在內以關東軍『滿洲派』爲主的政府，進而全面實現『向南洋發展、在決戰中打敗美國』、稱霸世界的『石原構想』。該計劃披露後，有人評論説，如果條件具備，石原莞爾很可能成爲日本的希特勒或墨索里尼。

石原莞爾還是『石原構想』的積極推行者。『九・一八』事變和僞滿洲國的建立是他參與其中的『杰作』。在全面侵華戰爭中，他也是個急先鋒。可以説，石原雙手沾滿中國人民鮮血，是侵華戰爭的罪魁禍首之一。因他自稱篤信佛教，所以有『手持屠刀的佛』之『美譽』。

石原莞爾素來自命不凡，在日本陸軍中以『天不怕地不怕』出名，他以玩世不恭的態度對待所有上司，故而升遷很慢。東條英機任陸相後將其排擠出現役。

日本投降後，石原將自己裝扮成受東條英機迫害的『和平戰士』，同時討好美國人，發表文章宣揚建設不要戰爭的文明。『與美國決戰』的論調消聲匿亦了。見風使舵的絕招使石原逃脱了

正義的審判。

一九四九年八月十五日，石原莞爾病死家中。其追隨者在他的墓碑上刻了七個字：『南無妙法蓮花經』。

河本大作病死監獄

河本大作，一八八二年出生于日本兵庫縣。一九〇三年畢業于日本陸軍士官學校。一九一四年，從陸軍大學畢業後，歷任參謀本部中國班班長、步兵第三十八聯隊中隊長、日本華中派遣隊參謀、參謀本部第一部、第二部和第四部部員、日本駐華公使館武官等職。一九二六年三月，河本大作出任關東軍司令部高級參謀，同時晉升爲陸軍大佐。

河本大作到東北後，迫不及待地提出了對中國採取積極進攻態勢的侵略主張。他向士兵灌輸『滿蒙是日本生命綫』等侵略思想，糾集一批法西斯分子，向日本政府和軍部『請願』，要求儘快解決滿蒙問題。與此同時，他督促關東軍加緊訓練，以完成戰爭準備。

一九二七年六月，河本大佐作爲關東軍司令官武滕信義的隨員出席了首相田中義一召集的『東方會議』。會上，河本大佐主張用武力解決滿蒙問題。最後，『東方會議』通過的『根本解決滿蒙問題』決議中，基本上接受了河本關于阻止北伐軍進入東北、解除奉軍武裝和迫使張作霖簽訂賣國條約的意見。

一九二八年五月，張作霖被蔣介石打敗，被迫向關外撤退。關東軍準備利用這個時機解決奉

軍武裝，但没有得到天皇的批准。河本大作心尤不甘，遂秘密策劃暗殺張作霖、伺混亂之機突襲東北軍。一九二八年六月四日凌晨五時三十分，皇姑屯車站一聲巨響，張作霖的專列被炸起火。張作霖身負重傷，不久斃命身亡。張作霖死後，主持東北大局的臧式毅秘不發表，使東北没有出現關東軍預料中的混亂局面。河本大作的陰謀没有得逞。

『皇姑屯事件』震動了世界。日本國内要求調查真相的呼聲也很高。但由于關東軍司令官村岡長太郎的庇護，何本大作僅受了一年的停職處分。期滿後，經陸相阿部信行介紹，河本充任『東京中日實業公司』顧問。由于該公司專做與陸軍有聯繫的交易，所以河本雖退出現役，但仍與軍部保持密切聯繫，繼續從事侵略中國的活動。

『九·一八』事變前夕，河本大作專程到瀋陽，向關東軍提供爆炸柳條溝鐵路的活動經費。他還到大連和朝鮮分別會晤滿鐵理事十河信二和朝鮮軍司令部參謀中山大佐，請求他們支援關東軍。『九·一八』事變後，應本莊繁司令官的請求，河本到西安縣，指揮關東軍霸佔了原由張學良經營的西安炭礦。並擔任西安炭礦總辦。後來，河本大作又擔任『滿洲炭礦株式會社』理事長。爲掠奪中國的煤炭，河本大作實行野蠻殘暴的『要煤不要人、用人換煤』的『人肉』開採方法，絲毫不管中國礦工的死活。結果，阜新煤礦每出煤二百噸就有一名中國礦工喪命。撫順煤礦僅在一九三九年一年就傷亡礦工一萬零九十名，平均七名礦工中就有一人死亡。

一九四二年九月，應山西日軍司令官岩秀義雄和參謀長花谷正的請求，日本政府又任命河本大作爲『山西産業株式會社』社長。在河本的領導下，山西産業株式會社展開了瘋狂的掠奪戰。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但河本大作卻不甘心失敗。他一方面將『山西産業株式會社』的資産全部移交給閻錫山，一方面唆使日本山西派遣軍拒絶接受八路軍的受降命令，只向閻錫山的軍隊繳械。全面内戰爆發後，河本大作又伙同閻錫山的日本顧問城野宏等人，發起『在晉日人殘留運動』，脅迫一部分日軍官兵加入國民黨第二戰區太原綏靖公署暫編獨立第十總隊，直接參加中國内戰。

一九四九年四月，中國人民解放軍一舉殲滅了暫編獨立第十總隊。四月二十九日，太原一解放，太原市公安局便逮捕了參加侵華戰爭和内戰的『雙料』戰犯河本大作。

一九五五年八月二十五日，河本大作病死于太原戰犯監獄。

土肥原賢二引頸受刑

土肥原賢二，日本岡山縣人，一八八三年生。一九〇四年畢業于日本陸軍士官學校。一九一二年從陸軍大學畢業。一九一三年，土肥原賢二作爲坂西利八郎中將的副官，被派遣來中國。從此開始了其在中國長達三十餘年的間諜生涯。

土肥原賢二到中國後，利用職務之便，不僅學會了中國的語言，熟知了中國的政治、歷史及風土人情，而且還和中國許多軍閥和政界要人建立起了微妙的個人關係，成爲日本陸軍特務系統中有名的『中國通』。

土肥原賢二在中國進行的所有特務活動都是圍繞着如何將中國變爲日本的殖民地這個目的進

行的，並且很多是秉承關東軍的旨意活動的。

一九二〇年，土肥原賢二奉東京和關東軍的命令，扶持奉系。一九二四年十月，『北京政變』後，土肥原通過暗中停止銀行兌換等手段，致使吳佩孚發行的紙幣破產，加速了直系軍閥的垮台。一九二五年奉系將領郭松齡倒戈後，土肥原直接向日軍參謀本部建議，調遣駐朝鮮龍山的日軍阻擊郭部，援助張作霖。結果，郭松齡兵敗自殺。

當然，土肥原在中國最成功的陰謀活動當屬一九三一年底幫助關東軍劫持溥儀，建立僞滿洲國一事。（此事已在前文中詳述，這裏略過。）除這件『得意』之作外，土肥原還在一九三五年，關東軍和天津駐屯軍策動『華北五省自治運動』的陰謀活動中，充當了主謀人。

但土肥原在中國的特務活動也有失敗的時候。其中最大的失敗，即是一九三八年策動吳佩孚建立傀儡政權工作的失敗。

由于土肥原擅長從事陰謀詭計的策劃活動，被國際新聞界稱爲『東方勞倫斯』（勞倫斯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英國最著名的間諜）。三十年代英國駐日本大使羅伯特·克雷吉在談到土肥原時說：

『歷史將無可辯駁地表明，日本陸軍的既定政策就是（在中國）挑起各種爭端，從各種挑釁事件中取利，在所有這一切陰謀詭計、阿諛討好和兇相畢露的威脅聲中，日本方面有一個小人物始終在活躍地上竄下跳——那就是土肥原大佐所扮演的角色。……無論什麽地方，只要有他沾邊，哪怕是寫上幾個字，作上一番鼓動，就注定要出亂子……無疑，他搞這一套的功夫是爐火純

青了。他在中國的各社會階層中製造糾紛，一般是無往不勝的，藉此而爲侵略者鋪平道路』。

鑒于土肥原賢二在中國的『成功』活動，東京從一九三二年到一九四五年期間，先後任命土肥原爲日軍第九旅團旅團長、第十四師團師團長、陸軍航空總監、軍事參議官、日軍第七方面軍司令官、軍事教育總監等職。一九四一年四月破格晉升他爲陸軍大將。

一九四五年九月十三日，駐日盟軍總部逮捕了甲級戰犯土肥原賢二。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二日，遠東軍事法庭判處其死刑。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夜，土肥原賢二同東條英機等人在東京巢鴨監獄被處以絞刑。

抗日戰爭勝利五十年







《日本關東軍獸行內幕》 徐付群等著

《香港密約 —— 日蔣和談秘檔》

李紅喜、周冰、劉夕海編著

《血祭太陽旗 —— 百萬日軍 亡命中國》

柳 風著

半個世紀以前，中國抗戰勝利，日本無條件投降，歷時十五載的侵華戰爭結束。當時日軍的暴行兇殘非常，尤其是關東軍在中國東北搞細菌試驗的“黑太陽”罪行，更令人髮指……其實，在抗戰期間，中日之間的和談不下十次，而且在香港、澳門皆有密談，秘檔今天始陸續曝光……血債血償，這場侵略戰爭除了對中國人造成不可治癒的傷口外，日本人在戰爭中同樣受到傷害。在五十年後的今天，我們仍須僅記這場戰爭，時刻反省。

利源書報社／發行　各大書局均有代售　　利文出版

日本關東軍獸行內幕

作者 —— 徐付群等著
出版 —— 利文出版社
香港九龍界限街33號4樓C座
發行 —— 利源書報社有限公司
香港九龍洗衣街245-251號地下
Tel: 2381-8251 Fax: 2397-1519
美國發行 —— 華文書報雜誌社
Chinese Periodical Distribution, Inc.
507 S. Stoneman Avenue
Alhambra, CA 91801 U.S.A.
Tel: (818) 282-0361 (818) 282-0387
Fax: (818) 282-9370
印刷 —— 陽光印刷製本廠
香港柴灣安業街3號6字樓G座
版次 —— 1995年7月初版



ISBN 962 7766 42 9
Published and Printed in Hong Kong

提起侵華的關東軍，人們會直接聯想起其在中國東北搞細菌試驗的"黑太陽"罪行，但事實上，這僅僅是日本侵華史上冰山一角。由於關東軍是日本陸軍方面最兇殘、精銳、狂野的部隊，因此被日軍軍國主義利用爲整個侵華的先遣和特別任務的執行隊。事實上，日軍的每個侵華行動，都或多或少與關東軍有關，關東軍的勢力甚至反過來左右了日本中央本部……

定價港幣58元

Published & Printed in Hong Kong

